国际移民组织（IOM）

联合国移民署

#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全球化智库（CCG）译

报告仅代表作者意见，而非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观点。 报告中涉及的任何指称与材料均不代表 IOM 对任何国家、地区、城市、主权、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意见。

IOM 秉持人道及有序地移徙将惠及移民个人和社会的原则。 作为政府间组织，IOM 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伙伴一道致力于帮助应对移民问题；促进（全球）对移民事务的理解；鼓励通过移民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维护移民的个人尊严和福祉。

出版者：国际移民组织（IOM）
17 route des Morillons
P.O. Box 17
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电话：+41 22 717 911
传真：+41 22 798 6150
E-mail: hq@iom.int
网址：www.iom.int

ISSN 1561-5502
ISBN 978-92-9068-742-9

封面照片
上：埃塞俄比亚，金比，南苏丹难民走进一个位于中途站的帐篷。 ©IOM（摄影：Rikka Tupaz)
中：韩国首尔景福宫。该景点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 IOM（摄影： Muse Mohammed）
下：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享受周末购物的人们。©IOM（摄影：Muse Mohammed）

Copyright 2107 国际移民组织（IOM）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未获出版者事先书面许可，此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复制，储存于检索系统，或以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包括电子，机械，复印，录音或其它方式传播。

国际移民组织（IOM）

联合国移民署

#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全球化智库（CCG）译

此书是众多合作者和贡献者在编辑们的指导下大力合作的成果。《世界移民报告 2018》项目从 2016 年 9 月开始，于 2017 年 11 月由总干事在第 108 届 IOM 理事会正式发布后结束。

报告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观点。报告中涉及的任何指称与材料均不代表 IOM 对任何国家、地区、城市、主权、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意见。

我们已尽全力来核实数据以保证报告中数据的精确性。对于可能遗留的错误和疏漏，我们深表歉意。除非另外指出，该报告不涉及 2017 年 6 月后的数据或事件。

照片背后的故事可在第五页找到。

# 编辑，评论与制作团队

| | |
|---|---|
| 编　　辑 | Marie McAuliffe（IOM）和 Martin Ruhs（牛津大学） |
| IOM 评论者 | Jason Aplon,Gervais Appave,Tara Brian,Richard Danziger,Jill Helke, Louis Hoffmann,Frank Laczko,June Lee,Mathieu Luciano,Laura Lungarotti, Marina Manke,Joel Millman,Daria Mokhnacheva,Michael Newson, Ahn Nguyen, Carlotta Panchetti,Anna Platonova,Tauhid Pasha,Marzia Rango 和 Erica Usher |
| 摄　　影 | Muse Mohammed, Carolina Celi, Amanda Nero 和 Rikka Tupaz |
| 制作协调者 | Valerie Hagger |
| 文 字 编 辑 | Karl Muller 和 Olga Sheean |
| 报告设计和排版 | Marie McAuliffe, Valerie Hagger, Mae Angeline Delgado 和 Harvy Gadia |
| IOM 项目团队 | Marie McAuliffe, Marco Pedrotti ( 分部项目 ), Sanjula Weerasinghe ( 分部项目 ), Alexandra M. Goossens ( 分部项目 ), Adrian Kitimbo ( 分部项目 ), Mark McCarthy ( 分部项目 ), Eleni Alexandrou ( 分部项目 ), Juan Cava Quintero ( 分部项目 ), Mohamad Elmasry ( 分部项目 ) |
| 全球化智库（CCG）报告中文版翻译团队 | 杨靖皎，应妲，曲梅，牛骁，蒋逸尘，李珊珊 |

# 致谢

编辑在此向所有主题章节的作者和为章节草稿提供建设性反馈的 IOM 与学术界评论者们表示感谢。我们尤其要向 IOM 总干事 William Lacy Swing 和参与此项工作及世界移民报告系列校准的 IOM 高级管理团队致谢，其中包括 Laura Thompson, Gervais Appave, Clarissa Askoul, Jill Helke, Bruce Reed 和 Ovais Sarmad。同时，我们对挪威外交部，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为此项工作提供的财务支持表示感谢。

我们谨向下列对此报告有贡献者致谢：Guy Abel, Graziano Battistella 和 Maruja M.B. Asis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 Mulugeta F. Dinbabo (《非洲人类流动性评论》), Howard Duncan (《国际移民》), Allan M. Findlay, Carla H. Mulder 和 Darren P. Smith (《人口，空间和地点》), Kevin Hannam, Mimi Sheller 和 David Tyfield (《流动性》), Khalid Koser (《难民研究》), Paul Statham (《民族和移民研究》), James Landale, Tarika Lall and Ceri Parker (“世界经济论坛”), Martyn Pearce (“ANU 政策论坛”), Manuel Orozco (“美洲间对话”), Ali Shehzad Malik(IATA), Meredith Klein (麦克阿瑟基金会), Chris Berg (IPA), Christine Hall (CEI), and Nicholas Hunt (《户外》Letters Outside)。此外，Ruhs 教授作为独立顾问以个人身份也为此报告作出了贡献。

# 贡献者

第一章 报告综述：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
作者：Marie McAuliffe 和 Martin Ruhs
研究助理：Adrian Kitmbo 和 Diletta Cordani

第二章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主要贡献者：
Marie McAuliffe, Sanjula Weerasinghe, Mark McCarthy, Marco Pedrotti 和 Marzia Rango
研究助理和其他贡献者：Guy Abel, Julia Black, Shalohm Chikono, Patrice Cluzant, Harry Cook, Kate Dearden, Eliza Galos, Jenna Iodice, Sarah Knight, Daria Mokhnacheva, Nuno Nunes, Tauhid Pasha, Etienne Quillet, Muhammad Rizki, Steffen Schillinger, Helen Seeger, Raùl Soto 和 Brian Guthrie

第三章：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主要贡献者：Guy Abel, Marie McAuliffe, Mark McCarthy, Sanjula Weerasinghe 和 Adrian Kitimbo

研究助理和其他贡献者：Tara Brian, Alexander Doggen, Salvador Gutierrez, Julia Hill-Mlati, Geertrui Lanneau, Lucie Motuin, Alina Narusova, Charles Obila, Sofiane Ouret, Marco Pedrotti, Eva Pons, Stéphane Rostiaux, Naomi Shiferaw, Argentina Szabados, Ezequiel Texido, Irina Todorova, Mariko Tomiyama 和 Vassiliy Yuzhanin

第四章 :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研究领域和当下贡献

主要贡献者 : Marie McAuliffe, Marco Pedrotti，Sanjula Weerasinghe 和 Adrian Kitmbo

研究助理和其他贡献者 : Eleni Alexandrou, Kerstin Lau, Graziano Battistella 和 Maruja M.B. Asis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 Mulugeta F. Dinbabo (《非洲人类流动性评论》), Howard Duncan(《国际迁徙》), Allan M. Findlay, Carla H. Mulder and Darren P. Smith (《人口，空间和地点》), Kevin Hannam and Mimi Sheller (《流动性》), Khalid Koser (《难民研究》), Paul Statham (《民族和移民研究》), James Landale and Tarika Lall （ “世界经济论坛” ), Martyn Pearce (“ANU 政策论坛 ”), Manuel Orozco （ “美洲间对话” ）

第五章 :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作者 : Susan Martin 和 Sanjula Weerasinghe

第六章 : 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

作者 : Marie McAuliffe, Alexandra M. Goossens 和 Anita Sengupta

研究助理 : Marco Pedrotti

第七章 :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作者 : Marie McAuliffe, Adrian Kitimbo, Alexandra M. Goossens 和 AKM Ahsan Ullah

其他贡献者 : 关于儿童和移民的附录 : Tom Wong, Nadia Hartvisgen 和 Elizabeth Arroyo

第八章 : 迁徙与移民的媒体报道

作者 : William Allen, Scott Blinder 和 Robert McNeil

研究助理 : Nahla Ahsan 和 Hoor Tariq

第九章 : 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

作者：Khalid Koser 和 Amy Cunningham

其他贡献者：Marie McAuliffe 和 Adrian Kitimbo

第十章：移民与城市：超越 2015 年世界移民报告

作者：Howard Duncan 和 Ioana Popp

# 照片

**封面**

上 : 埃塞俄比亚，金比，南苏丹难民在走进一个位于中途站的帐篷。© IOM ( 摄影 : Rikka Tupaz)

中 : 南韩首尔景福宫，此宫殿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大量游客。©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下 : 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享受周末购物的人们。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一章**

（多年前，）Lidya 移民到英国伦敦学习国际关系和新闻学。这两个领域在她的祖国立陶宛工作机会很有限。而如今，她拥有并经营一家主要面向英国客户的公关公司。在她看来，她在伦敦获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她对于不同文化的接触与理解，这其中即包括英国文化。对英国文化的了解让她更容易了解英国地区客户的不同需求。©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一部分**

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市中心，人们尽情享受周末购物。爱尔兰拥有多元化的移民人口。2016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所有非爱尔兰民族的国民中，人口超过一万的十二个民族占据了 73.6%。 另外，人口在一千和一万之间的 32 个民族占据了 19.7%，而剩下部分则由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国民组成。©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二章**

叙利亚难民儿童在土耳其准备上课。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阿勒波 ,并因为叙利亚内战逃至土耳其。今天，这些孩子在叙利亚联谊会 ,一个由 IOM 支持的多功能中心上课。该中心向所有叙利亚难民提供服务，包括向妇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成人夜校，以及为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有惨痛经历的人提供心理医疗服务。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三章**

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在临时搭建的房子外拍照。这个家位于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农场中心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营地，是用一堆纺织品建成。在这里她还有其他几位同伴原先居住的村庄被一个名为博科圣地的武装团体夷为了平地。©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四章**

Candida Antonia Basurto Holguín 是一位八十岁的厄瓜多尔妇女。她住在厄瓜多尔马纳比省托萨瓜的一个叫 El Juncal 的社区里。 她在 2016 年的一场 7.8 级的地震中失去了房子和财产。这场地震摧毁了她所在的社区。IOM，日本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和民事保护部门为 Basurto 太太建造了临时庇护所。© IOM ( 摄影 : Carolina Celi)

**第二部分**

农场中心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是尼日利亚迈杜古里数个此类营地之一。随着博科圣地叛乱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蔓延，作为博尔诺州里唯一的避难所，许多尼日利亚人逃离他们的村庄来到迈杜古里。随着州里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的增加，他们开始住满各种场所，包括公立学校校舍、未完整盖好的住宅项目和养殖中心。©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五章**

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的 IOM 第 107 届理事会标志着 IOM 成立 65 周年（1951 年 12 月

5 日成立）。该理事会是 IOM 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例会。它主要进行政策决议，报告审议，批准和指导项目和财务常务委员会和总干事的活动，并审议和批准该组织的项目、预算、开支和账目。 © IOM（摄影：Amanda Nero）

**第六章**

叙利亚难民在海拔 30,000 英尺之上偷闲拍摄日落。对于许多人，飞向加拿大多伦多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2015 年末，IOM 在几个月内帮助 35,000 名叙利亚难民在加拿大重新安置。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叙利亚人飞往了他们位于加拿大的新家。这一天，其中一些人已等待了数年，横跨大西洋的飞行标志着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 IOM（摄影：Muse Mohammed）

**第七章**

Osman 受到了两届奥运会铜牌得主 Rohullah Nikpai 的鼓舞。后者和他一样是哈扎拉族人。Osman 谈到，“在阿富汗作为一个哈扎拉人不容易。我们经常被其它民族和塔利班歧视，他们认为我们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在几年中他一路上升到黑带并赢得了当地的比赛。后来塔利班发现了 Osman 的身份并威胁要杀死他，于是他离开阿富汗来到了印度尼西亚。他等待重新安置已经等了数年，而在南苏拉威西的这段时间，他在当地社区发展了他喜爱的这一体育项目。© IOM（摄影：Muse Mohammed）

**第八章**

Mark 在爱尔兰都柏林从事电子设备的修理和维护。他出生在波兰，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在去国外工作后不久就搬到了爱尔兰。他来到都柏林正值 2006 年经济繁荣期。此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修理上。许多人对自家的电子产品那么缺乏关心让他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这种情况同他的祖国进行了比较：在那里，人们总是精心对待贵重物品，而今天，大家则直接选择新的产品（来代替家中出故障的产品）。 © IOM（摄影：Muse Mohammed）

**第九章**

位于南苏丹班提乌的平民保护区（PoC）于 2013 年 12 月建成，现在收容了大约 12 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许多因为南苏丹冲突失去家园的人逃至联合国平民保护区以寻求安全和保护。联合国和各种人道主义机构同社区一道致力于改善平民保护区的生活条件。 © IOM（摄影：Muse Mohammed）

**第十章**

拥有大约二百七十万人口的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有五百九十万），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之一。2006 年多伦多市的人口组成中，加拿大人占将近 8%，近期移民 30%，所有移民 20%。多伦多既是加拿大语言最繁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语言最繁多的城市之一。在这里流通着超过 140 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IOM（摄影：Muse Mohammed）

**参考**

孩子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卡特里特群岛戏水。 © IOM（摄影：Muse Mohammed）

**附录**

一位叙利亚妇女在去往多伦多的航班上眺望阿尔卑斯山。第一次坐上飞机的她，将要和家人在加拿大开始新生活。她是 2015 和 2016 年间在加拿大被重新安置的数万叙利亚人中的一个。© IOM（摄影：Muse Mohammed）

# 内容目录

主编寄语，评论和制作团队 ii
致谢 iii
贡献者 iii
照片 v
图版和表格目录 vii
附录 x
前言 xi
第一章 报告综述：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 1

**第一部分：关于移民的数据和信息** 10
第二章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13
第三章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41
第四章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研究领域和最近贡献 89

**第二部分：复杂与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 114
第五章 全球移民治理框架：既有结构与最新发展 117
第六章 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 139
第七章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157
第八章 迁徙和移民的媒体报道 175
第九章 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 193
第十章 移民与城市：超越《世界移民报告 2015》 207
参考 223
附录 301

# 图表目录

## *第二章*

表 1. 国际移民，1970-2015 年 15
图 1. 国际移民，按主要居住地区划分，2000-2015 年（单位：百万人） 18

图 2. 2015 年前 20 国际移民目的国（左）和来源国（右）（单位：百万人）..... 19
表 2. 对选定国家和地区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 ..... 20
图 3. 经估算的地区移民流量，2010-2015 年 ..... 22
图 4. 迁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 OECD )的外国国民，永久性移民 2000-2015 年( 单位：百万人 ) 23
表 3. 外来务工人员，按性别和目的国的收入水平划分（2013 年）..... 27
图 5. 截至 2013 年按目的国收入水平和性别划分的外来家政人员数量（单位：百万人）..... 28
表 4 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出国 \ 汇入国( 2000-2015 年 )( 单位：十亿美元 )..... 29
图 6. 截至 2016 年主要难民来源国迁出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31
图 7. 截至 2016 年主要难民接收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 32
图 8. 2000 到 2016 年间主要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单位：千人）..... 33
图 9. 新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单位：百万人）..... 36

## *第三章*

图 1. 1990-2015 年间迁入非洲，非洲地区内迁徙和迁出非洲的移民 ..... 43
图 2. 2015 年前 20 大非洲移民国家 ..... 44
图 3. 涉及非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 45
图 4.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前 10 位的非洲国家 ..... 46
图 5. 1990-2015 年间前往亚洲、亚洲区域内和离开亚洲的移民人数 ..... 52
图 6. 2015 年移民人数位列前 20 的亚洲国家 ..... 53
图 7. 涉及亚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 54
图 8.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列前 10 的亚洲国家 ..... 55
图 9. 1990-2015 年间前往欧洲、欧洲区域内和离开欧洲的移民数量 ..... 63
图 10. 2015 年欧洲 20 大移民国家 ..... 64
图 11. 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 65
图 12.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最多的前 10 位欧洲国家 ..... 66
图 13. 1990-2015 年去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境内和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 ..... 70
图 14. 201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前 20 大移民国家 ..... 71
图 15. 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 72
图 16. 2016 年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划分的前 10 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 73
图 17. 1990 到 2015 年间前往北美地区、北美区域内和离开该地区的移民数量 ..... 76
图 18. 2015 年北美主要移民国家 ..... 77
图 19. 涉及北美国家的前 10 条移民通道 ..... 78

图 20. 2016 年北美地区和来自北美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 78
图 21. 2015 年前往大洋洲，大洋洲区域内和离开大洋洲的移民 ..... 81
图 22. 2015 年大洋洲移民国家 ..... 82
图 23. 涉及大洋洲国家的前 10 条移民通道 ..... 83
图 24. 2016 年大洋洲国家内和源自大洋洲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 ..... 84

## *第四章*

图 1. 1970-2015 年间致力于移民研究并发表英文刊物的智库数据 ..... 95
图 2. 2015-2016 年间来自 7 个学术刊物的 538 篇学术文章标题的文字云 ..... 99
表 1. 2015-2016 年间 IOM 书店的出版物 ..... 103
图 3. 选定刊物的影响因子 ..... 104
图 4. 2015-2016 年间选定刊物 512 篇文章的学术论文替代计量得分 ..... 106
图 5. 样本期刊 2015-2016 年间 353 篇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分布 ..... 107
图 6. 按主题划分，2015-2016 年间有关 IOM 研究的下载比例 ..... 109
图 7. 按地理划分 2015-2016 年间有关 IOM 研究的下载比例 ..... 110

## *第五章*

表 1. 21 世纪全球层面选定的对话和磋商 ..... 128

## *第六章*

图 1. 空中旅行的单位成本和价格，已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 141
图 2. 国际游客到达（百万），1995-2016 ..... 141
图 3. 全球因特网和移动电话使用 ..... 143
图 4. 人口流动性的变迁 ..... 146
图 5. 跨国劳务移民中介 ..... 150

## *第七章*

表 1. 选定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脆弱性指数和签证限制指数 ..... 160
图 1. 2010 到 2015 期间潜在移民主要希望前往的目的国家 ..... 162

## *第十章*

图 1. 1840-2012 年底特律人口 ..... 215

# 附录目录

## *第二章*

附录 A. 关键移民概念和定义 ..... 301
附录 B. 离散 ..... 305
附录 C. 非法移民流动 ..... 306
附录 D. 贩卖人口 ..... 308

## *第三章*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地区和次区域 ..... 310

## *第四章*

附录 A. 对学术刊物的简要概述 ..... 313
附录 B. 学术期刊的贡献 ..... 316

## *第五章*

附录 A. 定义 ..... 333
附录 B. 全球多边条约和当事国 ..... 335

## *第七章*

附录 A. 儿童迁徙： 推力和挑战 ..... 337

#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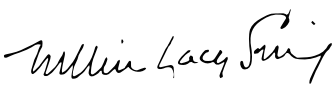
此报告为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九期。从 2000 年开始，IOM 已发布一系列世界移民报告来增进全世界对移民问题的了解。作为 IOM 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一系列报告在这个充斥着超负荷和虚假信息的后真相政治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当下，事实和专家意见日益让位于舆论和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用证据和知识来解释移民并揭示其变化的机会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

IOM 现为联合国的移民署。虽然我们组织从诞生之初就和联合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仍为胜任我们的新角色进行了必要的转变。联合国移民署这个身份与其蕴含的责任让我们深刻反思了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我们有义务为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学生和公众解开移民“世界”的谜团。我们意在促进人们对移民问题复杂性的各个方面有权衡性的理解，以易懂的方式呈现相关的数据和信息，解释突出的、复杂的和正在显现的问题并分享我们 65 年来在全球积累的众多经验。

作为 IOM 担任联合国移民署角色后的第一份报告，《世界移民报告 2018》寻求达到上述目的。通过进一步完善这一报告系列并给予它新的活力，我们旨在以此来实现对迁徙和移民问题更准确合理的理解。基于学者以及应用型研究人员和专业意见和知识，我们加强了同他们的合作从而以更充分的证据支持来提升世界移民报告的效用并促进它对移民政策、实践和研究的互通领域的贡献。

此报告也承认 IOM 对移民权利的一贯主张，并对最需要帮助的移民注入更深层次的关切。这一关切并不是在加入联合国后才开始的，而在最近几年和几十年的时间里 IOM 已经进行了持续的努力。尤其（但不仅限于）是对于因气候事件、冲突和迫害而流离失所或陷入困境的人们，IOM 努力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IOM 致力于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协助、支持和服务，而不是自身拥有移民条件和能力的人们。同样，IOM 还继续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成员国（最能从技术支持受惠）以提高他们管理移民的能力为己任，通过统计数据收集、报告和分析，发展边界管理同移民政策与实践，以及实现移民融入社区。

在这一对迁徙与移民关注度日益增加、对其影响日渐扩大的的时代，我们希望 2018 年版的世界移民报告，作为 IOM 的旗舰出版物，能够发挥有效的参考价值。如果你正致力于以更多的行动和介入来改善移民的境况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一不断变化发展极具挑战的议题。



William Lacy Swing

总干事

MARIE MCAULIFFE
MARTIN RUHS

# 1 报告综述：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1]

## 引言

在这个日益密切联结的世界里，国际移民已成为影响我们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复杂现象。移民这一术语涵盖了种种涉及各行各业和各种背景的人们的活动与境遇。在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移民对所有国家和民众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移民和地缘政治，贸易和文化交流交织在一起，为国家、商业行为和社区提供了大量的获益机会。迁徙有助于改善来源国和目的国民众的生活，并使全世界数百万人在他国获得安全和有意义的生活。然而，不是所有的迁移都在有利的环境下发生。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大量由冲突、迫害、环境恶化以及人类安全和机会严重缺乏导致的迁徙和流离失所问题。虽然大多数国际移民都属于合法迁移，当下有关移民一些最严重的危害隐患和舆论都和违规移民有关。

作为一个公共政策议题和独具新闻价值的话题，移民问题的突出性或许从未如此显著。当下，世界范围内众多政府、官员和民众将移民视作首要政策议题。基于移民对经济繁荣、人类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移民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首要关切之事。随着移民问题的日益凸显，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对移民的关注也更为加强。随着联合国的成员国对在 2018 年缔结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契约作出承诺，在移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目前聚焦移民问题的报道多涉及移民的消极方面。这其中可能部分反映了世界某些地区的移民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但（人们）应该反思新闻和媒体是如何被“构建”和 “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更倾向关注“不好”的消息。而社交网络，因其很少甚至从不过滤任何信息，更强调个人观点而非事实和分析。在对移民问题经常两极化的政治、公众和媒体讨论和辩论中，具备历史洞察力的对移民战略意义的事实、依据、知识的探讨和分析十分有限，且鲜有吸引力。即便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的各个方面和形式，提升移民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并应对移民带来的挑战，这些事实依据、相关知识和分析仍至关重要。

在民众和国家间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让迁徙更安全，更正规已经成为全球的优先关切事项。这一点已反映在联合国 2016 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里。这一宣言陈述了各国有意在 2018 年底达成一个关于移民问题的全球契约以及单独一份关于难民问题的的全球契约。这些契约所囊括的内容和承诺在这份报告写作时仍处于讨论中。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各国同意讨论和协商全球治理这一事实已表明各国目前已认识到需要增进对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复杂性

1 Marie McAuliffe，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部主任；Martin Ruhs，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此报告仅表达作者本人意见，不一定反映作者所属的任何组织或机构的观点。

和动态性的共同理解，并寻求从全球层面来应对这些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世界移民报告 2018》运用目前能获得的的数据和研究来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和紧迫的一些全球移民问题进行基于事实依据的分析和政策辩论。由于其本身性质，全球移民的复杂动态永远无法被完全测量、理解和控制。然而，正如这份报告所表明的，我们确实拥有持续扩充和完善的数据和证据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移民在这个连接日益紧密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里的基本特征。

## 迁徙问题的发展？

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大多从数字开始。目前估计，2015 年全世界的国际移民人数大约为 2.44 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3%。[2]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只占全球人口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也意味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他们的出生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没有进行跨境迁徙。更多人的迁移只限于在他们国家内部（2009 年估计有 7.4 亿国内移民[3]）。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国际移民在数字和比例上的增长都是显著的，且增长的速度比一些人预想的要更快。例如，2003 年预测，截至 2050 年国际移民者将占全球人口的 2.6% 或达到 2.3 亿（而实际数量早已超过这一数字）。[4] 作为对比，2010 年经过修改后对 2050 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的预测达到 4.05 亿。[5] 但是在制定全球人口预测的过程中（国际移民是其中一部分），人口学家注意到“国际移民在过去是波动最大的一个变量，因而也最难被精准地预测”。[6] 虽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是和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事件有关（诸如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目前叙利亚的冲突），基于目前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结性这一情况，这个趋势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在过去几年里，世界某些地区的移民增长相当显著，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作出的下一个对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估计中，很有可能国际性迁徙的规模以及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

最近几年，我们同样目睹了境内和跨境流离失所现象的增加。这大多起源于国内和国家间冲突，包括战争区外的暴力极端主义行为。现存的数据表明，仅 2016 年全世界便有 4030 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 (IDPs) 和 2250 万名难民。[7] 而且据估计，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总量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在此报告撰写期间，自 2017 年 8 月起超过五十万的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去往孟加拉国，这一事件进一步增加了世界流离失所的人口数量。目前按估算有可能 2017 年流离失所者人数将和 2016 年持平，甚至更高。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4 例如，见国际移民组织《2003 世界移民报告》，该报告采用联合国人口数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2）和移民数据（国际移民组织，2000）。

5 国际移民组织，2010。

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3。

7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联合国难民署，2017。

同时考虑这些情况，这些数字实际勾勒出了一幅全球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画面，数字更尖锐地指出，如此众多的人口流动（包括被胁迫）部分是由诸如叙利亚冲突在内的重大事件造成。[8] 因而必须将全球移民状况视作许多问题的总和，而且我们应当在全球和历史的语境下审视特定地区最近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发展起来的移民通道既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贸易、经济、冲突、人类安全（和不安全）、社区和种族关系，以及贩运和非法交易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的后续章节将对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阐述，包括按不同地区进行分析（见第三章）；而第二章将展示全球迁徙和移民概况综述。

虽然人们习惯性地倾向于关注移民问题带来的挑战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回应这些挑战，但我们很有必要对已经获知的移民的巨大益处进行重新梳理。在境内和国际流离失所现象以及相关的非常规移民均愈发显著的时期，移民的巨大价值可能多少会在辩论中被淹没。许多国际组织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对移民问题进行重新权衡考量，而最近也涌现了大量从全球层面对移民同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键性检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各区域开发银行等都强调了同时关注移民带来的成功与挑战有多么重要。

## *移民的价值*

迁徙可以为移民、他们的家庭和来源国带来众多好处。移民在国外所挣的工资可能远高于他们在家中从事同样工作之所得。举个例子，2009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工人和国外同样工种的工人（出生国、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居住在农村 / 城市均相同）工资系数所在的范围是从 15.45（针对出生在也门的工人）到 1.99（针对出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工人），中间系数为 4.11。[9] 通过迁徙获得的工资差别和相对收入所得对于低技能工人是最有效果的，而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也最受限制。[10] 移民收入的增加还能带来其家庭福利的显著改进并促进家庭成员个人的发展。这可能是直接通过与移民一同在东道国生活实现，也有可能是通过收到侨汇来间接实现。重要的是，迁徙对移民和其家庭的有利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体现在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人的发展的其它方面。[11]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移居到发达国家后，来自于最贫穷国家的移民收入平均增长了 15 倍，入学比率增加一倍，而儿童死亡率下降了 16 倍”。[12]

除了使移民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受益外，大量研究也证实移民的迁出行为能为其来源国带来巨大好处。[13] 迁出行为不仅可以减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减少贫困，并且在适当的政策支持下，移民还能以多元化的方式促进来源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移民汇入其来源国的侨汇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侨汇总的来说是相对其它资金流动更稳定和可靠的资本来源。[14]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 年移民向中低收入国家汇入大约 290 亿美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

9 见 Clemens, Montenegro 和 Pritchett, 2009。

10 例如，参考 Gibson 和 McKenzie (2011) 的研究，这项研究评价了外来务工人员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成本和收益。

11 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12 世界银行，2016。

13 查阅近期评论，例如见世界银行，2017. 也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14 世界银行，2016。

元。[15] 这个数字在 2000 年翻了一倍达到 740 亿美元，并在 2016 年达到了 4290 亿美元。[16] 目前在全球，侨汇是官方发展援助总数的三倍多。人口迁徙也会带来技能、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尽管效果很难准确衡量，但这的确会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带来可观的正面影响。除了这些经济影响外，迁出行为也会对包括贫穷和脆弱国家在内的来源国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例如，目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移民在战后重建和恢复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7]

移民同样能为东道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其他效益，对此人们也有广泛共识。在特定时间内，这些效益的性质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的技能与东道国国内工人互补的程度，也取决于东道国经济的特点。总的来说，迁入移民为经济发展补充了劳动者，从而提升了东道国的 GDP 水平。移民也能以众多其它方式对劳动生产力和人均 GDP 产生积极影响，例如，移民可能比国内工人拥有更强的技术水平，亦或是移民能够带来创新和技能的聚集。[18] 出于天性或必要性，移民可能更勇于冒险，而这一品质促使移民在诸如技术、科学、艺术和其它诸多领域为目的国做出巨大贡献。除了提高目的国国民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外，移民还能够通过为劳动力短缺职业和部门增加劳动力供给帮助解决就业市场的错配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技能要求高的部门和低技能的领域均十分显著。[19] 此外，移民同时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与需求，这即意味着劳务移民（包括低技能工人）能够为现有的工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当然，移民也会对劳务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工资和国内工人的就业上），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文献发现，平均而言这些消极影响一般比较小。除了劳务市场和宏观经济，年轻劳动者的迁入也能帮助高收入国家减轻因人口迅速老龄化而对养老系统造成的压力。最后，人们通常直觉上认为移民所缴的税不足以补偿其获得的福利与政府服务所造成的财政支出，但和这种直觉相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研究通过计算发现在被研究的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移民对东道国的净财政影响均是积极。[20]

## 世界移民报告系列

IOM 的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出版于 2000 年，起初作为一次性的出版物旨在增加决策者和普通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它对移民政策以及对移民研究的贡献是及时的，它的成功也预示了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后续发展。从 2000 年起，IOM 已经发布了九份世界移民报告（参见以下文字框）且此报告已发展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旗舰出版系列。它始终关注并致力于对移民问题进行以事实为依据的合理分析，并因此增进决策者、从业者、研究者和大众等对移民问题的了解。

15 世界银行数据库，2017。
16 世界银行，2017。
17 对于流落他乡的人参与冲突的不同形式的批判性讨论，见，例如，Van Hear, 2011。
18 查阅这些问题的研究依据，请参见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2014 等。
19 参见 Ruhs 和 Anderson, 2010。
20 OECD, 2013。

世界移民报告 2000
世界移民报告 2003：管理移民—迁移中的人们面临的挑战及回应
世界移民报告 2005：国际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世界移民报告 2008：在不断演进的全球经济下管理劳动力流动
世界移民报告 2010：移民的未来：应对变化的能力构建
世界移民报告 2011：关于移民问题的有效沟通
世界移民报告 2013：移民福利和发展
世界移民报告 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目前，随着人们对移民问题愈发重视，它的复杂性以及和众多其它公共政策问题的相互关联使得这一系列报告更加不可或缺。然而，随着移民问题的受关注度更高，以及跨国迁徙的增加，迁徙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过程日趋复杂化。由于媒体时常刊登一些令读者困惑不解的内容而没有合理地阐释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不难理解人们为何时常对媒体上读到的包罗万象的术语——“移民”感到不知所措。鉴于此，我们已进一步改进了世界移民报告，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于迁徙和移民的关键信息（包括和移民相关的统计数据）。

第二部分：对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进行权衡的、实证的分析。

基于此，对于本期报告的两个部分和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我们计划对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的迁徙模式与过程进行解释，并为研究此问题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决策者提供见解和建议。随着对移民问题的聚焦以及移民问题的复杂化，完善本系列亦是为了弥补单个主题的报告可能无法充分说明或体现更大范围内全球移民变化趋势的缺陷。如果世界移民报告系列能够更好地提供迁徙和移民信息概况，且包含更多对热点问题的分析，这份报告就可以成为更重要的资源。此外，作为移民问题相关材料的出版者，IOM 也有能力为出版世界移民报告系列之外的专题报告提供充足的机会（例如，第四章中涉及对 IOM 及与其研究相关的出版物的讨论）。

出版本系列报告进一步考虑的是为其“增值”计划。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一个联合国体系内的新机构，确保世界移民报告能为公众提供切题、易懂、可靠、精确和合理的信息和分析这一点对 IOM 至关重要。并且，IOM 也认识到目前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众多，因此世界移民报告应当吸收现有事实与知识并成为移民问题领域有效的参考读物。考虑到（近期众多）关于移民治理的著作出现，诸如 IOM 和经济学人智库合作推出的“移民治理框架”和“移民治理指数”（现被称为“移民治理指标”），避免复制或过分重叠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世界移民报告目前已被重新组织，更侧重在移民领域决策者面临的复杂性、突发性问题，而不是描述和评估当前的移民政策与治理。本系列意在补充而非重复已有的著作。

##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作为修改后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一期，《世界移民报告 2018》旨在促进对当下的和战略性的移民问题的了解。第一部分，关于“移民的关键数据和信息”将在不同章节分别阐释：全球移民趋势和模式、区域维度和发展、学术界和众多机构近期的移民研究和分析。这三章由 IOM 自己完成，已经形成制度，主要由全世界 IOM 的专家、从业者和官员根据众多相关组织的数据作出分析。[21]

第二部分的六章由移民和人口流动领域的应用和学术研究者完成。这些章节揭示了一系列“正在出现的复杂的移民问题”。其中包括：

●国际移民全球治理框架的发展；

●跨国联结迅速变化的层次与类型同移民之间的关系；

●移民视角下的移民旅程；

●对于移民和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

●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

●移民与城市。

虽然这些话题不可避免受到主观选择的限制，本报告第二部分关注了当今世界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些移民问题。这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决策者们在制定有效适当和有建设性的移民政策中面临的难题的核心。因此，通过揭示关键问题，对相关研究和分析进行关键性综述并探讨这些问题对未来研究和决策的含义，这些章节旨在影响现在和未来的政策讨论。这一部分的目的不在于提倡特定的“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信息，进一步推进这些高度争议辩论来防止出现“银弹”解决方案。这些章节多次强调解决方案应考虑多方面因素和逐渐显现的战略性问题，这一点对未来移民政策和实践至关重要。

《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所有章节都是相对独立的，可以作为单独的章节和稿件下载。但整个报告同时也讨论了若干重要的有交叉的主题和议题。例如，一个主要的交叉议题是关于影响移民的重要变量及这些变量的影响，以及关于移民的公共和政策辩论，跨空间问题（例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口组别（例如按性别和年龄），亦或是不同的管理层级（例如在城市、地方、国家、世界局部地区和全球的层面上加以区别）。比起大众媒体高度简单化且经常有误导性描述的报道，通过突出地理、人口和政治上的变化，报告意在勾勒一幅更细致和在我们看来更准确的全球移民的图景。为了更为有效地获得更多的实证支持，关于全球移民问题的公共和政策辩论需要意识并考虑到这些重要的变化。

整个报告中一直讨论和强调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移民并不是一个无需考虑以下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重要因素即可被有效分析、讨论和调节的孤立现象。

●“空间”（例如在不同国家的政策之间），治理的规模和水平（例如，相联的城市，地区，国家，超国家和全球治理结构）；

●移民类型，类别和政策（例如，考虑因工作、保护、家庭原因和学习这些迁徙原由间的关系和原由之间经常模糊的界线）；

●“时间”（例如，包括暂时和永久的移民流动和政策）；以及

21 Guy Abelz 作为移民数据专家也为此部分，尤其是第三章数据的呈现和分析作出贡献。

●移民和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诸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福利政策、教育和培训、住房政策等）。

这些相互联系对于了解和回应全球移民和人口流动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说来，为了更好地理解移民并更有效地规范移民，《世界移民报告 2018》认为大家需要了解并考虑地理、人口和地缘政治这些影响移民问题的重要变量，并在对移民问题进行分析和决策中认同这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虽然这些基本见解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目前关于迁徙问题和移民公共政策辩论仍时常将其忽略。相反，它们应该成为包括如何达成关于移民的全球契约以及关于难民的全球契约等讨论在内的移民问题的重点。此外，此报告也在不同章节相关处阐释了这两个全球条约的含义及对其的见解。

## *第一部分*

第二章将对国际移民的全球数据与趋势和全球移民流动进行总结。它也对侨汇以及特定移民群体进行探讨，其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难民、寻求庇护者及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另外，此章突出了IOM不断积累的项目数据，尤其是失踪移民，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入，移民健康，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追踪，迁居者分析图（mapping）以及人口贩运等问题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总的来说不是全球性的或很有代表性的，但其能够为全球范围内IOM项目和行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重要见解。最后，本章也将讨论关键数据的缺口和挑战。

在全球综述之后，第三章将从关键地区的角度讨论移民的发展。该讨论主要依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使用的六个世界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对于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 对和人口相关的关键统计数据的综述和简要讨论；2. 基于国际组织、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的大范围数据、信息的分析，对该区域移民的“关键特征和发展”进行简明描述。为了揭示六个区域中每个地区的移民模式、趋势和问题的多样性，对移民的“关键特征和最新发展”的描述将从次区域层面呈现。

关于移民问题，一大批学者、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智库已进行并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第四章将选择性地总结这些贡献。并将总结主要集中在学者和政府间组织且覆盖 2015 到 2016 年这一时期。严谨的研究和分析能够且应该为包括决策者和移民从业者在内的人士提供关于世界变化及移民问题的重要信息。对于那些正在研究移民问题、制定移民政策进行移民实践，或试图更好地理解移民问题的人们，了解目前移民领域不同类型研究和分析的种类、性质和特点十分关键。

## *第二部分*

第五章将批判性地讨论国际移民的全球治理。此章首先评述当前关于移民全球治理的一些主要的全球规范和机构，接着将讨论下列三个主题和最近发展：

●为在全球层面推进更大的行动而构建创造动力和信心的关键对话和倡议；
●建构规范性框架来促进移民保护的具体倡议；
●把国际移民整合到针对其它问题的全球性应对举措中。

该章认为，迄今为止渐进的磋商、合作和信心建立方式能够逐步带来进步。该章作者表示，这一逐步改进的方式仍然是实现更有效的全球移民治理最有希望的道路。

运输与电信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全球在获取信息和进行互动方面的巨变。日益发展的跨国联结使人们得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国际迁移。第六章即分析了日益频繁的跨国联通对流动性和移民的意义，以及相关过程的形成方式。在对全球运输和电信技术的主要进步作简要阐述后，该章将讨论跨国联通如何通过影响移民者、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来影响移民过程。作者们举例说明了跨国联通如何影响不同的移民主体，并总结了跨国联通对包括全球移民契约在内的移民治理的影响。

第七章主要通过在研究中听取移民的心声来从移民的角度理解移民问题。虽然所有移民或多或少在移民前和移民过程中作出了一些决定，其中有些可能相当重要并可能涉及生死抉择，该章主要聚焦移民方式和选择都更为有限的人们。该章首先对移民的主体能动性（即移民有能力作出决定并根据其选择采取行动）以及能动性的持续性作简短讨论，后者解释了影响移民选择的变量。接着该章节分析了移民过程中对移民的考虑和决定有重要影响的四个关键因素：信息（和错误的信息），签证偏好，风险与回报以及移民的压力。该章也回顾了在移民领域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最新进步，这些进步正使得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在全球推广。作者认为，更好地了解移民在迁徙途中的选择对制定更有效的移民政策至关重要。最后，该章将阐述包括全球移民契约在内的研究和政策倡议的含义。

媒体在塑造人们、决策者和移民自身对迁徙的认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八章即批判性地讨论了针对移民和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通过利用不同国家的现有研究，该章节旨在回答四个关键问题：关于迁徙和移民，全世界媒体在说什么？这些新闻报道对公众、决策者和移民有何影响？新闻业自身如何为这些报道作贡献？媒体和移民的近期经历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有何含义？在作者看来，针对移民的媒体报道的变化部分反映了不同国家媒体系统运作中的差异。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旨在揭示在移民问题上媒体、舆论和政策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更多的研究应关注过境国和来源国媒体的角色以及移民自身对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和偏爱。这对于了解信息如何影响人们的看法尤其重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众多政治领袖正把移民、迁徙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这也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民众情绪。基于这一问题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第九章将基于现存事实依据着重分析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间的关系。该章将首先简单介绍一些定义和数据，强调清晰分析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缺乏可靠数据，并强调区分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带来的挑战。其后，该章将介绍从出发、安家到时常发生的返乡这一移民周期的逻辑，并对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交叉部分进行简单分类。最后，该章讨论了这一问题对未来政策辩论的一系列初步含义。

第十章作为《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后续将主要讨论的主题为：移民和世界城市间的关系。该章建立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基础上，通过利用最近关于城市正显现的性质以及城市在世界的作用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审视了现代城市在移民管理中的角色。这其中包括了对庇护城市以及城市在回应近期发生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移民现象中发挥的普遍作用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基于城市对社会和经济事务以及对国际国内迁徙轨迹的影响正持续增长，学者和决策者应对城市的角色投入更多的关注。

总体而言，世界移民报告将增进我们对移民问题的各种表现和复杂性的共同理解。我们希望所有读者能够从这一版本学到新的东西，并为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其它活动提供帮助。

# 第一部分

## 关于移民的数据和信息

# 2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 引言

人类移民是一个古老现象，可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最早期。在现代，移民的迁入与迁出继续为国家、社会和移民带来大量的机遇。同时，移民在过去几年内已成为汇聚社会融入、流离失所、安全移民和边界管理等多重问题的一个重要政治和政策挑战。据估计，2015 年全球国际移民人数达 2.44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3.3%），远超过 2000 年的 1.55 亿（约为世界人口的 2.8%）。[1] 国内移民更加普遍，最近的全球估算表明有超过 7.4 亿人在他们的出生国内进行移民。[2]

为了有效地应对日增的移民规模并充分反映移民多种多样的需求，了解国际移民及其各种表现是至关重要的。数字革命、技术革命缩短了距离并削减了旅行成本，国际间的移动正变得更加可行。[3] 促发移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经济繁荣、不平等、人口、暴力冲突以及环境变化等。虽然绝大多数人进行国际移民是出于工作、家庭和学习，还有许多人则是出于其它迫不得已的原因，比如冲突、迫害和灾难。总的来说，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在内的失去家园的人口仅占所有移民相对较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时常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境地，他们经常需要获得（更多的）集体关注和行动。而这些人往往也是最需要援助的。

通过呈现关键性的全球移民数据和趋势并对迁徙和移民进行总结，本章旨在帮助移民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移民问题。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难民署、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移民组织等组织收集的数据，本章将综合性地回顾目前全球移民的人数和国际移民的流动趋势。同时，本章也将重点讨论侨汇问题和一些特定的移民群体，其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另外，IOM 在失踪移民、协助自愿返乡和重新融入社会、移民健康、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追踪、离散者分布以及人口贩运等方面的数据也日益丰富。虽然这些数据总的而言不是全球性或极具代表性的，它们却能帮助我们思考关于全球性的项目和行动中一些变化的重要影响。作为联合国新的移民机构，基于所有同本章讨论主题相关的活动，IOM 已有能力为移民问题及包括移民需求在内的种种移民动态提供进一步的见解。

本章同时突出了在数据收集中实现数据的可比较性和一致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对全球移民潮流的全面分析变得十分困难。最近正在进行的数据收集和改进已使可被利用的移民数据在不断扩充。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3 可参见本报告第六章关于跨国联通的讨论。

然而，数据的碎片化以及数据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仍是对全球移民问题进行全面解读的关键障碍。[4] 同样，正如下列文字框所体现的，迁徙和移民的定义本身仍备受争议。

### 迁徙、移民和其它关键术语的界定

除了字典对迁徙和移民的一般定义外，在法律、行政、研究和统计等领域还存在着各种对移民相关术语的具体定义。[a] 因此，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对迁徙和移民的解释。然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8 年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中陈述的那些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并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发展。[b]

对移民和迁徙的专业定义、概念和分类必然受到地理、法律、政治、方法、具体时间和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移民事件可以依据出生地、公民身份、居住地和逗留时长等若干种方法来定义。[c] 运用何种定义对迁徙和移民的量化分析具有重要影响。我们鼓励读者参阅本章引用的一手资料，来了解数据背后依据的具体定义和分类。对和移民相关术语的专业定义可参见附录 A。

IOM《移民概念表》也可为读者提供有效参考。该词典在 IOM 网上书店有售，详情请访问 www.publications.iom.int/。

a. 可参见 Poulain 和 Perrin, 2001。
b.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8。
c. 可参见 de Beer 等人，2010。

## 国际移民：数量和趋势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基于各国提供的数据估算了目前全球国际移民的数量。[5]

《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将常住国发生改变的人们定义为国际移民，并区分了“短期移民”（常住国发生变化在在三个月到一年之间）和“长期移民”（常住国改变至少一年）。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在实践中都采纳这一定义，[6] 且各国运用的定义标准不同。比方说，有些国家通过确立不同的最短居住时间来定义国际移民。概念、定义以及不同国家在数据收集方式的差别使得很难对国际移民的国家统计进行完全比较。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国际移民的人数已大幅增加。2015 年居住在出生国以外国家的人数大约在 2.44 亿，比 1990 年几乎多了 1 亿（当时为 1.53 亿人），且为 1970 年数量（8400

4 总的而言，由于对数据的具体解释、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数据收集的方式占据大量篇幅，本章将不予以具体论述。但读者可通过数据来源进行查阅。

5 地区和行政单位也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供了数据。查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源、收集方法和附加说明，请参考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a。

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8。

万人；见表 1）的三倍以上。[7] 虽然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在此期间明显增长了，绝大多数人仍选择继续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2015 年大多数国际移民（约占总数的 72%）正处于工作年龄（20 到 64 岁），而在 2000 到 2015 年期间 20 岁以下的移民比例略有下降（从 17% 降至 15%），65 岁以上的国际移民自 2000 年起比重则保持稳定（大约为 12%）。

## 表 1. 国际移民 ,1970-20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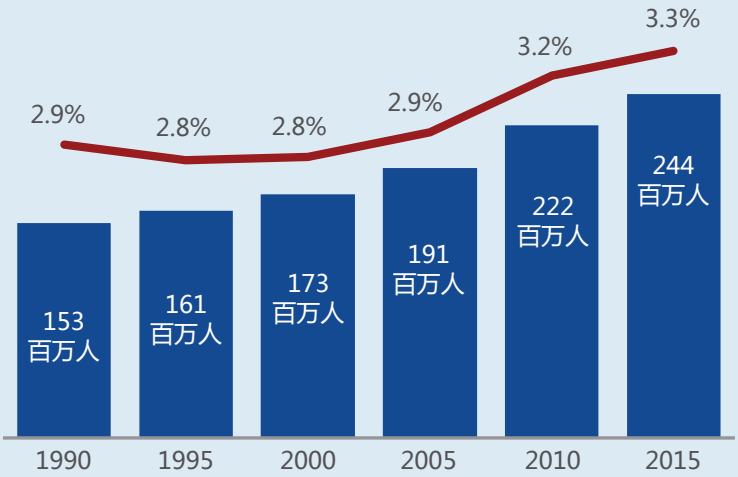
| 年份 | 移民数量 | 移民占世界人口的百分 |
|---|---|---|
| 1970 | 84460125 | 2.3% |
| 1975 | 90368010 | 2.2% |
| 1980 | 101983149 | 2.3% |
| 1985 | 113206691 | 2.9% |
| 1990 | 152563212 | 2.8% |
| 1995 | 160801752 | 2.8% |
| 2000 | 172703309 | 2.8% |
| 2005 | 191269100 | 2.9% |
| 2010 | 221714243 | 3.2% |
| 2015 | 243700236 | 3.3% |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 和 2015a。
*注：*2015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国际移民数量的修订》中数据采集的实体（诸如国家、地区和行政单位）数量为 213 个。1970 年该数字为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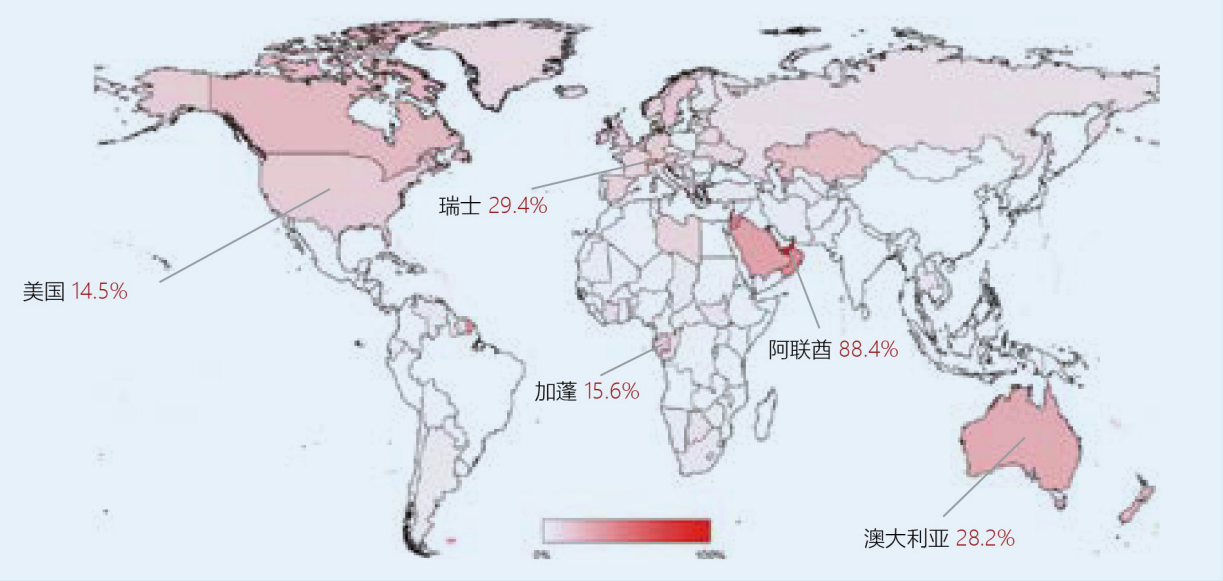
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

# 国际移民简单介绍

全球的国际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对稳定
单位：Million 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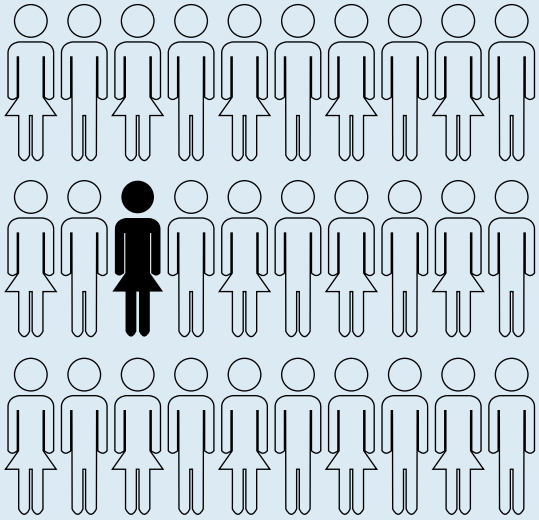



全世界国际移民比例存在巨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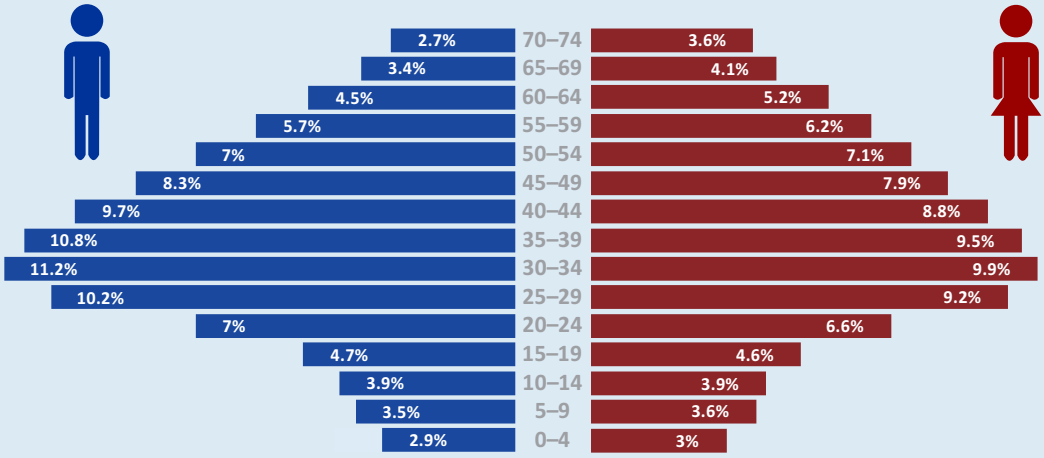



*注：*本地图所使用的名称和边界并不代表 IOM 的官方意见。

2015 年 73 亿全球人口中有 2.44 亿国际移民
每 30 人中即有 1 位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 52% 为男性，48% 为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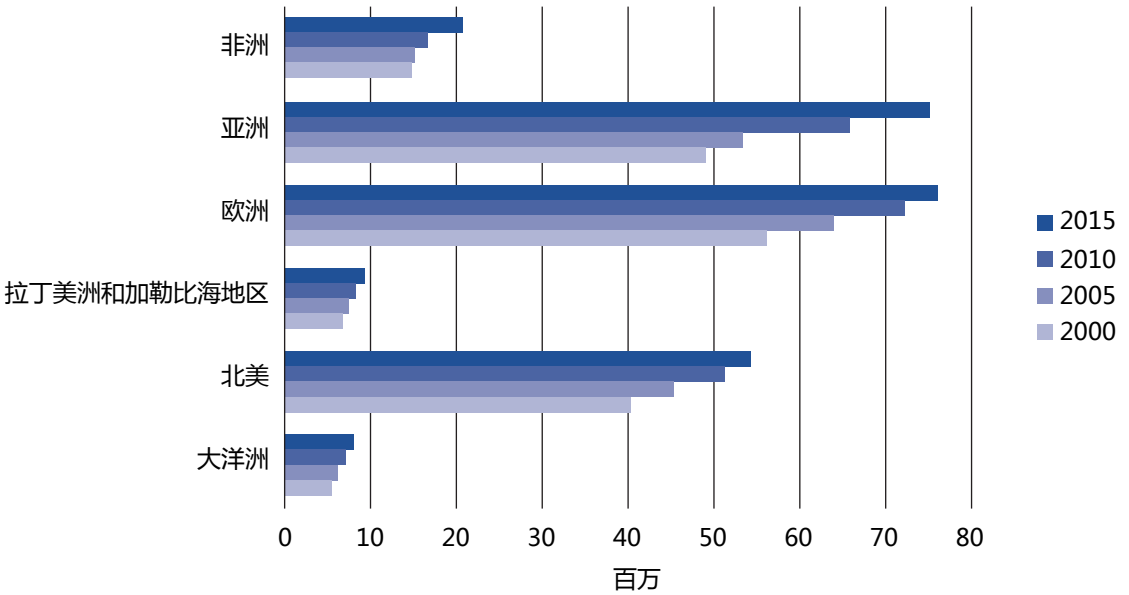

大多数国际移民（72%）正处于工作年龄（20-64 岁）

**此处 75 岁以上的年龄组（男性占 4.5%，女性占 6.8%）被省略。*

*注：* 该简要说明依据的是 IOM 移民研究部和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IOM，2017d）的图表信息，该图表信息利用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015 年欧洲和亚洲各接待了 7500 万移民，占全球移民总人数的 62%（见图 1）。北美紧跟其后，2015 年国际移民为 5400 万人，占全球移民人数的 22%。在其他地区，非洲接待了 9% 的移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4%，而大洋洲为 3%。同每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相比，2015 年国际移民比例最高的是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其中国际移民分别占对应地区总人口的 21%、15% 和 10%。[8] 相比之下，亚洲、非洲（各占 1.7%）和拉丁美洲（1.5%）的国际移民比例相对较小。然而，亚洲是 2000 到 2015 年期间移民人口增加最为显著的地区，比例超过 50%（按绝对值计算，增加人口大约在 2500 万人）。[9]

## 图 1. 国际移民，按主要居住地区划分，2000-2015 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数据可从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5.shtml（2017 年 6 月 22 日登录）获得。

自 1970 年起，美国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10] 从那时起，居住在美国的外国出生的人数几乎翻了四倍，从 1970 年的不到 1200 万人上升至 2015 年的 4600 万人。从 2005 年起，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估算中德国一直是第二大移民目的国，且在 2015 年有超过 1200 万名国际移民住在这个国家。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在 2005 年之前的大约 15 年间，俄罗斯是第二大国际移民目的国。以下表 2 左栏列出了前 20 位国际移民目的国。

图 2 的右栏则为排名最前列的移民来源国。2015 年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国际移民出生在亚洲，[11]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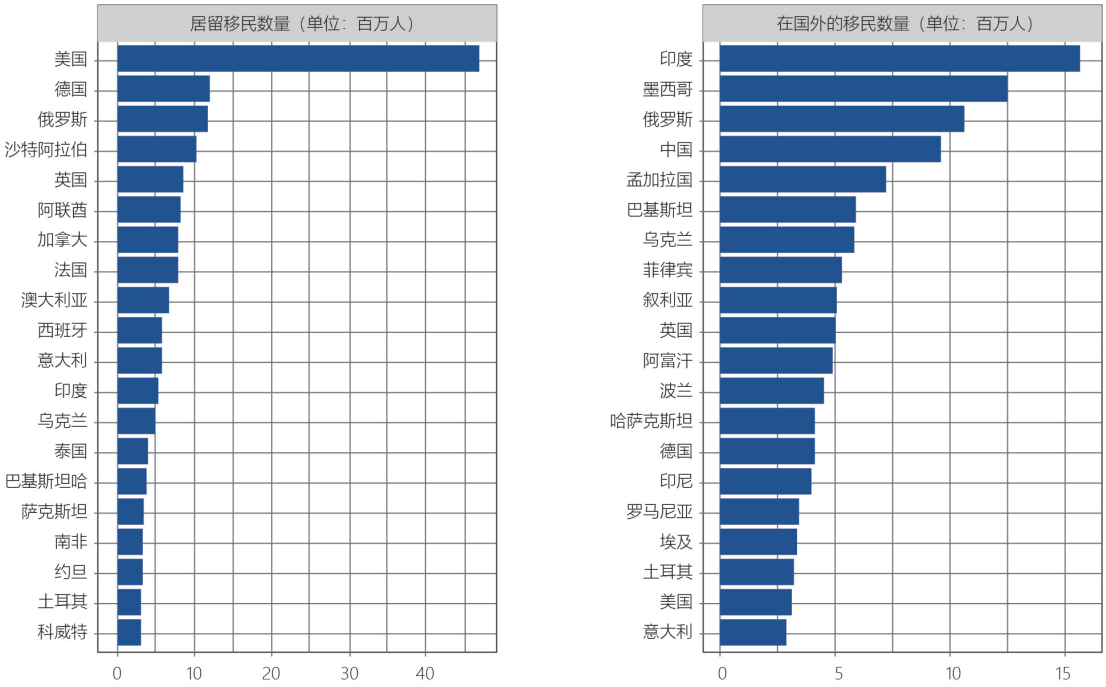
9 同上。

1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并主要来自印度（最大移民来源国）、中国和其它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南亚国家。移民输出数量第二大的是墨西哥，而一大批欧洲国家紧跟其后。

## 图 2. 2015 年前 20 国际移民目的国（左）和来源国（右）（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 年经修正后的数据汇总可在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5.shtml获得。

如果按国家收入划分国际移民，[12] 2015 年大约有 2/3 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人数大约为 1.57 亿人。相比之下，同年中等收入国家大约有 7700 万名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居民（此数目约占移民总人数的 1/3），此外有 900 万出生在他国的人生活在低收入国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出生在他国的人口的估算无法体现迁入移民身份或移民政策类型（例如学生、高技能移民或难民）。出于几个关键原因，获取这些信息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个人的迁入移民身份随着环境和法律政策变化可能随时发生改变。例如，许多可能被认为“非常规”或“无证”的国际移民最初依靠有效签证进入各个国家，但因其在当地的逗留可能违反一个或多个签证的条件而成为非常规移民。事实上，很多方式都能使一个人成为非常规移民，例如未经授权过境、超过签证期限非法逗留、违反签证条件工作、以非常规身份出生、或在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依旧在此地居留等。[13] 第二，不同国家移民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同且采取了不同的数据收集方式，因而很难建立全球统一的方法来对非常规移民人数进行统计。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增加了数据统计的复杂性，因

12 根据《世界银行国家和贷款集团》中的通过收入进行的国家分类。具体信息可访问 http://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世界银行，n.d.a）

13 Gordon 等人，2009。

为随着政策改变，人们可能随时成为“常规”和“非常规”移民。目前分析家们采纳不同的方法来对非常规移民人口进行阶段性评估。表 2 显示了若干对选定国家和地区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然而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数据，因为这种估算往往是不精确的（例如，在对欧盟和美国非的常规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中即存在差别）。由于非常规移民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又难以获得关于移民身份的官方行政数据且移民身份时常发生变更，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难以被准确衡量。[14]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移民流动。

## 离散人口还是跨国社会群体？

在学术和政策圈，离散人口用来指代来自某个具体国家但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且经常包括他们的后代）。然而这一定义尚未被普遍接纳。事实上，鉴于移民同本国及其他国家移民的联系，有建议表明跨国社群这一说法能够更贴切地描述当今的移民经历。事实上，IOM 经常替换使用离散人口和跨国社会群体两种说法（IOM, 2017c）。对于离散概念、量化全球离散人口数量的难度以及 IOM 在这个领域的著作的进一步讨论，请见附录 B。

### 表 2. 对选定国家和地区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

| 国家 / 地区 | 年份 | 估算的人口数量 | 来源 |
|---|---|---|---|
| 澳大利亚 | 2011 | 5.84 万人 | (a) |
| 欧盟 | 2008 | 190 万 -380 万人 | (b) |
| | 2008 | 800 万人 | (c) |
| 德国 | 2014 | 18 万 -52 万人 | (d) |
| 希腊 | 2011 | 39 万人 | (e) |
| 以色列 | 2015 | 15 万人 | (f) |
| 意大利 | 2008 | 27.9 万 -46 万人 | (b) |
| 俄罗斯 * | 2011 | 500-600 万人 | (g) |
| 南非 | 2010 | 300-600 人 | (h) |
| 西班牙 | 2008 | 35.4 万人 | (i) |
| 英国 | 2007 | 41.7 万 -86.3 万人 | (j) |
| 美国 | 2014 | 1110 万人 | (k) |
| | 2016 | 1130 万人 | (k) |

* 表示对非常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估算。

*来源：* (a) 澳大利亚国家审计办公室，2013；(b) 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09a；(c) 欧盟边境管理局，2010；(d) 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15；(e)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12；(f) Fleichman 等，2015; (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a；(h) 南非警察署，2010；(i) 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09b; (j) Gordon 等，2009；(k) Krogstad, Passal 和 Cohn，2017。

14 Koser 等人，2010。

# 国际移民流动：定义，数据和缺口

虽然对移民人数的统计比比皆是，关于全球人口移动（流动）的数据却相对有限得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全球移民总人数的估计是全球性的且涉及广泛领域但关于流动的数据库仅仅由 45 个国家的数据构成。[15] 出于若干原因获得关于人口流动的数据相当困难。首先，虽然国际人口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两方面，更多的注意力仍放在移民流入上。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会统计一切跨边界人口流动，但许多其它国家仅计算入境而不统计出境记录。[16] 再者，一些国家的流动数据源自和移民身份相关的行政事件操作（例如，居住许可的颁发 / 续签 / 撤销），因而这些数据常常被用作人口流动一手数据的替代用品而被用于统计。同时，人口迁徙性的移动经常难以同包括旅游和商务出行在内的非迁徙性流动混淆。此外，追踪移民移动也需要相当多的资源、基础设施和 IT/ 知识系统。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收集、管理、分析和汇报流动性、移民和其它领域数据的能力很有限，这对他们收集准确数据构成相当大的挑战。最后，许多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阻碍了移民流动数据的收集。例如，一些地区因为是群岛或是拥有孤立的边界而使它们的入境和边境管理尤其困难。而且，一些为了打工而进行非正规迁徙的传统也使情况更为复杂。[17]

## *移民流动*

目前关于国际移民流动主要有两个数据统计。两个统计数据的来源均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移民数据库的国家统计。[18] 自 2005 年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依据能获得的各国内部的统计数据对去往和离开选定国家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进行了整理。最新版次（2015 年）由 45 个收集这一信息的国家数据组成，比起 2008 年的 29 个国家和 2005 年的 15 个国家都有所增加。[19] 扩大数据库的进展很鼓舞人心，但我们对移民趋势进行分析的能力仍很有限。[20]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球或地区的移民流动，研究与分析者们用移民存量的变化数据代替流量数据并已作出了许多尝试。Guy Abel 和 Nikola Sander 最近采用了一个复杂的方法来实现这一替代分析。他们通过分析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来估计移民流量，并用圆圈图把数据形象化。[21] 图 3 通过展示 2010 至 2015 年间移民流量数据，来表明目前这一数据已发生变化。[22]

15 Laczko, 2017.

16 Koser, 2017.

17 Gallagher 和 McAuliffe, 2016。

18 其他项目也对地区层面（非全球）的迁徙流动监测作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用以数据分析的移民模型》项目（欧盟统计局发起）衡量了迁徙流动（外向和内向移民）以及欧洲的人口规模（de Beer, van de Erf 和 Raymer, 2009; Raymer 等人，2011）。而《欧洲移民整合模型》项目（Raymer 等人，2013）按年龄和性别呈现了移民双边流动的数据，但只限于欧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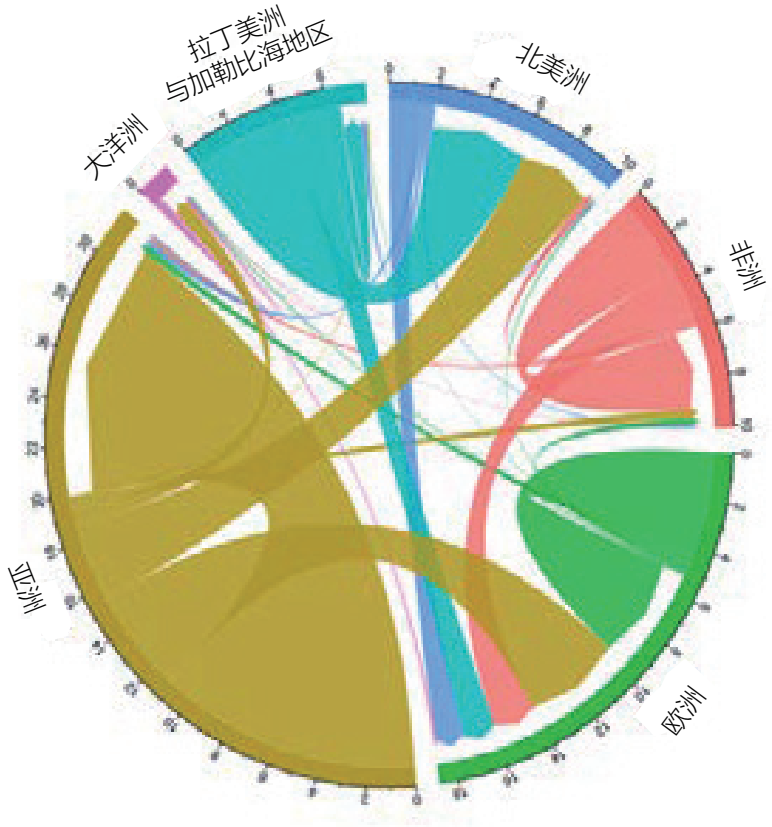
19 关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迁徙流动数据以及具体囊括的国家，请参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d。

20 对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迁徙流动数据源、方法和附加说明的总结，请参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d。

21 Abel 和 Sandel，2014。

22 由 Guy Abel 于 2017 年提供。

## 图 3. 经估算的地区移民流量，2010-2015 年




*来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2015 年去往和离开选定国家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的修订版可以从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mpirical2/migratgionflows.shtml. 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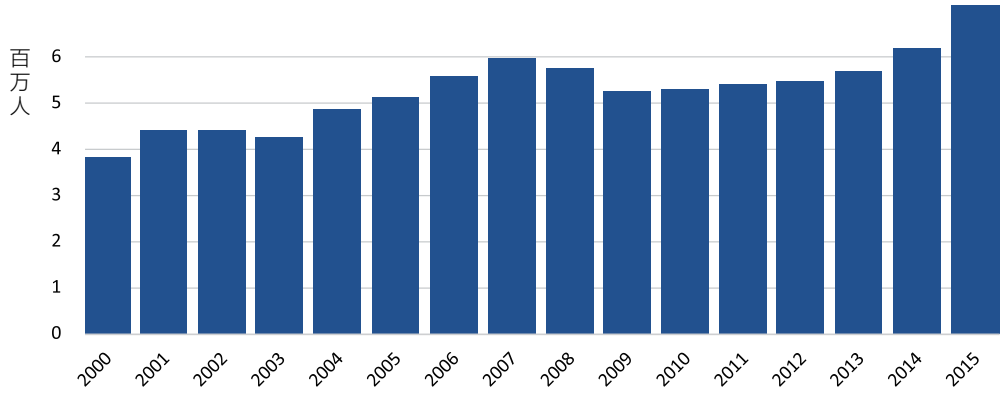
*注：* 流动方向即箭头指向。流动的规模由底部箭头的宽度决定。轴线外截面上的数字均以百万人统计，用来体现移民流动的规模。举个例子，2010 至 2015 年之间，出生在亚洲但在北美生活的人增长了大约 400 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00 年开始收集关于移民流量的数据。如图 4 所示（虽然依据注解这些数据并未被标准化），这些数据使得一定范围内的趋势分析成为可能。[23] 估算的数据显示，流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永久移民从 2000 年的 385 万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713 万人，但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短暂的停止（图 4）。2015 年，德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接收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有超过 200 万的国际新移民（超过 2000 年注册人数的两倍多），其后为美国（恰好超过 100 万）和英国（大约 48 万新移民）。[24]

23 这一部分是基于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的数据，具体可参阅 OECD，2015。对于移民流动和 OECD 国家的其他移民数据，请参见 OECD, n.d.a.。

24 列举国家均为 OECD 内部接收永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数据自 2015 起可获得。

## 图 4. 迁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外国国民，永久性移民 2000-2015 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

*注 1：* 数据未被标准化，因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6 国际移民展望》（OECD,2016a 和 2016b）中 关于流入选定国家永久移民的统计数据有所差异。

*注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中的 35 个国家一般指：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个别国家个别年份的数据未能提供：2000 年有 31 个国家提供了相关数据，而 2015 年则有 33 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2 年起，报告未公布希腊的数据，而土耳其的数据自 2010 年起便未被公布。

### 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移民流动数据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未能提供依据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Abel，Samir 和 Sanderdd[d] 提出了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对双向移民流动按性别进行划分。Raymer 等人[e] 也按照性别和年龄对双向移民流动进行了估算，但仅限于欧洲国家。最后，Nawrotzky 和 Jiang[f] 估算了 2000 年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双向净移民流量；该信息目前存储于人口统计学共同体 – 国际移民（CDM-IM）数据库并对公众开放。对双向移民流动的统计，也可以从国际移民决定因素（DEMIG）的国家间数据库得到，这其中包括了 1946 到 2011 年期间多达 34 个国家的双向移民流动数据。该数据库也相应提供按性别划分的数据。

d. Abel, Samir 和 Sander, 2013。
e. Raymer 等人，2013。
f. Nawrotzki 和 Jiang, 2015。

一般来说，上述的移民流量包含拥有签证或入境许可的常规移民（或居民）的数据。（但）大多数这样的数据无法捕捉到那些涉及“发生在输出、中转和接收国家监管规范之外”的非常规人口流动数据。[25]

25 IOM，2017a.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非常规移民的流量和非常规移民的存量。虽然两者相互关联，但在概念和实践中两者存在很大差异且时常在使用中被错误地互换。[26] 如本章先前所述，一个人可以凭有效签证合规地进入一个国家（因而不构成非法入境）但此后这个人可能因逾期逗留或违反签证条件，而转变为非常规移民。对非常规移民（存量）的估算在前文已讨论。关于非常规移民流量的进一步讨论详见附录 C。

## 贩卖人口和偷渡

对人的贩卖经常涉及国内或跨越国界的人口移动。在不同的环境中，移民（包括劳动者、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都有可能变成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然而由于人口贩卖的隐秘性且被严重低估，目前无法系统地进行这一领域的数据收集并进行全球层面的估算。相关可获得的数据信息及 IOM 在这方面的工作，请见附录 D。

通过海陆空进行偷渡的全球数据目前还无法获得。透过被偷渡移民的悲惨经历，我们得以了解与贩运偷渡相关联的人口移动潜在延伸范围和脆弱性。近几年，为了更好地认识充满变数的贩运问题，研究者已经致力于分析现有的数据和研究（详情可见，如 McAuliffe 和 Laczko, 2016）。

对于贩卖人口和偷渡的定义请见附录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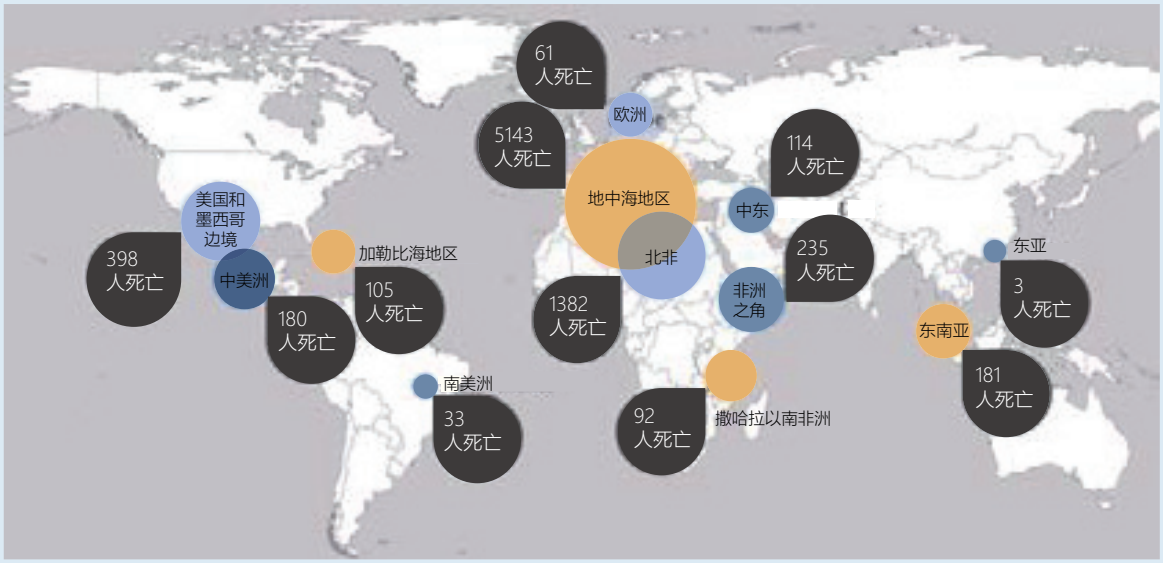
## 移民死亡和 IOM 的失踪移民项目

自 2013 年 10 月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附近载有 368 位移民的两条船沉没事件爆发后，IOM 便开始在它的失踪移民项目内着手收集和整理全球在迁徙途中死亡或失踪的移民信息。日常收集的移民死亡事件的信息可在 IOM 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GMDAC）管理下的失踪移民项目的线上数据库查到。失踪移民项目（MMP）同时对与移民死亡相关的问题和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包括海岸警卫队和法医的官方记录、媒体报道、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报告，以及对移民的采访。收集数据的所面临的挑战相当大。例如，大部分的死亡发生在非常规迁徙途中且经常发生在海上或偏远地区为了避免被发现，这意味着遗体下落不明。同时，官方搜集与制作的移民死亡数据来源公众不能获得。此外，由于移民证词的不精确和报道的不完整，二者作为信息的来源也存在诸多问题。

根据 IOM 的失踪移民项目，2016 年全世界有 7927 名死亡或失踪的移民，比 2015 年记录的死亡和失踪人数（6281）多了 26%。2016 年地中海区域的死亡和失踪移民数量同比增长了 36%，从 2015 年的 3785 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5143 人。地中海地区移民死亡和失踪人数均占失踪移民项目记录人数的 60% 以上。2016 年北非记录了接近 1400 死亡和失踪移民，其中事件原因主要在于严酷的自然环境、暴力和虐待、险恶的运输条件以及疾病和饥饿。其它地区失踪和死亡移民人数如下：

26 McAuliffe,2017.

## 2016 年全世界载入记录的死亡和失踪移民人数




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398 人死亡；中美洲 180 人死亡；加勒比海地区 105 人死亡；南美洲 33 人死亡；欧洲 61 人死亡地中海地区 5143 人死亡；北非 1382 人死亡；撒哈拉以南非洲 92 人死亡；中东 114 人死亡；非洲之角 235 人死亡；东亚 3 人死亡；东南亚 181 人死亡

*来源：* IOM, n.d.i.。

*注：* 数字对应移民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人数。所有数字仅反映 IOM 所知的事件。由于一系列死亡事件未被记录，目前数据仅为最保守估算。目前数据包括已发现尸体和或失踪或被认定死亡的移民。地图所采纳的名称和国界并不代表 IOM 的官方意见。

关于失踪移民项目的更多信息，详见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about。IOM 将持续增加新的数据并继续为全球的数据收集作出努力。关于收集移民死亡数据的难点的讨论，请见 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methodology。

## IOM 的协助自愿返乡和重新融入社会项目

从 1979 年起，IOM 开展了协助自愿返乡和重新融入社会项目（AVRR）。IOM 的 AVRR 项目包含一系列支持移民的活动，一般包括出发前心理辅导、机票购买、行政和旅行帮助，以及在重新融入的过程中尽可能提供帮助。

2005 到 2014 年期间，通过 AVRR 项目 IOM 平均每年帮助 3.4 万名移民。近年来移民规模大幅增长，但返乡的人数也有显著提高。2016 年，AVRR 向从 110 个东道国或过境国家返回到 161 个来源国或地区的 9.8403 万名移民提供了支持。这一数目和 2015 年（6.954 万名）相比增长了 41%。2016 年的 9.8403 万名 AVRR 受益者，大约 32% 为妇女，27% 为儿童。超过 3% 的返乡者曾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无人陪伴的儿童，或有健康方面需求的移民。在出发前或抵达他们来源国或地区后，大约 3.9 万名受益者被给予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财务支持。

AVRR 项目受益者的前十位东道国 / 过境国和来源国 / 地区（2016）

| 东道国或过境国家 | | 来源国或地区 | |
|---|---|---|---|
| 德国 | 54006 人 | 阿尔巴尼亚 | 17976 人 |
| 希腊 | 6153 人 | 伊拉克 | 12776 人 |
| 奥地利 | 4812 人 | 阿富汗 | 7102 人 |
| 尼日尔 | 4788 人 | 塞尔维亚 | 6978 人 |
| 荷兰 | 4635 人 | 科索沃 / 联合国安理会 1244 号决议 | 5889 人 |
| 比利时 | 4117 人 | 埃塞俄比亚 | 5675 人 |
| 也门 | 2594 人 | 马其顿 | 4986 人 |
| 芬兰 | 2116 人 | 伊朗 | 4485 人 |
| 吉布提 | 1803 人 | 乌克兰 | 3438 人 |
| 挪威 | 1459 人 | 俄罗斯 | 2058 人 |

如上表所述，2016 年 AVRR 受益者大多数（占总数 83%）从欧洲经济区（EEA）和瑞士返乡，尤其是从德国、希腊、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返回。从这些地区返回来源国的人数从 2015 年的 5.5851 万名增长到 2016 年的 8.1671 万名。

最近的趋势也表明了“南 - 南”返乡的态势，包括从过境国返乡的人数也在增长。2016 年，从尼日尔和摩洛哥返回诸如喀麦隆、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等国家的人数相当于全球返乡总数的 6%。2016 年 AVRR 项目的受益者的来源地主要包括东南欧、东欧和中亚（占总数的 49%）、亚洲和太平洋（16%）以及中东和北非（16%）。返乡者前十位的来源国和地区的人数加总占 AVRR 项目受益者总数的 72%。

更多的信息，详见 www.iom.int/assisted-voluntary-return-and-reintegration 和 www.iom.int/sites/defaut/files/our_work/DMM/AVRR/AVRR-2016-Key-Highlights.pdf.

# 外来务工人员（劳务移民）

基于 2013 年的数据，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全球存量最新统计表明 2013 年大约有 1.503 亿外来务工人员，该数量接近该年全球国际移民总人数（2.32 亿）的三分之二。[27] 当和处于工作年龄（一般是在 15 岁以上）的全球国际移民人口（2.07 亿）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占到了 70% 以上。然而，出于一系列原因全球外来务工人员的总数仍可能被低估。[28] 虽然存在更早的对全球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估算（1995 年为 3600-4200 万人，2000 年 8620 万人和 2010 年 1.055 亿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由于在定义、方法和数据源上的差异，这些数据不能用来和 2013 年的数据相比。

2013 年，1.123 亿（占总人数的 75%）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另外的 3440 万人（23%）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去往低收入国家的外来务工人员仅占总人口的 2%。在所有收入群体中，外来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相对较低（大约为 1.4%），这一情形也出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但在高收入国家，外来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要高得多（约为 16.3%）。

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中男性数量超过女性（男性为 1.072 亿人，女性 9930 万人）。基于这一背景，2013 年男性外来务工人员比女性多出几乎 1700 万人，其中有 8370 万男性（占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的 55.7%）和 6660 万女性（占总数的 44.3%）。进一步的数据分布请见表 3。

## 表 3. 外来务工人员，按性别和目的国的收入水平划分（2013 年）

| | 低收入 | | | 中等偏下收入 | | | 中等偏上收入 | | | 高收入 | | | 全球总量 | | |
|---|---|---|---|---|---|---|---|---|---|---|---|---|---|---|---|
| | 男 | 女 | 共 | 男 | 女 | 共 | 男 | 女 | 共 | 男 | 女 | 共 | 男 | 女 | 共 |
| 劳务移民 | 1.8 | 1.8 | 3.5 | 9.4 | 7.5 | 16.9 | 10.4 | 7.2 | 17.5 | 62.1 | 50.1 | 112.3 | 83.7 | 66.6 | 150.3 |
| 占劳务移民总量比例（%） | 1.2 | 1.2 | 2.4 | 6.3 | 5.0 | 11.2 | 6.9 | 4.8 | 11.6 | 41.3 | 33.3 | 74.7 | 55.7 | 44.3 | 100 |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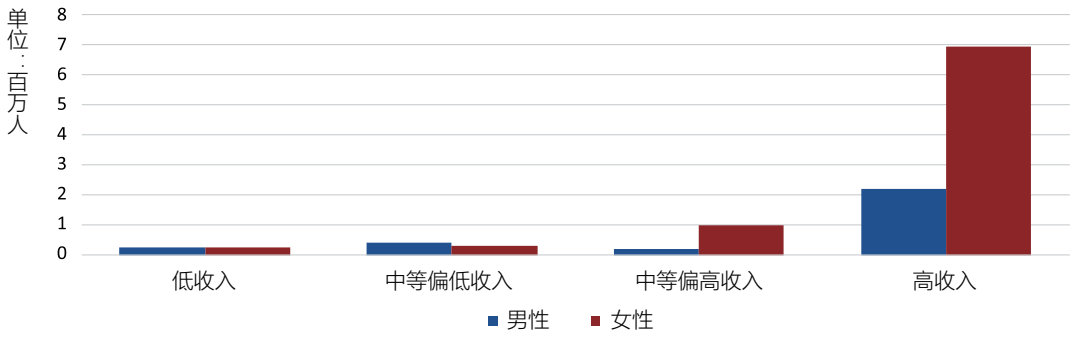
2013 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从事服务业（1.068 亿人，占总数即 71.1%）。其余为制造和建筑业（2670 万人，占总数的 17.8%）和农业（1670 万人，占总数的 11.1%）。在超过总人数 70% 的从事服务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有 8% 为家政人员。

据估计，2013 年大约有 1150 万外来家政人员，占所有家政人员数量（6710 万）的比例超过 17%，占所有外来务工人员的 7%。在这 1150 万人当中，845 万为女性，370 万为男性。外来家政人员绝大多数聚集在高收入国家，且对于女性和男性外来家政人员来说都是如此（见图 5）。如下列文本框所讨论的，IOM 针对移民健康问题的工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和难民尤为重要（下一部分将讨论这一问题）。

27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2015 年的数据。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见此文件。OECD 国家外国出生人口就业的信息可从 OECD，n.d.b. 找到。

28 请见国际劳工组织，2015。

图 5. 截至 2013 年按目的国收入水平和性别划分的外来家政人员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5。

## IOM 针对移民健康问题的工作

IOM 通过它的移民健康部为移民提供和推广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健康项目。应接收国政府的要求，无论是出于重新安置、国际就业，还是为了获得短期或永久签证，在移民出发前 IOM 为其提供身体和心理健康评估。具体的服务包括结核病测试和控制，艾滋病、梅毒和肝炎测试，体检，实验室诊断服务，医疗护送服务和出发前免疫接种疫苗。

这样的健康评估，有利于对特定移民人群的流行病知识的了解，并用于发展基于实证的项目和健康干预措施。数据由 IOM 国家办公室按标准程序集中收集，以减少处理时间，节省资源并在国家层面整合所有与移民健康相关的活动。IOM 也在开发一个医疗数据储备库，来对现有和历史的手术数据进行分析。

2015 年，IOM 为超过 80 个国家的移民进行了超过 34.6 万次的健康评估，其中包括移民（占总数目的 65%）和难民（占 35%）两个群体。大多数评估在亚洲进行（占总数的 45%），接着是非洲（29%），中东（14%）和欧洲（13%）。2016 年，IOM 提供了将近 45 万次健康评估（其中移民占 52%，难民占 48%），和 2015 年相比增长了 27%。同样，大多数评估在亚洲进行（占总数的 35%），接着是非洲（30%），中东（23%）和欧洲（12%）。这些数字同此前 5 年 IOM 的数据均表明 IOM 的全球健康评估活动在稳步增长。

从 2012 年开始，在美国难民准入计划下，IOM 联合美国相关机构为去往美国开发和实施难民疫苗接种计划。该计划力图在重新安置过程早期引进疫苗接种来保护难民免受多种常见的可防治疾病。到 2015 年底，该计划已在超过 12 个国家实施。总的来说，在 2012 到 2016 年期间，该计划已在 21 个国家实施，并有超过 21.5 万难民接种了一种或更多的疫苗。

关于 IOM 在移民健康方面的工作，详见 www.health.iom.int/.

# 侨汇

侨汇是指移民直接向他们来源国的家庭或社区进行的财务或实物转移。虽然在整理准确数据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数据缺口，且有定义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挑战，世界银行仍统计了关于侨汇的全

球数据。[29] 但这一数据并不包括未被记录的经正式或非正式渠道的移民流动，因而全球侨汇的实际数量可能比现有的估计更大。[30] 尽管有这些局限且在过去两年中侨汇总量有所下降，现有数据表明近几十年侨汇整体处于增长态势，并且从 2000 年的 126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750 亿美元。在 2015 和 2016 年期间，全球（向内）侨汇流动据估计缩小了 2.7%，即从 2014 年的 5960 亿美元缩小到 2015 年的 5820 亿美元，而从 2015 到 2016 年又缩小了 1.2%。和这个趋势相一致，寄往发展中国家的侨汇（占全球总数的大多数）也连续两年下降。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这一趋势在过去三十年是第一次出现。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侨汇数量已大大超过了由政府发起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官方发展援助（ODA）项目的总额。[31]

2016 年 ,印度、中国、菲律宾、墨西哥和巴基斯坦( 按递减顺序 )为数额最高的前五位侨汇汇入国。汇入中国和印度的数额远超过其它国家，且两国接收的侨汇均超过了 600 亿美元（见表 4）。剩余三个国家同年收到了 300 亿美元的侨汇。这些国家中很多在进入 21 世纪后侨汇的汇入金额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当按侨汇占 GDP 的比例来考虑，2016 年侨汇占 GDP 比重最高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吉尔吉斯坦( 35.4% ),其后是尼泊尔( 29.7% ), 利比里亚( 29.6% ),海地( 27.8% )和汤加( 27.8% )。

高收入国家是侨汇的重要来源。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是侨汇汇出最多的国家，2015 年向外汇出 613.8 亿美元。接着是沙特阿拉伯（387.9 亿美元）和瑞士（243.8 亿）美元。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中国也是一个主要汇出地（中国同样也是侨汇接收数量最高的国家），在 2015 年汇出 204.2 亿美元。2015 年排第五位的侨汇汇出国是俄罗斯（197 亿美元）。表 4 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和趋势。[32]

## 表 4. 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出国\汇入国( 2000-2015 年 )( 单位：十亿美元 )

| 侨汇汇入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 | | | | | | |
|---|---|---|---|---|---|---|---|
| 2000 年 | | 2005 年 | | 2010 年 | | 2015 年 | |
| 印度 | 128.4 | 中国 | 128.4 | 印度 | 534.8 | 印度 | 689.1 |
| 法国 | 86.1 | 墨西哥 | 86.1 | 中国 | 524.6 | 中国 | 639.4 |
| 墨西哥 | 75.2 | 印度 | 75.2 | 墨西哥 | 220.8 | 菲律宾 | 284.8 |
| 菲律宾 | 69.6 | 尼日利亚 | 69.6 | 菲律宾 | 205.6 | 墨西哥 | 262.3 |
| 韩国 | 48.6 | 法国 | 48.6 | 法国 | 199 | 法国 | 233.5 |
| 西班牙 | 48.6 | 菲律宾 | 48.6 | 尼日利亚 | 197.5 | 尼日利亚 | 189.6 |
| 土耳其 | 45.6 | 比利时 | 45.6 | 德国 | 127.9 | 巴基斯坦 | 198.5 |
| 美国 | 44 | 德国 | 44 | 埃及 | 124.5 | 埃及 | 165.8 |
| 德国 | 36.4 | 西班牙 | 36.4 | 孟加拉国 | 108.5 | 孟加拉国 | 153.8 |
| 英国 | 36.1 | 波兰 | 36.1 | 比利时 | 103.5 | 德国 | 153.6 |

29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源自世界银行与移民和侨汇相关的数据，可从世界银行 n.d.b 获取；关于这一主题的刊物，可以从世界银行 n.d.c. 获取。世界银行年度侨汇数据库（世界银行 n.d.b.）、 移民和发展摘要 25（世界银行，2015a）、移民和发展摘要 26（世界银行，2017a）和移民和发展摘要 27 （世界银行，2017a）和世界银行 4 月 2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世界银行，2017b）是数据的关键来源。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考这些资料及“世界银行移民和发展事实记录”（包括 2016 年出版的最新版）。

30 世界银行，2016a。

31 同上。

32 请见 OECD，n.d.c, 其中也包含关于 ODA 的数据。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关注这一趋势在发展、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 侨汇汇出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 | | | | | | |
|---|---|---|---|---|---|---|---|
| 2000 年 | | 2005 年 | | 2010 年 | | 2015 年 | |
| 美国 | 343 | 美国 | 472.5 | 美国 | 507.8 | 美国 | 613.8 |
| 沙特 | 154 | 沙特 | 143.2 | 沙特 | 270.7 | 沙特 | 387.9 |
| 德国 | 90.4 | 德国 | 127.1 | 俄罗斯 | 214.5 | 瑞士 | 243.8 |
| 瑞士 | 75.9 | 瑞士 | 99.9 | 瑞士 | 168.8 | 中国 | 204.2 |
| 法国 | 37.7 | 英国 | 96.4 | 德国 | 146.8 | 俄罗斯 | 197 |
| 阿联酋 | 36.8 | 法国 | 94.8 | 意大利 | 128.9 | 德国 | 185.6 |
| 韩国 | 36.5 | 意大利 | 75.5 | 法国 | 120.3 | 科威特 | 152 |
| 以色列 | 32.6 | 俄罗斯 | 68.3 | 科威特 | 118.6 | 法国 | 126.8 |
| 日本 | 31.7 | 卢森堡 | 67 | 卢森堡 | 106.4 | 卡塔尔 | 121.9 |
| 荷兰 | 31.3 | 韩国 | 66.7 | 阿联酋 | 105.7 | 卢森堡 | 113.5 |

*来源：*世界银行，n.d.b.。（登录时间：2017 年 5 月）

*注：*所有数字单位为亿美元。

##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截至 2016 年底，全球共有 2250 万难民，其中 1720 万人受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且有 530 万人已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33] 虽然从 2012 年起，难民的年增长速度已有所放缓，但目前的难民总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记录。另外，有 280 万人正寻求国际保护并等待难民身份认定结果，而这些人被统称为寻求庇护者。在 2016 年大约有 200 万庇护申请提交初审，德国依然是接收申请最多的国家，接到超过 72 万份庇护申请，其后为美国（26.2 万份）和意大利（12.3 万份）。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 2016 年底十八岁以下的难民人数约占全球难民总人口的 51%。事实上，据现有非总和的数据分析显示，2003 到 2016 年期间，难民总数中儿童的比例非常高，且在 41% 到 51% 的比例之间波动。同一时期，妇女占难民总人口的比例相对稳定，保持在 47% 到 49% 之间。此外，与全球的发展动态相一致，越来越多的难民生活在城市，且在 2016 年底住在市区的难民已占难民总数的 60%。[34]

2016 年，无人陪伴和失散的儿童在 70 个国家提交了约 7.5 万份单独庇护申请，比起申请数量

33 这部分的内容是基于联合国难民署 2016 年和 2017 年的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考这些资料。联合国难民署之前的全球趋势报告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库（可从联合国难民署 n.d. 获取）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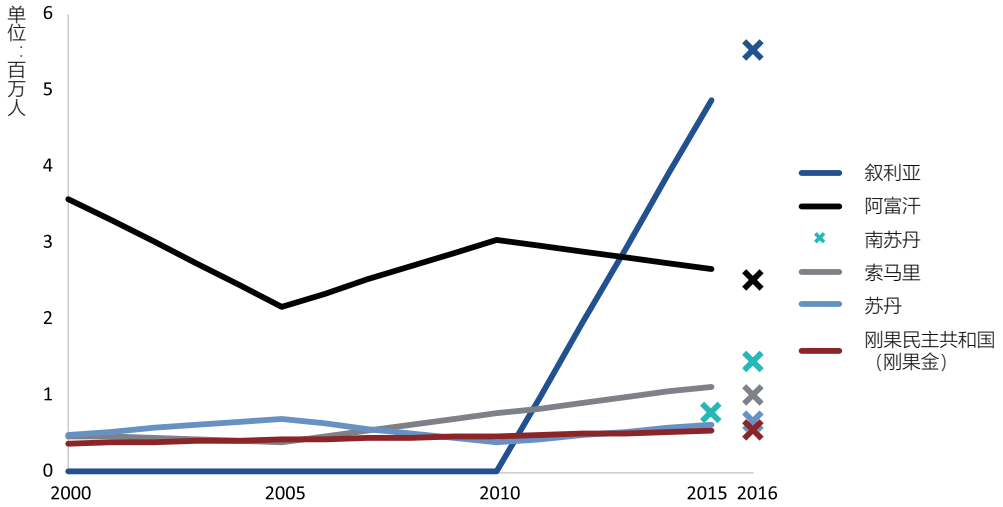
34 关于按年龄、性别和地点划分的评估的局限性，请参考联合国难民署 2016 年和 2017 年报告。

格外高的 2015 年（9.84 万份）有所下降，但仍比 2014 年通报的数字多了一倍多。[35] 与庇护申请提交的全球总趋势相一致，德国收到的无人陪伴和失散儿童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一半多。

和其它年份一样，一些国家尚未解决和新出现的冲突事件对目前的难民数量和发展趋势影响最大。2016 年底在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下的难民中，有 1350 万人来自世界前十位难民输出国，占到难民总数的 79%。这些国家包括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索马里、苏丹、刚果、中非共和国、缅甸、厄立特里亚和布隆迪。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在至少五年中均为难民的主要输出国。

叙利亚冲突目前已造成 550 万名难民。阿富汗三十年的动荡和暴力使其成为第二大难民输出国，难民总数达 250 万人。但因为部分难民从巴基斯坦回到阿富汗，这一数据相比 2015 年的数据（270 万人）略有下降。2016 年中期，南苏丹爆发的大规模暴力使其成为第三大难民来源国，到 2016 年底总共有超过 140 万名的难民。来自阿富汗、南苏丹和叙利亚的难民已占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下难民总数的 55%。图 6 显示了 2000 到 2015 年间选定国家难民数量的演变趋势。图 6 能清晰表明叙利亚冲突对难民人数的影响。对叙利亚而言，转折发生在 2010 年。2010 年，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人数不足 3 万人，而当时叙利亚作为第三大难民接收国，接收了 100.55 万来自伊拉克的难民。[36]

图 6 截至 2016 年主要难民来源国迁出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2017 年 7 月 18 日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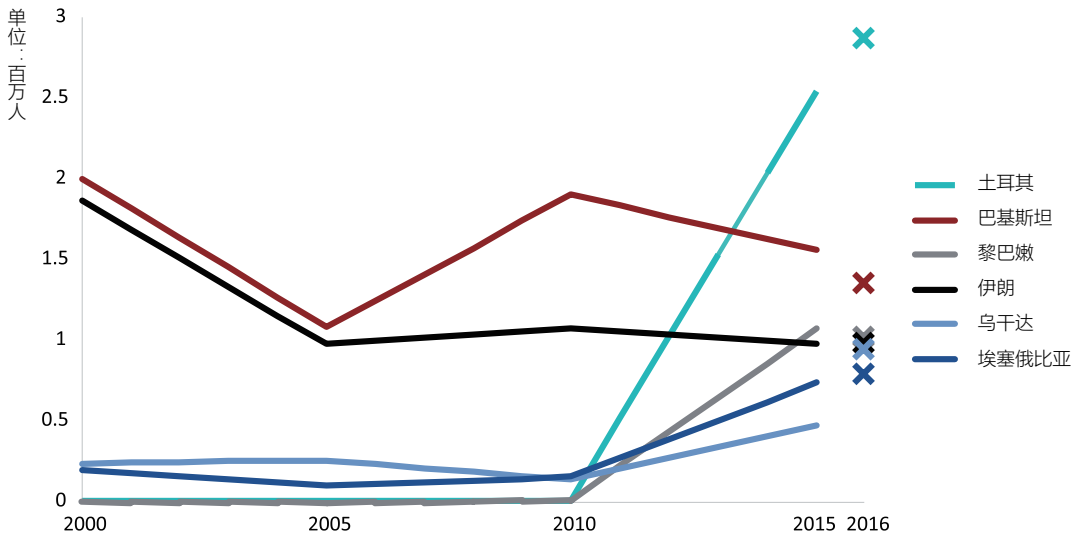
*注：*线条表明五年的发展趋势，叉号代表单年数据。南苏丹在 2011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35 对于数据被低估的解释。请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7。

36 联合国难民署，2010。

2016 年，土耳其连续第三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总共接收了 290 万名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叙利亚（约 280 万人）。考虑到叙利亚难民在全球难民人口中的重要比重，叙利亚的另外两个邻国 - 约旦和黎巴嫩也位列难民接收国的前十。巴基斯坦和伊朗作为第二大难民来源国是阿富汗难民的主要接收国，也处于难民接收国的前列。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德国、刚果（金）和肯尼亚构成其余的主要难民接收国。难民主要去往自身国家的邻国区域。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诸如喀麦隆、乍得、刚果（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等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接收的难民人数达到全球难民总人数的 28%（490 万人）。只有当按难民人数占国家人口的比重进行排列时，诸如瑞典（第五）和马耳他（第九）等高收入国家才进入前十的行列。图 7 显示了 2000 到 2015 年间主要难民接收国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

## 图 7. 截至 2016 年主要难民接收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2017 年 7 月 18 日发布。

*注：*线条表明五年趋势，叉号代表单年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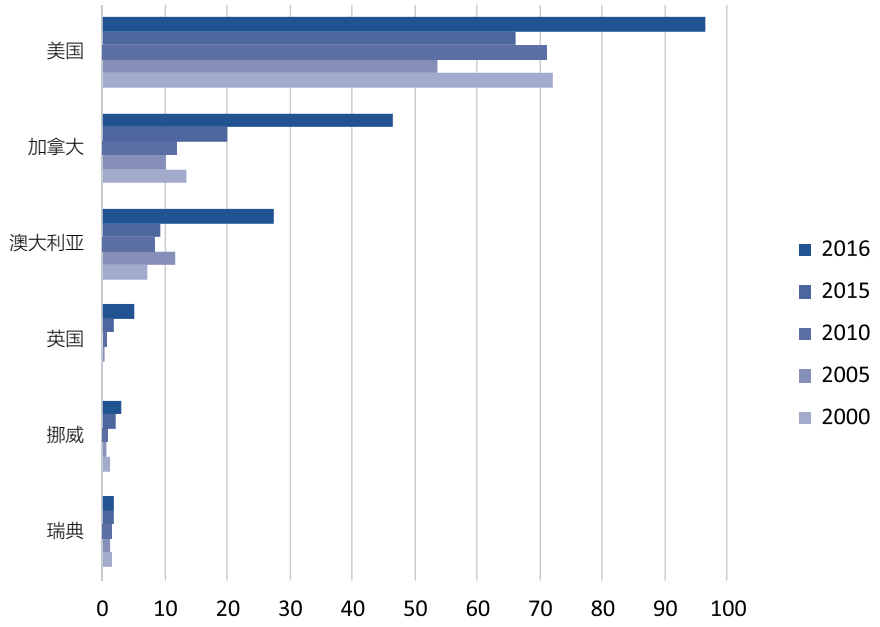
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个关键任务是为难民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整理了三类传统解决方案的数据：自愿返乡、就地融合和重新安置。对于许多人，回家是首选。然而出于各种原因，在任何给定年份仅有少数人可以达成这一愿望（如下列数据所示），而这一点也造成了难民困境的延续。

2016 年间，超过 55 万难民回到了他们的来源国。这一数量是 2015 年数量的一倍多，比前几年的人数也有大幅增长。大多数返乡的难民（38.4 万人）主要是从巴基斯坦回到阿富汗。由于长期和新的冲突也是自愿返乡数量不高的原因，2011 到 2015 年间返乡的数量仅占过去二十年所有返乡人数的 10%。

尽管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有益于就地融合，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6 年有 23 个国家报告当年至少有一名难民获得了该国的公民身份（2015 年有 28 个国家），而这一年共有 2.3 万难民（获得不同国家的公民身份）（2015 年有 3.2 万人）。其中，加拿大所占比重最高，2016 年有 1.63 万名难民（2015 年有 2.59 万名）归化入籍加拿大，其后为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

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安置项目的参与国家从 2015 年的 33 个上升到 2016 年的 37 个。其中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施行了新的重新安置项目，或对新的重新安置项目作出了承诺。虽然（参与的国家数目）有所增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传统的重新安置国仍是世界难民安置的主力。2016 年，近 19 万名难民在全球得以重新安置，这一数据比 2015 年（10.71 万人）增长了 77%。叙利亚、刚果、伊拉克和索马里难民是主要的受益者。图 8 反映了 2000 到 2016 年间主要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

## 图 8. 2000 到 2016 年间主要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单位：千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2017 年 6 月 23 日发布。

## IOM 在重新安置项目中扮演的角色

IOM 通过重新安置项目为难民安排安全和有组织的出行，并帮助其他易受伤害的人获取其他人道主义援助。在传统的难民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准入计划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对其它的准入形式表示出兴趣或正执行其他的准入方式，如人道主义签证、个人赞助、奖学金和劳工流动体系。IOM 协助重新安置的行动数据是指特定时期在 IOM 保护下从不同国家前往世界各地的难民及相关人员的总数。

2015 和 2016 两年间，IOM 在 140 多个难民来源国帮助 43 个国家地区执行了重新安置和人道主

义准入计划，并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伊拉克、约旦、肯尼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尼泊尔、泰国、土耳其和坦桑尼亚开展了重要行动。2015 年，共有 12.6867 万名难民在 IOM 的保护下前往 30 个国家获得重新安置，其中主要为叙利亚人、刚果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索马里人。2016 年则有 20.4973 万名难民在 IOM 的帮助下在 39 个国家获得重新安置。每年得以重新安置的难民性别构成保持稳定，其中有 51％是男性，有 49％为女性。从 2010 年到 2016 年，IOM 帮助重新安置的人数每年以 103% 的比例增长。2010 年获得 IOM 帮助的相关人员达 10 万人，而在 2016 年数量接近 20.5 万人。这很大部分缘于对叙利亚人的紧急安置以及通过特殊移民签证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翻译人士提供的准入。叙利亚人重新安置人数的增长始于 2015 年下半年，其中在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德国和瑞典等若干欧洲国家增长尤为明显。

基于合作协议，IOM 将为利益攸关方提供必要的信息并和包括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安置国和安置机构等在内的主要合作方分享数据。通过密切合作，IOM 和联合国难民署定期对与重新安置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前往安置国的难民人数）进行核实和校正。

关于 IOM 重新安置活动的更多信息，详见 www.iom.int/resettlement-assistance.

## 境内流离失所者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统计了两组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数据：给定时期的新增流离失所数量，以及给定时间点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存量。2016 年底，在 125 个国家共有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案例）3110 万例。[37] 其中，突发的灾害是造成流离失所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一原因使得 118 个国家的 242 万人无家可归。冲突和各种暴力事件是造成流离失所的另一原因，迫使 37 个国家共 690 万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作为直接引发流离失所问题的两大原因，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在最新的报告中重申了区别对待冲突和灾难两大因素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由于存在多种引发因素，呈现流离失所问题的方式应当进一步改进。[38]

截至 2016 年底，冲突和各种暴力事件在全球共造成 4030 万例境内流离失所案例，相比 2015 年的 4080 万例（自 1998 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开始监测该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数量有所下降。和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一样（上一节已讨论），自 2000 年起，长期未被解决和新引发的冲突已使由冲突和各种暴力事件引发的流离失所总人数翻了一倍，并在 2010 年后急剧上升。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全球总人数目前难以获得，但这一问题正被努力解决。现有的数据表明自 2008 年后的 9 年间，灾难共造成 2.276 亿人无家可归。2015 年记录的样本案例数据也显示，持续 1 到 26 年的流离失所正影响着数以万计的人。

37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基于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6 和 2017 的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考这些资料。IDMC 自 2016 年起开始发布单一整合的年度报告，该报告中包含关于冲突、暴力事件和灾难的数量。流离失所监测中心之前的全球评估报告（可从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 获取）以及其全球国内流离失所数据库（可从 IDMC,n.d.) 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38 除冲突、各种暴力事件和突发灾害外，目前的全球数据未能体现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其他原因，比如犯罪、发展项目和与水涝、环境恶化相关的长期潜伏的危机。在《2016 全球国内流离失所报告》中，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正努力收集由这些原因导致的流离失所的数据并说明了数据收集的复杂性。

从 2003 年起，冲突和暴力平均每年导致新增流离失所案例 530 万例，相当于每天大约有 1.5 万名男性、女性和儿童被迫离开家园。[39]2000 年到 2015 年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的案例数量更高，年平均总量达 760 万例，或日均达 2 万例。2016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人数 690 万正好处于两个平均值之间，反映出自 2003 年以来流离失所人数总体在不断上升。2015 年，也门是受流离失所问题影响最深的国家（220 万例），其次是叙利亚（130 万例）和伊拉克（110 万例）。然而在 2016 年，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新增的流离失所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40]（2015 年三国新增流离失所的人口数占全球新增流离失所总人数的一半多，达 880 万例），但同许多在 2015 年位于前列的国家一样，三国的（新增流离失所人口数）仍位列（世界）前 10。刚果（金）作为流离失所问题频发的地区一向被忽视，但 2016 年刚果（金）的流离失所总人数居世界首位（共有 92.2 万人无家可归），接着是叙利亚（82.4 万人）和伊拉克（65.9 万人）。如果比较（各国各地区）新增流离失所人数占（该国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叙利亚再次位列第一（每 10 万居民有 4.4 万人无家可归），接着是萨尔瓦多（每 10 万居民中有 3600 人无家可归）和利比亚（每 10 万居民中有 2500 人无家可归）。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注意到，过去的十年中萨尔瓦多一直是暴力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然而由犯罪和帮派暴力导致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直观地发现。2016 年底，共有 56 个国家和地区了接纳了 4330 万因暴力和冲突而无家可归者，但相比以往，位于前列国家的流离失所人口数的变动很小。哥伦比亚（724.6 万人流离失所）和叙利亚（632.6 万人）远高于其它国家，并一起构成了全球流离失所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接着是苏丹（330 万人）、伊拉克（303.5 万人）、刚果（金）（223 万人），然后是也门、尼日利亚、南苏丹、乌克兰和阿富汗。在全球 4030 万人中，超过三千万无家可归者位于这 10 个国家。事实上，自 2003 年以来哥伦比亚、刚果（金）、伊拉克、苏丹和南苏丹每年都排在前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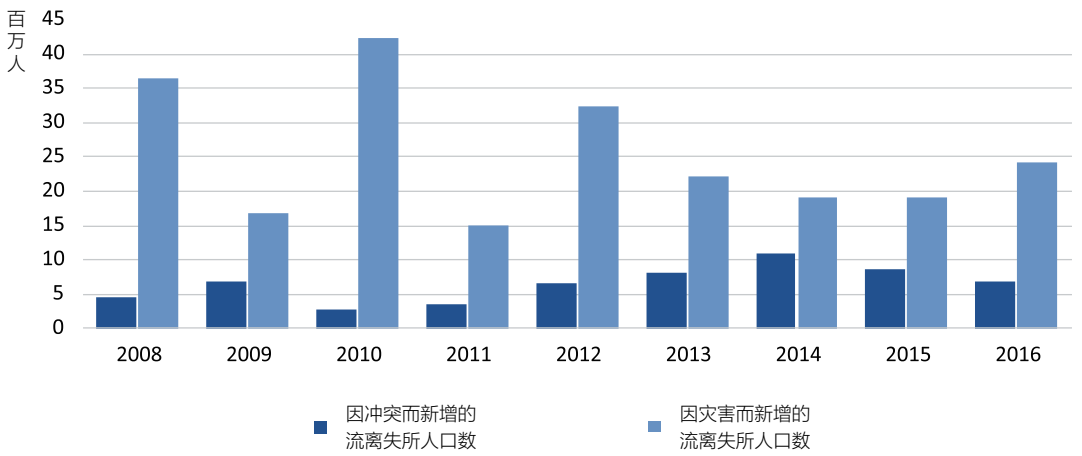
从 2008 年起，每年平均新增 2530 万因灾害而无家可归者。[41] 这比由冲突和暴力引起的流离失所的平均人数要大得多，也反映了某些危险灾害对人群伤害的无差别性、无法预见和难以控制的性质。当考虑到拥有无家可归者的国家数量时，这些特征尤为鲜明：有 118 个国家的人们因灾害而无家可归，而只有 37 个国家因冲突和暴力而出现流离失所问题。2016 年（同往年一样），诸如洪水和风暴等由气候和与天气相关的灾害引发的流离失所人口数占总流离失所总量（2420 万人）的大部分（2350 万人，即 97%）。从 2009 年起，由地质险情引发的灾难平均每年致使 200 万人无家可归，这也是导致全球流离失所的第二大原因。然而，2016 年的数量远低于平均值，仅记录了大约 70 万例新增流离失所案例。其中中国（743.4 万例）、菲律宾（593 万例）和印度（240 万例）2016 年流离失所人口的绝对数量最高。正如图 9 所示，和往年一样，2420 万例的数量虽然低于一段时期内的平均值，但仍远高于由冲突和暴力造成的新增流离失所人口数。但是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观察到，在全球因灾害而无家可归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进行了相对安全和有序的短期撤离。

39 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40 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包括冲突局面的稳定、停火、对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数据统计方法的改变。

41 流离失所检测中心，2017。

## 图 9．新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单位：百万人）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n.d.。（登录时间：2017 年 6 月 23 日）

### IOM 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

IOM 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DTM）系统追踪国内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而形成的流离失所问题。这一系统能够捕捉、处理和传播关于流离失所人口和移民移动，并显示该群体不断演进的需求。数据以地图、信息图表、报告、互动网络可视化、原始和个性化定制数据等形式进行分享。

该系统能基于一个给定的情景，通过使用下列的工具方法收集关于人口、位置、条件、需求和脆弱性的信息：

i. 在特定方位追踪人口流动和（获取）不同方面的需求以制定协助方案；

ii. 在来源地、过境处及目的地追踪迁移（“流动”）和总形势；

iii. 登记个人和家庭以挑选受益人、确定弱势方面并制定项目；

iv. 基于兴趣人群进行调查并收集具体信息。

2016 年，DTM 系统跟踪了 23 个国家超过 1450 万因冲突和自然灾害受困的人口。2015 年和 2016 年 IOM 的数据是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用于估计若干国家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的参考。2015 年 10 月，DTM 系统建立了一个关于人口流入欧洲的信息门户，这一门户可从 http://migration.iom.int/europe. 获得。该门户发布关于迁移趋势、过境通道及陷入困境和失踪移民的信息。

关于 IOM 的 DTM 系统，详见 www.globaldtm.info.

# 数据缺口和挑战

正如本章表明的，在收集和分析移民数据上存在若干关键缺口和挑战。以下将对这些关键缺口和挑战进行一个简单叙述。但是，基于大量文献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我们鼓励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查阅相关书籍。[42]

目前我们对于国际移民的了解主要通过估算国际移民存量，或统计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国家的人口数量。但是，由于无法按统一的关键特征划分数据等，存在于数据收集上的局限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移民人口数据的获取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作为计算移民人数的重要数据来源，人口调查一般每十年左右才进行一次。这些人口调查往往仅记录迁入的移民而忽略迁出的移民，且不记录年龄或移民年份。[43] 再比如，一些国家不记录居民出生国，而是只关注公民身份。这种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缺乏对国际移民统一的概念和定义使得对国际移民人数的估算十分困难。

关于移民流动的数据比移民人数数据更有限。尽管目前正努力从国家获得移民流动数据并改进它们的可比性和统一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法提供关于国际移民动态的数据。[4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仅为 45 个国家整理了移民流动数据，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仅报告了一些成员国的移民流动。然而，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用来定义移民事件的时间长度以及对处于危险的人群的覆盖范围可能有差别，这一点也会妨碍分析。同时，因为移民这一形式的私密性和流动性，[45] 关于非常规移民流动的规模、模式和动态的数据更为不足。近期地中海区域移民流动的频繁促使一些人努力收集了很多关于去往欧洲的移民的数据，但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对于移民数量、模式和特征的了解相对较少。[46]

对劳务移民的全球规模和特点的了解主要基于国际劳工组织作出的估算。包括对短期劳移民估算不足等一系列因素在内，对劳工移民的估算可能无法体现其真实规模。和全球移民人数一样，外来务工人员人数及其各自的特点在统计、定义和方法上都很复杂。每年对全球侨汇的估算能够通过世界银行获得，但同样，现有数据都有限制性说明并且有很大的局限性。

尽管在冲突、暴力和灾难背景下数据收集固有难度，若干组织，尤其是联合国难民署、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 IOM，将持续致力于扩大关于易受伤害人群（诸如难民、寻求庇护者、国内无家可归者和人口贩卖受害者）全球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可获得性。由于事件紧急以及被统计人口的特点、脆弱性和“可见性”，常常会出现方法上、操作上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但缺乏与环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相关的迁移量化数据，是一个关键缺口。这类迁移通常由多种原因造成，因此数据收集也尤为困难。与灾难相关联的长期趋势，诸如流离失所的时长及其后的迁移和轨迹等方面的证据也相当缺乏。这些缺口已经被认识，并已作出努力来克服这些问题。

42 详情请见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Raymer 和 Willekens, 2008; de Beer 等人，2010；Kraler 和 Reichel, 2011。

43 Willekens, 2016.

4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c; Vezzoli, Villares-Varela 和 de Haas, 2014; Lemaitre 等人，2007；Poulain,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45 Kraler 和 Reichel, 2011。

46 McAullife 和 Mence,2017。

# 结论

近些年关于移民的资料和认识不可否认已大幅增长，对全球移民问题表现出的兴趣亦是如此。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到移民（包括难民）的大规模迁移和对就移民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鼓舞，政府、国际组织和其它行为体正不断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就移民规模和特点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事实储备。但全球对移民问题的了解仍存在很大的缺口。如本章所示，现有的信息在很多方面是有限的、碎片化的，且国家和地区间差别很大。收集和比较移民方面的具体数据有很大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即便移民的推动因素和模式在不断演化，但一定程度上，在创新已经纳入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7] 与技术变革的帮助下，通过创新和全球一致的努力，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动力提升全球国际移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质量。

基于目前的数据，这一章对迁徙和移民进行了全球综述。尽管在勾勒全球移民图景中存在各种数据缺口和挑战，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几个高水平的结论。现有的数据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全球移民动态和趋势并有助于进行明智的决策。数据本身也在讲述一个个移民故事。

虽然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生活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他们所属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许多人正移民去往遥远的高收入国家。国际移民构成世界总人口中一个较小但在不断增长的部分。另一方面，关于非常规移民的全球数据目前仍难以获得。

为了更好地了解常规移民流动的全球趋势，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创新和改进来使数据覆盖面扩展至更多的国家（目前已掌握信息的国家有 45 个）。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世界有很多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尤其是那些依靠蛇头和人贩等隐蔽渠道进行的移民。这类信息相对较新，而信息的质量和覆盖面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工作是人们进行国际移民的主要原因，且外来务工人员组成了全球国际移民的绝大多数。大部分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并从事服务业。男性外来务工人员多于女性，而男性移民参与劳动的比例也比女性高。2000 到 2015 年之间，大多数位于前列的侨汇汇出国保持不变，同位于前列的侨汇汇入国的情况相似。总的来说，侨汇的全球总流量在 2000 年到 2016 年间大幅增长。

最后，由冲突、各种暴力事件和其它因素引发的全球流离失所问题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难化解的、未被解决的和持续发生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导致全世界难民人数激增，而妇女儿童占了难民总人数的大部分。虽然少量的国家继续为难民提供解决方案，总的来说目前的援助还不足以满足全球范围的需求。与难民形成类似的因素已造成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而与冲突和暴力相关的流离失所人数自 2000 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如此，由突发灾害造成的新增流离失所案例仍比那些由冲突和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案例要多得多，且人们已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收集和积累相关的数据。同时，我们和全社会也需要改进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内的与环境变化相关的数据。

4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e。

# 3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 引言

第二章全面总结了全球移民的数据和趋势，其中包括国际移民（存量）、国际迁徙（流量），及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内的特殊移民人群的迁徙，以及移民带来的侨汇。这一章通过结合地区差异和个别国家的案例从全球层面探讨了移民问题。而第三章则将关注区域维度和地区发展，并从多样且相互补充的视角揭示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他们的迁徙。

考虑到地理在历史上和当下都是影响迁徙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我们将首先从地理角度理解迁徙。尽管交通和电信技术上的进步让许多人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不断缩小（具体可参见本报告关于流动性、迁徙和跨国联通的章节），地理仍是影响迁徙和流离失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许多人通常选择迁徙至他们生活区域的附近地区，或是去往临近国家，或是易到达、他们熟悉且方便返乡的地区。对于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远离国际或国内冲突、极端暴力、突发灾害等危机时，迅速获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倾向于搬迁到附近安全的地方，不管这些地方是在本国还是在境外。

本章力图从地理视角理解区域迁徙，从而帮助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国际移民。本章的分析将采纳由联合国界定并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其它组织使用的六个区域：

- 非洲
- 亚洲
- 欧洲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北美洲
- 大洋洲

对于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 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难民署所统计的数据[1]，对关键的移民数据进行综述和简短讨论；2. 根据国际组织、研究者和分析人员大范围的数据、信息和分析，对该区域迁徙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进行简要描述。为了解释移民模式的多样性，本章将从次区域的层面呈现六个区域各自的移民趋势和问题及“重要特征和最近发展”。例如，对于非洲，这种串联式的呈现模式既分析了整个非洲的统计数据，同时也对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等次区域进行了总结。附录 A 提供了对区域和次区域的分类。这些次区域概述提供了关于离开、

1 具体请参见第二章附录 A 对“国际移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

前往及这些次区域内部的移民模式的信息[2]。除此之外，本章也关注特定次区域的内部特征，比如劳务移民、侨汇、非常规移民、移民偷运、流离失所（境内和国际）和融合。对这些次区域进行概述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提供详尽信息，而是更多地揭示移民趋势、模式和问题。

正如前一章所强调的，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但目前仍存在重要的数据缺口，且全世界关于移民的数据往往是碎片化且缺乏统一性，这一点时常妨碍我们的分析和政策、项目和行动的制定。[3] 本章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事实依据，其来源可参见脚注和参考文献部分。同时，我们特鼓励读者查阅本章所引用的来源以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更深入地了解。

## 非洲[4]

非洲区域迁入和迁出非洲的移民数量大致相当。如图 1 所示，2015 年有超过 1600 万非洲人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非洲国家，另外也有 1600 万人生活在不同区域。生活在非洲的移民人数自 2000 年开始增长，在刚过去的五年内增长最为明显。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面积相对较小但数量众多的非洲国家，对衡量该区域的国际移民有重要影响，而这一点也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其它如自由迁移协议、可渗透的边界、移民和迁徙等方面将在“重要特征和发展”的部分进行讨论。

从图 1 可以看出，非洲地区国际移民的数量从 2000 年开始增长，但增长最显著的是从非洲迁至非洲以外地区的国际移民数量。从 1990 年起，生活在非洲以外的非洲移民人数翻了一倍多，其中去往欧洲的非洲移民人数增长最为显著。2015 年，所有生于非洲但生活在非洲以外的移民中，有 900 万人生活在欧洲，400 万人生活在亚洲，200 万人生活在北美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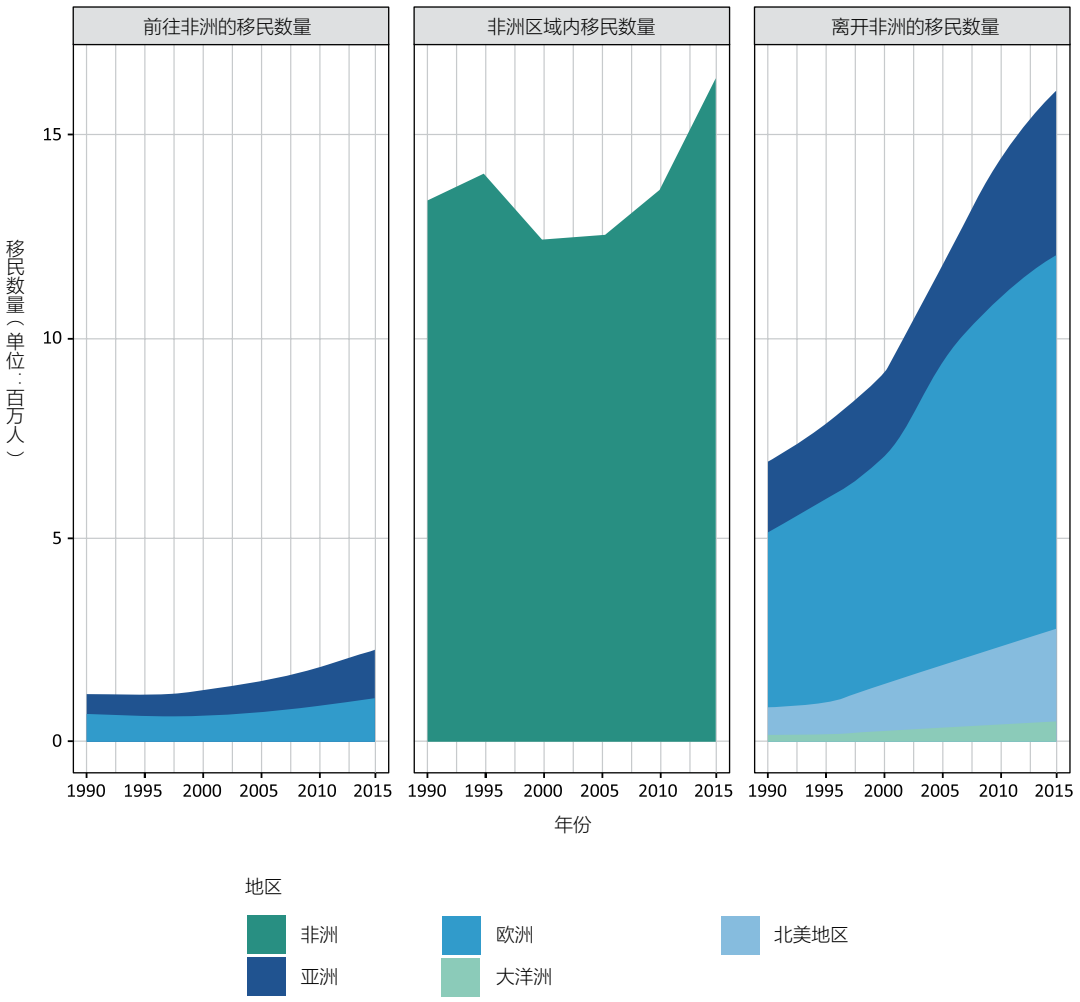
如图 1 所示，非洲国际移民最突出的一方面是出生在非洲以外并迁移至非洲的移民数量非常少。虽然该数量已逐渐增长，但 2015 年大约仅有 230 万来自非洲以外地区的移民生活在非洲，其中大多数来自亚洲和欧洲。

2 这些次区域的划分主要和移民动态相关，因而可能不同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区。附录 A 有具体信息。

3 本章已尽最大努力（包括进行数据认证）确保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但我们很遗憾地表示数据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详情请参阅对数据技术性和解释性的说明，以及数据的局限性和附加说明。

4 关于非洲的地区构成请参见附录 A。

## 图 1. 1990 到 2015 年间前往非洲，非洲区域内和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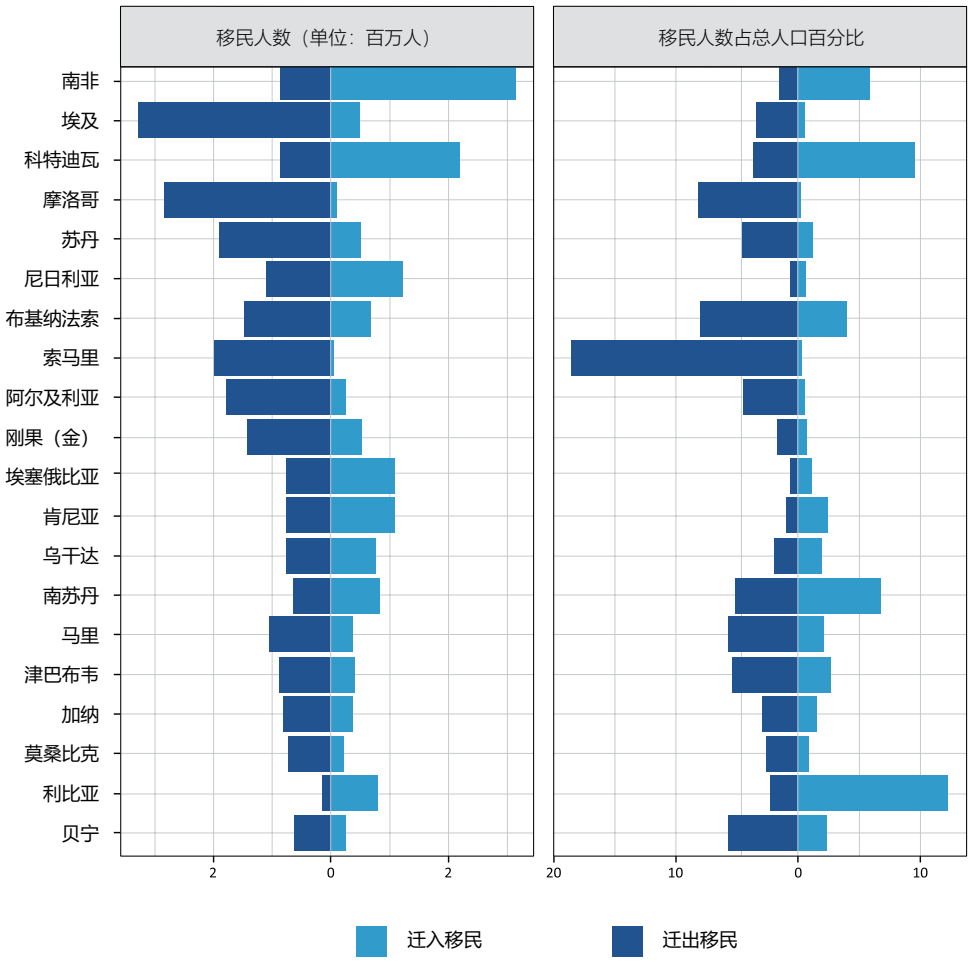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例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非洲的移民。“非洲以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也就是非洲）并生活在出生国以外非洲地区的移民。“离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非洲但生活在非洲以外（例如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去往国外的移民数量最多的非洲国家大多位于非洲北部。图 2 左侧即体现了这一点，但图 2 中的国家是按移民的总数量进行排列的（即迁入移民和迁出移民数量的总和）。2015 年，埃及拥有最多生活在他国的人口，其后是摩洛哥、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就迁入移民数量而言，南非是非洲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国，有大约 310 万国际移民生活在这个国家（大约占南非总人口的 6%）。此外，迁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还包括加蓬（16%），吉布提（13%），利比亚（12%），科特迪瓦和冈比亚（都为 10%）。

## 图 2. 2015 年前 20 大非洲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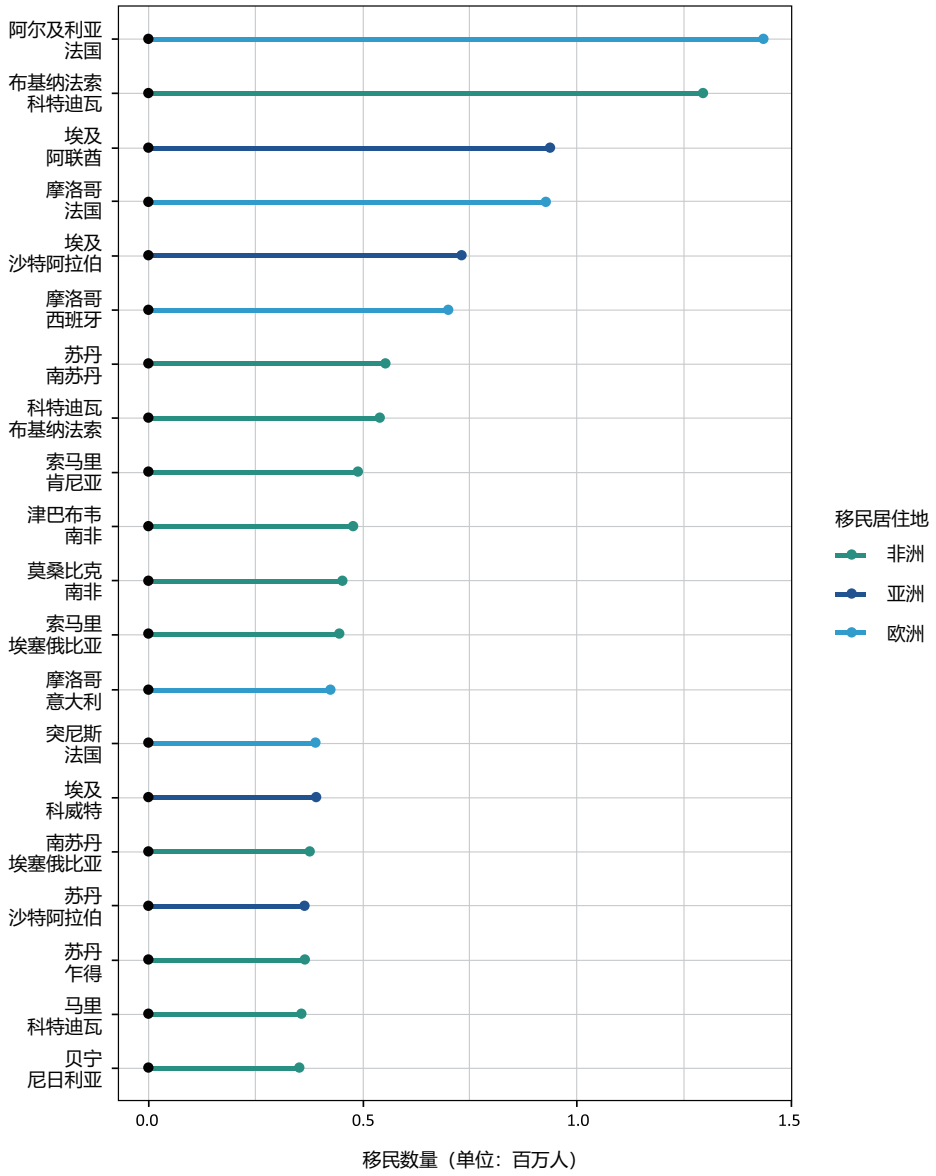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数量源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的该国居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出生在外国但生活在该国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人。

非洲境内和从非洲出发有很多重要的移民通道，其中（很多通道的形成）和地理上的临近、历史关联及流离失所等因素相关。从国家 A 到国家 B 的移民通道的规模是依据 2015 年来自国家 A 但生活在国家 B 的移民人数来衡量。移民通道体现了一段时间内移民迁移活动的集聚区，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是如何发展成为当地人口重要的一部分。如图 3 所示，一些涉及非洲国家的最大的移民通道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同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之间。这部分也反映了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国家间联系。还有去往海湾国家的重要劳务移民通道，例如，从埃及去往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通道。重要的是，图 3 所示的主要移民通道中，非洲洲内的通道数量仅超过半数，其中布基纳法索通往相邻的科特迪瓦之间的通道构成非洲的第二大移民通道。“重要特征和发展”一部分将对选定的移民通道进行进一步分析。

## 图 3. 涉及非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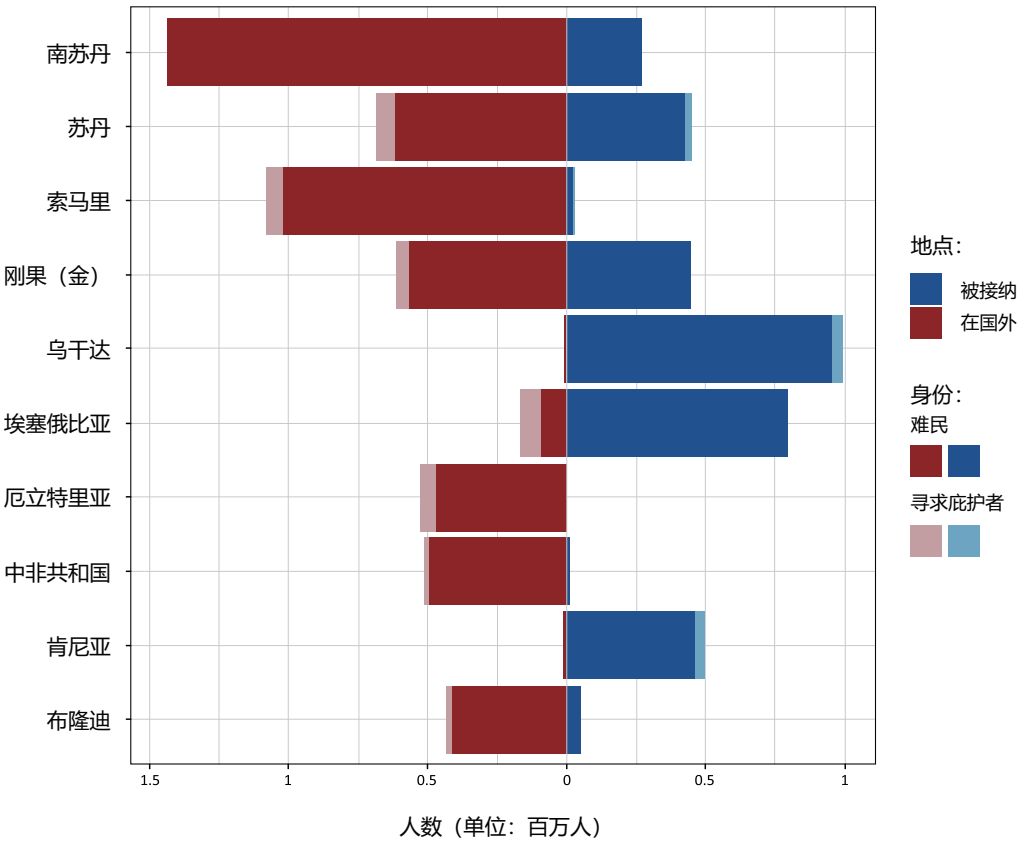

*来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移民通道体现了一段时间内移民活动的聚集区，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是如何发展成为当地人口重要的一部分。

如图 4 所示，非洲地区内和源自非洲的流离失所是该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非洲的大多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区域内的相邻国家接收。图 4 按接纳和来自该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呈现了数量排前十的非洲国家。2016 年，南苏丹的难民数量为非洲第一，世界第三。大多数南苏丹的难民

生活在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由于长期的冲突和近期的干旱，所产生的难民数量在非洲国家中排在了第二位，其中大多数被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相邻国家接收。其它拥有大量难民人口的国家包括苏丹、刚果（金）、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造成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包括冲突和暴力，而这在某些情况下也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这些国家中很多也接收了大量的难民。图 4 即表明了若干国家既是大量难民的来源国也是难民接收国，具体国家包括南苏丹、苏丹和刚果（金）。

## 图 4.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排前 10 的非洲国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 “被接收”指来自其它国家但目前居住在接收国家（如图右侧所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位于他国”指来自一个国家但目前居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见附录 A）对“难民”等关键术语进行了定义。排列前 10 位的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计算所得，该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和在该国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 *非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 *北非* [5]

**●从北非移民至欧洲和海湾国家始终是该区域移民动态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已延续了数十年。**从北非移民至非洲以外国家的人数长期都远高于从该区域流向该区域其他地区和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6] 源自北非的移民分支主要有两条：基于地理上的临近、先前订立的劳动力招募协议和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纽带，[7] 第一条是历史上来自西北非（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移民迁往欧洲，而第二条是来自东北非（例如埃及和苏丹）的移民前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8] 寻找临时工作。来源国和目的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以及北非的高失业率仍然是移民的重要动因。截至 2015 年，大约 1060 万北非人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地区），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欧洲，并有 300 万人居住在海湾国家。[9]

**●虽然北非是主要的移民过境地区，这些地区也接收了包括难民在内的大量国际移民。**利比亚拥有北非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在 2015 年超过 77 万人。[10] 苏丹也有大量的外国出生人口，他们来自南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乍得。埃及的国际移民数量从 2010 年的 29.5 万人增长至 2015 年的 49.1 万人，其中移民主要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索马里和苏丹。[11] 摩洛哥虽然传统上属于移民输出国，但也日益成为移民目的国，接收了包括来自非洲其它地区的大量移民，他们在滞留这一地区的同时寻找横渡（地中海）去往欧洲的方法。[12]

**●区域内部及周围地区的冲突和暴力引发了北非的流离失所问题。**截至 2016 年底，来自苏丹的近 65 万难民中绝大多数被邻国乍得和南苏丹接收。[13] 苏丹也有大约 33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此成为世界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第三多的国家。[14] 同时，苏丹也是一个重要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超过 40 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南苏丹。[15] 阿尔及利亚截至 2016 年底也接收了 9 万难民，[16] 而埃及接收了超过 20.1 万难民，其中主要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其它非洲国家。[17] 到 2016 年底，利比亚不稳定的安全和政治形势导致超过 30 万人无家可归，这也影响了居住在利比亚超过 3.8 万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18]

**●作为许多国家移民去往南方途中的过境枢纽，北非次区域在保护非常规迁往欧洲的移民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2011 到 2016 年期间，大约 63 万人利用“地中海中部路线”抵达意大利。**[19] 光

5 关于北非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6 Flahaux 和 de Haas, 2016。
7 Natter, 2014。
8 海湾委员会国家是一个由六个国家组成的地区政治组织，其中包括：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0 同上。
11 同上。
12 Reifeld, 2015.
13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4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a。
15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6 同上。
17 联合国难民署，n.d.a.。
18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9 欧盟委员会，2017a。

在 2016 年就有发现有超过 18.1 万人沿地中海中部路线（这一线路是 2016 年从非洲非常规的迁往欧洲的主要路线）迁徙，其中大多数抵达意大利。[20] 绝大多数人是从利比亚出发（几乎占偷渡总人数的 90%），其它出发国也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21]2016 年抵达意大利的人中，大多数来自西非和东非（尼日利亚、厄立特里亚、几内亚、科特迪瓦、冈比亚、塞内加尔、马里和索马里），其中超过半数申请了庇护。[22] 2016 年抵达意大利的 18 万移民中，13%（约 2.4 万人）为妇女，15%（2.8 万人）为儿童，但绝大多数儿童（占儿童人数的 91%）无人陪伴。相比之前，儿童包括无人陪伴的儿童的比例有所增加。[23] 其他人则沿着所谓的“地中海西部”路线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前往西班牙。这些移民通道正面临侵犯人权、保护不当等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在海上、沙漠中和其它过境地点发生的死亡事件、失踪移民、剥削、身体和精神虐待、贩卖、偷渡、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随意逮捕、被迫劳动、要求赎金和恐吓以及其他的人权侵犯行为。[24] 包括难民在内的一些移民也因此被困在北非这些国家。[25]

*西非和中非* [26]

●**西非和中非最显著的区域内移民表现为受多种原因驱动的混合迁徙流。**虽然关于非洲内部移民流动的数据缺口较大，且精确的数字难以被确认，但近期的估算反映出西非和中非绝大多数国际移民在区域内部进行迁移[27]。若干因素导致西非区域内移民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免签证迁移、该区域许多国家规模相对较小且散布在该区域的许多民族间联系紧密。[28] 重要的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区域内移民大多缘于劳动力的流动，例如很多季节性的、临时的和永久的迁徙工作者从尼日尔和马里等国家迁至加纳和科特迪瓦等海岸国家。[29] 经济因素是影响西非区域内移民的重要原因，但在中非，冲突和不稳定则在引发流离失所并驱使人口向邻国迁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30] 但中非同样存在大量迁徙工作者，例如加蓬接收了大量来自中非的从事石油和伐木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31]

●**尽管存在自由迁移协议，非常规移民在西非和中非仍非常普遍。对于许多试图横渡地中海去往欧洲的西非和中非移民，尼日尔是重要的过境国家和主要的偷运中心。**[32] 尤其当人们缺少护照或旅行证书等文件时，[33] 即使是在西非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自由迁移区域内，依靠偷运过境仍很常见。然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在路上被偷运的西非人在旅程之初是自由迁移协议下的合法移

20 欧盟委员会，2017b。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同时也可参见 IOM，2016d。
24 具体请参见如国际移民组织失踪移民项目；混合迁徙中心，2015。
25 Altai 咨询和国际移民组织，2015a。
26 关于西非和中非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27 Adepoju, 2016.
28 F lahaux 和 de Haas, 2016。
29 Devillard, Bacchi 和 Noack, 2016。
30 国际移民组织，n.d.d.。
31 同上。
32 Altai 咨询和国际移民组织，2015b。
33 同上。

民，只有在他们离开西非经济共同体区域后才成为非常规移民。[34] 此外，西非的很多边界漏洞极多，因而更容易进行未经国家间授权的迁移；且西非经济共同体的几段边界位于经济动荡和人口稀少的区域，这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不安全。[35]

●**由政治动乱、社会群体和民族关系紧张及博科圣地极端主义带来的冲突和暴力，使西非和中非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境内或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尽管影响差异很大）。**和非洲内部其他区域一样，西非和中非国家在接收和产生流离失所人口方面有很长的历史，且两者时常同时发生。例如，2016 年底，全球有接近 54 万来自刚果（金）的难民，而该国接收的来自其它国家的难民人数也超过 45 万人。这一数量尚不包括刚果境内约 22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36]2016 年有相似动态的该区域的其他国家还包括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马里和尼日尔。[37] 基于 2016 年刚果流离失所的规模，在以下国家排名中刚果（金）均位列世界前十：a）难民接收国（第九）；b）难民来源国（第六）；c）缘于冲突和暴力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第一）；d）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第八）；e）境内流离失所总人数（第五）。[3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把这一情况称为“被忽视的流离失所危机”，而联合国难民署注意到，刚果（金）的社会经济环境（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考量刚果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连同该区域的不安全隐患和对进入该区域的限制使对这一地区进行保护和援助非常困难。[39]

●**西非和中非的环境变化正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流动。**例如，萨赫勒地带[40] 的降水虽然在慢慢增加，但降水的不规律和雨量变化差异大导致了干旱和洪水频发。[41] 同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密集收割、森林采伐和过度放牧，加速了土地退化。[42] 尽管该区域农业规模有所增长，数百万人仍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43] 例如，截至 2016 年 6 月，乍得湖流域 460 万人遭遇粮食危机，而预计 2017 年这一数量还会上涨。[44] 西非和中非数百万人依靠乍得湖生活，然而由于日益严重的干旱以及日增的灌溉取水等人为原因，[45] 过去 40 年乍得湖面积已经缩小了 90%。旱涝、资源过度利用和气候变化等复杂而相互联系的环境变化，是该区域国家内和国家间城乡和周期性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收成不定等问题，[46] 移民是西萨赫勒地区用来发展生计和减少危险的一个策略。同时，气候变化对自然资源导向型生活和粮食危机都有影响。研究也揭示了这些影响与紧张、冲突和人口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47]

34 Carling, 2016.

35 同上。

36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检测中心，2017。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联合国难民署，n.d.b. 更多的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可参见国际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追踪模型（IOM,n.d.c）。针对喀麦隆和马里的信息，可在 www.globaldtm.info. 查阅。

40 萨赫勒地带是一个半干旱的热带萨瓦娜生态区，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和苏丹等众多西非和中非国家。

41 Hummel, Doevenspeck 和 Simimi, 2012。

42 同上。

43 联合国环境署，2011。

44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6；联合国粮农组织，n.d.。

45 Gao 等人，2011。

46 Hummel 和 Liehr, 2015。

47 联合国环境署，2011。

*东非和非洲南部* [48]

**●对于东非和非洲南部的几个国家，移民的迁入和迁出、被迫流离失所以及来自非洲大陆之外的移民构成了该地区主要的迁移活动。**东非和非洲南部长期以来一直是非非洲裔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大量亚裔移民来此短期工作或永久定居。历史上，乌干达、肯尼亚和南非有大批来自印度的移民，[49] 但最近几年去往这些国家的中国务工人员明显增多。[50] 非洲南部也形成了稳定的区域内劳务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马拉维、莱索托、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等国家。这些工人一般从事关键行业，例如在南非和博兹瓦纳采矿。[51] 作为非洲的发达经济体和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南非在近几年吸引了大量非洲南部地区内外的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南非的国际移民数量从 2010 年的 190 万人上升到 2015 年的 310 万人。[52] 同时，由于贫困、低工资和高失业率，[53] 东非流失了大量劳动力。最为明显的即是近期以短期工作合同形式迁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低技能和半熟练东非工人大幅增加。海湾国家临近东非，这些国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阿联酋、肯尼亚、[54] 沙特阿拉伯与埃塞俄比亚 [55] 等国签订的劳务协议，都意味着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可能会持续增加。

**●东非和非洲南部移民中仍有大量非常规移民，并表现为由社会经济因素、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多重原因导致的混合迁徙流。**除社会经济因素外，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仍是东非非常规移民的重要原因。随着人们越来越多依靠蛇头前往目的地，移民偷渡在这两个区域尤为突出。许多偷渡网络都以非洲之角为基地，而属于东非共同体的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为主要的过境国家。[56] 中东、欧洲和南非是来自东非的移民的三个主要目的地。偷渡路线主要有四条，包括通过苏丹进入利比亚并横渡地中海的西路，通过埃及去往以色列的北路，沿东部通道去往南非的南路以及经也门去往沙特阿拉伯及更远地区的东路。[57] 和东非相似，非常规移民在非洲南部也很普遍。这些非常规移民部分来是自其他地区，但也包括来自津巴布韦等区域内国家的移民。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代表的来自非洲之角的移民尤为众多。这些移民频繁依靠蛇头进行偷渡，[58] 但他们极易遭受很多危险，其中包括敲诈、身体和性暴力、绑架和抢劫，而其中很多人也因在非人的运输条件下死亡。[59]

**●持续的冲突、政治和族群暴力以及和平进程受挫使上百万东非人流离失所并且影响了该区域绝大多数国家。**例如，在 2016 年底，南苏丹已有超过 140 万难民（其中大多数为儿童）和超过 18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60] 索马里有超过 100 万难民和超过 11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而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也有大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61] 南苏丹和索马里流离失所的规

48 关于东非和非洲南部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49 Flahaux 和 de Haas, 2016。
50 Cook 等人，2016。
51 Nshimbi 和 Fioramonti, 2013。
5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53 Manji, 2017.
54 同上。
55 GCAO, 2017.
56 Majidi 和 Oucho, 2016。
57 丹麦难民委员会和 RMMS，2017。
58 Frouws 和 Horwood, 2017。
59 Schiwikowski, 2016.
60 联合国难民署，2017a；境内流离失所检测中心，2017。
61 同上。

模均属于世界前列。[62] 索马里内战迫使大量人口迁往区域内其它国家或向东迁往也门等国家。[63] 但也门越演越烈的冲突使生活状况极具恶化，并迫使大批移民回到东非，给东非带来新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其中即包括非非洲裔的也门人。[64] 与此同时，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是主要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大量东非内部的难民。南苏丹也是重要的难民接收国，尽管南苏丹的冲突也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65] 由于引发流离失所并阻碍这一问题解决的原因复杂且多样，这些难民接收国尽管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但不得不超出自身实力范围为世界上众多流离失所者提供长期避难所。[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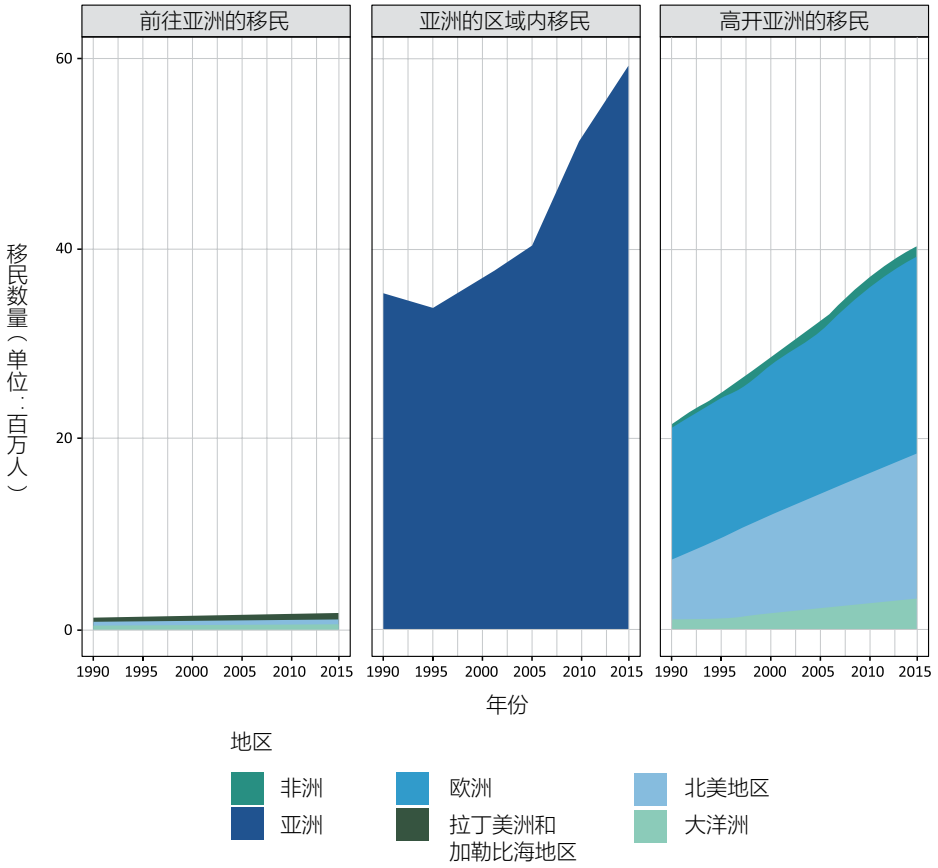
●**东非和非洲南部气候变化和灾害愈发频繁普遍，并对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造成影响。**该地区在近几十年内降水量极不稳定干旱频发。[67] 鉴于农业是东非和非洲南部的经济支柱，[68] 缓慢发作的环境变化对粮食安全有重大影响。最近，由 2015 和 2016 年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已引起大面积粮食短缺和饥荒，[69] 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外加其他非环境因素）已导致多国人口流离失所。[70] 而诸如 2016 年洪水等突发灾害也使约 30 万埃塞俄比亚人、4 万肯尼亚人和 7 万索马里人无家可归，而在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流离失所的人数更是多得多。[71]

*亚洲*[72]

作为 44 亿人口的家园，源自亚洲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国际移民总人数的 40%。其中超过一半的移民（5900 万人）居住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如图 5 中间一栏所示，从 1990 年的 3500 万人开始，亚洲的区域内移民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幅增长。生于亚洲但移民至北美洲和欧洲的人口也有很大增长（2015 年北美洲 1550 万人，欧洲 2000 万人）。前往欧美的亚洲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使得离开亚洲的移民数量有显著提高，并在 2015 年达到 4000 万人。

62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63 同上。
64 丹麦难民委员会和 RMMS，2017。
65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66 国际移民组织，n.d.c.。
67 气候和发展知识网络，2014a。
68 Tierney, Ummenhofer 和 deMenocal, 2015; 美国国际开发署，n.d.。
6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n.d.a；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n.d.b.。
7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71 同上。
72 对亚洲的构成请详见附录 A。

## 图 5. 1990-2015 年间前往亚洲、亚洲区域内和离开亚洲的移民人数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亚洲以外区域（如欧洲或非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即亚洲）的移民。“亚洲境内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亚洲）并居住在他们出生国以外亚洲地区的人。“离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亚洲并住在亚洲以外地区（如欧洲或北美）的人。

生活在亚洲的非亚洲出生的移民数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欧洲人在这部分移民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些数据包含来自前苏联欧洲部分但目前生活在中亚的移民。同一时期，作为另一大亚洲移民群体——非洲移民人数有所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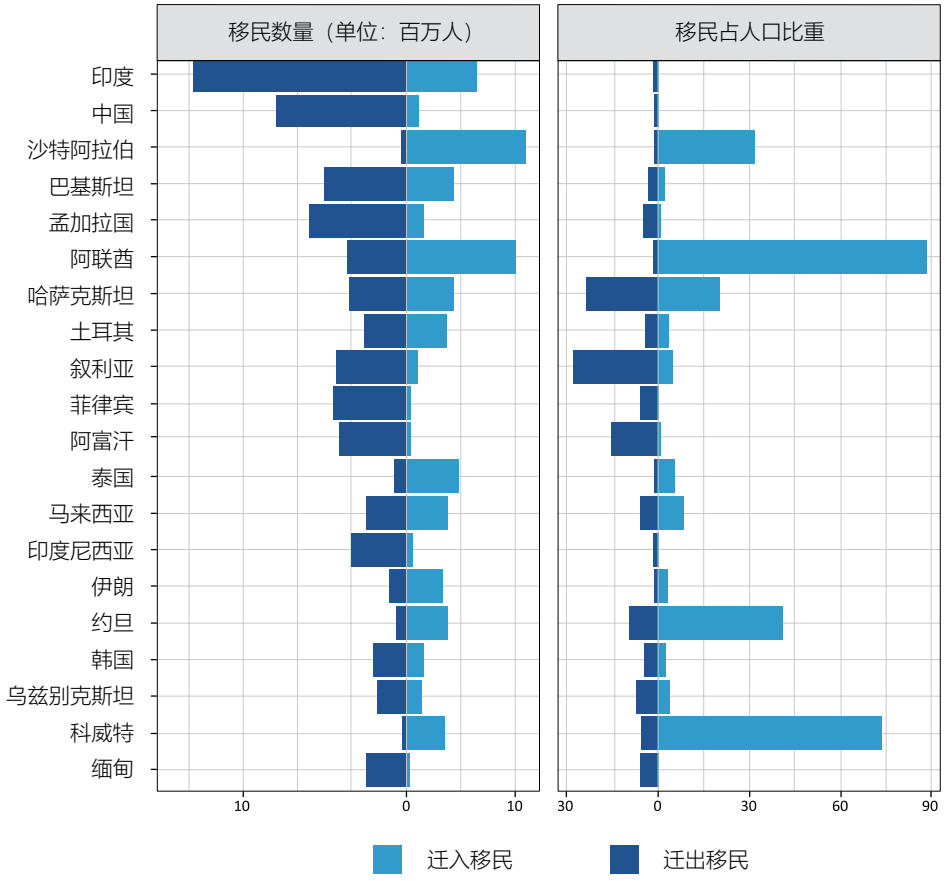
作为亚洲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拥有最多生活在国外的移民（图 6）。但两国的移民人数仅占印度和中国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是继来自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移民数量之后，世界第四大出生于居住国以外地区的移民群体。有超过 200 万出生在中国的移民生活在美国，而美国也居住着大量来自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的亚洲移民群体。其它有大量移民生活在它国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其中很多移民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居住。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移民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图 6）。例如，2015 年阿联酋人

口中 88% 为移民，科威特 74% 的人口为移民，卡塔尔 76% 的人口为移民，而巴林的移民也占总人口的 51%。[73] 许多移民来自非洲、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及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重要特征和发展”一部分将进一步讨论包括去往海湾国家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问题。

此外，关于一国的国外出生移民数据部分也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 194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导致两国大规模的人口颠沛流离。这一情况可以从 2015 年的数据中直观地反映出。根据该数据，2015 年分别有超过 520 万和 360 万的国外出生移民住在这两个国家。

## 图 6. 2015 年移民人数位列前 20 的亚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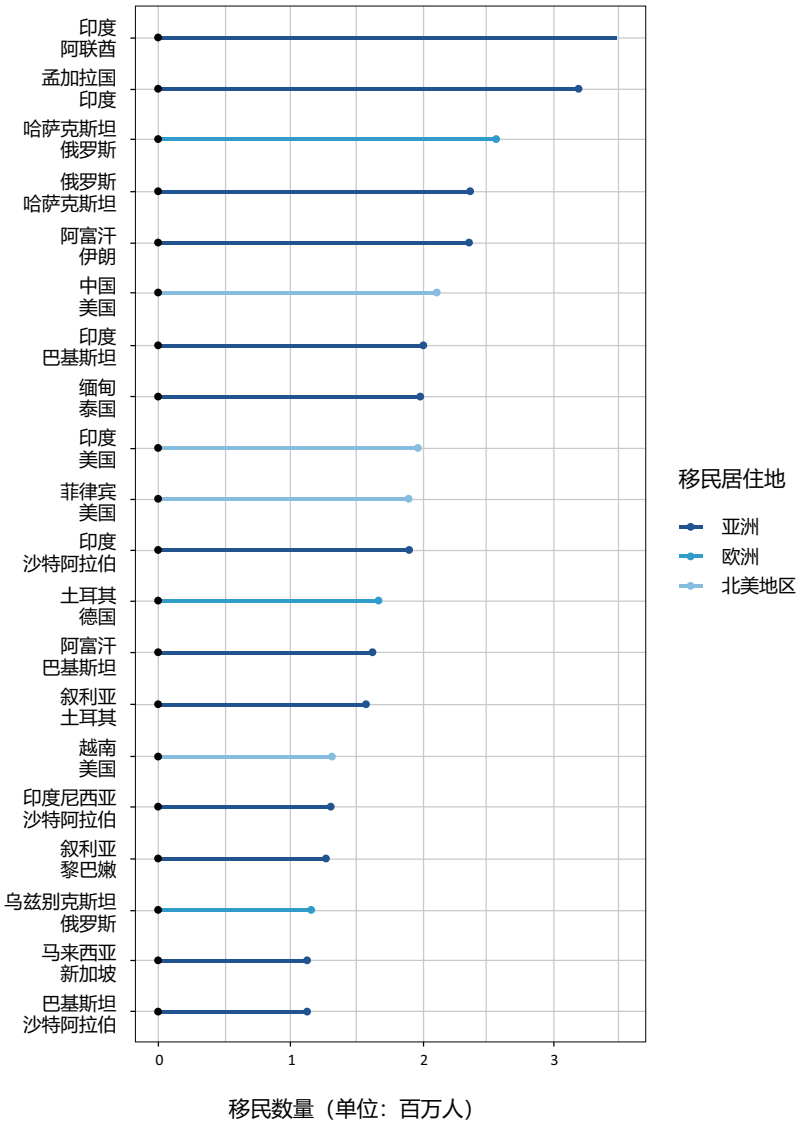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数量占总人口比重的人口数据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含出生在外国的人口数量。
*注 2：*“迁入移民”指出生在居住国以外地区的移民。“迁出移民”指 2015 年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7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图 7 显示了涉及亚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其中 13 条通道位于亚洲境内。它们代表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累积的迁移活动并简要展示了在特定国家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发展成为该国人口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规模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印度通往阿联酋，2015 年有 350 万印度人生活在阿联酋。之后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将对特定移民通道作进一步讨论。

## 图 7. 涉及亚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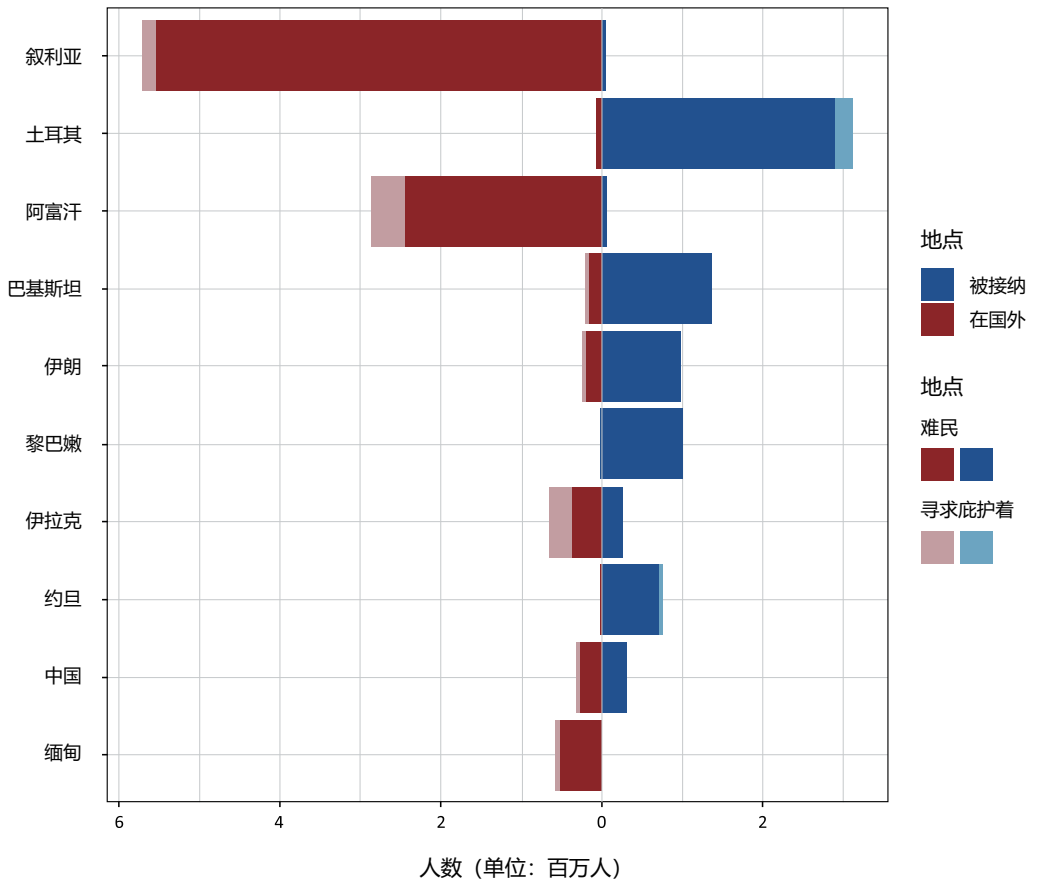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代表了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展现了迁徙方式如何使移民在特定国家发展成国家人口重要的一部分。

如图 8 所示，亚洲境内和源自亚洲的国际流离失所问题是该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在 2016 年底在世界难民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图 8 清晰反映了叙利亚冲突对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相比，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人数不足为奇。在叙利亚冲突深化以前，阿富汗曾是该区域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2016 年，来自亚洲国家的绝大多数难民生活在相邻国家。例如，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主要被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接纳，而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主要居住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但如图 8 所示，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等难民来源国自身也接收了大批难民。

## 图 8.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列前 10 的亚洲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 “被接收”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该国但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对“难民”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定义。排列前 10 的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并通过计算目前在这些国家生活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得出。

## *亚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 *东亚*[74]

**●东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若干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使移民政策重新被纳入考虑范围。**日本等国正经历人口负增长，而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也属于出生率最低、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75] 随着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降低，面对日益增长的医疗成本和低生产力水平，[76] 人口变化预计将对社会政策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现实局面正促使决策者们重新评估历史上用于限制移民的方式。这些方式部分和一些国家高度的文化同质化相关，部分是和一些国家移民政策上经验有限有关，也有部分则是因为许多国家对移民并不很欢迎。[77] 但目前韩国和日本都在不断鼓励短期外国劳务移民。截至 2015 年底 ,已有超过 50 万名外国工作者在就业许可体系下在韩国工作。[78] 东亚地区学生的迁入和迁出愈发显著。来自东亚的国际学生人数近年内迅速增长，大学层次的国际学生数量增长尤为明显，而该区域的外国学生人数也在持续增长。为追求更高品质的教育，大量来自东亚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地学习。2015/2016 学年，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际学生数量均位列美国前十，其中仅中国留学生就有超过 30 万人。[79]2014 年，全球所有在国外学习的学生中每六个就有一名中国学生。[80] 但东亚不仅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也在逐渐成为外国学生的重要目的地，其中很多人就来自此区域。例如，越来越多的韩国学生选择在中国学习，2015 年在中国的国际学生中韩国学生数量最多。[81] 此外，日本计划在 2020 年前吸引大约 30 万国际学生去日本学习。[82]

**●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量劳务移民的迁出意味着这一区域是世界上接收侨汇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2015 年，出生在中国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第四大国际移民人口，有接近 1000 万中国移民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生活。[83]2016 年全球侨汇流总约达 5750 亿美元，其中中国便收到了 610 亿美元。这是继印度之后全世界第二大侨汇份额。[84]

**●虽然本章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但境内移民仍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包括规模前所未有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显著。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85] 受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驱使，[86] 成千上百万待业农民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绝大多数从中国西部省份搬迁至东部省份。中国西部和东部之间的社会经济动态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西部人口增长率高，劳动力过剩、收入低，而东部大都市地区劳动力缺乏，且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87]

---

74 关于东亚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75 Moon, 2015.
76 世界银行，2015。
77 Staedicke, Batalova 和 Zong, 2016。
78 Park, 2017.
79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6。
80 ICEF Monitor，2015a.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
82 ICEF Monitor, 2015b.
8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84 世界银行，2017。
85 “户口”是一套家庭登记体系用以记录和控制国内迁徙（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86 Hu, 2012.
87 Hugo, 2015.

*南亚* [88]

**●从南亚去往其它区域是南亚地区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工作的短期劳务移民即来自该区域。从 1970 年代起，石油丰富的海湾国家一直是大量来自南亚的短期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虽然一开始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工作者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此后外来务工人员的来源逐渐多样化，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工作者。[89] 目前南亚人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构成了最大规模的劳务移民队伍。[90] 获得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希望使近些年离开这一区域的人数显著增长。[91] 对于该区域劳动力明显过剩的国家，移民能够减轻就业压力，并通过侨汇缓解了贫困问题。事实上，南亚是世界上接收侨汇数目最大的地区之一。2016 年，汇入印度的侨汇总数达 627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收到的侨汇数额超过了同年 GDP 的 5%。[92]

**●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影响，[93] 区域内移民也是南亚的一大主要特征。**发生在该区域的常规和非常规区域内迁移和国家间历史、地理上的相近、文化和亲缘纽带都有密切关系。[94]2015 年，南亚地区 1410 万国际移民中有超过 85% 的移民来自该区域的其它国家。[95] 该地区的移民通道主要包括孟加拉国 - 印度、阿富汗 - 巴基斯坦、印度 -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 巴基斯坦。例如，有数百万孟加拉和尼泊尔移民在印度工作，并主要从事建筑和家政等非正式行业。[96] 南亚国家的境内移民也比较广泛，规模比国际移民要大，其中主要包括短期和季节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97] 南亚的城乡迁移是大规模的。在 2001 到 2011 年间，南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 1.3 亿人，并预计在接下来的 15 年中城市人口会继续增长约 2.5 亿人。[98]

**●在松散的偷运网络协助下，南亚区域内部和源自该区域的非常规移民在此区域较为普遍。**部分由于该区域边界的相对易渗透性，此区域非常规移民的确切人数尚未得知。但据估计该区域存在大量非常规移民。[99] 例如，印度接纳了大量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规模相对小一些的斯里兰卡非常规移民。[100] 此外，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也是来自该区域的非常规移民偏爱的目的地。[101] 去往欧洲的偷渡路线或通过中亚和俄罗斯，或通过中东进入西巴尔干地区。其他非常规移民偷渡至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寻找工作，或借这些国家去往澳大利亚。[102] 目前已有大量记录表明南亚移民遭受蛇头的剥削和虐待，其中包括强奸、其它形式的虐待以及被迫挨饿。[103]

88 关于南亚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89 Oommen, 2015.
90 同上。
91 Doherty 等人，2014。
92 世界银行，2017。
93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94 同上。
9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96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97 同上。
98 Ellis 和 Roberts, 2016。
99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100 Jayasuriya 和 Sunam, 2016。
101 同上。
102 同上。
103 同上。

**●长期的冲突、政治不稳定、暴力和压迫造成南亚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并使南亚成为接收流离失所人口的主要地区。**在刚过去的这段时期，该区域每个国家（除马尔代夫外）皆是流离失所人口的输出国或接收国。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多年间，有大量阿富汗人无家可归，并被迫跨越边界前往邻国或更远的地区。至 2016 年底，阿富汗有难民 250 万人，难民数量为全世界第二，并有超过 150 万国内无家可归者，数量在世界排第十。实际上，每 10 个阿富汗人中就有超过 1 个无家可归者。[104] 巴基斯坦和伊朗两个相邻国家接收了绝大多数阿富汗难民，并因此跻身世界难民接收国的前列。[105] 巴基斯坦，因其边境的易渗透性和在民族、语言、宗教和经济上与阿富汗紧密的联系，数十年来一直是主要的难民接收国 ,在 2016 年底在巴基斯坦的难民有将近 140 万都是阿富汗人。[106]2016 年，从巴基斯坦返乡的人数也创下 12 年新高，其中超过 38 万阿富汗难民从巴基斯坦返乡。[107] 返乡人士列举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影响他们返乡决定的因素，包括当局的骚扰和压力、对逮捕和驱逐的恐惧、经济困难、对阿富汗生活改善的主观感受，返乡援助计划以及和家人团聚的愿望。[108] 返乡人士也在重新融入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获得土地和住房、就业和生计、食物和医疗，以及人身不安全。[109]2016 年底，伊朗接纳了接近一百万难民，从而成为世界第四大难民接收国。同时印度和孟加拉国也继续接纳了大量国内流离失所人口。[110]

**●南亚人口极易受突发和潜在缓发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灾难的伤害。**基础设施不足、高度依赖土地资源和易受伤害地区人口高度密集都可能在灾难发生时引发流离失所问题。[111]2016 年，南亚境内新增流离失所案例 36 万例，且当年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均跻身世界十大因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国家。[112] 诸如 2017 年 5 月的莫拉台风等灾难使孟加拉国数十万人流离失所。[113] 在尼泊尔，2015 年廓尔喀和乌达亚布尔地震也导致境内大量人口无家可归，[114] 而 2017 年 5 月斯里兰卡严重的洪水也使约 50 万人流离失所。[115] 迁徙和流动是应对南亚环境变化事件尤为重要的策略，这些环境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洪水和地下水枯竭等。这些问题在南亚地区都相当严重。[116]

*东南亚* [117]

**●许多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迁出移民、迁入移民及过境移民。**该区域内较大的收入差别是促发人们从低收入国家移民至向该区域内外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该区域内有国际移民将近一千万人，而来自该区域的移民有超过两千万人，这其中有 690 万人（从一个东南亚国家）移民到东南亚

104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检测中心，2017。

105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06 同上。

107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联合国难民署，2017b。

108 联合国难民署，2017b；也可见国际移民组织，2017b。国际移民组织，2017b; 联合国难民署，2017b。

109 国际移民组织，2017b; 联合国难民署，2017b。

110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更多关于境内流离失所的信息，尤其针对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也可见国际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追踪模型。

111 国际移民组织，2016 a。

112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13 Solomon, 2017.

114 国际移民组织，2016a。

115 国际移民组织，2017a。

116 气候和发展知识网络，2014b。也可参见 Ionesco, Mokhnacheva 和 Gemenne, 2017。

117 关于东南亚的组成请见附录 A。

其它国家。[118]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凭借经济优势是著名的移民目的地。地理因素在此区域的迁徙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接壤的国家之间迁徙更为频繁，尤其是在泰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毗邻边界迁徙。[119] 区域内的长期移民通道较为鲜明，并主要由短期劳务移民构成，但另外也有数量相对少一些的永久（技能的和家庭的）移民、学生迁徙和被迫迁徙。[120]

**●东南亚地区的迁徙中有大量非常规移民，其中主要和短期劳务移民相关，但也涉及保护问题和环境变化。**[121] 未经许可入境和非常规移民的普遍和若干因素相关，包括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工业/行业对非常规移民的依赖、人口贩卖和移民偷运等。[122] 事实上，移民偷渡被认为是东南亚一个普遍现象，而该地区的国家也尤其注重通过双边合作和多边机制来打击移民偷运现象。目前该地区国家可利用的多边机制包括东盟、“巴厘进程—亚太地区应对偷渡、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等。许多移民也依靠蛇头的偷运服务从此区域过境。[123] 该地区既有混合迁徙流（即包括需要和不需要国际保护两类移民群体）也有出于不同目的的移民流动。许多移民因非常规移民身份而面临被剥削的危险。而从事很多特殊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面临强迫劳动、剥削和严重虐待等问题（例如捕鱼、农业、建筑和制造业）。[124]

**●近些年（东南亚地区）并未因国内或跨境冲突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但该地区长期存在与系统性的迫害和边缘化相关的断断续续的移民流动。**2016 年马来西亚是该地区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9.2 万人），而缅甸是该地区最大的难民来源国，而且类难民状态人口最多，2016 年二者数量刚超过 49 万人。[125] 但是基于出生在居住国以外国家的人口数据（见亚洲地区总数中的图 7），该区域内部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缅甸到泰国。这既与缘于冲突和暴力的流离失所相关也同为获得收入、家人团聚和其它原因进行的跨境移民有关。目前主要是“传统的”安置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来自该区域的难民进行重新安置，而区域内“保护性基础设施”很少。[126] 区域内也有大批国内流离失所人口和无国籍人口。该区域的六个国家接纳了这些无国籍的人口（其中接收数量最多的是缅甸）。[127]

**● 2015 年初，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东南亚经历了一场与移民相关的人道主义危机，其中大约有 7000 移民在海上陷入困境。**[128] 移民被困在蛇头丢弃的船上长达数个星期，并造成数百人死亡。[129] 随着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该区域内一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议以迅速应对这些危机，策略包括营救、救济和为需要的人提供短期避难住处。接下来的会议将聚焦更长期的应对举措，诸如保护海上人员、防止非常规移民和偷运、处理迁徙的根源并为有流离失所风险和可能成为非常规移民的人提供谋生的机会。[130]

11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19 Hugo, 2014; Hatsukano, 2015.
120 同上。
121 Hickey, Narendra 和 Rainwater, 2013。
12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Djafar 和 Hassan, 2012。
12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
124 Gois, 2015.
125 联合国难民署，n.d.a.。
126 McAuliffe, 2016; “保护性基础设施”包括针对保护的国内法律、国家政策以及行政举措；见 Sitarpoulos, 2000。
127 Southwick, 2015; 联合国难民署，n.d.a.。
128 国际移民组织，2015a; 泰国皇家政府，2015。
129 国际移民组织失踪移民项目，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latest-global-figures。
130 McAullife, 2016.

*中东* [131]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短期劳务移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依靠石油财富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并吸引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前去从事各部门的工作，其中包括建筑、零售和家政服务。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的增长对目的国人口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除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外，移民已成为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人口的主体，如在阿联酋移民已占总人口的 88%，在卡塔尔移民占 76%，而在科威特移民占 74%。[132]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由于海湾国家能为劳务移民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原住国和目的国之间的收入差异是移民的主要原因。[133] 尽管已取得一些进步，该地区对移民权利的规范和保护仍不尽如人意。若干海湾国家委员会国家已实行的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其雇主捆绑在一起的卡法拉赞助系统（The Kafala sponsorship system）[134] 目前也处于审查中。但是一些海湾国家已逐步采取措施改进卡法拉系统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135]

**●最近几年，国内冲突、教派暴力的加剧和恐怖主义扩散（尤其是达伊沙）导致了该区域大规模的境内和国际流离失所。**该区域的三个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面临“三级（L3）紧急情况”（全球人道主义体系中针对最严重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级），也是世界流离失所人口的形成地。[136] 叙利亚的冲突在 2017 年已持续了七年，造成该国超过一半的人口无家可归。截至 2016 年底，叙利亚有超过 550 万难民，超过 63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超过 18.4 万名寻求庇护者。[137] 目前大约有 65% 的叙利亚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138] 始于本世纪之初，伊拉克持续的流离失所浪潮在 2016 年愈发严峻并延续至 2017 年。这一状况发生在争取收回领地和反抗达伊沙的背景下。伊拉克国内有超过三百万人无家可归，且许多挑战和保护风险阻碍了他们持续的返乡。[139] 也门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也在不断恶化，而相继发生的暴力事件和动荡使该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在 2016 年底降至 200 万人，而在 2015 年底也门接收的难民有 250 万人。[140] 高返乡率和二次流离失所目前也在也门出现，据估计在 2017 年 3 月前的 24 个月中，有 10.4%的也门人经历过无家可归。[141]

**●中东接收的全球难民数量仍占世界难民总量很大的一部分。**和 2016 年底一样，中东地区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全球难民人数的 45%，其中也包括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A) 登记的难民。[142] 在接纳原本在其它国家寻求庇护的人们时，这些国家的邻国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与自身能力不成比例的责任，而这也是该区域当下流离失所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叙利

131 关于中东的组成详见附录 A。

13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133 Jacobsen 和 Valenta, 2016。“卡法拉系统阻止不拥有技术的工人与家庭团聚，将他们同单个雇主捆绑，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成婚，并在权利和行动上对他们加以限制以至于他们在海湾国家始终是临时工人”（Rahman, 2013）。

134 “卡法拉系统阻止不拥有技术的工人与家庭团聚，将他们同单个雇主捆绑，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成婚，并在权利和行动上对他们加以限制以至于他们在海湾国家始终是临时工人”（Rahman, 2013）。

135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际移民组织，2015。

13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n.d.c.。

137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38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39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4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41 国际移民组织，2017g。

142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亚的邻国以及叙利亚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在 2016 年位居世界十大难民接收国（土耳其第一，黎巴嫩第三，约旦第七）。[143] 通过比较接收的难民数量和全国人口，这些国家责任的重大清晰可见：在黎巴嫩，每六个人中有一个为难民，在约旦，每 11 人中有一个难民，在土耳其，每 28 个人中即有一个难民。按难民人口占国家总人口比重进行衡量，这三个国家位列世界前三。[144] 该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也门、伊拉克甚至叙利亚等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145] 也接收了许多难民。在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的近 530 万难民也位于此区域。[146]

●**本区域内和来自这一区域的非常规移民对移民和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相邻国家接纳的叙利亚难民数目之大，加上持久的冲突以及返回叙利亚的可能性很低，都促使难民以非常规形式迁往其它国家，其中最显著的便是那些沿地中海东部线路去往欧洲国家的人。例如，2015 年乘船横渡爱琴海去往希腊的 85 万多人中，从土耳其出发的叙利亚人约占一半，其它人则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一系列国家。[147] 移民偷运者在这些迁移活动中很有作为，且获利众多，并时常剥削和虐待移民。[148] 在过去的两年中，地中海东部移民路线已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公众的关注。关于欧盟 - 土耳其声明的讨论则将在之后欧洲地区的部分呈现。

*中亚* [149]

●**中亚地区的移民活动以离开该区域的迁徙为主，其中最显著的是向北迁移至俄罗斯。**例如 2015 年有将近 500 万出生在中亚的移民在俄罗斯生活。[150] 但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和以违反行政规定为由禁止移民再次入境等政策出台在某种程度上使来自中亚的移民相对减少。这一变化影响了中亚地区人们的生活并减少了作为该区域重要资金来源的侨汇收入。[151] 针对俄罗斯这一举措，移民或回到他们的出生国，或以非常规移民身份逗留或寻找其他出路。哈萨克斯坦人受影响最大（见以下讨论）。[152] 来自中亚的人们也移民去往欧洲和中国，通常这些地区工作和家庭纽带都相对更坚固。例如，德国 2015 年接纳了超过 100 万哈萨克斯坦移民，接收数量仅次于俄罗斯（同年有 256 万哈萨克斯坦出生的人居住在俄罗斯）。[153] 区域内移民也是该地区一个主要特征，且这一特征是由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联系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中亚有上百万国际移民，其中主要来自该区域内部，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更远地区。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多现在是独联体的成员国。[154]2015 年，哈萨克斯坦有 355 万外国出生的人口，其中 235 万是在俄罗斯出生。[155] 哈萨克斯坦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和过境国家，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型劳动者并日益

143 同上。2016 年底，土耳其接收了超 280 万难民，黎巴嫩超 1 百万难民，约旦接收了超 68 万难民。
144 同上。
145 同上。
146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47 联合国难民署，2016b。
148 McAullife 和 Koser, 2015; Içduygu 和 KoserAkcapar, 2016。
149 关于中亚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15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51 国际移民组织， 2016c。
152 同上。
15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54 同上。
155 同上。

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来务工人员的目的地。近年来，中亚国家调整了管控区域内移民的政策，其中即包括就入境和再准入签订双边协议。[156] 例如，2015 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允许其成员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自由迁移至其它成员国并在那生活、工作和学习。[157] 该区域国家也在加强进一步合作以提升对包括边境管理、移民权利保护和非常规移民等方面的混合迁徙流管理。[158] 中亚男性和女性外来务工人员都极易遭受剥削和虐待，尤其是那些从事建筑、农业和家政等非正式行业的人们。[159]

●**侨汇在中亚经济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对该区域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世界十大侨汇汇入金额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 -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 均位于此区域。[160] 在吉尔吉斯斯坦，侨汇据估计将国家贫困减轻了 6%-7%。[161] 汇入中亚国家的侨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内部和来自该区域的移民模式，这些移民模式同工作和获得收入密切相关。例如，得益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间的低廉的转账费用，来自俄罗斯侨汇金额一直十分巨大。然而近期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和政策改变对侨汇流动总体有负面影响。在 2014 和 2015 年之间，流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水平几乎下降了一半，乌兹别克斯坦下降了 60%，而从俄罗斯寄往塔吉克斯坦的个人汇款同期减少了近 70%。[162]2015 年和 2016 年间哈萨克斯坦坚戈的贬值也导致了流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侨汇数量减少。[163] 侨汇的减少对很多社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164] 很多社区极度依赖侨汇来满足食宿等基本需求，因此侨汇的减少对这些社区的影响尤为严重。由于汇款减少，有成员在国外工作的家庭面临生活水准下降的风险，其中有些可能因此陷入贫困。此外，因未能安置返乡的移民并发挥他们的潜能，该地区贫困问题愈发严重。[165]

*欧洲*[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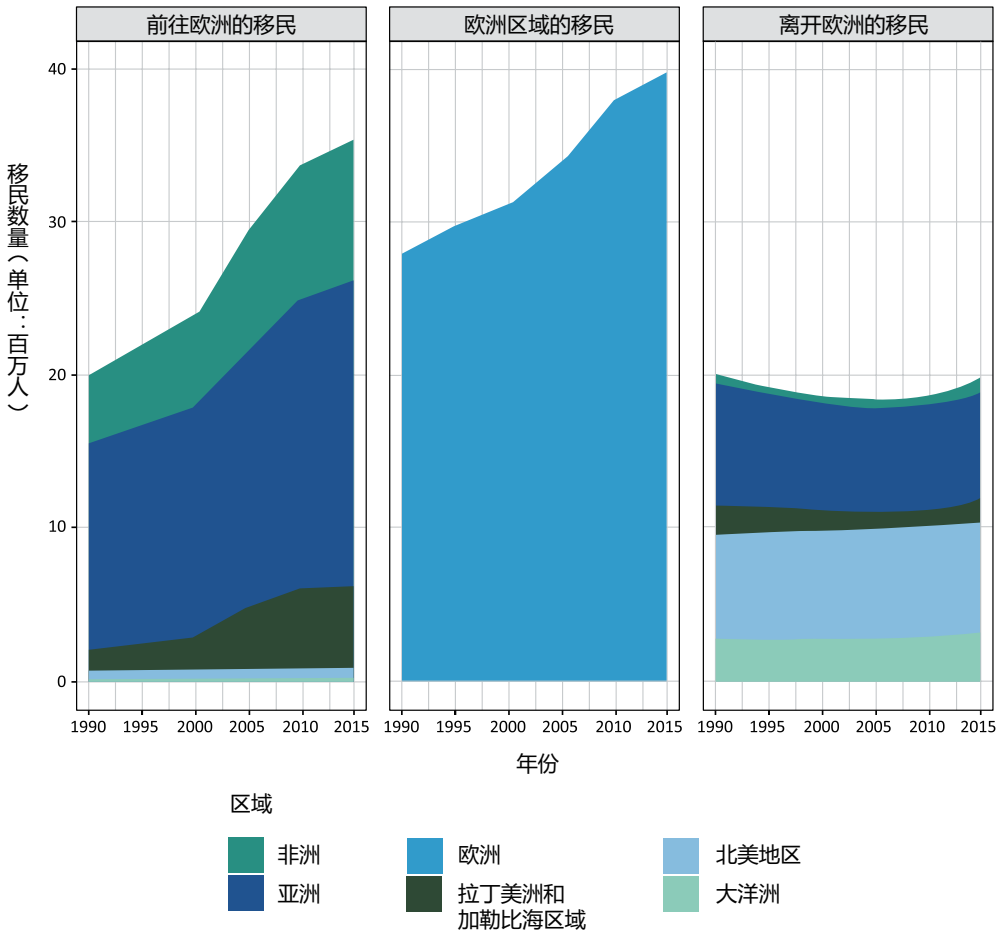
2015 年全世界约三分之一国际移民（7500 万人）生活在欧洲。这些人中超过半数（4000 万人）出生在欧洲，但生活在欧洲的其它地方。这一数量远超过 1990 年的 2700 万人（图 9）。2015 年，从欧洲到欧洲的移民通道是世界第二大区域移民通道（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到北美洲的移民通道排第一）。在欧洲的非欧洲移民数量在 2015 年超过 3500 万人。出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在欧洲的移民在过去 25 年间经历了类似的增长：从世界各地区前往欧洲的移民数量在上世纪 90 年代平稳增长，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增长更快，但此后逐渐减慢。

1990 年，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和生活在欧洲的非欧洲人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但是，和去往欧洲的移民数量增长不同的是，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数量过去 25 年主要是在下降，但在这

156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16。
157 Russell, 2017.
158 国际移民组织，2016e。
159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60 世界银行，2017。
161 Slay, 2015.
162 国际移民组织，2016c。说明：数据是以美元衡量。估算是依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收集的数据。
163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64 《经济学人》，2016。
165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66 关于欧洲的构成请见附录 A。

5 年中回升到近 2000 万人（和 1990 年的水平相当）。2015 年，欧洲出生但居住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主要生活在北美区域。2010 到 2015 年间生活在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移民也有所增长。

## 图 9. 1990-2015 年间前往欧洲、欧洲区域内和离开欧洲的移民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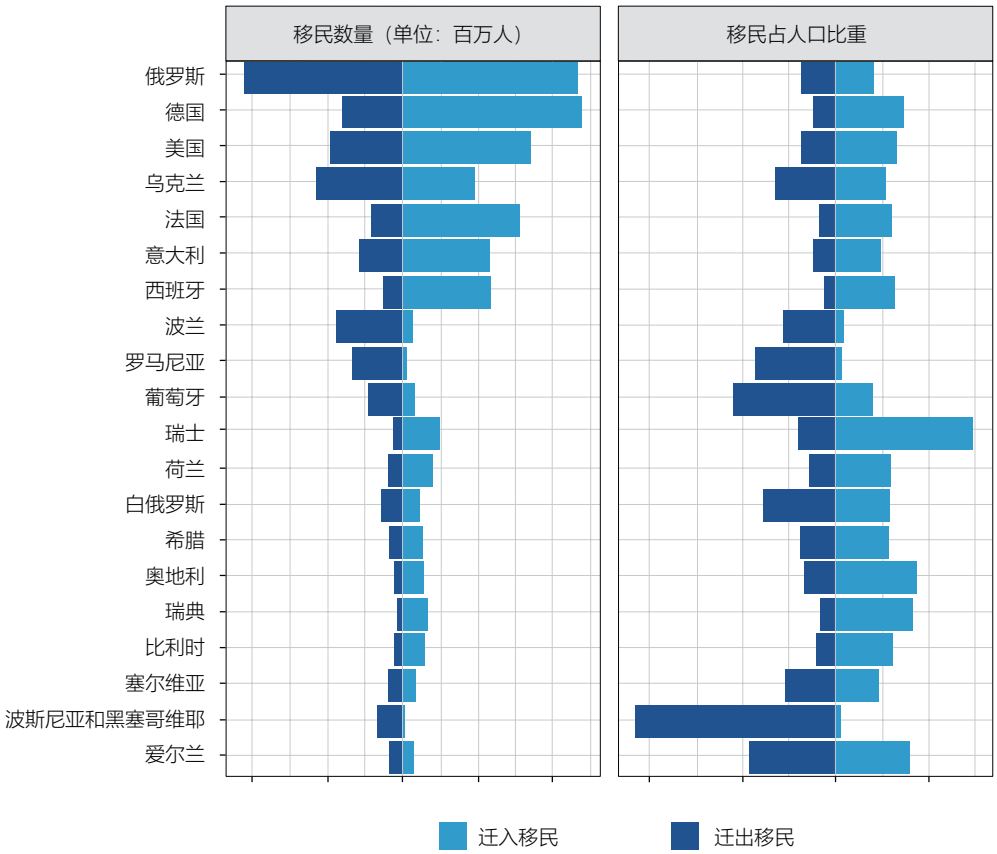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欧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非洲或亚洲）但住在欧洲的移民。“欧洲境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欧洲）但住在出生国以外欧洲地区的移民。“离开欧洲的移民”指出生在欧洲但生活在欧洲以外（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一些东欧国家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外迁人口（图 10）。2015 年俄罗斯的外迁移民超过 1 千万，其生活在国外的公民数量在全世界居第三。来自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的移民构成欧洲前四大移民通道（见图 11）。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英国的外迁移民数量位居欧洲第三（490 万人）。这些人很多生活在欧洲之外、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201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迁出移民占居民人口的比重为欧

洲最高，其中很多是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离开。葡萄牙和爱尔兰这两个有较长迁出移民史的国家，其生活在国外的人口占居民人口的比重也很高。2015 年，德国国内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为欧洲第一。德国 1200 万移民中，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且每一移民群体均超过 100 万人。同年，法国和英国的人口中各有超过 750 万外国出生者。来自北非法语国家的移民构成法国最主要的外国出生的人口。而在英国，来自印度和波兰的移民构成最主要的移民团体。此外，拥有超 550 万移民人口，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欧洲第四和第五大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这些国家出生外国的人口主要来自欧洲其它地方，如罗马尼亚、德国和英国，或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如图 10 所示，欧洲前 20 大移民国家中，瑞士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最高（29%），其后为奥地利、瑞典和爱尔兰。

## 图 10. 2015 年欧洲 20 大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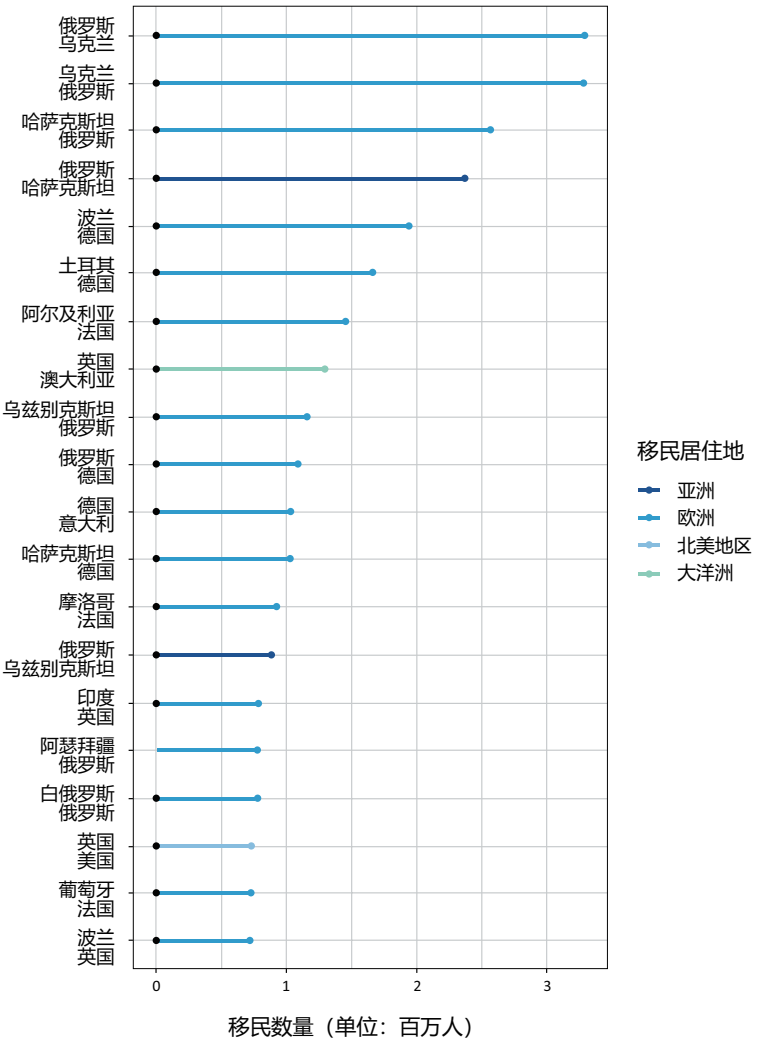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比重的一国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该国人口总量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居住在该国以外地区的人。

图 11 显示了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既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也简单呈现了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人口在特定国家成为该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相较其他地区，涉及欧洲国家的主要移民通道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即是大多数移民通道都在区域内部。俄罗斯在这些通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俄罗斯出生但居住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的人在 2015 年构成了欧洲区域最庞大的移民通道。俄罗斯也是继德国之后欧洲第二大移民目的国。以下“关键特征和发展”部分将进一步讨论这些移民通道和近期变化。

## 图 11. 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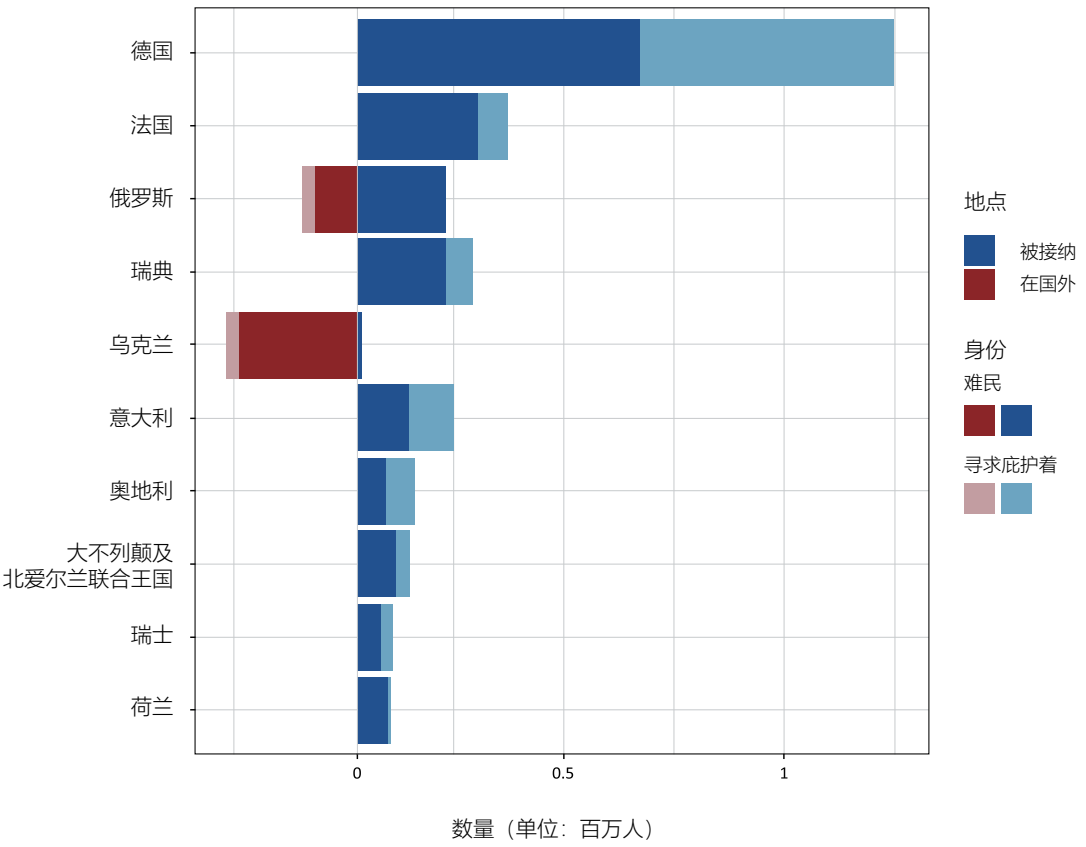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通道代表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在特定国家成为国家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德国接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为欧洲第一，其中将近一半是寻求庇护者（图 12）。同时，德国在 2016 年接收的新庇护申请数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球也是第一，其中绝大多数庇护申请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们。法国和奥地利最主要的难民人口中有部分来自俄罗斯。2016 年法国也接收了大量来自斯里兰卡和刚果（金）的难民。乌克兰和俄罗斯是欧洲主要的难民输出国（图 12）。过去有超过 22 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俄罗斯，但自 2013 年冲突开始后，许多人离开了俄罗斯。

## 图 12.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最多的前 10 位欧洲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含对“难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最多的前 10 位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并通过合计位于一国和来自该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得出。

## *欧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 *北欧、西欧和南欧* [167]

●**欧洲区域内移民尤为活跃。**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有 1600 万持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人生活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家。[168] 自由通行协议使公民在过境时无需接受边境检查，因而促成了大规模的区域内迁徙。由 22 个欧盟成员国和 4 个非欧盟成员国组成的开放边境的申根区确保了 4 亿公民能够自由迁徙。[169]2016 年，罗马尼亚约有 300 万公民居住在本国以外的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成员国，数量为欧洲最多。其后为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英国。[170] 但是，欧洲的自由迁徙也面临着挑战。从 2015 年下半年起，几个申根成员国临时性地重新引入了边境控制措施。[171] 而 2016 年 6 月就英国是否应当留在欧盟进行公投的“英国脱欧”事件也引发了对未来迁徙环境的不确定。2016 和 2017 年，迁徙均为欧洲的重要事项，并且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长和首脑会议定期处理的事务。大多数前去欧洲的移民或从利比亚乘船横渡地中海到达意大利，或穿过爱琴海从土耳其到达希腊。2016 年，接近 39 万人经陆路或海路穿过地中海地区来到欧洲，[172] 其中依靠海路的超过 36 万人。[173] 在 2016 年 3 月 18 日欧盟 - 土耳其声明发表后，经海路到达希腊的人数大大下降，在 2016 年仅有 17 万人以此种方式到达欧洲，远低于 2015 年经海路到达希腊的 85 万多人。[174，175]2016 年，超过 18 万人经海路到达意大利，和 2015 年相比数量增长了 16%。[176]2016 年对非常规移民而言，从利比亚通往马耳他和意大利的地中海中部路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致命的线路，估计有超过 4500 例死亡和失踪移民，而该数字也为该地区目前的最高记录。[177] 沿其他迁徙路线（包括穿越撒哈拉沙漠过境）还有众多海上死亡事件未被报道。[178]2016 年从海上到达欧洲的人中，超过半数来自世界前十大难民输出国，尤其是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179] 单身妇女和无人陪伴或失散儿童属于到达移民中极为脆弱的群体。[180]2016 年所有经地中海中部路线到达欧洲的儿童中有 92% 为无人陪伴或离散儿童。2016 年，欧盟成员国收到超过 6 万份由无人陪伴的儿童提交的庇护申请。[181]

●在大批移民与难民经地中海前往欧洲的同时，反移民言论也在政治话语、政策和媒体中兴起。总的说来，许多欧洲社会对移民的印象往往是消极的：2015 年 5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数欧洲人（56%）对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持负面态度。[182]10 个欧洲国家平均约 56% 的公众均表示应当阻

167 关于北欧、西欧和南欧的构成请见附录 A。

168 欧盟统计局，2017a。

169 欧盟委员会，n.d.a.。

170 欧盟统计局，2017a。

171 欧盟委员会，n.d.b.。

172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确认的到达人数（国际移民组织，2017d）。

173 国际移民组织，2017d。

174 声明中包含一项要求“所有经土耳其进入希腊岛屿的新非常规移民”返回土耳其的协议。除此以外，对于每个回到土耳其的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将基于现有承诺从土耳其安置到欧盟，且安置上限为 7 万 2 千人（欧洲委员会，2016）。

175 国际移民组织，2017d。

176 国际移民组织，2017e。

177 国际移民组织，n.d.b.。

178 国际移民组织，2017f。

179 联合国难民署，2017f。

180 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

181 欧盟统计局，2017b。

182 欧盟委员会，2015。

止穆斯林国家民众继续向欧洲移民。[183] 许多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他们国家移民和穆斯林的数量。[184] 这些对移民的负面印象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截至 2016 年 11 月，欧盟基本权利署表明无论是由当局还是私人公司、个人或治安团体 [185] 发出的针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暴力、骚扰、威胁和恐外言辞仍很严重。持续的对移民的负面印象阻碍了政府实现融合的计划。但据预测，短期到中期欧盟劳动力和技术的短缺将影响欧盟未来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例如，按人口预测，在 2023 和 2060 年之间欧盟将失去超过 1900 万劳动力。[186] 基于欧洲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如果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开始便能实现移民适时的融合，移民能对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东南欧和东欧* [187]

**●对于大多数东南欧和东欧国家而言，迁出移民是近些年以及近几十年的主要特征，并同欧洲其他区域相比，此地区迁入移民的比例相当低。**出于各种原因，按预测该区域数个国家将在 2050 年前经历人口数量的大幅下降（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188] 从东欧国家迁出前往西欧的移民在不断增加，这一点在 2004 年和 2007 年欧盟两次扩大后尤为明显。东欧国家大量加入欧盟并将欧盟的边界向东部的非欧盟成员国延伸。[189] 近期随着俄罗斯经济下滑，这一趋势愈发明显（见以下）。东南欧国家传统上便是迁出移民国家，其移民主要去往欧盟。因坐落在“巴尔干西线”等线路上，东南欧国家同时也是移民过境国家。俄罗斯仍是该区域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国之一）。2015 年，该国接收了超过 1160 万国际移民。[190] 其中多数为来自邻国、尤其是独联体成员国的移民。[191] 但同前些年相比，俄罗斯经济的下滑和移民政策的改变使俄罗斯移民流入和侨汇汇出均有减少。[192]2015 年乌克兰拥有超过 480 万出生在外国的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193] 但鉴于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和该国经济总体的衰退，之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国际移民的统计中乌克兰外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很有可能会减少。该地区内部和源自该地区的流离失所问题在最近几年有所加剧，这主要是乌克兰东部长期冲突的直接结果。截至 2016 年，乌克兰约有 17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194] 乌克兰东部长期的不安全致使大量移民和难民流入邻国和欧盟。2015 年，全球范围内乌克兰难民的总数达到顶峰，超过 32 万人 [195]，并在 2016 年仍保持高纪录，仅下降到略低于 24 万人。[196] 大量的乌克兰人也向俄罗斯提交了庇护申请，且 2015 年乌克兰人向

183 基于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2 月间进行的一向调查（来源：Raines, Goodwin 和 Cutts, 2017）。受调查的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

184 Ipsos MORI, 2016.

185 欧盟基本权利署，2016。

186 欧盟委员会，2014。

187 关于东南欧和东欧的构成请查阅附录 A。

18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189 欧盟委员会，2017。

19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91 独联体由九个成员国组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外还有两个观察员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192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9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94 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95 联合国难民署，2016c。

196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俄罗斯提交的庇护申请量占俄罗斯当年总数的 98%。[197] 联系上下文，2015 年乌克兰人在世界范围内提交了 17.5 万份庇护申请，其中有 85% 是向俄罗斯提出的。[198] 另外，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作为务工人员离开该国，尤其很多迁往了波兰。这些变化进一步增加了该区域原本众多的境内流离失所人口。巴尔干西部和高加索南部地区境内流离失所人口格外多，其中很多人是在 1980 年代末及 1990 年代的冲突 / 流离失所事件后长期处于这一境地。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初，来自和经土耳其和巴尔干西部地区的过境迁徙大幅增加，其中主要是沿经地中海东部和巴尔干西部线路抵达欧盟北部国家（主要为奥地利、德国和瑞典）。**这些迁徙活动将沿这些线路进行的混合迁徙水平拉至历史最高，并使该区域内寻求庇护和易受伤害的移民数量也增加。随后，继 2016 年 3 月 18 日欧盟 - 土耳其声明发表后，巴尔干西部线路边境限制的确立使得沿巴尔干西部线路迁移的人数大大减少。[199] 但该线路的封闭使 7 万多人陷入困境。[200] 这一形势使移民更易遭受虐待、剥削和类似人口贩卖等伤害性行为。[201] 在这一背景下，线路封闭后移民无法再依靠巴尔干西部当局提供的运输工具进行迁徙，因此移民偷运在这一地区也成为一个重大挑战。[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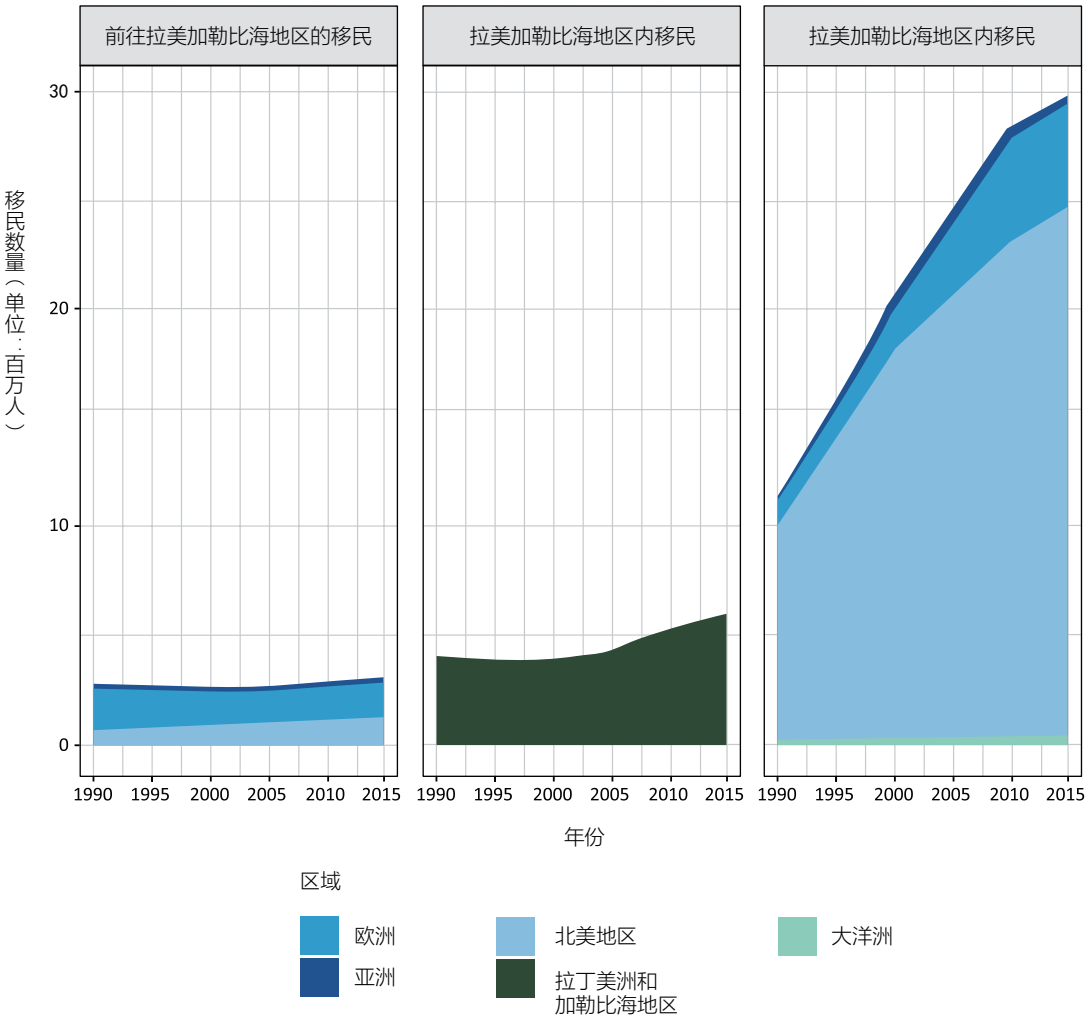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0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迁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迁徙至北美地区。2015 年，接近 2500 万移民向北迁徙并居住在北美地区。如图 1 3 所示，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一直大量增长，从 1990 年估计的 1000 万人涨至 2 0 1 5 年的近 2500 万人。同年有 460 万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生活在欧洲，而 1990 年这一数字为 110 万人。

而来自其它地区但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总人数保持相对稳定，在过去的 25 年基本为 300 万人。这些人主要为欧洲人（但人数在这一期间略有下降）和北美人（这部分人口数量有所增长）。

197 联合国难民署，2016c。
198 同上。
199 Frontex, 2017.
200 国际移民组织，2016b。
201 国际移民组织，2017f。
202 Frontex, 2016.
203 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 图 13. 1990 到 2015 年去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境内和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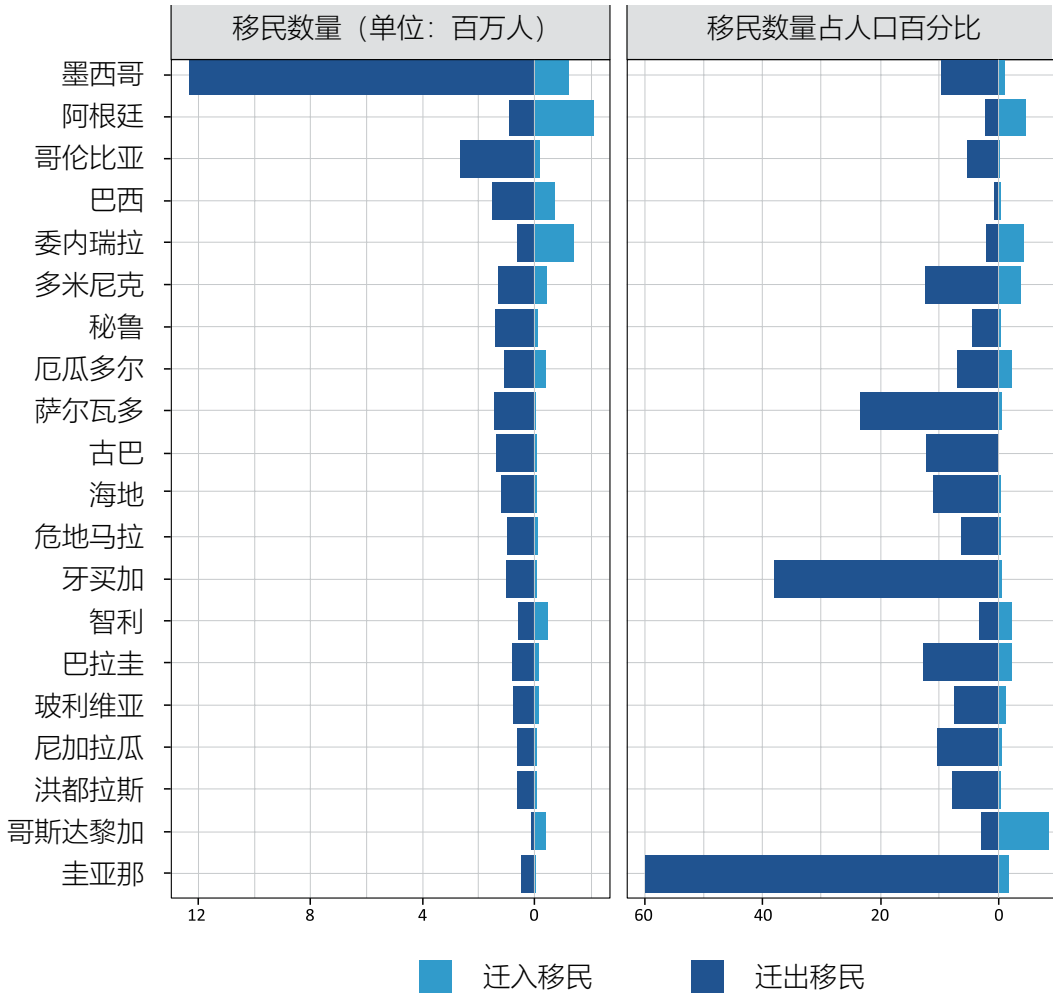
*注：* “去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外地区（如欧洲或亚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境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住在他们出生国以外地区、但该地区仍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北美地区）的人。

墨西哥是迄今为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迁出移民国家（图 14）。2015 年超过 1250 万墨西哥出生的人生活在国外，使墨西哥成为继印度之后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大多数从墨西哥迁出的移民住在美国，构成全世界最大的国与国之间的移民通道（图 15）。诸如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众多中美洲国家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秘鲁等南美国家在美国也拥有较多的移民人口。大量来自南美的移民也住在该区域的其它地方。尽管近期发生的众多事件使移

民模式有所变化（此部分将在“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进一步讨论），2015 年仍有约 100 万哥伦比亚人住在委内瑞拉。

阿根廷是该地区接收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 200 万移民），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玻利维亚等邻国。委内瑞拉拥有该地区第二多的移民人口，其后为墨西哥和巴西。在墨西哥，有 88 万美国出生的移民。如图 14 所示，该区域前 20 大移民国家中，哥斯达黎加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高（几乎为 9%），而这一结果需归结于邻国尼加拉瓜长期向哥斯达黎加输出移民。该地区前 20 大移民国家之外的一些国家，其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更高，比如伯利兹的移民人口即占总人口的 15%。

## 图 14. 201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前 20 大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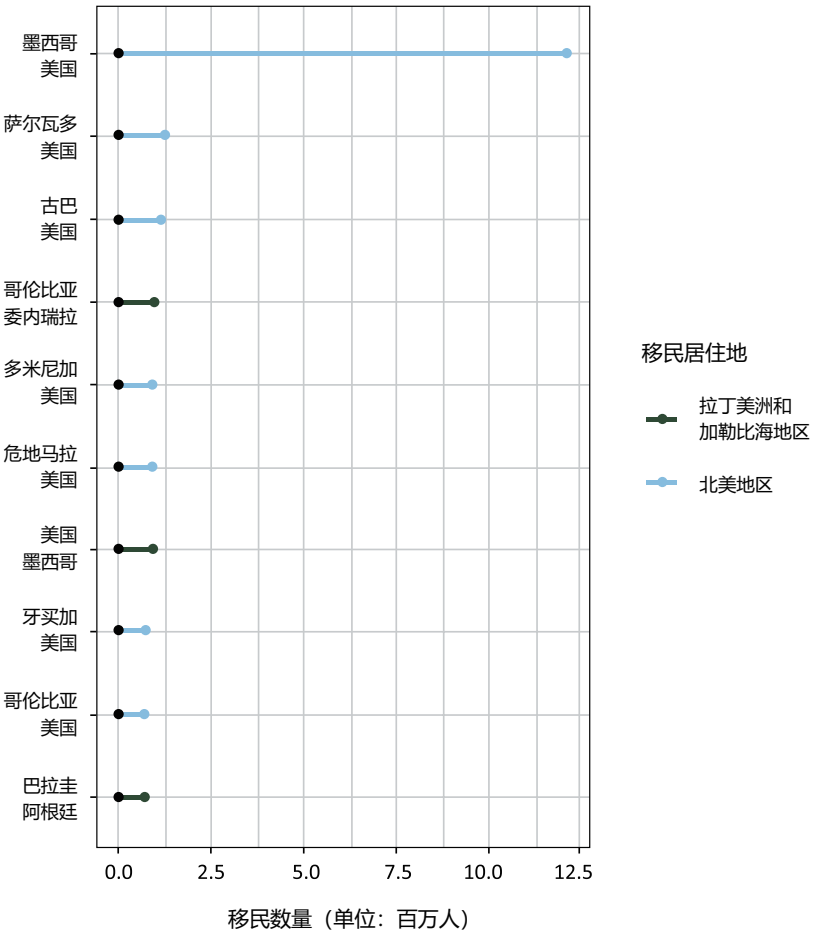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占总人口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一国人口总数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在其他国家出生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人。

该区域内部和源自该区域的主要移民通道最显著的特征（图 15）即美国始终是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国。大多数移民通道通往美国，其余的主要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部（如从哥伦比亚通往委内瑞拉）。这些移民通道代表了随时间迁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 图 15. 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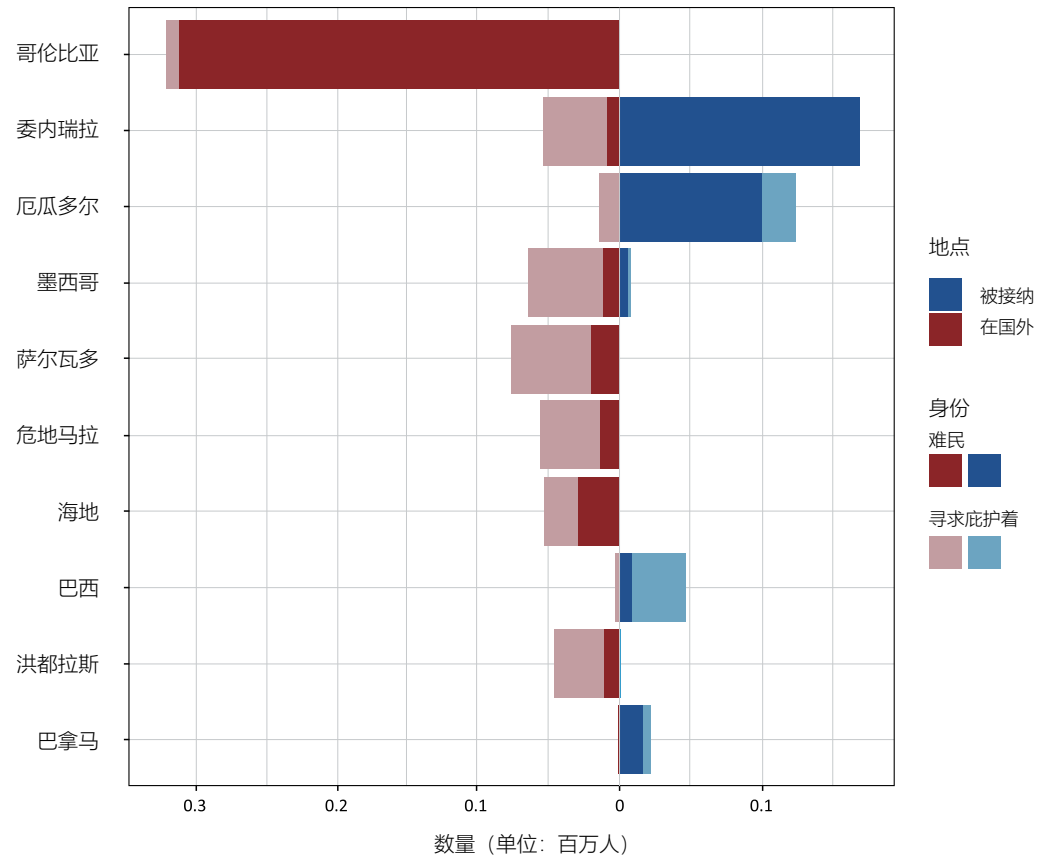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移民模式是如何使移民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基于长期的国内冲突，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难民来源国。来自哥伦比亚的难民大多数都被邻国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接收。海地是该地区第二大难民来源地，并有 2 万多寻求庇护者，而墨西哥也有 6.4 万寻求庇护者。接着是萨尔瓦多（6.2 万人），危地马拉（4.6 万人），委内瑞拉（4.5 万人）和洪都拉斯（3.5 万人）。这些寻求庇护者有很多在美国。

## 图 16. 2016 年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划分的前 10 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被接收”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有对“难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前 10 位的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并通过合计该国国内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得出。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 *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 [204]

**●在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向北移民是主要趋势，但此地区的区域内移民也值得关注。**墨西哥仍然是主要的移民来源国，每年成千上万人移民至美国。同时，墨西哥也是向北前往美国南部边境移民的过境国家。但是，随着墨西哥经济状况改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美国出台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墨西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墨西哥人口中外国出生的人数从 2010 年的约 97 万人增加到 2015 年的近 120 万人。其中多数为美国人，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在增多。[205] 但美国迄今为止是最受中美洲移民喜爱的移民目的地，在 2015 年中美洲移民中有

204 关于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构成请见附录 A。

20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78% 的人住在美国，而住在该区域其它国家和墨西哥的移民占全部移民的 15%。[206] 中美洲地区最突出的区域内移民通道包括来自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其他中美洲地区的移民去往哥斯达黎加寻找短期和永久工作机会，或是来自中美洲地区（主要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移民因不稳定和缺少就业机会移民至伯利兹。[207] 在加勒比海地区，最鲜明的区域内移民通道是从海地通往多米尼加。[208] 该区域内的非常规移民流动正发生改变且变得日益多样化。多年来，墨西哥人始终是因试图穿越美国 - 墨西哥边境而被逮捕的非常规移民的主体。但在 2014 和 2016 年，被逮捕的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北方三角”（Northern Triangle）地区的中美洲移民人数均超过了因穿越美国 - 墨西哥边境被逮捕的墨西哥人。[209] 另外，穿过中美洲和墨西哥的非常规移民流动变得非常多样化，不仅有大量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还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总的来说，在 2015 财年，有超过 5.5 万名非拉丁美洲人在美墨边境被逮捕。[210] 同年超过六千多“不被允许入境的”海地移民抵达美国西南边境口岸，而有近 8 千名非洲和亚洲移民在 2016 上半年到达墨西哥移民检查站，同前些年相比数量大幅增加。[211]

●**这一地区新的和多样的移民流动促使移民过境国和目的国增强边境执法和保护来应对这些移民流动。**面对越来越多的非常规移民，尤其是来自古巴和海地的非常规移民，尼加拉瓜在 2015 年 11 月关闭了其南部边境，而哥斯达黎加也在 2015 年 12 月向古巴人关闭了边境并随后在 2016 年 8 月向所有非常规移民关闭了边境。[212] 而且，墨西哥 2014 年实施了“南部边境计划”以减少来自中美洲的非常规移民流动。2013 年到 2015 年之间，墨西哥当局逮捕的人数从 8.6 万多人上升至 19.8 万多人。[213] 鉴于人们尝试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区避开边境检查，移民偷运也是该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美墨边境沿线的偷运网络是受国际犯罪团伙掌控的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214] 偷渡的移民经常成为索贿、集体绑架和敲诈等掠夺性行为的受害者。[215] 蛇头被拘捕的风险似乎较小。他们中很多人自己假装成非常规移民，经常是被遣返而不是被逮捕。[216]

●**一些中美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普遍的集体暴力事件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促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的迁徙。**2015 年美国收到的来自“北方三角”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庇护申请数量是 2013 年的 2.5 倍多，并且是 2014 年数量的两倍。[217] 从中美洲移民的无人陪伴的儿童数量也大幅增加：在 2011 和 2014 年财年间，美墨边境逮捕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儿童数量增加了 1200%。[218] 另外，近年来在墨西哥提交的庇护申请数量也大量增加，从 2015 年的 3400 多例增加到 2016 年的近 8800 例，涨幅达 155%。[219]

206 Lesser 和 Batalova, 2017。
207 国际劳工组织，2016。
208 同上。
209 Gonzalez-Barrera 和 Krogstad, 2016。
210 Bolter, 2017.
211 同上。
212 同上。
213 WOLA, 2016.
21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n.d.。
215 Sanchez, 2016.
21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n.d.。
217 Sturn, 2016.
218 Meyer 等人，2016。
219 Luna, 2017.

*南美洲* [220]

**●南美洲的区域内移民更为频繁。**从总体上看，在 2010 和 2015 年间南美洲的区域内移民数量增长了 11%，且约 70% 的迁徙都发生在区域内。[221] 由于国家间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差异，该区域大多数移民是为工作而迁徙。[222] 特别是南美洲的经济重组，以及服务和护理行业对女性移民需求的增加，使该区域移民女性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223] 由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组成的“南椎体”国家在 2010 到 2015 年期间移民人口增长了 16% 至 20%。这些国家也拥有南美洲最多的移民人口，并吸引了来自巴拉圭等安第斯国家的务工人员。[224] 委内瑞拉接收了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区域内移民。[225] 基于区域内移民不断增长，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性集团为实现区域内移民自由化作出了大量努力。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居住协议即促进了劳务移民并减少了该区域的非常规移民。[226]

**●数百万南美人居住在南美洲以外，同时此地区区域外移民的数量增长缓慢。**南美洲的向外迁徙主要和工作相关，并受移民来源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驱动。[227] 美国和西班牙是南美洲移民最主要的两个目的国，分别有 280 万和 180 万来自南美洲的移民。[228]2015 年拥有最多居住在南美洲以外地区的迁出移民的国家为哥伦比亚（大约有 140 万迁出移民），其次是巴西（有 130 万居住在本区域外的迁出移民）和厄瓜多尔（居住在本区域外的迁出移民超过 100 万人）。[229] 同时，国外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减少和本区域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带来了很多南美移民的回归并降低以及跨区域移民的比率。[230] 南美洲来自区域外的移民数量也在增长。例如，从 2010 年起，从欧盟迁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数总的而言多于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迁至欧盟的人数。[231] 这些人当中很多并不是从欧盟返乡的移民，而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欧盟国民。[232]2015 年南美洲来自这三个国家的移民已超过 70 万。[233] 越来越多的海地人、古巴人和多米尼加人也移民到南美洲。[234]

**●虽然限于个别国家，但冲突和暴力也在该区域造成人们流离失所和移民。**截至 2016 年底，哥伦比亚有超过 72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高。[235] 至 2016 年底，超过 30 万哥伦比亚人作为难民或以类难民状态在国外生活。[236]2015 年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也有 120 万哥伦比亚人。但随着哥伦比亚在 2016 年底和 2017 年就摆脱 50 年的暴力开始和谈，以及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条件恶化，许多哥伦比亚人回到了哥伦比亚，而众多委内瑞拉人则离开他们的国家，穿越边境到达哥伦比亚和其它地区。[237] 例如，从 2015 到 2016 财年，委内瑞拉人在美国提交的庇护申请数量增长了 168%。在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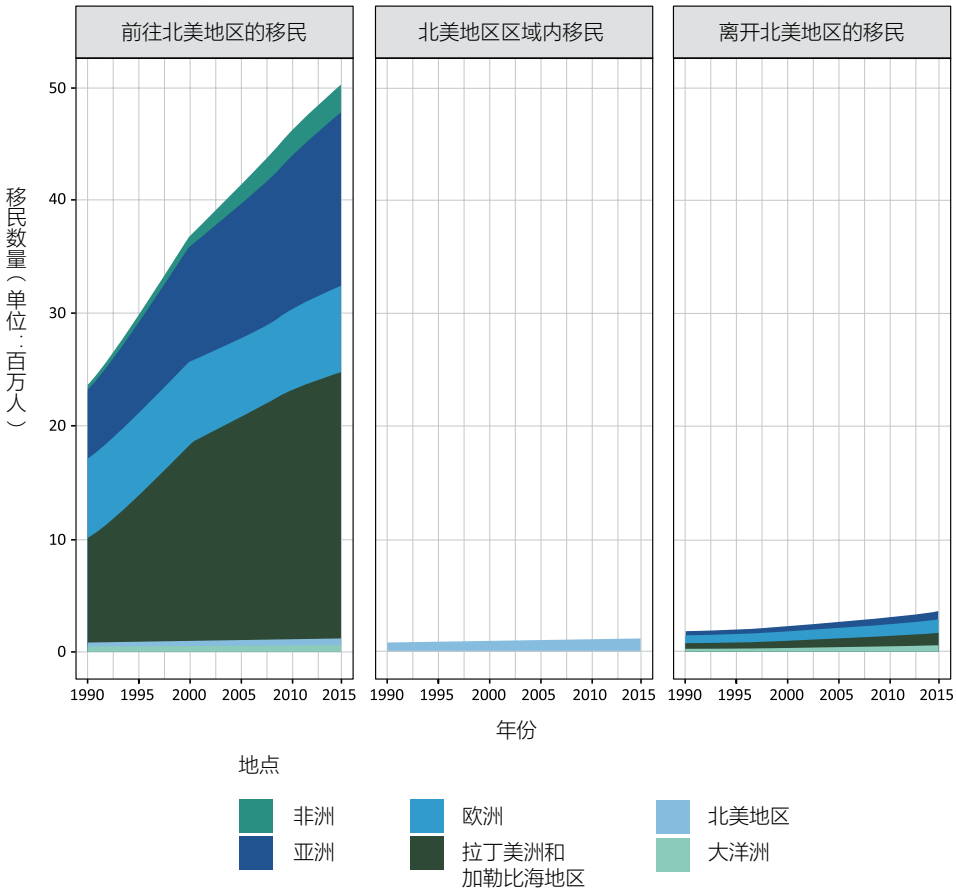
220 关于南美洲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221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22 同上。
223 Cerruti, 2009.
224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2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26 Acosta, 2016.
227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2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29 同上。
230 国际移民组织，n.d.a. 。
231 国际移民组织，2015b。
232 同上。
23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34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3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236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237 Carvajal, 2017.

委内瑞拉人在全球范围内提交了 2.7 万份庇护申请，[238] 但仅 2017 年上半年这一数量就达到将近 5 万份。[239]

*北美地区* [240]

美地区的迁徙以移民至该地区为主。如图 17 所示，2015 年有超过 5100 万来自各个区域的移民居住在北美地区。最大的移民人群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500 万人），接着是亚洲（1550 万人）和欧洲（750 万人）。在过去的 25 年中，北美地区的移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这既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亚洲人口增长相关，也受到北美地区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影响。

## 图 17. 1990 到 2015 年间前往北美地区、北美区域内和离开该地区的移民数量




*来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前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即北美地区）的移民。“北美区域内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北美地区）并住在出生国以外但仍在北美地区的移民。“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北美地区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亚洲）的移民。

238 Krosgtad 和 Lopez,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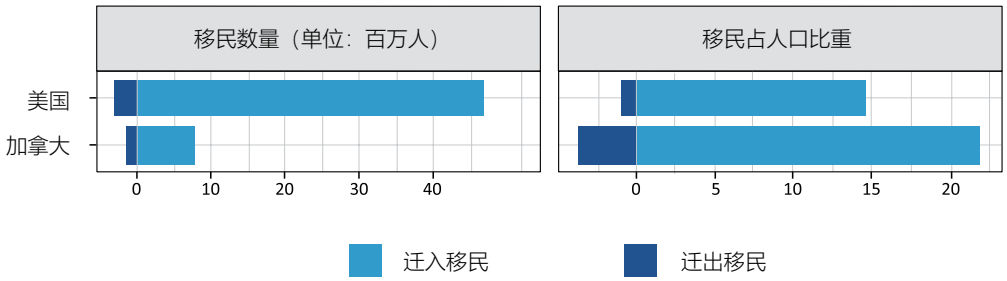
239 联合国难民署，2017e。

240 关于北美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和这一区域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比，该区域内部的移民和前往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2015 年北美地区出生但迁往其他地区的移民（约 130 万人，主要迁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要多于在该地区内部进行迁徙的移民（约 120 万人）。

2015 年，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国出生人口的国家。而加拿大拥有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在全世界排第 7。北美地区外国出生人口中有超过 85% 住在美国，并超过美国总人口的 14%。如图 18 所示，2015 年加拿大国外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 20%）远高于美国。和美国相比，加拿大迁出移民的比重也更高（占国内总人口的百分比）。

## 图 18. 2015 年北美地区主要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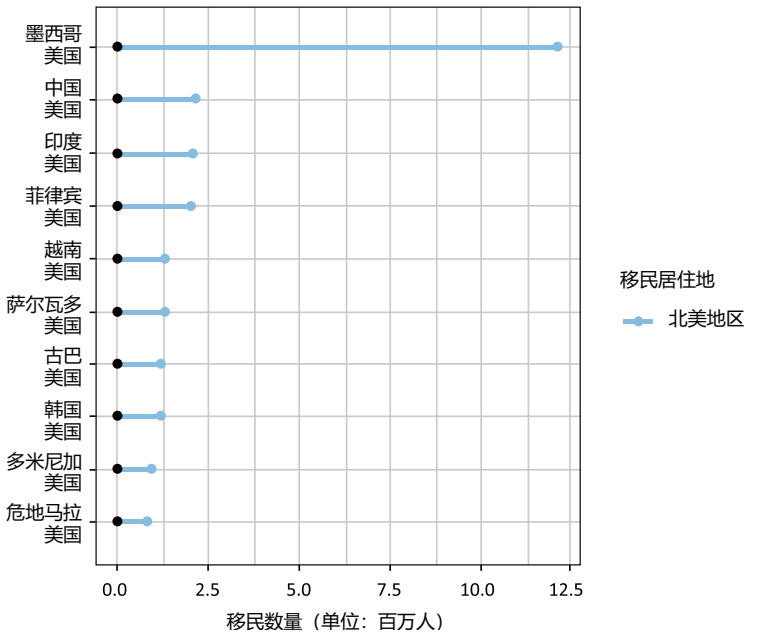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图 19 呈现了涉及北美国家最主要的 10 条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北美地区最大的移民通道或涉及从亚洲前往美国的移民，或涉及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去往美国的移民。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是最大的移民团体，在 2015 年有超过 120 万墨西哥出生的人口生活在美国。美国第二大移民团体来自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在美国，来自越南、韩国和古巴等国家的移民团体在多年前这些国家的冲突和政治变革后也迅速壮大。

## 图 19. 涉及北美地区国家的前 10 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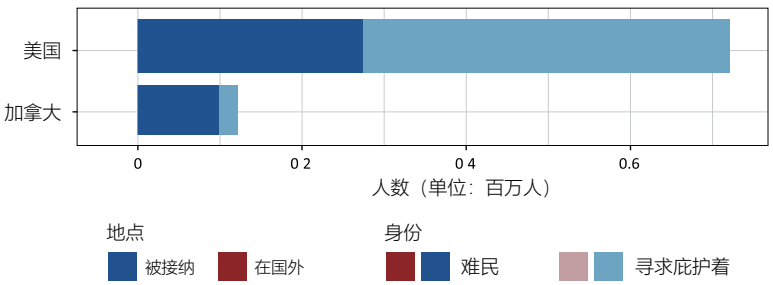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美国接收了超过 70 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如图 20 所示，被接收的人中大多数为寻求庇护者。美国的难民来自众多国家，但最大的难民人群来自中国、海地、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拿大也接收了大量的难民。难民最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中国。之后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将讨论美国和加拿大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的变化。

## 图 20. 2016 年北美地区和来自北美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有对“难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

*北美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241]

**●虽然国际移民的人口来源在变化，美国迁徙的主要特点是有大量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迁入。**截至 2015 年，美国有超过 1200 万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是美国数量最多的外国出生的群体。[242] 但和过去相比，迁往美国的墨西哥人已有所减少。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恢复缓慢造成的经济障碍 [243] 及美国移民控制加强等因素外，许多墨西哥人和他们的孩子也愿意回到墨西哥。[244] 例如在 2009 和 2014 年期间，87 万墨西哥人移民去了美国，而约 1 百万墨西哥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则回到了墨西哥。[245] 返回墨西哥的墨西哥人视家庭重新团聚为返乡的主要动力。[246] 相反，1980 到 2015 年间生活在美国的中美洲人数量增长了 10 倍。[247] 继墨西哥之后，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移民也是 2015 年美国最主要的移民群体。[248] 就近期迁至美国的人口数量而言，中国和印度已超过墨西哥。[249] 此趋势按预计将持续下去且目前的估算显示到 2055 年，来自亚洲的移民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出生的群体。[250] 亚洲人迁往美国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家庭担保签证，[251] 但学生也是主要的移民方式；从 2014 到 2015 年，美国高校录取的国际学生中，亚洲学生占到 76%。[252]

**●加拿大移民人口数量继续增长，移民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加。**2000 年，国外出生人口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18%，但在 2005 年该数字上升到 18.8%，2010 年上升至 20.5%，到 2015 年移民比重已达近 22%。[253] 过去加拿大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欧洲国家，但目前该国国外出生的人口构成已发生变化，其中有大量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例如，2000 年加拿大国际移民主要来自英国（61 万人），其后是中国（41 万人）、印度和意大利。但到 2015 年，中国和印度已超过英国成为加拿大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而菲律宾也跻身前 5 大移民来源国，但意大利则不再在前 5 之列。[254]2015 年加拿大 7840 万外国出生的人口中，包括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其它亚洲国家也在前十大向加拿大移民的国家之列。[255]2015 年，加拿大接纳了超过 27 万新永久居民，创下 2010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256]

**●按估算，近些年美国非常规移民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但数量远高于加拿大。**总体上，2015 年非常规移民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 3.4%。[257] 基于附加说明和在衡量非常规移民数量中数据的有限性，截至 2016 年，非常规移民按初步估计有 1130 万人，其中一半（约 560 万人）为墨西哥人。[258] 但

241 关于北美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24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43 Gonzalez- Barrera, 2015.
244 同上。
245 Krogstad, 2016.
246 Gonzalez- Barrera, 2015.
247 Lesser 和 Batalova, 2017.
24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49 Zong 和 Batalova, 2016。
250 同上。
251 Malik, 2015.
252 Zong 和 Batalova, 2016。
25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
25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5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56 移民、难民和加拿大公民，2016。
257 Krogstad, Passel 和 Cohn, 2017。
258 同上。

自 2009 年起未经登记的墨西哥人数量已在减少，而美国来自亚洲的非常规移民数量在增加，据估计在 2015 年达 150 万人。[259] 总的来说，尽管未经登记的移民有部分是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该国，但也有很多是按正规方式入境，但在签证到期后仍滞留美国。2015 财年据估计有 52.7 万人超过签证期限仍在美国逗留。[260] 在加拿大，一些统计表明该国有 20 万到 40 万非常规移民。[261] 其中有部分非常规移民（人数不明）是因为庇护申请被拒绝但尚未离开。[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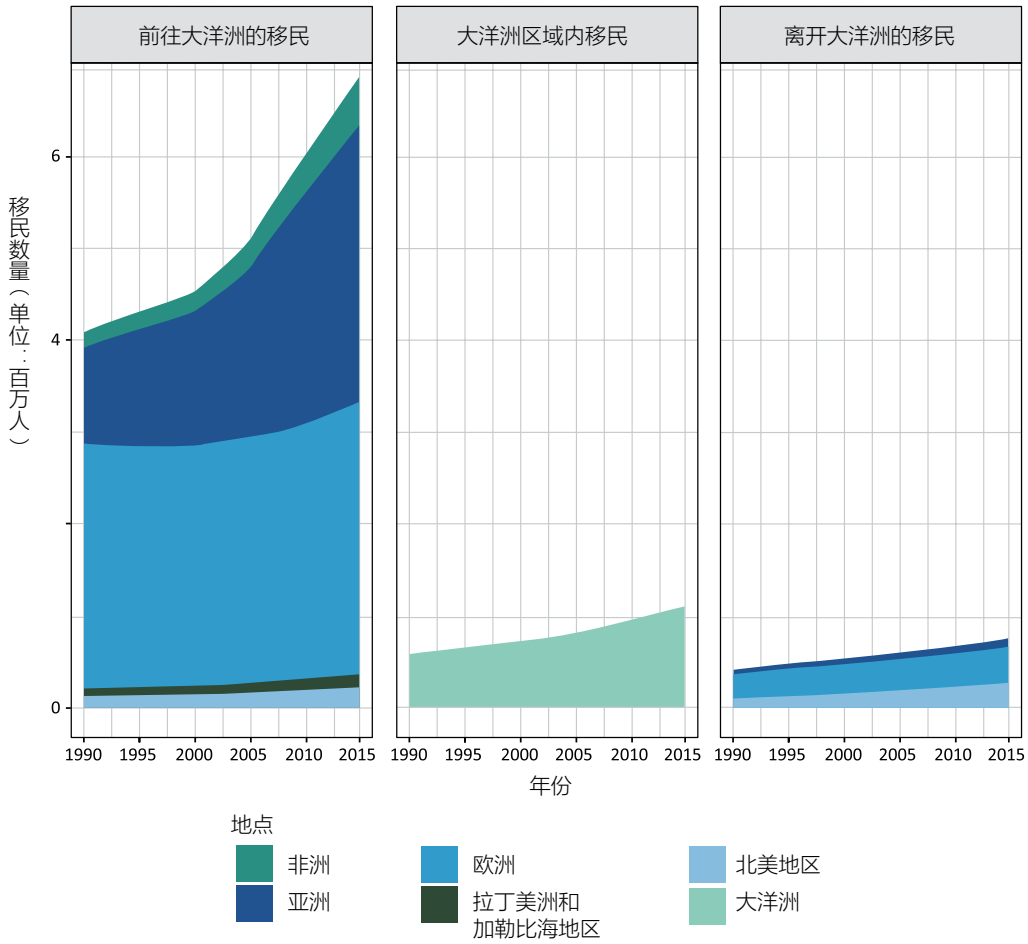
●**美国和加拿大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也使两国成为世界上安置难民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2016 年，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近 8.5 万人）超过 2010 年之后的每一年安置数量。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刚果（金）（超过 1.6 万人），接着是叙利亚、缅甸、伊拉克和索马里。[263] 但 2017 年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可能从预期的 11 万人下降到 5 万人。[264] 总的来说，加拿大 2016 年重新安置了近 4.7 万难民，这是自 1980 年来该国安置的难民人数最多的一年。[265]2015 年和 2016 年在加拿大得以重新安置的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刚果 ( 金 )、厄立特里亚和缅甸。

## *大洋洲* [266]

2015 年大洋洲是近 700 万来自该区域以外地区的移民的目的地。如图 21 所示，该地区外国出生的移民人口主要由来自亚洲（38%）和欧洲（37%）的两个群体组成。在过去的 25 年中，亚洲的移民群体已有增长，而来自欧洲的人数保持稳定。来自大洋洲的移民更可能留在该区域内而不是前往该区域之外。尽管过去 25 年大洋洲前往区域外居住的人数保持稳定增长，在本章涉及的 6 个区域中，2015 年大洋洲拥有的前往区域外居住的人数仍是最少的。尽管这一地区在过去 25 年间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离开该区域的移民数量仍部分反映了该区域较小的人口规模。出生在大洋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地区的人中大多数都住在欧洲和北美地区。

259 Passel 和 Cohn, 2017。
260 美国住房安全部，2016。
261 贝塔斯曼基金会和移民政策学会，2012。
262 Smick, 2006.
263 美国国务院，2016；Igielnik 和 Krogstad, 2017。
264 Krogstad 和 Radford, 2017。
265 联合国难民署，2017c。
266 关于大洋洲的构成请详见附录 A。

## 图 21. 2015 年前往大洋洲，大洋洲区域内和离开大洋洲的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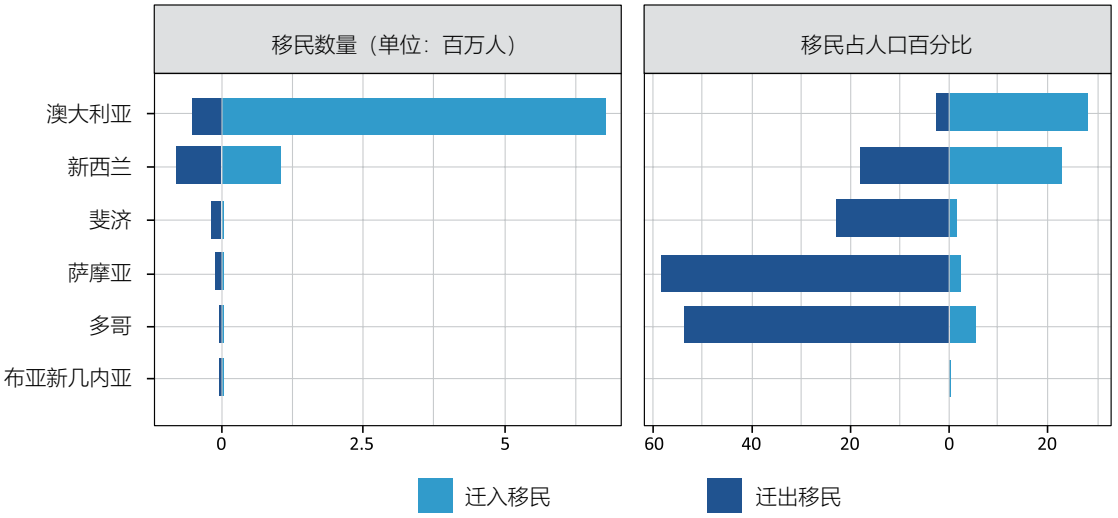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生活在大洋洲的移民。“大洋洲区域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大洋洲）并住在他们出生国以外，但仍在大洋洲范围内的移民。“来自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大洋洲但住在该区域以外其他地区（如欧洲或亚洲）的人。

大洋洲绝大多数移民生活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图 22）。该区域大多数国家一直是有移民偏向的特点，或是移民净输出国或是移民净接收国。例如，汤加、萨摩亚和斐济都有相对本国人口比较高的迁出移民数量和很低的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迁出移民主要生活在新西兰，也有一小部分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有相较本国人口比重很高的外国出生的人口，具体比重分别为 28% 和 23%。

## 图 22. 2015 年大洋洲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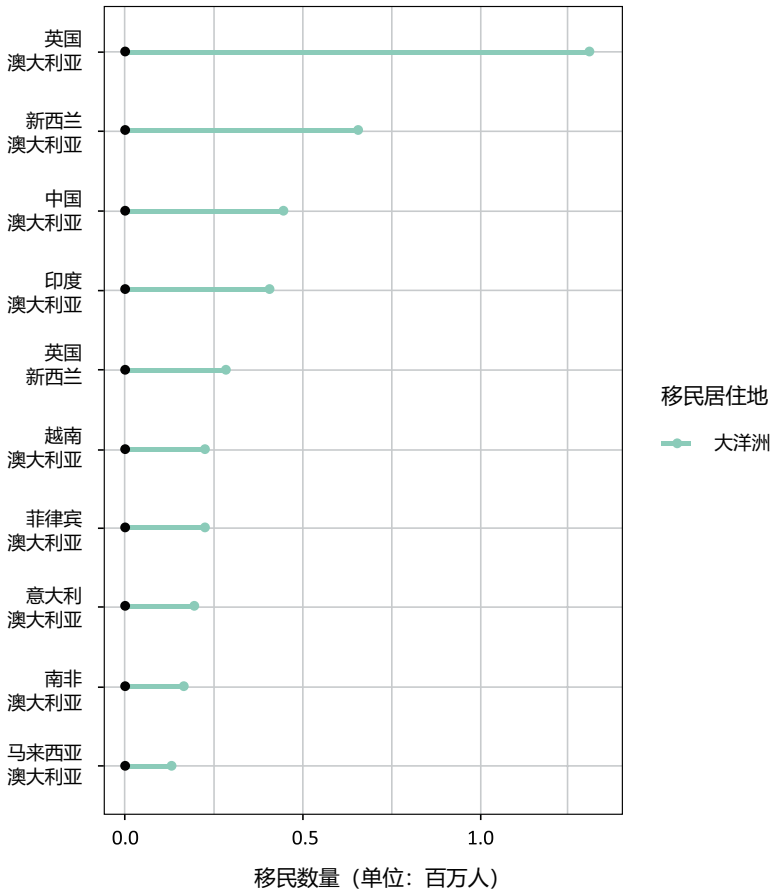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一国人口总数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在外国出生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人。

图 23 呈现了前 10 条涉及大洋洲国家的移民通道，并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区域前 10 大移民通道均是通往澳大利亚，其中最大的通道是由英国出生的移民组成。该区域最大的移民通道都是基于迁往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得出。这其中涉及众多大洋洲外的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新西兰有大比例移居国外的移民，其中大部分生活在澳大利亚。同时也有很多国际移民生活在新西兰。

## 图 23. 涉及大洋洲国家的前 10 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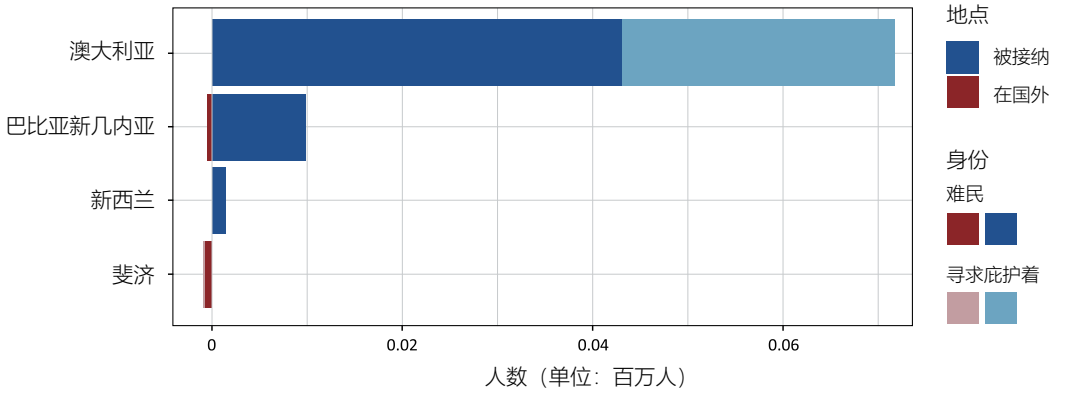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大洋洲接纳了不到 10 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澳大利亚是该区域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其后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接收的难民大多来自亚洲，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接纳的印度尼西亚人或是澳大利亚接纳的阿富汗人和伊朗人。2016 年全球来自大洋洲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超过 2000 人。

## 图 24. 2016 年来自大洋洲国家和大洋洲国家境内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 “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于一个国家但住在原住国以外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将对“难民”等关键术语进行定义。前 10 位国家是基于 2016 年数据并通过合计国家内部和来自一个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数得出。

## *大洋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移民数量继续增长。**相较前一年，2015 至 2016 年度新西兰移民净增长了 19%，[267] 而澳大利亚在同一时间段移民也比之前一年增长了 3%。[268] 从 2000 到 2015 年，英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国际移民最大的来源国，2015 年，澳大利亚英国移民数量达 130 万人，来自新西兰的移民（2015 年数量约为 64 万人）的数量位居第二。[269]2015 年澳大利亚国际移民的其他来源国主要为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270]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澳大利亚总人口有超过 28% 是在外国出生。[271] 在过去几十年间英国一直是新西兰移民的主要来源国，而亚洲移民的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尤为鲜明的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而来自斐济、萨摩亚和汤加等太平洋群岛也有大量人口移往新西兰。[272]2015 年新西兰外国出生的人口构成该国近 23 % 的人口。[27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大量短期工作者。2015 至 2016 年度有约 20 万人获得新西兰工作签证。[274] 这一年新西兰的短期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印度，其后是英国。[275]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澳大利亚有近 10 万短期工作签证持有者。[276] 两个国家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数量自 2012 年起大幅增长，2016 年达到 70 万人，创下了历史纪录，[277] 而 2015 年新西兰有超过 10 万国际学生。

267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68 澳大利亚数据局，2017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6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70 同上。
271 澳大利亚数据局，2017b。
27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73 同上。
274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75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76 澳大利亚 DIBP，2017。
277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2016。

这些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278]

**●大洋洲的区域内移民十分显著且将一直持续。**历史上，在两国政府间迁移协议的支持下，大量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间移民（大多数是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但从 2014 到 2016 年，从澳大利亚回到新西兰的人也大量增加，而在新西兰的澳大利亚人数量也呈现净增长的态势。[279] 从太平洋岛国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区域内移民也很突出，这一点将在之后将进一步讨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参与难民的重新安置。澳大利亚拥有世界第三大难民重新安置项目。**[280]2015 至 2016 年度该国至少为难民提供了 1.4 万个重新安置名额 [281] 并为因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额外提供了 1.2 万个安置名额。[282] 另外，澳大利亚也安置了来自缅甸和阿富汗但长期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国的难民。澳大利亚的政策是把以非常规方式迁徙的寻求庇护者转移到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和瑙鲁的离岸处理中心。2013 年 7 月，澳大利亚宣布所有坐船抵达的人将不会在澳大利亚本土得以重新安置。[283] 新西兰也是难民重新安置国家，并宣布在 2015 至 2016 年度重新安置了 750 名叙利亚难民。新西兰的国际 / 人道主义援助也同意支持来自太平洋地区的身陷人道主义危机的人，在 2015 到 2106 年新西兰批准了该地区的 1600 人居留。[284]

**●经济和环境挑战正影响着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迁出移民。**太平洋岛国出生现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移民有 42 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斐济、萨摩亚和汤加。[285] 太平洋岛国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所谓的“青年膨胀”问题导致就业机会严重短缺，并导致大量劳动力迁至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286] 每年约有 1.2 万来自太平洋地区的人通过季节工作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87] 环境改变和恶化也是驱使太平洋岛国许多民众进行移民的众多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有一半的人口住在拥挤的环狭窄珊瑚岛礁的城市地区，而水和土地资源都十分有限。[288] 逐渐上升的海平面、盐水侵蚀和干旱是影响该地区人们进行国内或国际迁徙的其他重要因素。[289] 在这个背景下，就是否应当有计划地重新安置群体和社区已有越来越多的争论。[290]

278 计量和国家研究局，2016。
279 新西兰数据，2016。
280 联合国难民署，2016a。
281 澳大利亚 DIBP，2016。
282 同上。
283 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2017。
284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85 Curtain 等人，2016。
286 同上。
287 同上。
288 Curtain 等人，2016。
289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2015。
290 就关于计划重置的一系列来源可见乔治城大学等。

## *结论*

当下公共政策辩论倾向于对全球移民的特点、它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移民给不同国家和地区造成的挑战进行一般性的总结。正如本报告第二章所示，在移民领域确实存在重要的全球趋势和模式。就移民对一国民众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以及移民给公共政策决策者带来的基本挑战等方面，不同国家之间显然也有一些相似处，因此对国际移民特点和影响的相似处和共同点的考虑对全球和国家的政策辩论和决策至关重要。但是本章认为从地区层面关注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规模和变化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些方面对全球和超国家层面（但不限于此）的辩论和管理有重要含义。

本章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对全球国际移民和流动进行了区域综述，并重点探讨了世界六大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和大洋洲）及其内部多个次区域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这些探讨在方法上是有局限性的且受主观选择的影响，但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突出地区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对每一地区国际移民和流动进行全面综述。如第二章“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所示，在全球移民人数和移民流动方面存在重要的数据和信息缺口。如本章所示，同样的数据信息缺口警示也适用于区域移民趋势和模式的分析。此外，对世界不同区域移民的研究和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移民数据和研究上在可利用性和质量方面的地理不对称性是全球和各国决策者应当注意的关键性问题。

本章总体上指出了不同区域和区域内不同次区域在移民方面的重要差异，以及全世界日益复杂的移民动态。举一个体现区域差别的简单例子，亚洲移民主要发生在区域内（例如从一个亚洲国家去往另一个），且远远超过去往世界其它区域的移民（例如，从一个亚洲国家去往一个亚洲以外的国家）。而在非洲，区域内移民一直都很重要，但现在迁往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欧洲、北美洲和中东地区）的非洲移民数量与在非洲内部进行迁移的移民人数大致相当。相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主要以去往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北美）的迁出移民为主，而区域内移民则相对有限。

世界不同区域移民动态复杂性中重要但时常不受重视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世界大量国家在“产生”大量逃到其它国家的难民的同时也“接纳”了大量来自其它国家的难民。为人熟悉的是，受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移民和学生等双向移民流动的影响，德国和英国等许多国家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迁入和迁出移民流动。但如本章所示，不被那么多人知晓的是，从难民角度，这一特点也适用于苏丹、南苏丹、刚果（金）和伊拉克等国家。

这些差异和复杂性（其中一些特点取决于时间地点，而另一些则相对普遍）为决策带来很多关键问题和挑战。例如，当讨论国际移民全球治理的合理方式时，不同区域移民的经历和动态的基本差异显然需要被考虑。这些差异对进行有效实践并确保治理模式和区域特点相匹配有重要影响。同样，移民动态的日益复杂也对国家管理者造成直接的挑战并影响国家间合理的治理和合作形式。对区域和次区域移民模式、差异性和复杂性更好的认识将有助于形成战略性的和可持续的政策回应。

# 4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 引言

随着我们对移民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围绕这个日益复杂又极其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所发布的信息也在不断增加。理想的状态下，经过严谨分析和研究的移民相关知识应该是决策者、相关实践者、学生、学者和公众了解人口迁徙及其变化规律的主要来源和起点。但是，关于移民的公开材料的增多，却使这一点越来越难实现。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识别、收集和消化有关移民的众多的材料可能难上加难。

本章提供对专业学者、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智库等众多移民话题行为体正在进行的和已发布的关于移民的研究和分析的综述。对于任何从事移民政策制定、研究人口迁徙以及想要对移民事务言之有物的人，了解关于移民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和分析的种类、本质和特点都至关重要。

本章显示，近年来有关人口迁徙的研究和分析出现了激增。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份关于移民的研究都进行检索、计算和分类，我们还是提供了基本的定量描述，例如对近年来出版的文章和书籍的数量的估计。我们的定性分析总结了一些作为样本的学术论文的主题以及来自一套政府间组织的旗舰型出版物的关键内容。我们也提供了测算出版材料的“读者范围”和“影响力”的基本方法。

在正式开始介绍这些材料前我们要强调，学术和非学术的出版过程千差万别，各自有其优缺点。学术出版系统主要聚焦于生产期刊论文和书籍。这个过程一般涉及多阶段的审阅和评论，通常会涉及作者、编辑和评审者多方。大多数出版的学术研究（“白色”文献）存在于付费墙后面（即不能被免费使用），且经常由商业出版商管理。相反，学术界之外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灰色”文献）的产出总的来说流程更快、更简单，通常是（虽然不总是）因为更有限的同行审议。灰色文献（诸如研究报告、工作论文和政府 / 官方文件）通常可被免费获得。一份如同这份报告一样的，旨在帮助我们在一个日益联通的世界里增进对移民问题的集体认知的报告，如果没有描述好“已被作为证据、论点、创新和见解的关键来源”的灰色文献的作用，显然是不完整的。[1]

白色和灰色文献的规模、多样性和增长使我们排除了对 2015 和 2016 年的全部有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做系统性回顾的设想。相反，本章突出在此期间，由我们挑选的一些学术期刊和政府间组织用英语发表的主要贡献。下一节将描述移民研究和分析的各方参与者。第三节主要是描述来自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的优选贡献。第四节勾勒出了一些移民研究材料的读者范围和影响力。

1 GreyNet International, 2014.

# 移民研究和分析的主要产出者

## *学术界*

在理想情况下，研究者生产被有力证据支撑并对他人有用的新知识。研究发现是为不同的目标受众所产出，并向其传播的。学术研究者越来越被鼓励向学术圈之外传播他们的贡献，虽然传统的学术著作可能会高度技术化且关注点较小。[2] 一些关于研究发现的交流涉及把知识向非业内专家的听众传播，包括向普罗大众。这些交流通过诸如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公开讲座和研讨会、科学节等活动的形式进行。分析政策的研究者经常积极和决策者建立友好关系来传递能为政策讨论提供信息并有助于形成决策的知识。对政策受众有影响的研究贡献往往采取短文和博客以及政策研讨会、专家互动会议、高层次咨询和会议等形式。决策环境的混乱以及部长和高级官员们及其他官员的高周转率可能使交流变得困难，部分原因是最近几十年中公共管理向管理主义的转变，使其专业性和对实打实的知识的应用逐渐消失。[3] 同时，“信息爆炸”也考验着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决策过程，而政策的复杂程度和互相之间的联系还在继续增大。[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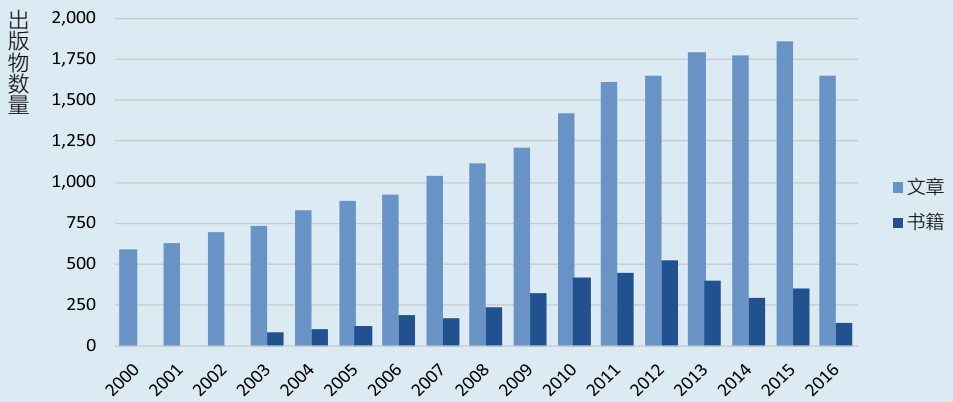
在学术界，传播系统围绕出版物运行，而一些形式的出版物（例如学术期刊）的可信度和重量秀出班行。学术出版物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其通常接受过同行专家的评审，这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然而，随着学术出版物的刊号数量日益增多，同行审议使用的标准也变得五花八门。可以说，学术研究的一个缺点是由于出版的压力，近年来学术研究产量大增，但其质量却不总是与数量一起提高。附录 A 提供了学术出版的概要，包括同行审议过程的细节、引用数和影响力评估。

在成千上万份涵盖各学科、主题和研究领域的接受同行审议的期刊中，[5] 我们选择了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出版的 130 多个涉及移民问题的期刊。[6] 主流学术出版者往往用英语出版，这既有使学术贡献标准化的优点，也有排斥了无法提交用可被接受的英语水平书写手稿的研究者的缺点。

### 关于“迁入移民”或“迁出移民”的学术出版物数量

以下的数字显示在学术界同行审议过的最大文献数据库 Scopus 中查询“immigration（迁入移民）”或“emigration（迁出移民）”的结果。出版物中份额最大的期刊文章一直保持明显的增长趋势，并在 2015 年达到顶峰。长远的趋势预示着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文献会继续增加：但这是否只是学术文献产出量总体扩大的一个表征，或者移民研究正由于某些特定原因在发展？

2 McAuliffe, 2016.
3 Box, 1999;Kirkpatrick, Ackroyd 和 Walker, 2005.
4 Nutley 和 Webb, 2000; Weinberger,2011.
5 Ware 和 Mabe, 2015.
6 期刊的列表可以在 IOM 的网站上找到 (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来源*：www.scopus.com

*注：* 仅查询关键词“migration”的话，会返回 10 倍以上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中包括和目前的移民研究无关的学科对术语“migration”的使用，诸如计算机科学（data migration）、生物学（cell migration）、动物学（bird or fish migration）以及其它学科。通过使用 Scopus 高级搜索功能，我们排除了诸如化学，物理，天文，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贡献。

## *政府*

从历史角度上看，政府关于人群进入和离开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行政数据是关于国际移民的最早的数据来源。[7] 不过，现代最早出现的有关移民的学术著作，是基于英国当局收集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境内移民动态的研究。[8] 直到今天，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具代表性的调查和其它的官方统计数据，仍经常被作为构成和移民相关的数据库的基础。政府关于移民的数据的核心地位已被像 IOM 发展基金会这样组织所认可，而 IOM 发展基金会正支持其成员国移民相关数据统计的能力建构等事务。

在统计数据收集、管理和报告以外，一些政府也是其他关于移民的信息的重要提供者，特别是以政策相关材料形式出现的信息，诸如评估、专题研究和评论文章。他们也可能委托他们在学术界的合作者、应用型研究者、政府间组织和智库进行研究。移民问题在公共事务中与日俱增的相关性，引导政府为实证研究提供资金，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拓宽了移民研究的范畴。[9] 这导致了对政府委托的研究的一些批评，有时是因为其过于集中在政策问题上，有时是因为这些研究会提出“对复杂的、长期的社会问题简单化的、目光短浅的对策”，[10] 或这些研究是由专门证明移民政策很合理的研究者完成的。[11] 也有一些证据显示，研究者们普遍地在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中被迫“产出政治上有用的结果”。[12] 政府委托的专项移民问题研究项目所着力解决的问题差别很大，并可能取决于

7 Poulain,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8 Ravenstein, 1885.
9 Castles, 2010.
10 同上。
11 Boswell, 2008.
12 The LSE GV314 Group, 2014.

该国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13] 同时，和政策无关的研究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在政策参考框架以外探讨移民问题中不易察觉的方面的研究。[14] 也有必要注意，政府委托的研究能够提供有关移民问题的有用而严谨的调查，通过包括利用别的机构不掌握的行政数据等手段，特别是和学术界和其他背景的研究者合作时，因为这些研究者能为复杂的、多方面的移民问题的调查带来不同的视角、知识和分析方法。如 Khalid Koser 所强调的：

> …真正的合作关系可以认识到并联合在政府内外不同但是互补的专门知识。在合适的条件下，强大而高产的合作关系能够形成，并利用批判性思维，去通过与政策相关的、策略性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移民问题。[15]

确实如此，有一些观点认为还应做出更大的努力进行合作，"研究者需要更好地了解政策过程 [...]，而决策者也应该更多地参与研究的概念化和推进"。[16]

除了为独立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诸如通过呼吁提案或直接委托，一些政府也实施了更正式的移民研究项目。虽然比逐个资助独立研究项目少见得多，但一些国家已经在实施长期的、涉及面广的研究项目。这种大项目的好处包括可以加强移民研究和分析中各方面的联系，以及可以从更长远的视角、多角度、多学科地调查问题。涉及面更广的研究项目（相较于单个的研究项目）也为政府提供了支撑横跨多地的比较研究的能力。例如，迁徙脱贫（Migrating out of Poverty）研究项目是由英国国际发展署（United Kingdom'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资助并由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协调管理持续了 7 年的研究项目组合。它聚焦于境内移民和区域性移民与贫穷之间的关系，并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五个区域。相较之下，澳大利亚非常规移民和边境研究计划（Australian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Border Research Programme）则聚焦于一个较狭窄的主题（即非常规移民和边境管理），但是其重点是把澳大利亚的经验放在更广的全球移民语境中。[17] 另一个有创新精神的、规模大的、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制是欧洲新研究机会合作资助机关（New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 Funding Agency Co-operation in Europe, NORFACE），它是一个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里 19 个欧洲国家的国家研究资助机构的合作关系的成果。2007 年，NORFACE 启动了关于移民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人口迁徙，融合以及凝聚和冲突。该计划持续了 5 年（从 2009 到 2014 年）并涉及了 12 个移民问题方面的跨国研究项目，包括绘制欧洲移民流动地图、移民融入、劳工市场情况和跨国家庭。[18]

13 Iredale, Asia-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and UNESCO, 2001.
14 Bakewell, 2008.
15 Koser, 2014.
16 Black, 2001.
17 McAuliffe 和 Parrinder, 2015。
18 Caarls, 2016.

## *政府间组织*

作为出版者和机构性作者，政府间组织为我们对人口迁徙和流动的集体认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组织可能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因而在学术文献里经常可以发现对多个政府间组织出版物的参考。例如，在一份商业出版的关于国际移民或流离失所的文集或论文可能会参考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 s Fund）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等等。一些关于进行移民研究的大学指南，提及了一系列政府间组织所制作的材料（诸如《乔治城大学关于国际移民和难民的研究指南》（Georgetown University Research Guid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fugees）和《伯克利法律图书馆全球移民问题研究指南》（Berkeley Law Library Global Migration Issues Research Guide））。一些学术研究也强调政府间组织现在是关于移民问题的主要信息产出者之一，这反映了对移民问题的兴趣有广泛的提高。[19]

虽然对于政府间组织的定义可能有差异，Davies 和 Woodward 把它定义为“由成员国（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威协定手段建立的正式、持续的结构或一个现存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通过这个组织追求它们的共同利益”。[20] 从上世纪上半叶起，政府间组织的数量、种类和影响力大大增大，[21] 以至于对这类组织关于移民研究贡献的系统考察远远超出了本章涵盖的范围。本章的重心放在联合国系统里的全球贡献者上，尤其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难民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国际移民组织，但这绝不是要轻视其它组织的作用，包括那些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运作的组织。[22] 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内的项目或单位，或半自治的、专业化的或（移民）相关的机构，本章所讨论的政府间组织都有全球性的读者范围，能够得到各方提供的信息和专业知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使他们能够在人口迁徙和流动方面塑造对话和实践的全球活动。

一些组织（诸如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使命或权限集中在特定形式的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上，而其它组织的责任则涉及某些独特的方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从事于数据工作；国际劳工组织从事于移民工人相关工作；联合国难民署从事于移民者的权利的相关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事于移民儿童的相关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从事于跨国犯罪方面（诸如人口贩卖和偷渡）的相关工作。不同的职责使得这些政府间组织能够收集或从各国得到大量的数据。除了制作和出版背景类、技术类、实操类、创新类和议题设置类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关于全球统计数据），这些组织也会召集涉及人口迁徙和流动的对话和会议以及出具报告。和其它的出版者一样，政府间组织难免在出版物质量、框架和议题设定方面受到批评。但是它们显然具备制作严谨

19 例如，Mason, 1999; Pécoud, 2015。

20 Davies 和 Woodward, 2014.

21 同上。

22 很多其它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下属机构或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也在移民方面生产资料，例如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会加强对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成果的介绍。未来的一些报告也会突出一些正在成长的非盈利或盈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而有力的数据和研究的责任心。例如，政府间组织会与移民领域顶尖的数据分析师和研究者常规性地合作，并以此作为吸取核心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手段。

IOM 在移民问题的许多方面产出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考虑到该组织专注于向移民和成员国提供技术帮助和直接支持，由 IOM 产出的在研究和分析领域之外的出版物通常包括机构报告（诸如会议 / 研讨会报告和《移民倡议》（Migration Initiatives））、培训材料、手册和指南以及给移民的信息资料（包括连环画小说）。了解 IOM 的使命和背景，以及它作为新的和联合国相关的组织的现状是大有裨益的。[23] IOM 作为提供服务的机构有长达 65 年的历史，这确实塑造了它阐述移民问题的各方面的表达方式，包括它的行动与移民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政策和治理。例如项目类数据一直是 IOM 移民数据的基础，反映出 IOM 在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中的强大而持久的作用，包括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全球难民安置和健康评估的支持，对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援助和对返乡移民的支持。同时，IOM 长久以来一直认同对支持人口迁徙进行更细致的了解的需求，包括通过关注特定的领域（诸如移民健康和环境移民）。

## *智库*

智库为决策提供信息的作用正在日益吸引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尽管智库作用日益突出，但对这个名词还没有形成被普遍认同的定义。出于这次讨论的目的，我们直接使用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全球智库索引（global think-tank index）中对其的定义：

> 智库生产政策导向型研究，分析并就国内和国际问题提出建议，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能够就公共政策做出知情决策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组织。智库可以作为附属性的或独立的永久机构长期存在，而不是临时性的会员机构。[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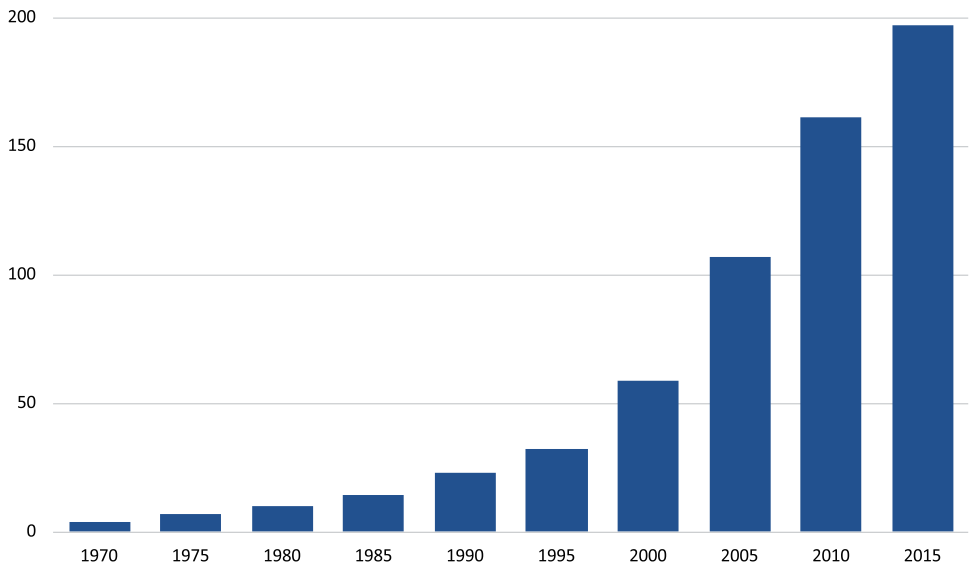
作为灰色文献的主要供稿者，在对政府的政策建议可竞争性日益增强的时代，智库已作为和移民相关的信息和分析的重要产出者而出现。随着对全球流动性、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的兴趣的增大，以及政府对适应日益充满变化而复杂的环境的需求，这一点变得尤其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缺少关于这个问题现成的数据，我们试图量化近几十年来从事于移民问题研究的智库数量的变化。在调查这个问题和量化这个趋势的过程中，第一步是考察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的列表。我们通过线上检索识别全球范围内其它的智库来补充这个最初的考察。我们把“从事移民问题”定义为至少有 5 年常规性地致力于和移民相关的课题，包括出版和移民相关的材料或举行关于移民事务的活动。我们的考察局限于用英语出版的材料，虽然我们承认其它语言也很可能有大量的产出。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全世界所有智库里有一半以上位于美国和欧洲。[25]（并且，）有许多位于非英语地区的智库是用英语发表贡献的。虽然存在语言和地理上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全球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数量有极大增长，如图 1 所示。

23 IOM 是于 1951 年建立的政府间组织，后于 2016 年 9 月成为了联合国关联组织。

24 McGann, 2016.

25 同上。

## 图 1. 1970-2015 年间致力于移民研究并发表英文刊物的智库数据




*来源：*基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 年全球智库检索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加上在与移民相关的各方面进行的补充性研究。

20 世纪后期，在智库总的来说激增的背景下，图 1 显示出自 2000 年起和移民事务相关的智库的快速增长，这突出了移民问题在社会、（地缘）政治和经济议题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考虑到最近几年备受关注的人口迁徙事件的数量和本质——诸如在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等发生了冲突的国家之内和来自于这些国家的大量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成千上万迁往欧洲的移民；2015 年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海上移民危机事件；英国脱欧公投中反移民情绪的作用；2017 年美国总统关于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的行政命令——我们预计移民问题将继续得到越来越多智库的关注。

但是由智库进行或报告的研究质量参差不齐。虽然智库有必要建立和维护关系网络来保证它们的研究的影响力，但是避免来自于利益团体、政党、媒体和说客们的不适当压力对于智库的可信度也是至关重要。智库圈子具有观点和议题多样化的特点。智库往往充当政治知识的掮客、政策研究的中心和新观念的孵化器。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向政府和民间团体提供咨询服务，进行培训活动，出版研究报告，和媒体合作以及进行政策推进工作。许多智库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因而在产生和传播关于移民的新数据和信息时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评论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最新作品时，Carling[26] 注意到：

26 Carling, 2016.

灰色文献在格式和内容上比较灵活。在记录移民偷渡的经历时，使用这个灵活性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例如，在他们对移民去欧洲的旅程的报告中，Hagen-Zanker 与 Mallett (2016)27 把说明性的基础研究、他们的研究与学术文献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与卓越的研究之间的交流结合了起来。

## 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的例子

阿富汗研究和评价单位（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阿富汗）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美国）
布勒哲尔（Bruegel）（比利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中国）
经济知识与自由披露中心（Centro de Divulgación y Conocimiento Económico para la Libertad）（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丹麦）
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尤索夫伊萨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Yusof Ishak Institute）（新加坡）
美洲国家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美洲）
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德国）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澳大利亚）
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美国）
海外开发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Centre）（英国）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nal Affairs）（南非）

*注：*主要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5 全球智库检索报告》。这些例子反映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的地理多样性。粗体字标注的智库是列表中唯一完全聚焦于移民问题的智库。

## 博客：增长，效用和担忧

最近 20 年，网络上产出的材料数量大大增长，尤其以博客的形式。博客（网络日志）最初在 1990 年代中叶出现，一般是贴在主页上发布的简明文章。虽然没有关于全球博客的确定数据，有估计显示近几年每年产生的博客的数量大有增长，从 2006 年的 3580 万增长到了 2011 年的 1.73 亿。[a]

博客的出现使得个人能够直接和非常多的人交流，而成本微乎其微。最近几年，博客日益为智库、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个人和机构）、政党和国际组织等等用来传播信息。[b] 对博客使用的扩张和多样化部分缘于和新受众沟通的愿望，[c] 以及为用户提供更多获取资料的途径或影响那些传统政治媒体鞭长莫及的受众群体。[d] 博客不受管理的

27 Hagen-Zanker 和 Mallett, 2016.

性质，引起了对于主观个人意见会压倒对事实和分析的担忧，以及在一个日益“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传播虚假信息的隐患。[e] 现在一些备受关注的事例说明，博客会被用来展示错误的消息，甚至有些虚假博客未经允许就转发分析师们的材料。[f] 我们现在依然不清楚“博客圈”有多少议题设定在发生。但是同时，学术界和政治圈也察觉到了与研究相关的博客正在变得日益重要。[g]

和研究相关的博客往往提取实证研究的发现，然后作为传播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取代其它的发表渠道（例如学术期刊），有可能提高政策和公共领域内研究发现的可获取性。这样的文章能够提供有用的且更易被消化的研究相关材料，而且虽然关于严谨性的担忧依然存在，但是那些旨在概括被同行审查过的实证研究的贡献的博客对增进我们对移民问题的理解作出了扎实的贡献。普遍来说，有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博客发布者被认为的可信度的高低程度会影响读者对信息的接受程度。[h]

a Statista, 2017.
b Farrell, 2012; Worthham, 2007.
c Cavanagh, 2009; Chong, 2010.
d Farrell, 2012.
e Weinberger, 2011
f Williamson 和 Eisen, 2017。
g Aldred et al., 2008; Mewburn 和 Thomson, 2013;
h Chu 和 Kamal, 2008。

# 最近贡献：聚焦 2015 和 2016 年

在调查了移民研究和分析的主要生产者的特点后，我们现在转向讨论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的最近贡献。

## *学术界*

由于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出版物数量太大，我们排除了考察 2015 和 2016 年全部出版材料的方案。取而代之，我们调查了一个学术圈成果的抽样，集中在 7 个涉及移民的并接受同行审议的期刊。今后的《世界移民报告》将包括其它的期刊。在这一辑，我们聚焦于一些存在已久的移民期刊以及学界新入者，包括《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亚太移民期刊》（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国际迁徙》（International Migration）、《民族和移民研究》（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难民研究》（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流动性》（Motilities）和《人口，空间和地点》（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我们的列表包括很多（但不是全部）世界上主要的移民期刊。[28] 调查由两部分组成：对这些期刊 2015 和 2016 年出版的所有文章标题的分析（总共 538 篇文章）；期刊编辑们对于他们期刊在这两年的主要贡献的

28 我们尝试着体现这些主流移民事务期刊的贡献在地理上的多样性。这种做法将在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中被延续，届时将有其它的期刊被囊括进分析。有 9 份杂志被我们选择，并且其编辑也同意向我们提供材料，但只有 7 家提交了资料。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和国际移民（Migraciones Internationales）最终没有提供材料。

综述。这样做使我们对各期刊的贡献有了更深的见解，并体现出它们的相似处以及在地理上和主题上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的领域。每位编辑的综述全文附在附录 B。在本章剩余部分的文字框里也会引用一些期刊编辑综述的摘录。

来自《国际迁徙》和《民族和移民研究》的编辑为涉及移民的研究的增长列出了几个原因。首先，“…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数量 [ 是 ] 对当今世界的移民问题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的回应”（Stantham – 见附录 B）。第二，2016 年关于建立一个全球移民契约和一个全球难民契约进程的启动，要求移民研究者们投以的更大关注；这样一个高知名度、高层次的政策倡议，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激励着更多对全球移民治理的研究（Duncan – 见附录 B）。第三，人口迁徙“…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诠释性透镜，社会和民众通过这个透镜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核心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全球化的结果”（Statham – 见附录 B）。

###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

近些年，围绕移民 – 发展关系的辩论，已在全球激起了对人口流动的日增的兴趣。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也不例外，那里的研究者力图描述移民的趋势和模式，并为该大陆的发展建议相应的行动，以控制它的经济、社会和人类权益。在这个方面，基于证据的研究被广泛接受，并通过测试假设、验证现有的理论和阐述新的理论来建构和扩大知识体系。最终，这些研究发现需要向一个更大的和更多样化、由专业学者、实践者、民间组织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受众发表和传播。出版物不仅会增强研究的知名度，同时还促进研究者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的可信度。经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是培养智慧的辩论和探究的基本工具。但是，目前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仍缺少针对人口流动等等问题的经同行审议的高质量期刊。学者们要在非洲的期刊展示他们在该领域的发现有困难，不是因为这类期刊出版不定期，就是因为它们干脆不存在。

*来源：* Mulugeta Dinbabo,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根据在我们的刊物样本中发表的 538 篇文章的标题，图 2 的词云突出了关于移民的学术出版物反复出现的主要聚焦领域。假设一篇文章的标题反映它的内容，我们试图把最频繁的词语用作强调突出的主题问题的线索。如我们所料，迁徙（migration）、移民 (migrant) 和人口流动 (mobility) 在标题中被广泛使用。有趣的是，迁入移民 (immigrant) 和移民迁入 (immigration) 都出现在前 10，而迁出移民 (emigrant) 和移民迁出 (emigration) 不在形成词云的 75 个词语之列。[29] 这至少说明在选定的期刊里所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个占主流的“接收国家”视角。虽然这无疑与我们为分析而选定的期刊自身特性相关，我们的样本确实包括有传统的移民“来源地”视角的期刊。另一方面，欧洲是前 10 大词语中唯一的地理词语。[30] 此外，其余的形成词云的 75 个词语中的地理词语为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英国、荷兰和韩国，大多数是移民迁入而不是移民迁出的国家或地区。

29 我们把词云精简到 75 个词语是因为其余的词语的低占比使加入它们没有太大意义。作为参考，第 75 位的词语是代（generation，在词云的右下的 migrant 之下）。

30 根据 2015 年国际移民报告（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制作），在 2015 年的 2.44 亿国际移民中，7600 万住在欧洲，7500 万在亚洲，5400 万在北美洲。

## 图 2. 2015-2016 年间来自 7 个学术刊物的 538 篇学术文章标题的词云

*注：*通过使用 www.wordclouds.com 和 www.wordle.net 产生。

###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亚洲和太平洋期刊》的文章一般描述亚太的移民情境并反映研究状态、政策讨论和倡议问题。…2015 和 2016 年发表的文章包括许多关于韩国和中国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最近两年强调了移民、来源地和目的地类型的多样性。例如，关于学生移民的文章经常与中国和印度学生相关，因为他们是前二大国际学生移民团体。关于在美国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韩国学生…，中国留学生归潮，以及对日本学生移民的一些关注扩大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菲律宾教师，新加坡的中国迁入移民企业家以及伊朗的阿富汗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生育差异等话题的文章，是一些揭示有关区域内移民的、相对不为人知的一些方面的文章，而关于越南人在波兰的文章提供了关于旧移民情况的更新和新的波兰越南人移民的特点…总的说来，2015-2016 年的文章把原有并持续存在的问题与新的或迄今未获足够研究的问题结合了起来。

*来源：*Maruja Asis, 合编辑。全文见附录 B。

其它一个频繁使用的词语是社会的( social ),这个词语在这 538 篇文章标题里出现 44 次( 8% )。这个形容词天然地适用于许多和移民相关的名词：用法包括社会融合，社会变化和社会保护。但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最频繁的关联是社会关系网络，这强调了在移民经历中关系网络是多么有用。关于社会关系网络在学术文章中被讨论的例子包括，从土耳其迁入到加拿大的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连接经历，在爱尔兰的巴西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他们进入劳工力市场的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移民到新西兰的印度移民的作用。

由于“…难民在全球政治的、媒体的和大众流行话语中新的相关性”（Koser – 见附录 B），“难民”（refugee）一词在词云中位列前 10 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正如人们所料，分析表明，在我们抽样的所有标题中提及词语难民的文章里，《难民研究》占了 46%，而其余的 54% 在剩下的期刊中出现。

另一个在前 10 大词语中出现的名词是“劳工”（labour）。[31] 寻求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条件是移民最重要的动因之一：2015 年所有国际移民中，高收入国家吸纳了国际移民增长的 81%。[32] 前十大词语的最后一个是“政策”（policy）。对我们样本的分析揭示与这个词相关联最频繁的词语是移民迁入政策，劳工政策和庇护 / 难民政策。

## 《民族和移民研究》（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7 年，《民族和移民研究期刊》出版 16 期大约 160 篇每篇 9000 个单词的在移民和民族关系领域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文章 […]。我们发表这么多（文章）的原因是让学术研究进入到公共领域，以便使其获得为公众理解提供信息的机会。原创学术研究的发现能给说客和政治家的主张提供合理性，有助于揭穿‘错误’的说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将其公之于众并留下记录 […]。

虽然 5 年之前我想可以这样说，期刊主要聚焦于“欧洲的”，近年来我们齐心协力，更直接地和北美的学者们（那些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鼓励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学者把《民族和移民研究》看作供他们辩论的论坛。这又一次反映了世界中那些正由人口迁徙驱动的重大变化。如果过去 10 年中国有 2.4 亿境内移民，这是不是移民学术圈显然应该涉足的课题？我们希望大陆间更多的交流可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我们这些学者带出我们的象牙塔和舒适区，去挑战一些深入我们骨髓的公认的“真相”。许多对人口迁徙和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战后时代从“南”向“北”移民的经历中提炼出来，并被来自于移民接收国的学者写下来。

*来源：* Paul Stathem,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科学 / 学术文章对决策者的相关性已成为一些期刊很重视的方面。三个编辑承认专业学者和决策者往往是脱节的，因为“……决策者经常立即就需要他们的证据而学术研究需要时间，而且同行审议进一步增加了这个时间，这意味着一些研究发表滞后于政策需要”（Duncan – 见附录 B）。政策和学术环境所使用的时间框架也存在重要差别：“……基于研究的知识是时间和流程密集型产品，有时这可能与政策制定快节奏并饱含争议的环境不相匹配”（Asis – 见附录 B）。可能的解决方法也许是“……产出简明的政策摘要、举行政策对话或和媒体合作产出更易获取和更及时的报告”（Asis – 见附录 B）。

## 《国际移民期刊》（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ournal）

[…] 人口迁徙是更长期趋势的一个现象，而长期趋势的规律经常是只能随着时间推移才变得清晰。比起许多被要求更快交出分析和建议的决策者们，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趋势。决策经常似乎是要解决紧急的问题，但其实它有其固有的保守性。被研究所识别的新趋势可能经过很久才会在政策里被认同，这使得实证研究被认真完成并接受同行审查变得更加重要。

31 Labour, work 和 profession 等近义词都被算在劳工（labour）之中。

32 UN DESA, 2016.

过去的几年中，对导致人们选择移民的决策过程和意图的兴趣在增大；这和对传统移民理论对宏观的“推”和“拉”的因素的大量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是传统理论一个补充，而不是代替。

*来源：* Howard Duncan，编辑。全文在附录 B。

## *政府间组织*

致力于移民事务的一些主要的联合国组织的贡献，反映了其在移民事务中的职责和目前移民事务的发展趋势，包括在移民模式中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些改变，例如进行国际移民的儿童的增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调包括有关移民数据的汇编，这个过程突出了各国统计办公室的能力的有限。2016 年，它的人口司（Population Division）发表了《国际移民报告 2015》（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这个两年一次的出版物提供关于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国际移民的程度和趋势的信息。人口司维护的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United Nations Global Migration Database）是关于国际移民的、按国家或地区计算、按年龄、性别和出生国家或地区或公民身份分类的最完整的一套统计。人口司同时还维护另一个 45 个国家每年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的较小的数据集。

### 2015-2016 年间出版的主要全球材料例举

| | | |
|---|---|---|
|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国际移民报告 2015》 | 2015 |
| | 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 | 进行中 |
| | 国际移民流动数据集 | 进行中 |
| 联合国难民署 | 《全球趋势：2015 年被迫的流离失所》 | 2016 |
| | 《全球趋势：2014 年被迫的流离失所》 | 2015 |
| | 《2014 年庇护趋势》 | 2015 |
| | 人口统计数据库 | 进行中 |
| 国际劳工组织 | 《促进公平移民：关于外来务工人员机构的总调查》 | 2016 |
| | 《国际劳工组织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估计》 | 2015 |
|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 《中转移民的处境》 | 2015 |
| | 《在关闭的门之后：保护和促进在非常规处境中的移民家政工作者的人权》 | 2015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被迫无家可归：难民和移民者儿童的日增危机》 | 2016 |
|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事处 | 《2016 年人口贩卖的全球报告》 | 2016 |

*注：* IOM 出版物在下文讨论。

作为一个被授权为难民寻求保护、帮助和问题解决方案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产出大量的出版物，并有一个专用的研究资源库——参考世界（refworld）。《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旗舰型出版物之一，它提供和分析全世界每年有关难民和其他联合国难民署所关注的人群的趋势。联合国难民署的年度报告《庇护趋势》（Asylum Trends）虽然不以全球为关注点（主要缘于寻求庇护者流动的本质），但仍提供 44 个工业化国家中寻求庇护者的庇护申请的统计数据和相关分析。联合国难民署也如它的人口统计数据库所报告的那样，是关于难民和其它受其关注的人口的全球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一个设定标准的机构，它负责协调国际劳工标准的形成并监督其实施。2016 年，其年度深度总问卷调查聚焦在外来务工人员。《促进公平移民：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文件总调查》（Promoting Fair Migration: General Survey Concerning the Migrant Workers Instruments）调查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外来务工人员法律文件的应用和影响。在为改善劳务移民的相关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制作方面所作出努力的方面，有《国际劳工组织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全球估计》（ILO Global Estimates on Migrant Workers）提供了对移民工人在世界移民总人数中比例的估计，特别是移民家政工作者。

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是被授权以促进和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权的主要联合国机构。除了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诸如人权理事会的条约委员会和特殊程序（Special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还产出大量的相关材料。

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中转中移民进行了研究，随后在 2015 年出版了《中转中移民的处境》（Situation of Migration in Transit），揭示了对这个移民群体明显的保护缺口。2015 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也出版了《在关闭的门之后》（Behind Closed Doors），揭示了非常规移民家政工作者可能面临的剥削、虐待和伤害，并对适用于他们的人权框架进行了概述。

虽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年度旗舰出版物《世界儿童的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不一定单独讨论儿童移民，但 2016 年出版了《被迫无家可归：日渐恶化的难民和儿童移民危机》（Uprooted: The Growing Crisis of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2016），展示了关于大约 5 千万跨境迁徙或流离失所的儿童的生活和情况的全球性数据和分析。

在其帮助联合国处理国际犯罪的职责范围内，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事处努力与包括人口贩卖和偷渡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并出具关于这些主题的种种报告。2016 年出版的第三份《关于人口贩卖的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基于 2012 和 2014 年间发现的贩卖案例，提供了对人口贩卖的模式和流量的总数的概述。

IOM 在 2015 和 2016 年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单独的研究和报告的形式发表的材料，其中很多直接衍生于一些项目。例如，欧盟资助的“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为政策提供的证据（Migration，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Evidence for Policy）”项目，2015 和 2016 年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来评估移民和气候变化的相关证据，这些报告关联于该项目所涉及的 6 个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肯尼亚、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产出的研究和报告的总数与项目周期关系很大，这部分解释了 2016 年报告量比前一年显著增加的原因（见表 1）。许多报告由 IOM 的机构在当地产出，尤其是如果它们出自单独的研究项目。

虽然 IOM 对移民期刊《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实践》（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的支持也对移民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表 1 显示了与研究相关的出版物的大部分由独立研究和报告组成。另外，“移民概况（Migration Profiles）”提供各国独特的移民综述（大多由 IOM 发展基金资助）来支持成员国移民数据、研究和分析的能力建构等事务。

## 表 1. 2015-2016 年间 IOM 书店的出版物

| 出版类型 | 2015 | 2016 |
|---|---|---|
| 世界移民报告（a） | 1 | 0 |
| 全球移民数据中心出版物（b） | 1 | 9 |
| 移民研究系列 | 1 | 1 |
| 移民概况 | 8 | 6 |
| 《移民政策实践》期刊 | 5 | 5 |
| 研究和报告 | 35 | 73 |
| 政策简报 | 8 | 12 |
| 《国际移民》期刊 (c) | 3 | 9 |
| 其它 | 9 | 16 |
| 总计 | 71 | 131 |

*来源：* IOM。

*注：*（a）世界移民报告 2015 用多种语言产出；（b）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于 2015 年 9 月成立；（c）2015 年《国际移民期刊》的编辑更换。

### 2015 和 2016 年 IOM 主要的和研究相关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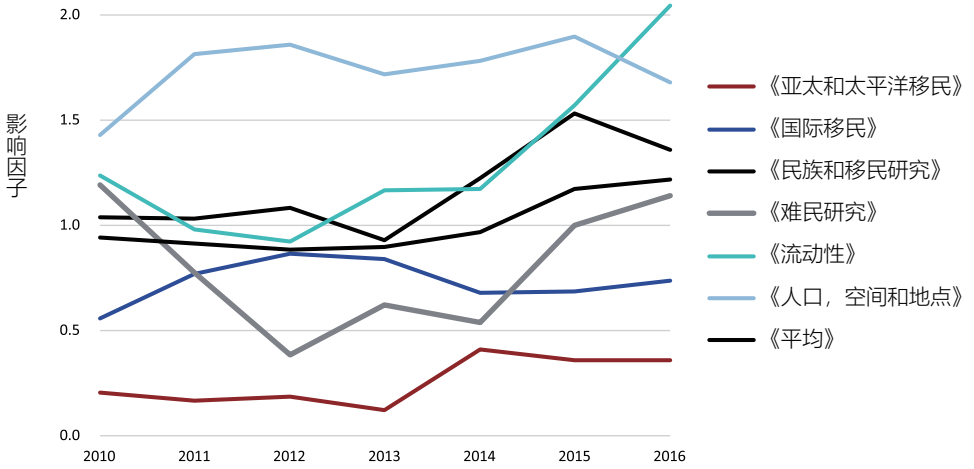
《世界移民报告 2015 – 移民和城市：管理流动的新伙伴关系》
《致命旅程第二集：死亡和失踪移民的识别和跟踪》
《证据评估：移民在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中的机遇和挑战》（多个国报告）
《移民偷渡数据和分析：新出现的证据基础的全球评论》
《衡量良好的移民治理：2016 年移民治理能力指数》（经济学者情报单位）
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数据简报
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简报
移民概况（多国报告）
营养监督报告（下属于 IOM 健康评估项目（IOM Health Assessment Progrmme））
《劳工剥削，贩卖和移民健康：多国关于健康风险和移民及被贩卖工人的结局的发现》

# 衡量读者范围

## *学术界*

随着对移民问题的兴趣增长，以及移民研究和分析的材料增多，可以合理地预计读者范围（例如通过扩大读者人数）也已增大。本章所调查的期刊印证了这个情况，它们的平均“影响力”在 2015 年（ + 21%）和 2016（ + 4%；见图 3）都有所增长。最近的平均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33] 增长表明，这些期刊中的文章受到更多的关注：一篇文章被引用意味着它已被研读过，而且它的一些内容有助于增加证据基础或产生辩论，建构知识，或为移民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

### 图 3. 选定刊物的影响因子




*来源：*《InCites 期刊引用报告》（InCites Journal Reports），Thomson Reuters。

*注：*在写本报告的时候（2017 年 6 月）《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未被 InCites 编入索引。影响因子是引用次数和发表数量之比。

基于引用次数（包括影响因子）的出版物度量显然有各种局限性和缺点。[34] 首先，考虑到学术出版的时间线和需要用来编制 / 发表统计的时间，引用数量往往是缓慢积累的。第二，引用几乎仅在学术环境下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替代措施（以下讨论）形成了。第三，引用并不能衡量材料的质量，只是一种量化影响力的方法（见附录 A 对这一点的讨论）。虽然引用度量已成为学术出版者和学者优先考虑的东西，它们对学术界外的人来说相关性较小。

33 影响因子是被引数和发表数的比率。每年的得分会按照那年的前面两年的被引数和发表数来计算。想看更多的例子请去附录 A。

34 如果想看最近关于影响因子局限性的概述，请看 Williams 和 Padula, 2015. 如果想从更广的角度看影响因子的使用不当，请看 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 《人口，空间和地点》（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从发表文章的总数方面来看，人口迁徙是《人口，空间和地点》的主要兴趣中心。文章涵盖国际移民和境内人口流动。一些研究者质疑把这两个说法区分开来的正确性，因为当代人口流动十分复杂，并且许多造成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现象发生的动因是一致的。[i]

可以认为，最重要的概念进步是承认人口流动（包括许多种形式的人口迁徙）是相关联的［…］。共享同一住所并有可能一起迁移的人的生活是关联的。[j] 在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之间（例如在为工作进行国际迁徙的人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之间），[k] 或在到达一个社区的迁入移民和在同一个社区并在适应新来者的非迁移者之间，都是关联的。[l] 在移民和那些有权力许可或阻止人口流动的人（例如那些向新来者分配住房的人），或那些支配移民政策并决定哪些人可以留下来而哪些人必须回到他们来源地的人之间，是关联的。[m]

*来源*：Allan M. Findlay, Clara H. Mulder 和 Darren P. Smith 编著。全文见附录 B。

i Hickey 和 Yeoh, 2016; Hugo,2 2016。
j Van Bochove 和 Engbersen, 2015。
k Murphy, Zhou 和 Tao, 2016。
l Philips 和 Robinson, 2015。
m Lietaert, Broekaert 和 Derluyn, 2015。

学术出版物已经开始采用新的度量方法来评估它们在学界之外的影响。其中一个度量方法是“替代计量得分(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 )”，[35] 它显示出“…多少人被展示并接触了一个学术成果”。[36] 对于任何研究成果，“替代计量得分”“…提供一个显示关注量的指标”，[37] 而一些关注度来源比其它来源有更大的权重。例如，新闻报道拥有最高的权重 8，因为“很容易想象一篇普通的报纸报道比一条起普通推特更容易给研究带来关注”。[38] 其它的高权重来源包括博客（5），维基百科（3），政策文件（3）和推特（1）。评价指标相对较新，于 2012 年开始，被认为是“…旨在测量一篇学术文章的实时读者范围和影响力的工具”。[39] 专业学者们发现（替代计量得分）“和引用量的正相关性但是程度相对较弱”，[40] 这支持一个概念，即“引用量和替代计量得分相关，但是所追踪的影响不同”。[41] 一个支撑博客在替代计量得分算法中取得重要权重的实证发现是，被在博客里提及“能够突出那些被引量较大的出版物”，[42] 这进一步强调了这个科学材料传播形式的日增的重要性。

我们分析了本章考虑的在 2015 和 2016 年 7 个期刊中的 6 个（《非洲人口流动评论》在写此报告时尚未出版这些数据）出版的 512 篇被同行审议过的文章的“查看 / 下载量”和“替代计量得分”。替代计量得分是出于两个原因被选上：第一，在所有期刊出版者的网站上可免费获得。第二，现有的证据支持它的使用，尤其是跟踪最近的研究成果。分析让我们能够解释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

35 参见 www.altmetric.com。

36 www.altmetric.com/about-altmetrics/what-are-altmetrics/. 于 2017 年 4 月 9 日查阅。

37 https://help.altmetric.com/support/solutions/articles/6000060969-how-is-the-altmetric-attention-score-calculated-. 于 2017 年 4 月 9 日查阅。

38 同上。

39 Warren, Raison 和 Dasgupta,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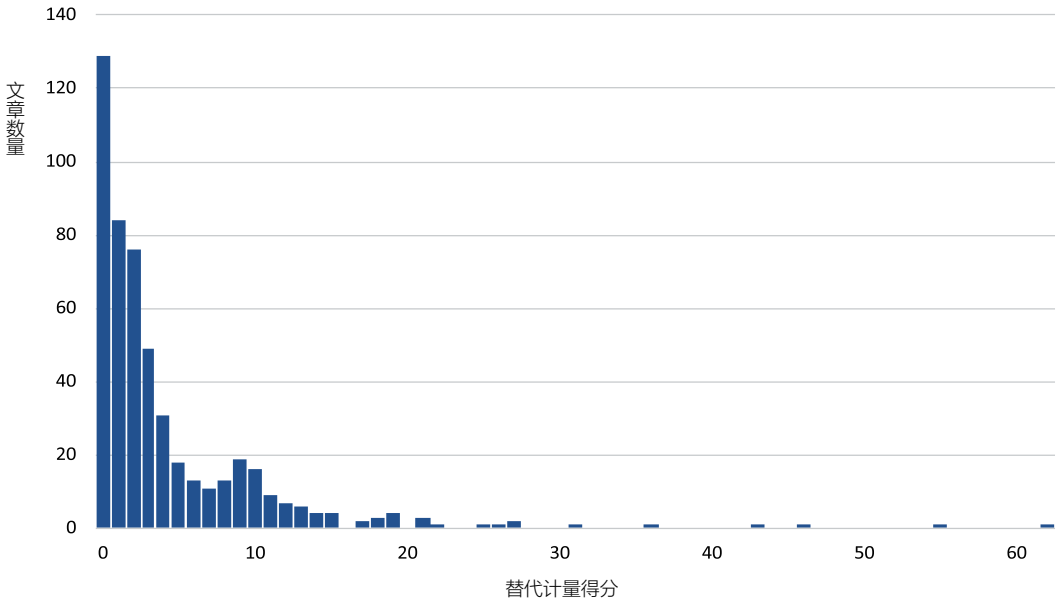
40 Costas, Zahedi 和 Wouters, 2015; Thelwall et al., 2013。

41 Priem, Piwowar 和 Hemminger, 2012。

42 Costas, Zahedi 和 Wouters, 2015。

出版物的定量的结果，诸如多少次被提及、查看以及下载。图 4 显示 512 篇样本文章的关注评分分布。没有得到任何注意或仅得到很少注意的学术文章占的比例最大：129 篇（25%）文章得 0 分，意思是它们没有被任何的线上信息源提及。超过一半（289 篇或 56%）评分为 2 或更低，意味着它们最多吸引了相当于两条推特的注意力。只有 14 篇文章（3%）获得高于 20 的评分（大致相当于在新闻和博客中各被提及一次再加上 5 条推特）。

## 图 4. 2015-2016 年间选定刊物 512 篇文章的学术论文替代计量得分




*来源：* www.altmetric.com

*注：*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在写此报告时尚未公布指标评价数据（2017 年 4 月）。

### 流动性（Mobil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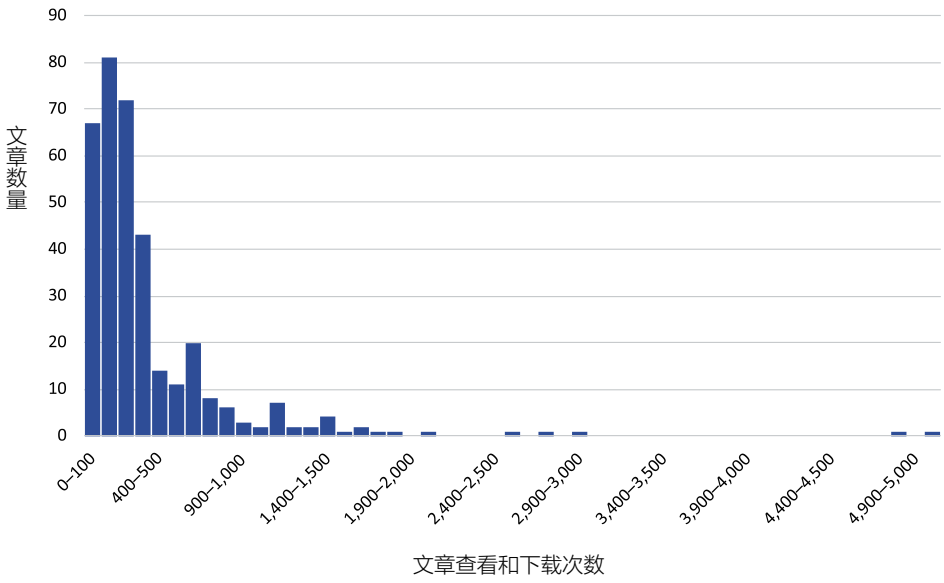
［……］边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当代话题，通过重塑边界对移民进行常规分析。就欧洲接收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的政治辩论；支持英国脱欧的公投；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造一堵墙的建议等，都证明了重塑边境的新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进程。边界的存在已被认为“不光是经验性的现象，它的使用、开放或是关闭，取决于谁跨越边界以及他们在政治辩论中变得多有争议”。[n]

*来源：* Kevin Hannam, Mimi Sheller 和 David Tyfield,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n Scuzzarello 和 Kinnvall, 2013. Rebordering France and Denmark Narratives and Practices of Border-Construction i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不是所有的期刊都在它们的网页提供了有关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的数据。在此报告成稿时，两个期刊（《民族和移民研究》和《流动性》）仅提供查看次数，一个（《亚洲和太平洋移民》）仅提供下载，一个（《难民研究》）提供查看和下载次数。三个期刊（《非洲人口流动评论》、《国家移民和人口》和《人口，空间和地点》）没有显示任何有关文章查看次数和下载次数的数据。为了克服这种标准化的缺失，我们融合了查看次数和下载次数。图 5 显示了来自这 4 个可用来源的 353 篇文章的查看次数 / 下载的分布，以百为单位。分布的左偏斜图形（和关注评分相似）突显读者读取程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只有 28 篇文章（8%）被查看 / 下载超过 1,000 次。查看次数 / 下载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文章读者人数相当有限。

## 图 5. 样本期刊 2015-2016 年间 353 篇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分布




*来源：*期刊出版者网页。

*注：*写此报告时（2017 年 4 月），《非洲人口流动评论》，《人口，空间和地点》和《国际移民》尚未发布关于查看和下载的数据。

总之，我们的量化分析显示，作为一个话题，移民问题正在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出版物和引用的数字象征着至少学术圈内的兴趣的提高。查看 / 下载的度量和指标评价显示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成果还有扩大读者范围和提高读者人数的空间。而实现此事主要的障碍之一是阅读学术出版物往往需要付费，这大大限制了学术界外对材料的使用。例如，期刊订阅者经常是学术机构，下载单篇文章的费用可能会使非订阅者望而却步。学术出版物对外开放虽然使下载免费了，但这通常是要求作者或他们的机构支付出版费。但是正有更多的开放阅览期刊（诸如《比较移民研究》（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和《反贩卖评论》（Anti-Trafficking Review））已在发

表移民问题的文章。[43] 另外，学术研究的语言和写作风格往往比其它的出版领域更技术化，主题也更狭窄。但是通过传统的和新形式的媒体，学术发现的传播为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为大众和政策论述提供信息的机会。接下来会讨论关于移民问题的博客一类媒体的潜在读者范围。

### 《难民研究》（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难民在遭遇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旷日持久的流离失所中，现实中无法预见永久性解决方案，并且更多的人搬迁到城市环境中，这使保护和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困难。难民始终遭受歧视，现在随着对难民的限制越来越多，其实比以往更加系统化：一些领导人开始暗示难民流动与暴力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风险有明确关系；对难民的仇外攻击增多。积极的方面，“2016 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有可能为国际难民制度和应对方面的重大改革铺平道路。《难民研究》期刊正在快速发展，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学科投稿，投稿质量屡创纪录，过去两年（2015 和 2016）中它的影响因子翻了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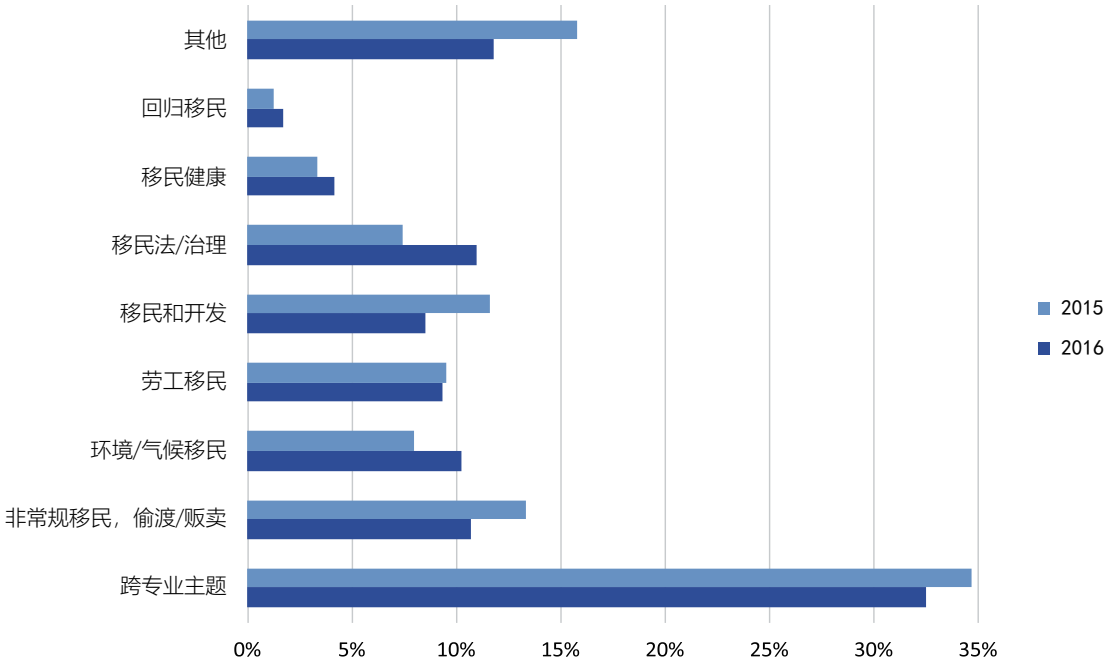
*来源*：Khalid Koser,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 *IOM*

近几年，IOM 线上书店进行了升级和改进。2009 年，线上书店作为推广 IOM 出版物的手段而启动，线上书店现在能够跟踪 IOM 出版物下载数量和支持数据分析。通过这些数据能够了解 IOM 出版物的可获取性和读者范围，补充对一些成果的读者调查。截至 2016 年底，该书店含有 27 种不同语言的超过 1370 份电子出版物，大多可以免费使用。虽然下载相关数据不是对出版物质量的评估（能通过读者调查或同行审查做到），但通过这些数据确实能够了解到高下载率的单个出版物，还能了解全球范围内创作和可获得的出版物是哪些主体，以及地域特征。IOM 书店中多年来创作的出版物下载量 2016 年已累计超过了 238 万次。经过对下载超过 1 千次的研究性出版物调查显示，有的主题比其它一些更突出，跨专业出版物的内容非常多，例如横跨多个主题的农村移民。2016 年对移民法和管理（以及移民和环境）的兴趣有所增长（见图 6）。

43 对外开放需要使发表的材料免费对外提供，不能收费或要求订阅。

## 图 6. 按主题划分，2015-2016 年间有关 IOM 研究的下载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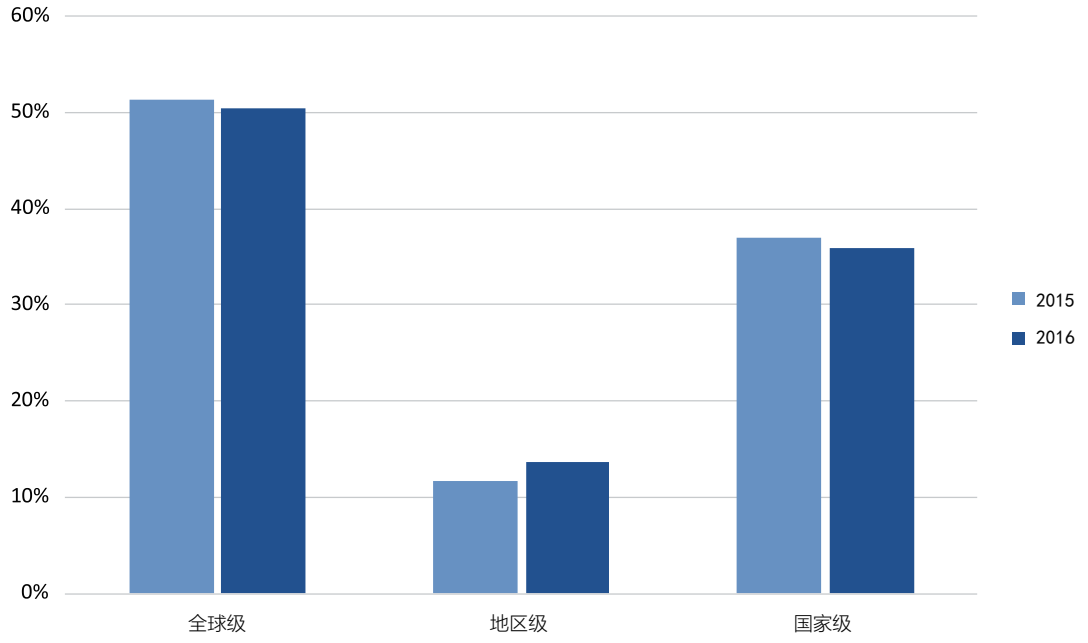



*来源：*IOM。

*注：*只包括一年中被下载 1 千次以上的出版物（2015 年的下载按比例分配，因为全年的数据未能提供）。下载可以被分类到一个以上的主题中。总计 1743167 次 下载。

全球视角的移民出版物比地区或国家视角的出版物更多（见图 7），这反映了《世界移民报告》的广泛读者范围。该报告两年出版一次，是 IOM 相关研究的主报告，最新版和以前几版都被广泛地下载。对《世界移民报告》的兴趣很明显，并且下载数据对解读读者如何对世界移民报告的材料作出反应很有帮助。例如，《世界移民报告 2010》关于非常规移民和混合迁徙流的背景材料在 2016 年被下载了几千次，考虑到 2015 到 2016 年去往欧洲的移民流量达到顶峰，下载量反映了 2016 年这个问题的突出性。

图 7. 按地理划分，2015-2016 年间有关 IOM 研究的下载比例




*来源：*IOM。

*注：*只包括一年中被下载 1 千次以上的出版物（2015 年的下载按比例分配，因为全年的数据未能提供）。分类不重叠。总计 1743167 次下载。

## *博客*

作为研究移民和相关问题的兴趣日增的大趋势的一部分，以移民问题为特色的博客数量也在随之增长。调查关于移民问题的博客发表的变化，大大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是以下的文字框里提供了广为阅读的移民文章的范例。这些范例显示出一些博客文章获得大量受众，并且因此可能大大影响对移民问题的讨论。[44] 但也很有必要承认，有的评论认为博客往往写比较“热”的或有争议的移民问题，诸如非常规或大规模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不那么有争议的话题往往被忽视。[45]

### 博客上发表的和移民问题相关的文章举例

将改变你对欧洲移民看法的四张地图（Four maps that will change how you see migration in Europe），作者 Alex Grey, 世界经济论坛议程（World Economic Forum’s Agenda）博客发表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 - 905126 次查看

44 Aldred et al., 2008.

45 Ozimek, 2012.

你能买到公民身份的国家 (Countries that you can buy citizenship)，作者 Joe Myers，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博客发表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 – 176065 次查看

出乎预料的后果：偷渡移民如何在利用国际保护系统（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ow migrants smugglers are exploit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作者 Marie McAuliffe 和 Khalid Koser，亚洲和太平洋政策学会（Asia and Pacific Policy Society）的政策论坛发表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 – 超过 100000 次阅读。读者大多数在加拿大，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叙利亚难民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yrian refugees），作者 Johnson Hewson，亚洲和太平洋政策学会的政策论坛发表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超过 18000 次阅读。读者大多数在澳大利亚，中国，印度，爱尔兰和美国。

中美洲前进一步：为了联盟繁荣的计划（One step forward for Central America: The Plan for the Alliance Prosperity），作者 Manuel Orozco，“美洲间对话”（Inter-America n Dialogue）的博客发表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 – 662 次查看

*注：*阅读或查看的数字及相关分析由相关的博客编辑在 2017 年 2 月末提供。

# 结论

本章综述了关于一些主要移民问题研究和分析创作者的核心创作，增进我们对移民问题的集体理解。我们发现，包括一些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创作者在内，大家对移民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反映了该话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我们也发现，移民相关的不同类型作品各有优劣，在阅读和使用这类材料时，尤其在为决策提供信息时，了解这些差异很重要。例如，学术研究和分析可能比其它形式更严谨，但是较长的交付周期可能会减少对决策者的有用性，决策需要的材料要能适应的时间要求，经常比学术出版体制出得更快。相反，和经过同行审议过的学术研究相比，灰色文献的优点是产出时间更短，更容易获取未出版的研究和数据资料，同时还具备利用学术界和政界的专门知识的能力。[46] 灰色文献也往往是免费的。但另一方面，有时候其质量和审查标准不稳定（甚至很差）、出版安排不定期、并缺乏标准的书目标识符。[47] 也有人批评它被用于议程设置或者使政策合理化。[48] 然而，这些缺点和潜在的优点一样，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此类出版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发挥移民议题不同类型的材料的优势。例如，一些关于移民问题的最高质量的博客，就是依赖多年的研究，建立在经过仔细阐述、钻研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基础之上。资深移民专业学术机构维护自己的博客并为其它出版者写博客文章，事实上正变得更普遍。这表明这种交流和传播形式的效果得到了学术圈的认可。这也被替代计量得分使用的增多所反映。期刊论文在包括通过发表博客在内的非

46 Pappas 和 Williams, 2011。

47 Banks, 2012; Pappas 和 Williams, 2011; Schopfel, 2011; Ruciski, 2016。

48 Boswell, 2008; Sageman, 2014.

学术发表传播形式，也算入替代计量得分衡量标准。但同时，我们很难评估博客和包括许多研究报告在内的其它灰色文献是否对移民问题的集体认知有重大贡献，亦或者它们只是更适合宣传的另一种议程设置工具。在学术环境下，被引用的次数提供了衡量一篇文献的价值（或缺乏价值）的指标；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因子也成了评估科学期刊一种类似的工具。灰色文献还没有类似的系统性评估体系，它的多变性和多样性既被看成是优点也被看成是缺点。但是，能够线上灰色文献的出版者能够通过技术帮助，来评估受众对一系列或甚至单篇文章、报告或研究的感兴趣程度。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本章收集的信息（包括来自博客编辑的信息）显示，一些涉及移民的线上研究和分析读者范围非常之大。受众能够如此广泛地查看、阅读和下载这些材料的事实提醒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移民问题出版材料的质量。例如，没有什么好理由能解释为何非学术类的材料不能被同行审议；为移民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需要以更强有力的证据为基础，因此，使用能提高出版的研究和分析的总体质量的工具是很重要的。同样，没有明显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尤其在非学术领域，更多移民研究和分析的出版者不能接受通过查看次数 / 下载次数 / 替代计量得分的测量方式。同时，学术出版试着接受灰色文献的优势，即可获取性和速度，是可取的。开放阅览就是种解决办法，而且使用其它交流办法，诸如博客当然能够提高可获取性。学界也在努力缩短出版时间，越来越多的优质期刊能够在两、三个星期内提供同行审议。但是这意味着给本已是志愿的、无报酬的、高技能的学术审议者劳动大军加上了严格的截止日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白色和灰色文献是关于移民问题互补且有用的信息来源。我们强调了两种文献的一些优缺点，并为帮助它们扩大读者范围来促进对移民问题的更平衡的对话提出初步行动建议。我们强调，本章的分析只与小范围的学术期刊和政府间组织的贡献相关。我们认为对这个源于这个范围的分析能清楚描述出移民问题的最新研究和分析，我们并不标榜研究分析穷尽所有范围。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世界移民报告中扩大这个分析的广度，把已有来源和其它来源都包括进来，逐渐为移民问题话语提供更完整的实证研究说明。

最后，我们鼓励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其它人用批判的眼光开发和利用关于移民问题的书面材料的价值。我们也强调旨在缩小研究和政策领域之间的差距的活动和倡议，通过研讨会、会议、简介会和相关咨询等方式，把移民问题的学者、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者集结起来。这种倾听和分享关于移民知识的机会，能够为新思路提供支持，为打造更有效的政策应对提供帮助。

# 第二部分

## 复杂与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

SUSAN MARTIN
SANJULA WEERASINGHE

# 5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1]

## 引言

近几十年来，在上世纪形成的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为改善全球移民治理所做出的努力日益增多。在《2016 年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简称“纽约宣言”，该宣言是联合国大会关于人类迁徙的、最受关注的全体成员国领导会面磋商的成果）里，各国承诺启动政府间谈判进程，以达成全球契约，实现安全、常规、有序的迁徙。在移民领域，全球治理明显滞后于其它跨国问题，因此，该宣言的形成尤其值得关注。它反映出通过非正式对话和倡议实现国家间的信息咨询与分享，加强国际合作，进而建立人们对多边治理的信心。然而，和以往一样，在面对政治、人口、环境和社会经济这些导致移民现象产生的因素时，“纽约宣言”也标志着对全球性合作的需求。

本章涉及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及其最新的发展状况，将重点关注跨国人口迁徙和全球层面的治理——也就是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相关，或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均可参与的治理。在这一背景下，治理包含下列实质性的规则和规范、决策程序以及执行与监督机制：

1. 约束性法律和规范、非约束性规范框架和国家间在多种移民事项上的合作协议；

2. 机构行为体，以及组织架构及其机制；

3. 程序，例如在全球层面的或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对话和倡议。[2]

下一节先讨论在全球层面进行移民治理的益处，并指出在推动全球移民治理进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随后再对主要规范和组织进行综述，这将为倒数第二节的讨论提供背景支持。倒数第二节强调三个主题：（1）有助于为全球层面的更大行动营造声势和信心的主要对话和倡议，尤其是 2016 年针对大规模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2016 年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以及就难民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磋商；（2）旨在为加强移民保护而建构规范框架的倡议，例如关于由灾害引起的跨境流离失所的“南森倡议”以及“危机国家移民倡议”；（3）把国际移民问题融入到对其它全球突出问题的应对机制中，诸如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结论部分将这三条线结合起来，讨论如何进一步促进全球移民治理。

1 Susan Martin，乔治敦大学赫茨贝格国际移民荣誉教授 Donald G. 和国际移民研究中心非驻留研究员 Sanjula Weerasinghe。

2 欲了解这一章节中全球治理及其他名词的定义，请查看附录 A。

# 全球移民治理的益处与障碍

提升全球移民治理有其益处。国家单方面的行动无法对跨国人口迁徙进行管理；事实上，应对移民动因和过程方面的国际合作更有利于移民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按照定义，国际移民涉及至少两个国家——来源国和目的国，并逐渐涉及许多其它国家——这些国家或为过境地点，或为争夺人才的竞争对手，或为反抗组织犯罪和与恐怖主义者斗争的合作者，也可能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侨汇流动的参与者。迁徙还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管理人口迁徙时，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与政府、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交错。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获得了正式批准（例如跨国公司、劳工招聘机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工会），另一部分则从事违法活动（例如偷渡移民和贩运人口）。此外，国际移民问题也和其它跨国问题相互交错，包括发展、贸易、安全、环境变化、冲突解决、降低灾难风险、人权和人道主义行动。但与这些跨国议题不同，在移民问题上，为应对当前和日益凸显的挑战而进行的全球治理，发展地仍较为落后。

面对全球合作和协调中的诸多问题，一个更有效的全球移民治理体系将有助于改善集体应对能力，并为互惠双赢提供机会。这个体系应能把各国联合起来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确定共同的目标和策略；为学习和理解创造空间；促进各国在治理体系、程序与倡议的设计和实施等活动中进行协调合作。不管在法律上有没有约束力，全球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指南）都可以成为衡量国家行为的标准。即使不被广泛认可或拥护，全球规范依然能影响国家行为。最后，全球移民治理的益处应以这一体系在实现移民权利和福利上发挥的作用大小作为判断依据。这就意味着，全球移民治理体系以及对它的任何改善应以承认和接受移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信念为基础。[3]

彼得 • 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曾在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特别代表的最后一场报告中警告全球移民治理不能通过命令实现：

> 进步有可能取决于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和那些负责政策实施的人的参与，并就广泛适用的共同的最低标准、原则和方法达成一致。后者使国家间坦诚、负责的合作和移民权利的保护（无论移民身处何地）成为可能。[4]

改善全球移民治理的努力由来已久。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作为应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现代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与劳工和难民迁徙有关的国际规范、规则、程序和组织的确立取得了重大进步。[5] 然而，全球移民治理仍处于碎片化状态：在一些领域有完善的国际法，而在另一些领域却存在重大的缺口，此外，政策实施中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也不充足。针对难民的法律和组织架构是最坚实最成熟的，这一点可以体现在联合国公约广泛的认可度和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上。同样，关于贩运人口和移民偷渡的国际条

3 欲了解关于“更好的”全球移民治理的基本观点，请参考文献如 Betts，2011; Martin，2014 和 2005；Betts and Kainz，2017；也可参看 Koser，2010。

4 SRSG，2017.

5 欲了解这些历史发展的详细过程，可参加，例如 Martin，2014。

约也得到相对广泛的认可。相比之下，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措施较少得到支持。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及其他类型移民均受国际人权核心措施的保护，但规范性的缺口仍然存在，特别是极易受伤害情况下的人（包括没有获得难民保护资格的人）进入他国辖区和居留方面的规范。[6]

建立一个更团结一致的全球移民体系受若干因素的阻碍。首先，一些国家关心这一体系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人们认为迁徙会通过对边界的完整性、经济增长、社会关系、人口、文化价值观以及在少数情况下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而对主权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单目的国能感受到，来源国和过境国也能感受到。例如，移民入迁在很多国家是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而公民身份决定着谁来决定国家的身份和未来。大规模或某些特定的移民迁出现象（例如高技能或领导性群体的迁出）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人们十分担忧会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失去主权，但人们也经常误解全球治理体系的性质。因此，承认各国管理移民的主权可能是任何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一个核心特征。即使各国同意人们自由跨越国界，但当它们认为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时，仍然有权恢复对边境的控制，正如 2015 年在一些欧盟国家发生的那样。各国自然更喜欢在“互惠”的基础上行事，而不是把主权让渡给在关键时刻可能有不同利益的其它国家。

第二，移民现象经常是国内政治中的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关于移民现象是个挑战还是个机遇，公众是有分歧的。[7] 利益集团倾向于采取更始终如一的立场，对于扩大或收缩移民入迁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但在对移民问题的公共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可能会相互抵消。此外，即使是那些把移民看成机会的人，也会担心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管理能力会日渐降低。[8]

第三项因素与第二项密切相关。有效的国际合作要求各国考虑他国利益，但当各国在移民所带来的利益方面仍存在内部矛盾的时候，很难顾及他国利益。当各国不清楚通过自己的移民政策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很难在国际论坛中和别国一起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很多国家可能是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国，也可能同时具有三种身份。在就不同议题进行讨论或就协议进行谈判时，它们的利益可能会不同。要达成共识则更加困难，因为在任何协议中各方都很难在是否大体上能从特定的移民政策获益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即使经济研究文献显示移民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9] 但在考虑人口迁徙的影响时，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考量，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在权衡如何管理人口流动或和别国达成协议时，社会、财政、文化、宗教和其它因素对各国政府同样重要。

第四，在建构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对称。相对于移民来源国，多数目的国是全球或地区霸主。这在南南和南北移民中都是事实。目的国通常更富裕并在战略和军事上也占统治地位。在谈判中，目的国拥有与其不相称的权力来定义签证的分配条款。即使是有着相似的经济政治体系的国家也难以达成政策共识。欧盟已为这类问题工作数十年，但仍然未达到所期望的政策一致性。同样，早在 1992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宣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应“以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资本和劳工、商品和服务、以及该地区的人民的自由移动的障碍为目的制定政策”[10]。《2005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促进人口迁徙的协议》的制定就是为了

6 这并不意味着在现有框架下的实践中不存在有意义的行动和执行缺口。

7 详见文献，如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2014。

8 同上。

9 World Bank，2006.

10 Article 5（2）（d），SADC，1992.

实现这个承诺，但该协议尚未生效。[11]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移民从根本上是与人有关的，这和针对资本和商品流动的全球体制形成对照。为了让全球移民治理体系惠及国家、移民和社会，被治理的移民必须参与到相关框架、制度和程序的发展和改善中。但是把移民整合进这样一个体系极其困难，特别是因为无法总能确定在某一特定的背景下谁能代表移民的利益。在“全球移民和发展论坛”上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一个由移民代表和侨民领导的机构组成的市民社会已形成。但是因为“全球移民和发展论坛”是一个协商而非决策机制，这些组织能否代表不同类型移民的利益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在确立关于政策制定的国际规范、程序和规则方面进展缓慢，且主要聚焦于在各国间和各国与其它伙伴间树立信心。二十年前，联合国秘书长询问各国是否要联合国组织一个讨论在移民管理上加强合作的国际会议。然而，各国强烈反对将这样的讨论放在全球层面上。秘书长总结道：

各国或次区域在国际移民上有着不同经历，这说明，如果要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考虑对全球国际移民体系有相似立场和考量的国家群的特殊情况。鉴于这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寻求针对地区和次区域的解决方法应该是权益之计。[12]

事实上，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地区和跨地区的协商进程的就在不断增多。在一些协商中，有一些仅涉及同是来源国或目的国的参与者，他们经历了相似的挑战，想法也类似。在另一些协商中，既有来源国，又有目的国。那些反对关于针对移民问题开展全球会议的声音在此后烟消云散了——2006 年和 2013 年关于国际移民和发展的高层对话和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就是很好的证据。正如许多支持者相信的那样，区域协商机制为下文将要讨论的正在形成的全球协商机制提供了建设性的经验。

## 规范和组织

全球移民治理的规范架构和组织架构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发展、演化和扩展，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现在，这一架构具备了相对具体的（尽管还是有些碎片化）针对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规范、规则和组织。本节将对法律（规范）架构和组织架构的主要方面进行综述。

### *法律和规范架构综述*

源于一个国家对领土和人口的管辖权，国际法承认单边国家行动在管理移民中的重大作用。各国在这个领域拥有广泛的权力，在决定入境许可、居留、驱逐和入籍的法律和政策方面具有管理权。

11 SADC，2005.

12 UN SG，1997.

但是，涉及国家权力行使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规范也对这种权威产生了限制。作为行使主权的一种形式，也是为了实现其利益和责任，各国签订了条约和协议并同意了限制它们移民管理权威的国际习惯法。[13] 这样一来，在国际法管辖下，实际上各国已经或明显或隐晦地认同了对于其移民管理权力的限制。

这意味着有关移民治理的法律和规范可以在国际习惯法和各种文书——包括多边条约、双边协议和国内法律——中找到。一些文书涉及移民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但考虑到移民问题的多面性，移民治理自然和许多其它领域的法律和规范有交集，并受它们的影响。尽管承认这些文书的实际影响，本节主要聚焦于与迫害和酷刑、偷渡和贩运、劳工和服务，以及家庭团聚有关的国际迁徙及迁徙方式的全球条约。[14]

国际人权法渗透并适用于上述每一个主题。在人权领域，通过思考和实践，各国已针对个人和群体（包括移民）承担了重大的义务。国际人权法强制各国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鉴于认同和接受维护人类尊严这一信念的根本意义，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1966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UDHR）和其它七部核心人权条约明确表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15] 由于人权是因为一个人作为人的身份而不是因其公民身份而存在，也应保证移民和其他类似的公民享受大部分的人权，无论他们具备何种迁入移民身份或其它特点。

尽管所有人权均适用于针对移民的国家行为，非歧视原则却是各国必须推行的最基本权利之一。[16] 该原则并非意味着禁止公民和移民之间有所区分。总的来说，如果允许存在某种区分，那么它必须是“合理和客观的”，而且总目标必须是在人权法的规定中“达到一个正当的目的”。[17] 至于迁徙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明确描述该权利的轮廓。处于国家领土内的合法人员有在领土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和选择住处的自由。每个人也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没有人可以被任意地剥夺进入自己国家的权利。当然，各国可以施加约束，但必须依据法律并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其它权利相一致，且这些约束对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和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必要的。

### *迫害，酷刑和战争*

最详尽的、地位最巩固的和被广泛采用的全球法和规范与迁徙迫害有关，特别是与能够满足难民法律定义的人有关。1951 年《有关难民身份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难民公约）为任何“确实害怕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见或某种社会群体身份而受到迫害，在国籍所在国之外，无法或因为害怕而不愿意利用国籍所在国的保护”的人建立一个替代性保护框架。[18] 在《难民公约》

13 欲了解国际习惯法的概念，请查看附录 A。欲了解关于习惯法的更多知识，请参看，如，Aleinikoff，2002。

14 这一小节并没有挖掘实施和执行方面的不足，虽然这些意义重大并可能以影响移民和国家利益的方式阻碍全球移民治理。

15 欲了解对于本章节提到的条约的生效情况，请参看附录 B。

16 参见，例如，Article 2 (1), ICCPR; Article 2(2), ICESCR。

17 UNHRC，1989.

18 Article 1A (2)，Refugee Convention.

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了难民问题的国际范围和性质以及在实现解决方案时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即使《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在别国寻求和享受免受迫害的庇护权，在《难民公约》下，各国没有相应的义务准许寻求庇护者入境，因为国际法没有明确表达一个非一国公民的人具有可以进入该国的普遍性权利。[19] 国家的主要责任同“不推回”（non-refoulement）相关，这是一项旨在反对因为上述特点而强制将移民遣返至生命和自由将受到威胁的地区的义务。[20] 但是，根据《难民公约》规定，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一个身负重罪的人将对该国或社会安全形成威胁，那么是可以将其遣返的。第 31 条明确要求各国避免将寻求庇护视为违反移民迁入规则而对难民进行强制性处罚。一旦寻求庇护者被确定为难民，各国有义务给予其一系列权利和福利；一些权利是自动赋予的，而另一些权利则是依据一些因素（比如附属于东道国的性质和持续时间）而逐渐得到的。[21]

各国日益增多的制止、防止和惩罚非正规入境的做法使得人们开始怀疑《难民公约》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其提供国际保护的初衷。尽管国际人权法扩大了《公约》中对于“难民”的定义，扩大了可能符合该定义的人员的范围，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证明当事人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上受到的迫害，这就意味着它不足以保护因战争或自然灾害而迁徙的人，因为这些人所受到的迫害往往与人权法所涵盖的五个方面无关。一些区域法律文件已在尝试通过扩大“难民”的定义范围来弥补这些不足，力图保障因在战争和国内动乱而迁徙至他国的人，而且最近也在针对因灾难和环境变化而跨境迁徙的人弥补一些规范上的缺口（关于后者请见下一节）。

根据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规定，那些越过国境线的酷刑受害者，不管他们是否有难民资格，也可以寻求庇护。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禁止将人员遣返回去接受酷刑，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把人员）遣返回去接受酷刑和其它形式的虐待。和《难民公约》不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明确包含且绝对反对把人员遣返到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此人在那里会受到酷刑的国家，[22] 这条禁令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有暗示。[23]

*贩卖和偷渡*

人口贩卖和偷渡是另一个被相对较多的国家所关注、且各国认为有必要采用国际性方法和制定全球法律和规范的主题。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CTOC）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也称“巴勒莫议定书”）认为 “人口贩卖”包含三个主要元素：行为；手段或方法；目的或动机。[24] 这意味着，按照定义，人口贩卖同时适用于境内和国际活动，虽然该议定书的范围局限于跨国犯罪且涉及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罪行。[25]

19 Article 14，UDHR。
20 Article 33 (1)，Refugee Convention.
21 Hathaway，2005.
22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条款 3（1）。
23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款 7； UNHRC，1992。
24 欲了解“贩运人口”的定义，请查看附录 A。
25 欲了解“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定义，请查看附录 A。

议定书制定了以充分尊重人权的方式对贩运受害者进行保护和帮助的目标，[26] 而且议定书明确说明了如何达成这一目标，[27] 尽管有人批评它们不足以满足受害者的利益和需要。[28] 议定书还要求各国考虑允许受害者暂时或永久待在其领土上的法律或其它措施；[29] 但是，受制于诸如源自难民或人权法的各国国际保护义务，受害者可能遭到遣返。[30]

在另一方面，作为非正规移民发生的主要手段，偷渡普遍被看成是一种商业交易而不是一种易受伤害的处境，虽然当前研究正对其复杂性提出更多见解。[31] 将偷渡看作商业行为可能部分缘于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移民偷渡的补充议定书》（“偷渡议定书”）给出的定义，该议定书把“移民偷渡”描述为偷渡移民的人和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移民之间的交易。[32] 和人口贩卖不同，移民偷渡要求具备跨越国境线以及移民未经授权进入一个其不是国民或不具有永久居住权的国家。该议定书的目的是防止和打击移民偷渡并促进各参与国之间为此目的进行合作，同时保护被偷渡的移民的权利。[33] 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偷渡移民者会因为偷渡受到刑事诉讼，而被偷渡的移民不受殃及。

*劳工和服务*

和涉及迫害、酷刑、贩运和偷渡的迁徙形成对比的是，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和规范在全球层次上的共识和合作较少。为了管理涉及劳工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各国主要采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也包括采用范围更广的自由迁徙框架。尽管如此，全球层面仍有一些相关的法律：1990 年《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ICRMW）， 国际劳工组织 1949 年《就业移民公约》（修正案）（97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以及 1975 年《有关在虐待条件下的迁徙和促进外来务工人员机会平等和待遇的公约》（143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虽然单独来看 ,这些文书未被广泛认可 ,但大约 86 个国家已批准了三个中的至少一个；这三项公约一起“构成了关于劳务移民的一个国际章程，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待遇的大多数问题提供了的一个全面框架。”[34]

1990 年《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旨在保证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世界人权宣言》和核心人权条约所承诺的权利。该公约涉及整个劳务移民进程，包括防止虐待；同时论及在正规和非正规处境中的移民 ,并包括实质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在非约束性的建议支持下，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约束性公约也涉及整个劳务移民过程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保护。97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提到了有序招募外来务工人员，并规定具有合法居住资格的移民在工作条件、工会会

26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2（b）。
27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6。
28 可见，如 Gallaher, 2010。
29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7。
30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8 和 14。
31 可见，如 McAuliffe and Laczko，2016。
32 偷渡议定书，条款 3。欲了解“偷渡移民”的定义，请看附录 A。
33 偷渡议定书，条款 2。
34 Cholewinski, 2012.

员资格和福利享受（包括劳资谈判、社会保障和就业税）方面与所在国国民享受同等待遇。[35] 国际劳工组织的 143 号公约对 97 号公约进行了补充，如，针对处于非常规处境中的移民设置了条款。另外，国际劳工组织的八个基本权利公约也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关，且这些公约涉及工作中的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普遍适用于一些国际劳工组织文书，诸如 2011 年《有关家政工作者的体面劳动的公约》（189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1994 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国际贸易法中使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主要文书。该协定含有间接支持贸易伙伴国间人员短期迁徙的条款，因而在全球层面上促进了国际流动性。GATS 适用于 164 个 WTO 成员国影响服务贸易的所有措施，除了在政府（在非商业的基础上）所提供的服务中。[36]GATS 包含一些规则和一个框架，帮助各国就向外国供应商开放特定服务领域做出具体承诺。GATS 提出四种可能的模式，供 WTO 成员国之间做服务贸易。在模式四之下，WTO 成员国可以承诺允许来自其它 WTO 成员国的自然人出于供应服务的目的在本国的存在。GATS 中的相关承诺服从于国家的移民迁入规定，因此 GATS 不要求 WTO 成员国授予外来务工人员在其领土上生活的权利。GATS 相关承诺在 WTO 是强制实行的。[37]

*家庭团聚*

关于和家庭团聚相关的国际迁徙没有明确的全球条约。事实上，国际文书中并不使用“家庭团聚”这个词语；总的来说，这个词用来描述尊重、保护和支持家庭的权利，包括生活在一起的能力。[38] 同样，虽然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在国际上并不存在关于家庭的一致定义。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写道的那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把该词语在广义上解释为体现“为在有关的社会中组成家庭而维系的所有人际关系。”[39] 在《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和 16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和 23 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0 条以及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CRC）和 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权利的公约》的规定中，均强调保护家庭团聚这一普世权利。在移民管理上，这些权利和国家权力机关互相作用，并对后者施加限制，尤其是在国家试图驱逐住在其领土内的一个家庭的非公民成员或拒绝一个试图和居住在领土内的家庭成员团聚的非公民入境的情况下。

*迁徙方式*

为了管理迁徙方式，国家利益在全球层面上已经趋于一致。在通过海路和航空途径迁徙的情况中，国际习惯法和关键的全球条约不仅与各国相关，还对它们施加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也对其它行为体施加义务。通过双边协定和其他机制，各国正加紧对于迁徙的预防和阻止。在这种环境下，这些条约和国际习惯法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正是由于国际法对于某些关键问题表述不清，才

35 同上。

36 服务贸易总协定，条款 1。

37 欲了解关于 GATS 和人员流动的更多知识，请参见，例如 WTO, n.d.

38 可见，如，Jastram， 2003。

39 Kalin and Kunzli, 2009, drawing on UNHRC, 1988 and 1990.

为这些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关于海路迁徙和国际航空运输的主要条约有：

-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 1979 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SAR）；
-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和
- 1944 年《国际民航公约》（又称“芝加哥公约”），尤其是其附件 9。

通过陆地或“绿色”边境的迁徙是移民入境的另一种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受单边或双边协议控制。

## *组织架构综述*

这一小节将突出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作用。在全球移民治理方面，这三个国际组织有最稳固的规范和（或）运作授权。下文也将涉及全球移民小组（GMG）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SRSG）的作用和使命。当然需要承认的是，众多其它机构行为体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 1951 年建立以来，国际移民组织在适应中取得了重大发展，从一个主要负责后勤的区域组织扩展为一个拥有一整套广泛得多的目标（特别是人道救援参与）的全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产生于联合国体系外的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进程，之前不叫这个名字，也不以公约为基础。国际移民组织在 2016 年 9 月作为一个相关组织加入了联合国体系。[40] 国际移民组织并没有详尽地规定或限制哪些人能够享有该机构依据其目的和功能而提供的帮助和服务。[41] 这使得国际移民组织在回应变化中的政治和人道需求时能具有探索性和灵活性。[42] 从 2001 年起，国际移民组织每年召开 “关于移民的国际对话”（IDM）。 该对话是一个重要的全球论坛，它使得利益相关者聚集一堂，讨论正在凸显的、复杂的移民治理主题。2015 年通过的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治理框架》与本章的主题尤其相关。通过有计划的、妥善管理的移民政策，该框架阐明了促进有序、安全、常规的和负责任的移民（和迁徙）的基本要素。该框架确立了三个原则：（1）对国际标准的坚持和实现移民权利；（2）通过使用证据和全政府动员方法制定政策；（3）同合作伙伴一起处理移民及其相关问题；以及三个目标：（1）提升移民和社会的经济社会福利；（2）有效应对各类危机中的人口迁徙问题；（3）保证移民以安全、有序和体面的方式进行。[43]

联合国难民署建立之初是一个临时性的区域法律保护组织。随着时间推移，为了应对日益变化的政治和移民图景和人道主义紧急事件，联合国难民署对其责任和运作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扩展。它目前是负责保护和援助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无国籍者的主要全球机制。[44] 根据《难民公约》，各国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以行使该机构的功能，尤其是为联合国难民署监督《难民公约》实施的特定责任提供便利。[45]

40 最初，IOM 名称为“欧洲移民迁徙临时性国际政府间委员会”（PICMME），随后改名为“欧洲移民国际政府间委员会”（ICEM）和“国际政府间移民委员会”（ICM）。目前的名字自 1989 年起使用。

41 Article 1(1), IOM, 2017.

42 Bardley, 2017.

43 IOM, 2015.

44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UNRWA）为处在于丹、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加沙地带和西海岸（包括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帮助和保护。详见，例如，UNRWA, n.d.

45 难民公约，条款 35。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是《难民公约》的“守护者”，促进和监督其实施和遵守。联合国难民署的职责和功能在它的 1950 年章程里有所提及；其核心职责是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并寻求永久性解决方案。[46] 依据联大（GA）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的指导和政策指示，章程还进一步规定了联合国难民署的职责和活动。[47] 此外，联合国难民署也召集组织了制定发展议程的全球磋商，主办了每年一次的关于难民保护关键挑战的“高级专员对话”，并出版《国际保护指南》以阐明如何实施《难民公约》。它的执行委员会由 101 个成员国组成，[48] 是“负责促进形成有关难民保护的国际标准的唯一全球性专业多边论坛。”[49]

国际劳工组织的运作角色范围比其它两个组织要窄得多，但它不断地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性作用。国际劳工组织自身发布的公约，以及以该组织承诺推动体面的工作为背景、于 2006 年通过的非约束性《劳工迁徙的多边框架》，代表着就国际劳工组织治理结构达成共识。该结构包含三方行动者：政府、雇主和工会。目标是“帮助各国实行更有效的劳工迁徙政策，包括权利、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保护”。[50] 在运作上，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促进对移民进行社会保护的项目，例如就允许福利可跟随人迁徙的协议进行协商；防止人口贩卖；改善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招聘工作；加强对移民的技能鉴定；支持移民重新融入社会；以及保护家政工作者。与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相比，移民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多项首要工作任务之一。[51]

除了这三个主要联合国机构，众多其它机构行为体和机制也与全球层面的移民治理有关。[52] 由于组织架构的复杂性，促使了全球移民小组的诞生，该小组将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它由 22 个实体组成，各机构和工作领导层定期开会。[53] 在它的职权范围中，全球移民小组已建立了全面的、连贯的组织回应机制，以应对国际迁徙问题，并保证使国际移民得到充分尊重，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对易受影响的移民提供保护。[54]

最后一个重要的行为体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移民特别代表。其办事处在 2006 年联合国高层对话形成过程中设立，旨在就促进和拥护联合国国际移民议程向秘书长提供支持和建议，并在涉及移民的问题上提供政策建议、协调联合国实体的参与。特别代表办事处引导国际社会努力加强国际合作，这些努力包括针对诸如受危机影响的移民等特定问题提出的倡议。特别代表办事处还将协调“纽约宣言”（见下一节）的实施。2017 年，路易斯·阿伯（Louise Arbour）接替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46 UNGA, 1950.

47 请见 UNGA，1950.《公约》、联大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明确指出哪些人可以定义为难民并接受 UNHCR 的帮助，以及在 UNHCR 负责范围内的其他类型“需要关注的人”。也可查看 UNHCR, 2013。

48 UNHCR, n.d.

49 Loescher, 2014.

50 ILO, 2006.

51 在国际劳工组织主页上的“主题”子页下，“劳工迁徙”是 40 多项主题中的一项。请见，例如 ILO, n.d.a。这一主题还是预算中的十项领域之一；请见，例如，ILO,n.d.b.

52 这其中包括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的人口小组。OHCHR 的责任之一是促进和保护所有人（包括移民）享有和实现人权，也需支持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包括移民特别报告员和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贩运特别报告员的工作。UN DESA 的责任之一是估算全球移民的存量，以支持联合国内部有关国际移民的对话和会议。

53 成员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与研究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联合国大学、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些知名的机构并不是成员，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气象组织。请见 GMG, n.d.a.

54 GMG, n.d.b.

# 改善全球治理的努力成果（2001-2016）

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正式的联合国机制以及非正式的、由国家领导的机制，已为改善全球移民治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此小节将简要审视三类活动：（1）促进各国之间建立信心和共识的对话和磋商过程；（2）改善移民保护的小型多边规范性倡议；（3）保证将移民包括在针对其它相关全球问题的决策过程中。

## *对话和磋商*

过去的二十年中，由于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多维性、跨国性、以及进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关于国际移民的全球层面的对话和磋商机制显著增加。表 1 列举了自 2001 年以来各国或者联合国在全球层面举行的主要对话和磋商，并概述了其主要成果或效果。这些对话和倡议在实质和过程层面上并非没有遭到批评。[55] 尽管这样，在全球层面进行移民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逐渐认识到全球讨论和行动的益处，过去的犹豫和分歧正逐渐被合作代替。

据对九个全球对话和倡议的最新分析，它们都包含下列几大主题：（1）通过应对流离失所和非正规移民的动因和后果使移民的消极方面最小化；（2）承认和加强移民现象来源国、目的国以及移民的积极作用；（3）保护移民的权利并保证他们的福利。[56] 虽然这些对话和倡议从不同角度、不同重视程度触及这些主题，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一些横跨不同对话和倡议的分主题上取得进步。一些比较紧要的分主题包括：关于为移民开放更多合法途径的建议、关注在临时途径之外的低技能劳工迁徙，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尤其是在《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中所提到的内容。[57]

55 请见，例如，Newland, 2005。

56 Bauloz, 2017. 这篇文章研究了“伯尔尼倡议”、国际移民组织每年召开的关于移民的国际对话、所谓的“道尔报告”、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全球移民小组、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等。关于他们的一些具体讨论也可见下表。

57 同上。

## 表 1. 21 世纪全球层面选定的对话和磋商

| 年份 | 对话或倡议 | 主要成果 |
|---|---|---|
| 2001-2004 | “伯尔尼倡议”，由瑞士发起并为国有。 | 移民管理的国际议程包括：（1）对于概括移民管理的共享设想和原则的共识；（2）根据各国实际和实践经验制定的关于一系列移民问题的有效实践。 |
| 2003-2005 |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由瑞士和瑞典担任联合主席国，还有 30 多个国家作为核心小组的一部分。[a] | 联通世界内的移民：行动的新指导，为了促进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对国际移民问题形成一致的回应而设计了一套框架。[b] |
| 2006 | “国际移民与发展的联合国高层对话”。 | 2006 年 12 月由联大一致通过的“关于国际移民与发展决议”（A/RES/61/208）。联大主席为高层对话 (A/61/515) 做总结时指出，要继续支持关于国际移民和发展的全球对话。 |
| 2007- 现在 | “移民与发展的全球论坛”。 | 由国家主导的、考虑到有更多更广泛的政府参与的、关于国际移民问题的磋商、对话与合作进程。在国家讨论之前进行市民社会讨论，国家与市民社会有共同空间进行互动。 |
| 2013 | “联合国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 | 经联大全体协商通过的宣言（A/RES/68/4），指明并再一次确认了在管理移民和保护移民权利中进行国际合作和行动的必要性。 |
| 2016 | “联合国针对大规模难民和移民迁徙的高层会议”。 | 首次关于难民和移民大规模迁徙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193 个）一致通过产生了“纽约宣言”。 |

a.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CIM）的成立源自 “道儿报告”（Doyle Report）中的建议。例如，见 GCIM，n.d.； 也可见 Doyle，2004。
b. 之前在本章讨论到的全球移民小组就是作为对此建议的回应而建立的。

2016 年的联合国高层会议特别值得关注。该峰会的举行正值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正受到重大难民和移民危机的影响。来自和经由中东和北非进入欧洲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让这个问题尤其受到关注。此外，大量来自中美洲的人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以及从孟加拉国和缅甸出发进入其它东南亚国家的人们也提升了此次峰会的全球关注度。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秘书长的报告同时聚焦于难民和移民，强调了大规模迁徙的趋势和原因，以及在途中和抵达后的需求。报告呼吁需要 “新的全球承诺来处理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迁徙，从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难民和移民的人权、安全和尊严的建议开始”。[58] 该报告还阐述了关注迁徙的原因和保护被迫迁徙的人的必要性，以及防止歧视和排挤难民和移民的必要性。[59] “纽约宣言”指出，虽然在治理难民和和治理移民方面，存在分别的法律框架，但难民和移民都拥有“同样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且他们也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并（例如在大规模迁徙的背景下）具有相似的易受伤害性。”[60] 在这个情况下，“纽约宣言”认可了一套同时适用于难民和移民的承诺，以及针对难民和移民的单独承诺。“纽约宣言”主张各国有“以人道、敏锐、有同情心、和以人为中心的方式管理难民和移民大规模迁徙的共同责任”，并通过国际合作做到这一点，同时承认各国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来应对。[61]

58 UNSG, 2016.
59 同上。
60 UNGA，2016.
61 同上。

关于难民，秘书长报告号召 “通过关于难民责任共担的全球契约，以及（设定）针对难民的全面应对计划的要素，以更可预见的和更公平的方式应对难民大规模迁徙……”。[62] 呼吁成员国采取契约方式，“承诺更公平地接收难民、分担责任”，并“迅速采取措施来保证……一些国家和区域不会仅仅因为距离难民来源国较近而承担更多责任”。[63] 责任分担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实现，比如“财政和实物支援、技术帮助、法律或政策措施、人员和安置点或其它接收难民的途径等等，在分担时要与难民的全球需求和各成员国不同能力相符合”。[64] 在“纽约宣言”中，各国承诺“为接纳和支持全球难民，更公平的分担负担和责任，并充分考虑各国的贡献及其不同的能力和资源。”[65] 尽管对很多难民倡议存在顾虑，宣言仍然强烈支持现有的难民保护规范框架。这些宣言本身就是重大的成就，因为“9 月 19 日峰会是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产生关于分担难民责任的集体承诺。”[66]“纽约宣言”赋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起草难民公约的主要任务，这份公约将被高级专员向联大递交的 2018 年度报告收录。[67]

关于移民，秘书长的报告要求“通过形成一份推动移民现象安全、合法和有序发展的全球契约，加强对移民的全球治理，该进程应立即启动并在今后的几年中实现。”[68] 秘书长并没有直接指示应该怎样撰写契约，而是坚持契约的通过必须 “由国家主导，详细阐述关于移民和人类迁徙的全面国际合作框架……并在 2018 年组织一次关于国际移民的政府间会议”。[69]“纽约宣言”确认了这个方法，而且事实上起草移民契约的责任牢牢掌握于各国手中。形成移民契约的进程由联大主席领导，他指定墨西哥和瑞士政府为共同促进者。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移民组织共同推动磋商，前者提供能力和支持，后者发挥技术和政策专长。[70] 全球移民契约的目的是“就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在会员国之间设立一系列原则、承诺和谅解。”[71]“纽约宣言”附录 II 列出了该契约将涉及的 24 个开放性问题，从最综合的（例如，就移民问题的各方面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合作）到最具体的（例如，通过法律途径促进更快、更便宜和更安全的汇款转账）问题都有。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最后报告中，萨瑟兰先生为该全球契约推荐了一个行动议程，该议程强调了五个有限政策：（1）管理和危机相关的迁徙并保护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2）为劳务和技能人口迁徙营造机会；（3）保证有序的移民，包括移民返乡；（4）促进对移民的包容和移民的发展性福利；（5）加强治理能力。其他报告强调了全球契约应该强化保护移民的人权框架。[72]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的另一个主要成果与全球移民治理的组织安排有关。“纽约宣言”支

62 UNSG, 2016. 关于难民的工作在 2016 年几个高层会议上提及过，这些会议致力于采取更广泛的合作来应对危机。包括 2016 年 2 月在伦敦举办的支持叙利亚和区域会议；2016 年 3 月在日内瓦举办的关于通过接受叙利亚移民分担全球责任的高层会议；以及与 2016 年 5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世界人权峰会。

63 UNSG，2016.

64 同上。

65 UNGA，2016.

66 Ferris, 2017.

67 UNGA, 2016.

68 UNSG, 2016.

69 同上。

70 UNGA, 2017a.

71 Guild and Grant, 2017.

72 同上。

持国际移民组织进入联合国体系，“它将更全面地帮助和保护移民，帮助各国处理移民问题，并促进各国在移民和相关的政策领域之间的协调性。”[73] 成员国表达了对国际移民组织作为一个相关组织加入联合国不会改变它的使命和行动模式的期望。[74] 总干事威廉·勒斯·斯温 (William Lacy Swing) 在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期间签署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间的协议的时候表示：

我们将继续保持为成员国定期提供全面的信息。我们将坚持采取最合算的经营模式：我们 10,000 名工作人员中有 97% 在海外，而在 15 亿的预算中，我们将使用不到 5000 万来进行组织运作。我们也将继续提供快捷的服务——与曾经允许我们就此协议达成共识一样具有公开性。[75]

但是从政策和联合国协调角度来看，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机构，国际移民组织应该能更好地在联合国体系内及成员国中为移民问题带来更大的关注、一致性和更有效的回应。

## *弥补规范性保护措施空白的小多边主义*

“纽约宣言”号召形成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磋商进程，来改善对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的保护和帮助，并积极考虑实施针对在自然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迁徙而提出的“南森倡议（Nansen Initiative）”以及“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 Initiative）”中的建议。这两个倡议的制定采用的是所谓的小多边方法，在规范制定中，该方法被用来弥补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无法通过新的公约或协议进行弥补的法律。[76] 国际移民的前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 (Peter Sutherland) 先生，强烈地表示这样的“国家自愿联合体同其它利益相关者合作，可以开始处理……优先考虑的事项，并就一个有效的国际移民架构在 2018 年及未来的样子，扩大共识。”[77]

### “南森倡议”议程：保护在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流离失所者

由国家主导的“南森倡议”是由挪威和瑞士提出的，其依据是一项广泛的共识，即需要弥补对跨境流离失所者进行保护的规范性缺口。“南森倡议”聚焦于对人的保护，但范围更大，包括处理国际团结合作问题的必要性。该倡议的目标在于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一个更连贯、更一致的方法，并帮助国际社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规范框架。[a]

作为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政府间磋商进程，该倡议就这类人的需求建立了一个全球实证数据库并建立需求共识，并于 2015 年 10 月在 109 个政府代表的支持下，发起了保护在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流离失所者的议程。

为了帮助各国和其它利益攸关者改善对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应对能力，该议程提炼了一个综合方法——一个不只针对跨境者保护、也为在来源国进行风险控制提供一系列处理办法。该议程在

73 UNGA, 2016.

74 依据联合国相关规定，“‘相关组织’这一术语应该作为默认表达。这一术语阐述了与联合国有合作协议的组织同联合国专门机构有很多共同之处”。请见，例如，United Nations System Chief Executives Board for Coordination, n.d..

75 IOM, n.d.

76 Naim，2009.

77 SRSG，2017.

国家、（次）区域和国际层面上集合了一套广泛而有效的实践经验，并强调三个优先领域：

（a）针对跨境流离失现象收集数据、提高认识；
（b）针对那些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者，加大人道主义保护措施的使用；以及
（c）通过以下措施，在来源国加强控制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风险：
（i）将人类迁徙融入到降低灾难风险和气候变化的适应战略和其它相关的发展进程中；
（ii）将促使有尊严的迁徙成为一种潜在的积极方式，以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iii）改善对有计划的重新安置措施的使用，将其作为针对灾难风险和流离失所现象的预防性或回应性措施；
（iv）在与灾难风险管理和境内流离失所相关的法律政策中确保灾难情况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得到回应。

欲了解更多关于“南森倡议”的信息，包括它的保护议程，详见：www.nansenintiative.org/. 关于“南森倡议”的后续措施，即“因灾难导致流离失所的平台（PDD）”，详见：http://disaterdisplacement.org/.

a. Kalin, 2012.

##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指南：保护遭遇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中的移民

作为小多边主义的重要举措，“危机国家移民倡议”也受到了赞誉。在 2014 年瑞士召开的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上，联合主席国美国和菲律宾共同发起这项倡议，以回应一系列对于行动的呼吁，包括 2013 年高层对话中前秘书长潘基文指出的需要解决处在冲突或自然灾害境况中的移民的困境。在危机中，移民可能在相关的准备和应对工作中被忽视（2011 年利比亚危机就是有力证明，80 万移民在几个月里离开国家），这是全球都关注的问题。这些呼吁也是源自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b]

在倡议发起后，一个专门工作小组着手开展广泛而又全面的证据收集和咨询程序。这个小组由联合主席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哥斯达黎加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欧盟委员会、国际移民组织（担任秘书）、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移民政策发展国际中心和乔治城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组成。“危机国家移民倡议”的主要结果，即关于保护来自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国家的移民的非约束性、自发性指南，于 2016 年 6 月在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总部发起。该指南为各国、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的行为体和民间团体提供冲突或自然灾害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移民保护了更好的办法。该文件包含 10 个基本的、相互交叉的规则（原则）；15 个按主题和按阶段组织的针对性建议（指南）；和一个非穷尽的说明性实践案例的精选（实践）。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及其指南，不管在过程还是结果上，都被认为是处理全球社会所关注问题的一个有用模式。和“南森倡议”一样，“危机国家移民倡议”在解决移民的需求并对其保护时的显著性和相关性在 2016 年的“纽约宣言”中得到了承认。

欲了解更多关于危机国家移民倡议的知识，详见：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

b. 欲了解更多危机对于非公民的影响，请见，例如 Weerasinge et al. 2015。

小多边主义是填补长期保护缺口的好方法。导致这一判断的理由有很多。马丁（Martin）通过从内部观察这些进程，发现各国将非正式、非约束性、有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看成是形成规范的实用方法。[78] 这些进程的临时性特点允许它们比经常受特定职责约束的正式机制能更有效地处理新出现的问题和关切。由于是国家在主导这些行动，因此行动的实施有其固有的支持者加以保证。而且，这些进程在区域范围和参与方面有高度的包容性。尽管建议的产生取决于各国领导，但也必须接受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审查。然而，只有在各国愿意同建议的原则和指南相一致地执行政策时，这些进程的实施才起作用。正如马丁总结道："增强对因冲突、自然灾难和其它危机而流离失所的人的保护这一问题需要得到持续的关注。从长远来看，只有当各国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愿意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对所有逃离威胁生命的处境的人提供保护，这些措施才是有效的。"[79] 拜茨（Betts）和坎兹（Kainz）也提示到，由于小多边主义可能对相似问题产生重叠的倡议，"这是全球移民治理向碎片化趋势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趋势可能对形成更普世的体系造成阻碍。[80]

正如"纽约宣言"所提到的，关于保护在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的新办法的磋商，将比"南森倡议"、"危机国家移民倡议"更好地考验小多边主义，主要因为易受伤害性是一个潜在地涵盖大量人口的无形概念。如何定义易受伤害处境将体现各国对保护不在现存的法律和框架中的人的承诺。易受伤害的移民可能包括在难民框架下没有受保护资格但在母国面临着一系列生命威胁的人，诸如来自社区、选举、帮派、垄断集团和恐怖主义暴力的威胁；核事故；流行病；灾难，等等。[81] 也可能包括陷入个人危机的移民，包括在去往最终目的地的途中在过境国受困的人。易受伤害性也可能缘于与生俱来的和受社会影响的特征，例如"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儿童且尤其是无人陪伴或是和家庭分离的儿童、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成员、暴力受害者、老人、残疾人、受任何偏见歧视的人、土著居民、人口贩卖受害者、在偷渡中受剥削和虐待的受害者。"[82] 相比之下，"南森倡议"和"危机国家移民倡议"针对的是需要保护的更具体的人群——分别为因灾难流离失所的人和危机国家中的非公民。

## 全球移民小组针对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中的移民制定的移民人权保护原则和指南

从 2016 年起，全球移民小组中的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工作组一直在引领建立一套基于实践指导的原则和指南，以保护在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中处于易受伤害境况中的移民。该框架是由多种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共同制定的，旨在指导各国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和义务，以尊重、保护和实现在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中处于易受伤害的处境、且可能未满足难民定义条件的人的权利。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的危险性质使一些移民处于特殊的易受伤害处境中，因而他们需要具体的保护措施进行干预。

如欲了解保护处于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的人权的原则和指南，详见：www.ohchr.org/EN/Issues/Migration/Pages/Draftsforcomment.aspx.

78 Martin, 2016.
79 同上。
80 Betts and Kainz, 2017.
81 欲了解人道主义危机和及其对非移民身份的人的影响，请见，例如，Martin, Weerasinghe and Taylor, 2014.
82 UNGA, 2016.

## *移民和其它全球治理领域*

这一节讨论的是各国是如何在联合国框架下将移民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口迁徙与全球治理领域进行（通常是初次）结合的。有四个主要的全球会议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强调了移民治理和其它跨国问题治理（包括发展、气候变化、降低灾难风险和城镇化）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虽然评判这些关于移民的承诺的实施是否取得巨大进步仍为时尚早，但把移民纳入这些议程是过去的两年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 *移民和发展*

随着移民被纳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国认识到上一次发展议程——《千年发展目标》对于移民和发展的关系的忽视，并对这一关系予以重视。该议程于 2015 年 9 月由联大通过，由终止贫穷、保护地球和促进和平繁荣的 17 个目标和 169 个目的组成。[83] 这个包容性的议程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把移民现象、迁徙和移民纳入了导言、其可持续发展目的和具体目标、以及最近的发展融资国际会议的协议结果——《2015 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移民不再被看作是发展不善的后果；导言和各种目的和目标承认移民现实的多面性以及它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能力。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了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措施。在 169 个目标中至少有 10 个直接提及移民现象、迁徙和移民。[84] 目标 10——“减少各国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呼吁目标 10.7 下涉及的国家“促进有序、安全、常规和负责任的迁徙和人口流动，包括通过实施有计划的和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85]

### *移民和气候变化*

2010 年，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会议通过了“坎昆适应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自那时起，人口迁徙一直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结果宣言的重要部分。该框架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就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移民和有计划的搬迁问题，适当地增进了解、协调和合作”。[86] 随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行动主要聚焦在流离失所问题上，略为提及移民，但并没有提及搬迁问题。[87]2012 年，缔约国会议指出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移民、流离失所和人类迁徙的模式”。[88]2015 年，由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其它机构组成的气候变化和人口迁徙顾问团在 21 方缔约国巴黎会议上建议缔约国会议设立一项机制，“作为分享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论坛，用来计划和实施气候适应

83 请见，例如，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n.d.。

84 UN DESA, 2015.

85 请见，例如，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d.a.;；UN DESA, 2015.

86 UNFCCC, 2011.

87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属和世界银行，通过它们的移民和发展知识伙伴（KNOMAD）项目，将移民和有计划的重新安置作为重要事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可以通过安全和合法的途径迁徙和重新安置时，且当移民的权利和未来福利受到保护时， 这些机制将对恢复力塑造和减轻气候变化引起的易受伤害性产生积极影响。欲了解更多，请见 Martin and Bergmann, 2017.

88 UNFCCC, 2012.

措施以避免流离失所、帮助自愿迁徙、并鼓励参与性的、有尊严的和有计划搬迁”。[89]“巴黎协议”改为承诺建立“一个特别小组来提出综合性建议，以防止、最小化和处理因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90] 该特别小组的职权范围表明，它将在国际层面上考虑方法并承认一些重大的跨境迁徙也会发生。它还负责确认法律、政策和制度上的挑战，识别在发展推介中的良好实践经验与教训。这些都将在 2018 年的缔约国会议中进行介绍。

*移民和降低灾难风险*

另一个全球性文件——《2015-2030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仙台框架”）也是利益相关者磋商与政府间谈判的成果。该框架于 2015 年在第三届“联合国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世界会议”上由 187 个国家通过，随后又被联合国大会批准。“仙台框架”中有多处明确提及人口迁徙问题，力求通过预防新的灾害风险、减少现存的灾难风险，大幅度降低灾难风险和损失。在其前言中，该框架承认流离失所是灾难最具毁灭性的影响之一，而移民是利益相关者。在“仙台框架”中多次提及不同形式的迁徙，这反映出流离失所者和移民都涵盖在“仙台框架”的全球目标里。该框架鼓励“采取措施和计划，处理灾难引起的人类迁徙以加强受影响人们的恢复力和东道社区的恢复力”。[91] 它指出“移民能够帮助社区和社会的进行恢复，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将有助于设计和实施降低灾难风险的行动。”[92] 此外，“仙台框架”还提及疏散和搬迁问题。[93] 例如关于后者，该框架呼吁各国发展公共政策将“居住在高灾害风险区的人”迁居。[94]

*移民和城镇化*

2016 年“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聚焦于“如何解决在规划和管理城市、乡镇和村庄中遇到的重要挑战，以使城市、乡镇和村庄发挥其可持续发展推动者的作用，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实施。”[95] 由于境内和国际移民是城市增长和活力的主要成因，因此，将移民写入效果文件中至关重要。在《新城市议程》中，根据“纽约宣言”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国承诺“通过有计划的、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保证安全、有序和常规的移民。”[96] 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地方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关于融合移民的政策上，让地方行为体参与政策的制定，是移民治理的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部分。

89 Advisory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Mobility, 2015.

90 UNFCCC,2015.

91 UNGA, 2015.

92 同上。

93 关于撤离，请见，例如，段落 33(h) 和 33(m)。

94 UNGA, 2015. 欲了解“计划性搬迁”，请见，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UNHCR, 2015 以及 Georgetown University, IOM 和 UNHCR, 2017。

95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d.b.

96 UNGA, 2017b.

# 结论

本章主要讨论了全球移民治理的现有架构，以及对该议题的现代审视和反思。在将来某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范式上的转变，为国际合作开启广泛的、全新的、不可预知的机会，这些机会将减少在全球化中移民机制同贸易与资本机制之间的差距，从而减少移民治理的碎片化。目前，我们的移民治理进展缓慢，但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正在树立信心，并表现出对于参与多边行动的更大的意愿，同时，它们也在为多种移民问题建立合作机制，以改善国际合作。

从许多方面来说，迄今在改善全球移民治理中取得的进步是令人瞩目的。在一个民族主义日增的时代，公众和政治家对于全球化多有抱怨，但各国仍然愿意在制定战略和措施方面进行合作，以应对全球议程中最大的跨国问题之一。尽管十年前，国家仍然不愿意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移民事务，但现在各国愿意就联合国的决议、宣言和全球契约进行磋商，并举行峰会，促使国际移民组织作为其移民机构加入联合国体系。

目前取得的进步是以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并持续到今天的区域程序、对话和磋商机制为基础的。这些倡议对于树立信心特别重要，它们使各国能够讨论共同的利益和关切点、确定方案和有效的措施、了解彼此的观点和需求、并在培训和技术援助活动中进行合作。具体来说，它们为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GFMD），奠定了基础，表明非正式协商进程可以长时间持续并为参与者提供利益。

应当承认，移民领域的全球治理仍然落后于对于国际资本和商品流动的管理体系。总的来说，移民治理缺乏强大的规范性基础来指导如何应对难民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活动。然而，即使是在这一缺陷上，也已经达成普遍共识，承认在管理人口跨境迁徙时必须将移民的权利和安全置于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已在“纽约宣言”中确认它们“将全力保护所有难民和移民的人权，不管他们是何身份；所有人都有权利”，以及各国的“回应将显示对国际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充分尊重。”[97] 同样突出的是，“纽约宣言”强调国际移民不仅仅会产生成本，也会带来收益，并且移民还能对他们的来源国和目的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从当前的以磋商为主、辅之以临时性行动的状态，逐渐转变为采取更多的联合行动，以最终缓和这一体系的碎片化状态。尽管迄今已经有了进步，但仍无法保证将形成一个更团结的体系，使得它们能够就跨境人口迁徙制定并实施双赢的决定——因为各国会权衡加强全球移民治理的实际好处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成本。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各国就不可能为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协调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或从共同的机会中获益。如本章所指出的，尝试解决复杂移民问题挑战的单边努力很可能会失败。对国际合作的支持者来说，其所面对的挑战是确定哪些问题和主题领域适合在全球层面的应对，而不是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应对。对于移民、社会和国家来说，全球治理何时是有效的回应？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协调如何形成互惠互利？移民和难民的全球契约为加强规范、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提供了机遇，为应对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契机。各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还未可知。

97 UNGA, 2016.

为应对这些问题和实施全球契约提供持续的组织支持将是个挑战。国际移民组织加入联合国体系为此带来了一些希望，但尚存在不足。筹款机制是阻碍国际移民组织在移民领域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的主要障碍。“项目化”的融资模式意味着国际移民组织必须聚焦项目运作，而没有资源可用于政策相关工作。然而，改善全球移民治理需要源源不断的不被捆绑在运作上的资金流，这种资金流将使国际移民组织能够加强自身在保护移民权利和安全上的作用，帮助各国和其它实体制定和实施政策，促进全世界人口的安全、有序、常规地迁徙。按照批评者的观点，另一个障碍是国际移民组织的活动没有规范性基础。[98] 在这个方面，联合国关于移民人权的特别调查报告员建议国际移民组织应担负起保证《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的责任，如同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公约所负有的责任。[99] 在先前的著作中，本章的一位合著者建议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修改章程 ,明确该组织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在国际法规定下保护移民的权利。[100]

在针对移民问题有不同职责、项目和利益的机构中进行协调，将是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全球移民小组在这方面可以充当重要的角色，但不管是在人员上还是在资金上，它都无法应对眼前的挑战。许多全球移民小组成员的关注点狭窄且用于处理移民问题的资源有限（有时只有一两个员工），而有些成员则几乎没有田野工作实践。由于小组采取轮值主席制，当轮到某国接任主席时，难以在广泛的移民问题范围内提供有效的领导。2014 年，担任全球移民小组主席的组织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一整年，而之前的主席任期只有半年。这为实现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但是这对在移民问题上角色和利益都很边缘化的组织增添了更多压力。积极的一面是，全球移民小组对涉及危机相关的移民和海上援救进行了盘点行动。这些行动明确了联合国内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优势和弱点，并向机构领导就需要改善的优先事项提供了建议。但是，要从盘点行动转向协调行动，就要求全球移民小组更多的参与，例如监督建议的实施。加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的作用也将是个挑战。该办事处的人员配置非常有限 ,且主要依靠来自私人基金会和援助国政府的外来资金来源。[101]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GFMD），作为一项关于国际移民的、由国家主导的主要全球倡议，已经运行了近第 11 年，它也可能需要努力克服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成立之初是一个临时性的、由国家主导的、处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非约束性的讨论和协商场所。在成立之初的十年，它帮助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官员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主要起到建立信任的作用。然而，它能否继续成功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今后几年的议程。即将离职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建议移民与发展论坛把注意力集中在实施最近在峰会所做出的各种国际承诺上，尤其是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上的承诺。其他评论者建议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加强它的工作小组、加强在年度会议休会期间的更积极地参与事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同市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互动。[102]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业务机制的形成和市民社会在该论坛会议中持续、积极的参与是该论坛进步的标志，所以应该加强培养。

国际移民是一个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系统的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从第一

98 参见，例如，Guild 和 Grant 2007。

99 参见 ,例如,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2013: “IOM 需要被赋予法律保护实名 ,并受国际人权条约( 包括 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指导，此外，联合国宪章中所涉及的原则应该被融入到 IOM 章程中。”

100 Martin, 2014.

101 目前，重要的资源来自于麦克阿瑟基金会，但该基金会近期取消了其在国际移民方面的资助。

102 Martin，2014。

次高层对话到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的成立，各国展示了探索在联合国内外强化合作的意愿。同时，负责帮助各国管理人口迁徙并保护他们的权利的国际组织也显示出在相互合作以及与各国合作方面的更大意愿。国际移民组织进入联合国大家庭也是这种合作意愿的最新表现。虽然如此，如果各国将目光转向内部，排外情绪没有得到处理，那么全球移民治理将有很多障碍，且障碍将不断增多。抗击这些负面因素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103] 目前，磋商、合作和建立信任正在循序渐进的进行，这说明进步是可以产生的，虽然是逐渐产生的。这仍然是通向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有希望的道路。

103 “纽约宣言”谴责排外现象（“我们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和其他相关的对于难民和移民的不容忍、将基于宗教和信仰的刻板印象强加给移民和难民等的行动和示威运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反对排外上的全球行动：UNGA, 2016。

MARIE MCAULIFFE
ALEXANDRA M GOOSSENS
ANITA SENGUPTA

# 6 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1]

## 引言

在一个信息过载和线上联通的时代，人们会感觉到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联系紧密。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活动就能体现这种现代的跨国主义。例如，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通过写电子邮件可以联系住在安全地区的亲戚，告知他们有关逃离的消息并给予安慰。赚到的辛苦钱被汇回数千公里之外的家，买到了急需的食物，并支持下一代获得教育的机会。这种日常活动——发邮件、汇款、智能电话视讯会议、下载应用程序——近几年成了许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信息、地理位置、资金、商品、人以及观念的获取或了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仅依靠指尖就获得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获取的难易程度和联通程度上，社群之间（内）、人与人之间在还是大有差别。

与此同时，目前的公共和政治话语提到了反全球化情绪的滋长，提到了社群和人们感到跟不上变化，还提到了在一些社会中调和全球发展、人类进步和公众期待变得日渐困难。在世界很多地方，日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所带来的上述挑战就变得特别重要，它们与移民的迁入和迁出高度相关，直接影响应如何分析、讨论或争论、以及回应移民问题。除了最近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基调的变化，关于这一话题的含义、影响、利弊，还存在丰富、多样的著作。[2]

### 何为全球化？

全球化是导致全球联通的范围、密集度、速度和影响逐渐扩大的一整套过程。其成因为：

- 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延伸跨越了政治前沿、地区和大洲；
- 贸易、投资、金融、移民、文化等的流动的愈发密集和强化；
- 全球互动和过程的加快；
- 全球互动的影响日益加深，例如，发生在远方的事件能在别处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模糊了国内事务和全球事务的界限；

*来源*：Held 等，1999

1 本章作者是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政策研究部部长 Marie McAuliffe；来自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研究生院的 Alexandra M. Goossens；和“国际事务中的亚洲”的主任 Anita Sengupta，她同时也担任加尔各答研究小组的高级研究员和协调员。

2 Lechner 和 Boli, 2015；Steger，Battersby 和 Siracusa，2014。

移民过程深受全球化的影响。毕竟，全球化在根本上牵涉到跨越多个地点、超越多个民族国家的互动。这些互动涉及观念、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还涉及虚拟和有形的跨越边界相互联系的人。国际移民和更广泛联通的复杂过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这出于多种原因。首先，更好地理解这个关系将有助于了解影响人口迁徙的全球动态，包括那些面临流离失所和（或）非正常迁徙风险的人口。第二，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政策在影响和塑造移民趋势和方式中的作用和局限。第三，更广泛的联通可能对不安全、非正规移民管理带来重大挑战。第四，运输和电信技术的最新发展预示着巨变，这似乎是一个更长期的且不可能改变航向的趋势的一部分。对跨国联通、流动性和移民的研究，目前是有意义的，在未来也会继续如此。

本章探讨的是全球化的一个特定方面：跨国联通。我们将其定义为人们之间实体的和虚拟的联通。我们将特别关注随着时间推移，在运输和电信技术上发生的改变，也将关注国际移民，而不是境内移民。第二节将简要概述全球运输和电信技术的主要进步。第三节讨论的是跨国联通如何影响移民过程。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将简要讨论对于移民治理的意义。

## 运输和电信技术的演变

国际迁徙的显著增长受突飞猛进的运输环节和电信技术的驱动。始于 19 世纪的运输革命（从帆船到蒸汽机和铁路）大大增加了国际人口迁徙的密集度和速度，[3] 在该世纪下半叶，移民迁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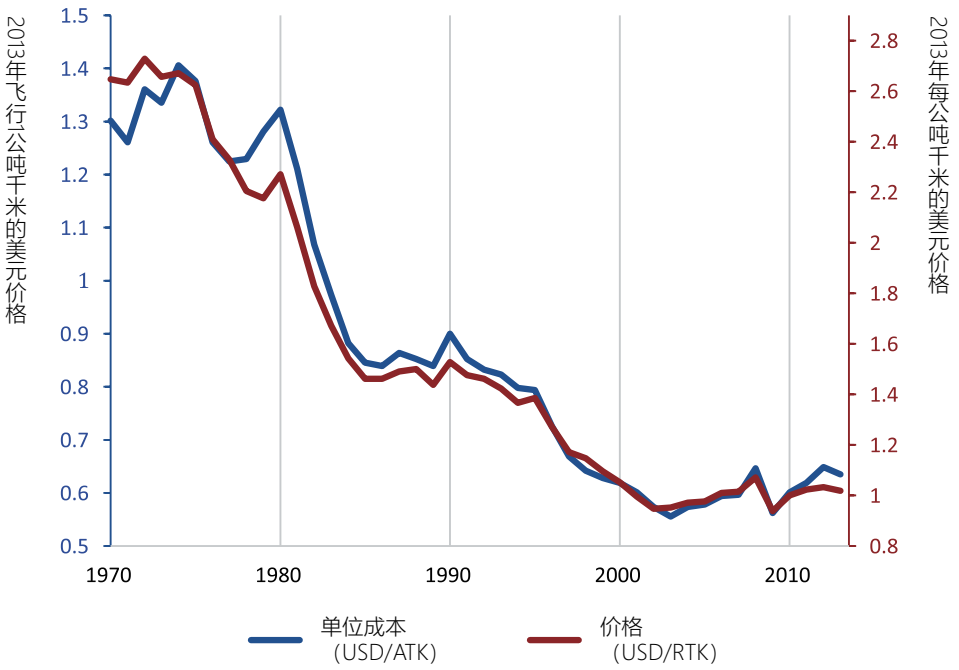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飞机制造业中迅速的技术改变（例如喷气发动机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空前繁荣。这些进步使得飞机能以低得多的成本抵达遥远的目的地，因此人口和商品的跨境流动也发生了巨大改变。[4] 有了空中运输、长途和实时电信，全球化使得跨国群体兴旺起来。海运运费、越洋电话、空中运输和卫星费用成本的降低导致了“距离的死亡”。[5] 最新数据表明旅行费用持续下降（见图 1），而国际游客到达数则不断增长（见图 2）。虽然游客到达仅仅是国际迁徙的一个方面，但该数据显示出全球迁徙有增无减的迹象。

3 Lucassen，Lucassen 和 Manning, 2010.

4 Hoovestal，2013.

5 Cairncross，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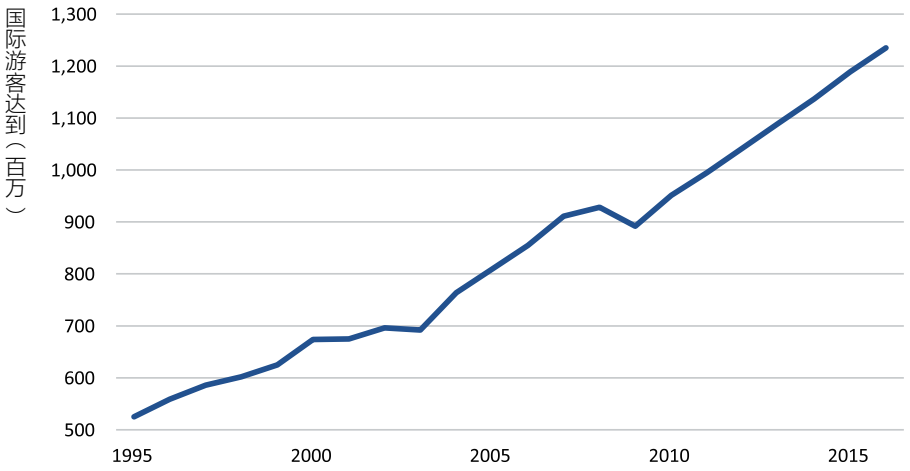
## 图 1. 空中旅行的单位成本和价格，已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来源：* IATA/Tourism Economics Air Passenger Forecasts（2014）；可从 www.iata.org/pax-forcast. 得到。

*注：* RTK= 收入公吨千米
ATK= 可获得的公吨千米

## 图 2. 国际游客到达（百万），1995-2016




*来源*：UNTWO，2017。

重要的是，不能就此推断地理和空间的约束已经消失。它们对于人口迁徙仍然非常重要，包

括受到各种限制的人们的迁徙，例如逃离武装冲突、逃难的人们的越境迁徙以及为了赴异地改善生活而踏上危险的海上旅程的人们。这一点可以被全球出生在外国的居民数量这一指标所证明，该指标表明迁徙至国外的人更可能留在临近地区而不是往更远处迁徙（如第 3 章关于移民区域规模的讨论）。此外，长期以来，地理上的接近被认为是构成移民模式和过程的中心因素，这一点早在莱文斯坦（Ravenstein）的“移民法则”中就有提及。[6] 然而，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克服距离问题。被许多国家管理的跨境迁徙数量在持续增长。在美国，2016 年跨境迁徙人数约有多达 390,000,000 人次，[7] 而 1980 年为 225,000,000 人次。[8] 在澳大利亚，1996-97 年度记录了 14,500,000 人次跨境迁徙，而 2011-12 年度则达到 31,600,000 人次。[9] 目前的估计是，到 2020 年，澳大利亚每年将有 50,000,000 人次跨境迁徙。[10] 在日本，某些选定的跨境迁徙数据 [11] 显示从 1985 年的 7,200,000 人次增长到 2015 年的约 36,000,000 人次。[12]

最近几十年，电信技术的进步也非常显著，尤其是过去十年（见“电信技术进步大事记”文本框），虽然进步的速度时快时慢。移动电话的使用率似乎增长极快，见图 3。全球因特网使用率也飞速增长，虽然分布并不均匀。在世界各地存在一个数字性别差距，即男性的因特网使用率比女性高；从全球来看，男性的使用率为 51%，而女性为 44.9%。[13] 事实上，用户率的增加这一个指标并不一定反映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新技术。阶级、性别和种族也是造成技术使用差异的因素。[14] 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个数字鸿沟，发达国家有 81% 的人使用因特网，而发展中国家为 40%，最不发达国家仅仅为 15.6%。[15] 但是，发展中国家移动宽带的用户数在快速增长。例如，缅甸在最近开放国家电信网络之后，其移动电话用户在 2016 年第三季度猛增了四百万。[16]

## 电信技术进步大事记

| | |
|---|---|
| 1876 | 电话 |
| 19 世纪 90 年代 | 第一次无线电波实验 |
| 20 世纪 20 年代 | 第一次电视传送 |
| 20 世纪 30 年代 | 现代计算机的发明 |
| 20 世纪 60 年代 | 电子邮件投入使用 |
| 20 世纪 80 年代 | 移动电话和 GPS 供公众使用 |
| 1993 | 因特网在公共领域得到分享 |
| 1994 | 博客和社交网络开始出现 |

2006 年不存在的移动应用、社交网络和移动操作系统包括：WhatsApp，Uber，Airbnb，Android，Instagram，Snapchat，Tumblr，WeChat 和 Facebook Messenger

6 Ravenstein，1885.

7 US Customs 和 Border Protection，2017。

8 White House，1998.

9 ABS，2007; Australian DIBP，2012.

10 Australian DIBP, 2012.

11 在日本，某些选定的迁徙数据包括进入日本的外国人数量和离开日本的外国人数量。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可以提供关于某些选定的跨境迁徙的全球估计。

12 Statistics Bureau，2016.

13 ITU，2016.

14 Panagakos 和 Horst,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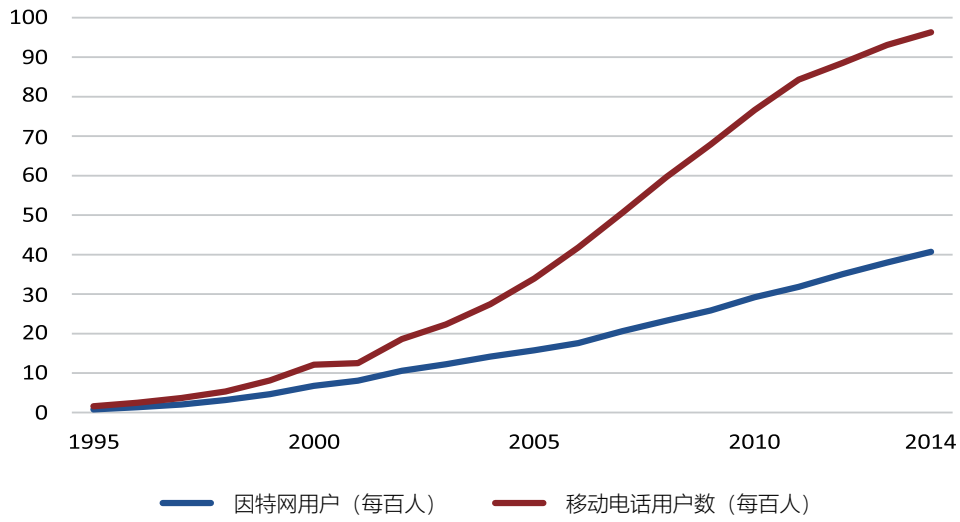
15 ITU，2016.

16 Ericsson，2016.

| | |
|---|---|
| 2001 | 3G 智能电话开始出现 |
| 2004 | 脸书（Facebook）的启用 |
| 2006 | 推特（Twitter）的启用 |
| 2007 | 云计算——第一个苹果手机出现 |
| 2010 | 第一个苹果平板电脑出现（iPad），平板电脑的使用快速发展 |
| 2017 | 全世界 1970 亿次移动应用（App）下载，预计 2021 年增长到 3529 亿次。每天大约产生 70,000 个新博客，近乎每秒一个。 |

该大事记是在多个文献来源基础上整理而得，包括国会图书馆，Statista 网站和《大英百科全书》。

## 图 3. 全球因特网和移动电话使用




*来源：*从取自 2015 年 10 月 21 日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的数据整理而得（见：www.data.worldbank.org）。与此图类似的一个版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在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布（见：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snapshot-6-rorschach-tests-international-order）

在全球范围内，智能手机[17]的用户数现在已经超过了普通手机，占所有手机用户的 55%。[18] 随着智能手机和宽带接通的增长，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在增长——因为智能手机现在常常是人们初次接触因特网的平台。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不要高估新通信技术的影响。虽然因特网通常被作为全球通信媒介，在许多地方，它的使用率仍然较低。精确测量因特网的影响是困难的。[19]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即使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因特网接入上也有极大飞跃。以阿富汗为例，据估计，移动电话用户从 2005 年的 1,200,000 人（4.8%）增长到

17 智能手机使用的是第三代（3G）及以上版本的技术，是一种具有内置计算机、操作系统、因特网接口和运作应用“App”能力的移动电话。普通移动电话使用的是第二代（2G）技术，没有因特网接口。

18 Ericsson，2016.

19 Rabogoshvili，2012.

2015 年的近 20,000,000 人（61.6%）。[20]

一些社群和个人面临着仅存在虚拟联通但实体无法移动的反常现象。达达阿布难民营的博客作者和活动家布朗基·阿卜杜拉希（Brownkey Abdullahi）分享了她关于全球化的局限性的观点（见以下文本框）。虽然布朗基·阿卜杜拉希和全球虚拟地联通着，但在实体上她仍然是孤立的。

### 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全球化

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难民营出生和长大的人，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个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全球化。

达达阿布在 1992 年开放，原打算为 90, 000 人提供暂时的避难所，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难民营。今天，大约有五十万人以它为家。和这个难民营中的许多人一样，我出生在这里，这也是我唯一了解的地方。我从没离开过肯尼亚这个我出生、长大和受教育的国家，但我并没有权利成为公民。

幸亏广播电台和零星的互联网接入，使得我们仍然可以和这个不能亲身经历的世界相联。我们跟上了全球发展，也多亏社交媒体，使我现在能通过移动电话上断断续续的互联网连接结识（仅仅是虚拟地）外国人。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全球化的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尝到一点甜头，但这些好处产生的影响却非同小可。我已经连续几年在我的营地里开展反对性别暴力和女性生殖器割除的运动。我们所拥有的这么点互联网接入，就使我能够通过我的博客和广大国际观众分享信息。

*来源：*节选自布朗基·阿卜杜拉希（Brownkey Abdullahi）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一篇文章（Abdullahi，2016）.

## 跨国联通和移民现象中的行为体

虽然运输和电信技术的革新提高了互联互通并方便了移动，但技术并不总能使移民现象更普遍，即使技术可能改变了潜在的移民过程。本小节探究愈发紧密的互联互通是如何影响移民过程及其中的行为体的。

目前，国际移民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大致表明移民数量在不断增长，虽然在世界人口大增长的环境下这一比例仍然较小——由 1970 年的 2.2% 上升到 2015 年的 3.3%。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估计，2015 年 2.44 亿人居住在出生国外的国家，几乎比 1990 年（1.53 亿）多出 1 亿，是 1970 年估计数量（0.84 亿）的三倍多。然而，移民模式并不统一，目前国际移民中的三分之二居

20 ITU/World Bank，2017.

住在高收入国家。[21]

对关于移民的主要著作（例如《移民时代》、[22]《全球移民治理》、[23]《全球移民：旧的设想，新的动态》[24] 和《劳特利奇国际移民研究手册》[25]）的显示，虽然这些著作都承认跨国联通的增长，但对联通中改变最快的方面——电信——所起的作用的讨论并不多。所以，我们将在这一节探究跨国联通如何影响移民过程。对此，我们将聚焦于移民现象中的三类主要行为体——移民、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并将特别参考地理因素（来源过、跨境旅程和目的国）。我们的讨论将提供一些例子，阐释跨国联通是如何影响不同行为体的。

## *跨国联通和移民*

在来源国，移民和他们的社群正以多种方式经历着日益紧密的联通，联通的方式包括社会接触、汇款流动、移民为了参加重大的假日和事件而回到来源国等。影响可能是多方面、多样化的，这取决于来源国的情况（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以及移民自身的处境。近期的研究，比如那些关注经济决定因素和移民影响的研究，发现“通过改进关于东道国的信息流，在 1995 和 2009 年之间宽带对移民迁徙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信息流影响着来源国移民的决定”。[26] 但是，这需要在更广的（结构性）环境中审视，因为广泛的联通中增加的信息并不一定会影响移民的决定、带来更多的移民。

关于移民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和分析有很多，它们识别出了奠定移民方式和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那些涉及经济和贸易、社会和文化联系、人口结构及其变化、安全和保护，以及地理和接近性的因素。[27] 其中的一类研究关注的是移民的“成熟”（maturity）和人类发展之间关系。这类研究表明，在某种意义上，高收入这一因素能够促成迁出移民数量的增长，因此高收入能够成为一项稳定的影响因素，并减少出境移民数量。换言之，随着人均 GDP 增长，迁出移民数在起初会增长，随后会减少。如图 4 所述，[28] 这个现象被一些作者称为“人口流动性的变迁”（mobility transition）或“迁徙驼峰”（migration hump）。[29] 如 Held 等所强调的，移民和发展的复杂过程（包括需依靠更大程度的联通而实现的转型加速）需要在更广的全球化动态背景下来审视。[30]

21 UN DESA，2015.

22 Castles，de Haas 和 Miller, 2014。

23 Betts，2011.

24 Acosta Arcarazo 和 Wiesbrock，2015。

25 Gold 和 Nawyn，2013。

26 Unver，2015. 该研究是以迁徙至 OECD 国家的信息为基础：“主要的目的国是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对于 OECD 国家和非 OECD 来源国的选择是以迁徙规模为基础的，即最少为 1000 人”（Unver，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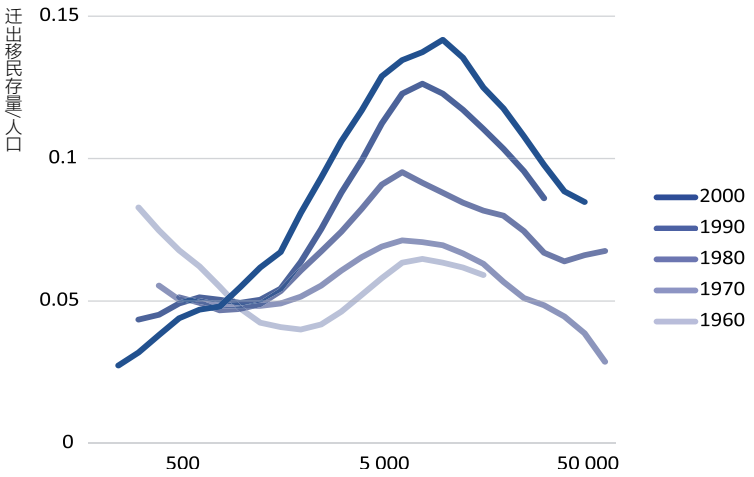
27 请见，例如，关于累计因果（Massey，1990）、新古典经济学（Todaro，1989），世界体系理论（Portes 和 Walton, 1981）、社会资本理论（Massey，1987）、关于劳动力迁徙的新经济学（Stark 和 Bloom，1985）和社会网路理论（Boyd，1989）。

28 Clemens，2014.

29 Zelinsky，1971；Clemens，2014.

30 Held 等，1999。

## 图 4. 人口流动性的变迁




*来源：*改编自 Clemens，2014：7-8。

*注：*Clemens 发现，总体更高的经济发展（更高收入）水平和迁出移民的减少相关。关于对数据分析的更多讨论详见 Clemens（2014）。

移民和他们的家庭和社群之间频繁的电信联系——取决于来源国内部的迁徙和发展上的互动——能够影响（但不一定增加）留守的家庭成员参与移民。更多的社会和财务联系可能对许多家庭和社群起到稳定的效果，否则他们也会处于移民的压力之下。例如，斯里兰卡在过去 30 年中汇款流入稳步上涨，从 1979 年占 GDP 的 1.9%（6000 万美元）到占 2015 年 GDP 的 8.7%（70 亿美元）。[31] 侨汇在帮助家庭满足基本需要中起到了重大的稳定作用，并提高了家庭应对负面冲击（诸如 2004 年亚洲海啸）的能力，还使他们能够购置土地，让家庭摆脱债务，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并增大教育和健康投资。[32]

同信息流类似，资金转移方面的联通性的也有增强和扩大，这能起到支持或稳定人口的作用。重要的是，来源国的一些人更易受剥削性汇款做法的伤害，这与他们在地理上和正式的、可靠的银行系统隔绝有关。然而，移动支付技术使得改善汇款服务的障碍消散，并使汇款的成本得以下降。[33]

移动支付在近年来异军突起，主要缘于“先进移动通信技术和将该技术应用于移动支付数据服务的能力的结合”。[34] 在对移动支付和技术趋势的最新评论中，麻省理工大学研究者谢瑞尔（Shrier）、卡纳勒（Canale）和彭特兰（Pentland）利用一系列数据发现：

> 截至 2012 年，在没有金融账户的 25 亿人中，17 亿人有移动电话。截至 2012 年，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移动支付账户比传统的银行账户更多。[35]

31 World Bank，2017.
32 Sri Lanka Ministry of Foreign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Welfare，2013.
33 Shrier，Canale 和 Pentland，2016。
34 Tobbin 和 Kuwornu，2011。
35 Shrier，Canae 和 Pentland，2016。

电信技术也被证明是使移民在过境国能够实时接触信息的一个重要因素。[36] 例如，2015 年，从土耳其到欧洲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凸显了智能电话技术在难民和其他移民的迁徙以及偷运者运作中的应用（见文本框中关于移民现象的“应用软件化”）。实时联通使得信息能够被获取并被核实，尤其在移民可能遭遇路途危险或依靠偷运者的地方。

## 移民现象的“应用软件化”：2015 年地中海海上移民迁徙的经验

二战后，欧洲出现了最大的难民危机，此后的近 70 年中，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那场危机中，“难民公约”得以形成，迁徙至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以外的难民由各国（包括在联合国之下）管制。联合国负责协调难民遣送、返回和并将难民重新安置在第三国。若用今天的说法，迁徙是缓慢的、受到高度监管的而且非常具有选择性。难民的信息基本上被各国垄断，迁徙到其它区域的机会仅限于正式的渠道。这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大约 70 年过去了，冲突和迫害可能仍然在令人沮丧和悲惨地发生着，但是环境已发生变化。移民现象的“应用软件化”已开始流行，以特定而重要的方式使得移民过程绝然不同。首先，移动电话技术成为常态，这把移民和亲戚朋友、人道组织和偷渡（移民）者联系在一起，但也同样把偷运者和中介、腐败官员及在分散在各地的偷渡者同道联系起来。[a] 电信革命使得无监管的迁徙途径得以产生，这些途径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是既快捷又能承受得起的。帮助人们旅行至欧洲或通过欧洲的手机应用有很多。例如，一对匈牙利夫妇建立了 InfoAid 来提供关于如何过境的实时建议。还有一些手机应用可以帮助难民融入当地生活，例如 Refugermany 和 Arriving in Berlin。联通性使得很多人可以迁徙至安全区域，但是这种途径通常极为危险，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

第二，几十年来，处在过境国和东道国（如土耳其）的大量难民和其他类型移民第一次不必坐等重新安置或遣返。他们能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多半因为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信息、建议和金钱可以迅速地被分享，地理的约束也更容易被克服。2015 年经东地中海到达希腊的迁徙人数突然剧增，正是由于强大的联通性。

电信帮助塑造了欧洲移民迁徙的规模、构成、速度和地理状态。对迁移和行动的实时报道，使得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等等）能够获得关于旅行到哪里、何时和如何旅行的有用信息。比起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强烈偏爱并不是偶然的，是移民自行增加信息分享的结果。在签证获取机会有限的情况下，难民和非难民即使利用无监管庇护途径，也会面临淘汰的风险。[b]

a. Khalaf，2016.
b. McAuliffe 和 Koser, 2015。

*来源：*节选自一篇在 2016 年 1 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策论坛上首次出现的文章（McAuliffe,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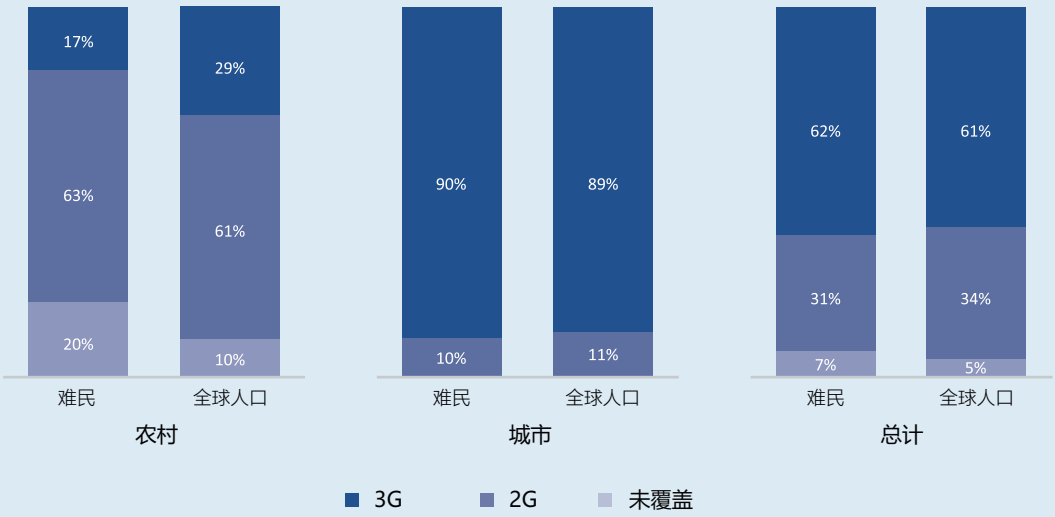
36 Kuschminder 和 Koser，2017；McAuliffe，2013。

在目的国，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移民能够“保持亲近型的远距离关系，并每天激活这种关系”。[37] 通过压缩时间和距离，电话、语音和视频聊天、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使移民能够和家人、亲戚保持联系，不管他们在哪里，都可以冲破国境的限制，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一项最新的研究探究了来自加拿大跨国家庭的韩国年轻人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移动平台。[38] 该研究发现，他们使用全球平台（尤其是 Facebook）来扩大他们在加拿大的同龄人社交网络。同时，他们还使用基于韩国的移动平台 Kakao Talk 来保持他们和韩国和 / 或加拿大的同民族社群的联系。社会联通对流离失所者（包括难民）也很重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目前在开展一个项目，通过加强互联网和移动联通，改善难民的福利（见以下文本框）。

## 难民的联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进行了一项关于难民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在技术条件存在的前提下）的全球评估，为一份新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全球难民联通战略的形成提供信息。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虽然 7% 的难民社区缺乏互联网接入和移动通信所必需的数字基础设施，但市区的大多数难民住在有 2G 或 3G 移动覆盖的地方。而对于住在农村的人，形势要糟得多，20% 住在没有联通的地区。




*来源*：节选自 UNHCR,2017, 于 2017 年 4 月 5 日获取。

虽然联通能通过使移民和家人、亲戚保持联系来使他们获益，更大的跨国联通，尤其是通过移动电话达成的联通，也会加大对目的国移民向家中寄钱的压力和要求。[39] 这些发现能够作为长久的

37 Diminescu，2008。
38 Yoon，2016。
39 Hunter，2015。

证据证明移民面临着相当大的汇款压力。[40] 在研究中，亨特（Hunter）发现汇款的压力因为移动电话的使用加放大了。[41]

## *跨国联通和非国家行为体*

如我们所看到的，技术的进步、联通的扩大明显改变了移民和移民社群的日常生活，那些支持、促进或报告移民和迁徙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深刻影响。广义上讲，非国家行为体是不属于国家结构中的团体、组织或个人，但仍可以对国家的和国际的进程和系统施加影响。非国家行为体的例子包括：移民代理；偷运移民者和人口贩子；雇主；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家；以及国际组织。[42] 非国家行为体正逐渐进行跨国运作，且其业务和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少受到地理的限制。随着地理因素变得无关紧要，移民过程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本节提供了某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例子，以及他们是如何参与移民过程的。

偷渡移民和贩卖人口的联系网络正在利用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特别是智能手机技术）组织国际旅行、与客户联系并（有时）从国内家庭诈取赎金。[43] 偷渡（移民）者还利用社交媒体与新客户联系并宣传他们的服务。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有关偷渡服务的信息（包括达到某些目的地的服务）正在改变非正规移民的方式和偷运者的经营方式。[44] 逐渐加强的联通性使人们能够核实偷渡者的信息，也扩大了移民传递信息的能力，以告知别人要避开的偷渡者。[45]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也成为“流动性行业”（mobility industry）出现的主导力量，该行业的运作是为了回应相对富裕的人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们想短期或永久移民到有好的医疗保健等服务的低物价国家。[46] 对于博客、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互动式在线实践的创新性应用，为（例如）希望迁徙到墨西哥的美国公民打开并拓宽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市场；2015 年，据估计有一百万美国公民居住在墨西哥。[47] 类似的促进流动和迁徙的技术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包括东南亚、南欧、东欧和北非，比较典型的服务是一系列迁居服务，但除此之外，还包括住房、学习（教育）、医疗服务和就业。

至于移民行业，随着跨国劳工招募机会的增多，和移民相关的代理和经纪人数量激增。即使是在最基础的行政层次，例如基于互联网的签证申请程序，也变得越来越常见，这减少了使用馆柜台签证服务的次数，同时也使得能够通过虚拟手段为移民提供便利的、基于互联网的经纪人和代理逐渐增多。图 5 显示的是有关跨国招募的实践中涉及到的各个层面，大家普遍认为在规模、复杂性和速度上有所增长，这给监管者带来一系列挑战。[48]

40 Carling，2008； Vargas-Silva，2016.

41 Hunter，2015.

42 为了给这一章做铺垫，前面章节已经讨论过移民（从技术层面来说也是非国家行为体）了。

43 McAuliffe 和 Laczko，2016。

44 Brunwasser，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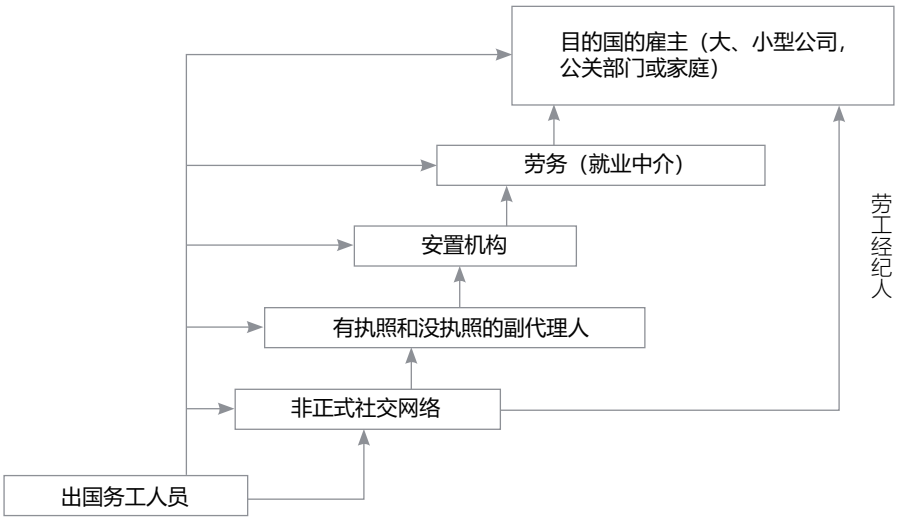
45 Triandafyllidou 和 Maroukis，2012。

46 Bantman-Masum，2015.

47 UN DESA，2015；US Department of State，2017.

48 Pittman，2013.

## 图 5. 跨国劳务移民中介




*来源：* Pittman, 2013

在不讲道德的私人招募机构中，欺骗性的做法并不罕见，如提供不存在的工作、谎报工作条件和工资、伪造合同或没收证件。这给决策者和政府在检查和监管私人招募行为时带去了更大的压力。但有时候，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强了透明度并能支持更好的招募行为。例如，位于菲律宾的 LBS 招募解决方案公司正在使用线上媒体和新的社交媒体应用来直接和雇主和员工打交道。这些变化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且，在 2014 年，研究结果显示，该公司的申请者供应链改善了，广告费用下降了，也没有任何有关招募违规或金钱索赔案例的报告。[49]

其它非国家行为体也在通过技术的使用以创新的方法应对移民现象。例如，国际移民组织正在研发一个移动电话应用（MigApp），旨在为移民提供关于移民程序及目的国现有服务的可靠的、实用的信息；例如提供有关签证和旅行规则的更新信息，以及用于和合法的服务提供商进行互动的平台。[50]

其它最新的倡议涉及慈善家、非政府组织和除移民之外的个人，他们通过在迁徙路上提供人道援助，支持正在进行危险的、非正规的海上旅行的移民。使用无人机技术来发现困境中的移民船只并为人道援助寻找目标是应用新技术的典范，这一技术在 10 年以前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51] 例如，“移民离岸援助站”是一个在马耳他注册的基金会，旨在通过援助困在危险船只上的移民。2016 年，该基金会用两架无人机在地中海水域巡逻并使用日夜光感光器件发回高分辨率影像。

实时联通也被用在冲突和流离失所情况中。这些情况中存在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跟踪变得十分必要，原因有很多，包括对人口进行评估以指导人道服务，正如下面文本框中将要讨论的。有

49 IOM，2014.
50 IOM，2017a.
51 Bryant，2015.

几个援助机构认为生物识别技术的效率很高。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正在使用生物识别对难民营中的人进行登记，并监控难民的食物和救济物资的发放，以保证提供的数量和难民的数字相匹配。但是，这需要平衡地考虑到人员的监控、监视问题以及当局使用数据应对移民的问题。生物识别、虹膜扫描或指纹等技术被各国用来监控人口迁徙，但这些技术也可能是侵犯隐私的政治工具。[52]

## 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识别

如果你关注有关大规模生物识别项目的新闻，就会立刻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创意极大部分都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至少，在近距离审视这些计划的实施环境之前，其份额是惊人的。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这些解决方案所需的环境是成熟的，因为同时存在需求和机会。

“食物和非食物援助以及食物分发是最初的使用案例之一，” 休斯（Justin Hughes）说。他是 PA 咨询集团的采购供应链专家，领导了该公司与联合国的合作……“当有大规模移民时，或当有越境的难民时，这就是一个修复人口的工具。它使得产生不需要识别个人的数据库成为可能……”

不仅仅是因为生物识别系统比基于纸张的系统更有效率，有时是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当人们逃离一个灾难区或冲突区时，一般不会带上证件，也没机会带上任何其它形式的文件，”休斯说。

“或者他们是故意丢弃了证件，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携带能识别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护照，可能会有更多危险。所以出于若干不同的原因，人们往往不会带着传统的纸式或卡式身份证件这样的东西出现。有了生物识别，你就是在手指或虹膜上随身携带身份证，所以这就是主要优点，围绕它也有相当水平的技术精度。”

*来源*：节选自 Mansfield-Devine(2015),Biometr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表于 Biometric Technology Today。

## *国家行为体及对移民管理的广泛影响*

虽然全球化、社会转型和移民进程间的相关性已经得到承认，[53] 但仍难以就跨国联通的加强对各国移民政策和监管程序的多种影响方式做出全面评估。联通的加强对各国的影响可能是不平衡的、碎片化的、多样的，并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全球移民中的身份——作为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国。

本小节将提供几个案例，说明各国是如何就基于跨国联通的移民过程中的改变而开展行动（做出回应）的。随着国际迁徙机会的增加，各国已尝试实施一系列战略，管理这种规模、速度和多样性上的增长，而且一些国家已试图把移民的利益最大化。移民迁入和边境管理政策和实践发展迅速，以应对大规模人口迁徙（例如偷渡移民、贩运人口和非正规移民迁徙相关的人口）所导致的风险认知。此外，由于强大的联通性影响着移民的各个方面，各国已采用技术来更有效率地管理或促进移民迁徙。因此，技术进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对迁徙人口的管理。

52 Dijstelbloem，2017.

53 Castles，de Hass 和 Miller，2014。

信息和通信技术潜在地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尤其是为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在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中出现了一个新做法，就是使用潜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和跨国联通，减轻农村或偏远地区的迁徙压力，例如下列文本框中概述的科克斯巴扎尔的数字岛项目。

### 新出现的实践：公私合作改善农村（偏远）地区的联通以减轻迁徙压力——科克斯巴扎尔的莫哈什卡利岛千兆数字岛项目

2016 年 2 月，韩国最大的电信服务供应商之一——韩国电信公司（KTC）与孟加拉国政府和国际移民组织为一个试点项目签署了一份三方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改善线上联通，在偏远地区改善政府服务。备忘录的签署表现出对于公私合作的重视和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三方聚到一起，尝试在莫哈什卡利岛开展一个利用高速互联网连接来提供服务的模式。该岛是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偏远部分，是该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使用服务的机会十分有限且质量低劣。该行动符合“数字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为该国政府“愿景 2021”倡议的一部分）。

（……）在实践中，该计划将借助电子工具（例如线上内容和远程教学、能够提供诊断服务的移动健康工具和专家电子咨询）为社会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这样一来，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居民可能就不需要旅行数个小时看医生，孩子也可以在家或在社区中心上课。另外，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促进市场准入，孟加拉农村地区的民众可以对自己的收入来源更有信心，也就不会因为经济压力而考虑通过移民增加收入。

*来源*：节选自 IOM，ILO and UNDP 2016。

就来源国而言，另一个支持迁徙人口的办法就是监管海外就业招聘程序。例如，在菲律宾，劳动和就业部下辖的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部通过其官方网站实时提供海外就业机会、经纪人联系信息以及岗位空缺数的更新列表。另外，还有一个强制的调度程序，包括出发前情况介绍讲座，并颁发海外菲律宾工人身份证。这个程序的目的是向菲律宾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关于目的国的信息和在使领馆能得到的资源，以及财务管理信息（关于汇款和使用银行与 ATM 卡）。同样，为了应对私人招聘实践带来的一些挑战，建立一个更顺畅、更透明的移民过程，尼泊尔政府 2014 年在加德满都开辟了一个“劳工村”，即一个把所有的涉及国外就业的服务容纳在同一处的建筑群，包括按不同国家划分的招工广告办公室、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政府机构（诸如外国就业促进会）、招聘机构、出发前情况介绍和技能培训提供者， 还有一家健康中心和一家宾馆。[54] 政府正为移民提供网络银行和保险业务上的服务，并将开发创新性服务，包括移动和数字技术。这样一来，家庭就能在更快、更便宜而且更靠近他们住处的情况下收到汇款。

各国也在利用联通的增强和技术的进步来加强对边境的管理以管理人口迁徙。在实时联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越发成熟的技术，正被应用于边境管理，以形成目的国的“虚拟边境”。例如，澳大利亚自 1975 年引进环球签证制度后，一直在逐步加强其虚拟边境。[55] 在实时跨国联通的帮助下，

54 Nep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2014.

55 ANAO，2006.

对去往澳大利亚的空中旅客的签证真实性、安全和其它检查远早于人们在来源国登机前就已发生。这个多层次、在地理上分散的边境处理模式的实现，需要大量涉及多个信息技术系统的技术，且这些技术需要具备不断增长的识别身份和其它欺骗方式的能力。[56]

世界其它地方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边境管理系统变得越来越成熟。例如，利用X光和指纹扫描、电子护照扫描、自动电子门和生物识别签证能够发现伪造证件，特别是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后。[57] 又如，2013 年欧盟发起了智能边境行动，旨在通过全区域使用电子门和实时出入信息分享技术，扩大和协调自动过境。信息链接到警察所持的指纹记录和监视清单上，边境哨卡和移民当局也能使用这些信息。技术也能支持和航空公司的合作，譬如，就抵达后在边境被拒入境的人员的返回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未经约定检查而让乘客错误登机的航空公司处以罚款。[58] 通过使用更多的技术来辅助实时检查，把边境远远延伸到地理边境以外，这种做法引起一些评论家的担心：一是担心通过域外适用规则[59]对主权进行"重置"，二是担心对个人数据的无差别分享所产生的人权影响。[60] 管理和支持迁徙人口的重要发展改善了融合进程。一些国家当局使用电信技术更好地促进了移民融入社群。例如，在荷兰和瑞典，有视频和音频学习方法的 ICT（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得到采用。通过在课堂中使用计算机技术，能够解决个人特殊需求；而在课堂外对于技术的应用则能为独立学习提供机会。这样一来，移民就能够更快地学习语言技能。[61] 德国最近启动了一个叫做 "Ankommen"（到达）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该应用提供了基础德语课和关于庇护申请程序及如何找工作或培训的信息，以及关于德国人价值观和社会风俗的信息，因此，它能够帮助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融入当地社会。这个手机应用提供数种语言服务，是由移民和难民联邦办公室、联邦就业局、歌德学院和 Bayerischer Rundfunk（公共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公司）共同研发的。

另外，由于数字时代的技术进步，地方政府能够利用一系列新工具更好地了解他们所服务的人口的需求，并与他们建立关系。不同语言的门户网站或移动应用将改善对公共服务的使用。[62] 例如，纽约研发了一个叫做 NYC311 的互动线上自助服务，可用 50 种语言提供服务。这个网络平台允许所有居民提交服务请求，进行正式投诉，以及匿名和秘密地使用公共信息。

更好的跨国联通也成为各国为移民提供领事服务和帮助的工具。例如，国际移民组织危地马拉分部为危地马拉外交部研发了一个移动应用来提供这类服务。在各种功能中，这个手机应用使移民和危地马拉领事代办机构可以直接联系，同时也提供实时数据登记和报告。移民能使用这个工具在诸如地震、飓风等灾害发生时联系国家主管当局。另外，它力图为内容发布建立一个数字机制，以提高离散社群的可见度，并促进特别活动的开展。[63]

关于跨国联通的加强所造成的移民和迁徙对国家的多重性影响及其回应，情况包罗万象，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这里强调了那些影响和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移民过程中技术使用的多种方式。实证研究显示了移民全球化是如何偏向主要目的国的。[64]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控制程度和平民主义期

56 同上。
57 Jeandesboz，2008.
58 Taylor，2008.
59 Gammeltoft-Hansen，2008；Godenau 和 Lopez-Sala，2016。
60 Valkenburg 和 van der Ploeg，2015。
61 Driessen 等，2011。
62 Mattoo 等，2015。
63 IOM，2017b.
64 Czaika 和 de Haas，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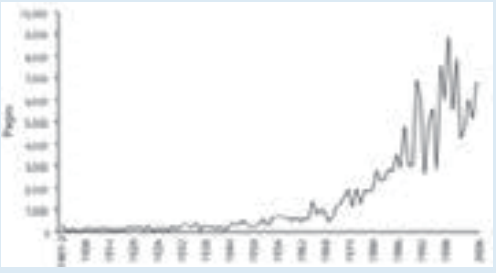
望之间新出现的悖论变得尤其重要。随着时间推移，在经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里，国家监管有了显著加强，这导致了对国家控制的更高期望。关于新出现的监管与期望的悖论，以下的文本框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

## 监管与期望的悖论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经济上、社会上和技术上的能力加强，各国监管社会的能力也在增强。治理在加强，同时变得越来越成熟和复杂。长期由民族国家（以及由之前的王国、帝国、部落等）监管的领域，例如对公民和居民的征税以及对商业和社会保护各方面的监管，已经扩大到了以前未被监管的领域，例如电信、媒体和广播、环保、公共卫生等。作为扩大监管和日益成熟的治理的一部分，国际迁徙——移民迁入和（在一些国家）移民迁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监管涉及新的法律政策框架的形成，框架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澳大利亚最初的 1958 年《移民法案》长达 35 页，向被授权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自由裁量权。到 2005 年，1958 年《移民法案》已拓展至 744 页，另有长达 9 册共 1993 页的规则条文，[c] 而且明显含有适用于移民管理的诸多规则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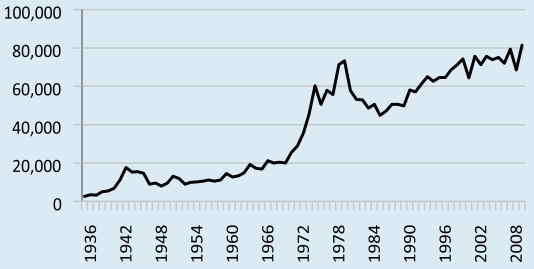
但是有必要承认监管的加强——需要监管的问题的增加，以及日益复杂的规则——不只针对移民。如下图所示，澳大利亚主要法律的页数在最近几十年显著增加，尤其自 1970 年代后。与之类似，其它国家（如美国）的监管也有所加强（见下图）。

1901-2006 澳大利亚通过的联邦立法页数



*来源*：Berg，2008

1936-2010 增加到美国联邦登记簿的联邦规则页数




*来源*：Crew，2012

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后果——在成熟度方面和总的覆盖范围方面——是对国家控制感的影响。国家越监管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越感到能够监管和控制现象，即使那些现象是跨国发生的并超出了国家或次国家监管者的直接控制。这种“监管与期望”的悖论对国家形成相当大的挑战，尤其涉及向公民和社会解释全球化对日常生活的一系列方面（包括移民现象）的影响。但是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平民主义话语认为，加强联通带来的现实，意味着移民“管理”可以大肆铺开，这时候，就能“控制”移民入迁的问题。

在移民监管演化的大背景下，跨国联通的最新发展与潜在的巨大影响有着巨大的相关性，包括监管与期望悖论的加深。

c. Kelly，2005.

*来源*：节选自关于国际移民管理的一本书中的章节（McAuliffe and Goossens,2017）。

# 结论

全球化进程正改变现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运输和电信技术的最新进展预示着实时使用信息和全球互动的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跨国联通的加强塑造了以前决不可能出现的人口国际迁徙方式。虽然技术的使用在世界上仍然不均衡，先进电信技术的持续扩张意味着更多人能上网联系。本章审视了跨国联通的加强对迁徙和移民现象的意义以及相关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已看到，跨国联通在塑造移民过程方面对移民和各国的影响并不均衡。但是，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的是，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使用先进的电信和其它技术（例如无人机）正在移民中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发展有明显的益处，例如针对移民的人道援助领域。 但它也有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促进了跨国人口贩卖网络的扩张。

联通性的加强和国际移民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越来越重要。虽然迁徙的动因在大致上仍未改变，人们对迁徙选择进行考虑和做出决定的环境已经大变，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将要强调以下政策。

●需要继续投资发展移民能使用的技术，来避免危险的和可能致命的迁徙途径以及虐待和剥削。**创新地使用技术、社交媒体和手机应用**（例如国际移民组织向移民提供的手机应用 MigApp，帮助移民获得关于迁徙过程和目的国服务的可靠的实用信息）**能支持和促进安全、有序和正规的移民。**

●将这类技术更均衡地推广和使用。近期在全球联通上的进步——即使是在一些偏远和最不发达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得到支持，以使新技术和应用（例如那些和移动支付相关的技术）能帮助全世界的社群并减少不均衡实施的风险。

●虽然各国已通过对基于实时联通的技术进行投资来提高监控边境、发现和防止非正规入境的能力，**但针对分析能力也需要相似投资，这样才能以更好地了解移民过程中的渐进变化**，包括移民如何考虑和评估其迁徙选择。

●随着全球化和跨国联通的加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个人数据的无差别分享对人权的影响。这类研究能够支持更有效的政策回应**，包括全球移民治理。

●最后，进一步承认技术在移民管理中的作用，是建立形成全球应对机制（例如 2018 年的全球移民契约 )的核心问题。虽然联通的加强和实时转移信息、金钱和观念的能力可能意味着更多挑战，尤其是在控制非法和危险的迁徙活动中，但也有可能依然能够在新出现的技术中找到一些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MARIE MCAULIFFE
ADRIAN KITIMBO
ALEXANDRA M GOOSSENS
AKM AHSAN ULLAH

# 7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1]

## 引言

今天，如同正在上演的一样，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自的人们即将踏上旅程，希望着能够在新的国家过上安全又有意义的生活。有些人将拿到护照，其中包含他们前往目的地国的签证。为了寻求在能在另一国家开启生活新篇章，他们很多人都经历了签证的申请。这些人将拥有选择新生活的许多方面的能力：选择工作或职业、打算居住的城市、出行方式、旅程的时机和长短、同伴及停留时间。他们应被视为是幸运的人，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并将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

今天，如同正在上演的一样，很多人也将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即使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做好在旅途中被虐待、剥削甚至是死亡的准备。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个极不确定的未来；即使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在新国度等待着他们的仍然是未知。许多人的护照没有签证，有些人甚至没有护照或者旅行证件。他们或许大致了解如何在途中去往不同地方，可以依赖谁来帮助自己，不同的旅程可能花费多少钱以及需要选择的旅程的模式。但是同样，很多事情仍是未知。他们并非幸运者，他们很有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破碎的国度，其中一些人因内乱、迫害或其他各种灾难而颠沛流离。

尽管引言部分明确根植于当下现实，但是迁徙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常态，早已与生计、文化和灾难以及流放相关联。任何有关迁徙问题的讨论中心都是谁在移民，如何移民以及为何移民，这通常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在考虑和进行移民时所拥有的选择密切相关。更好地理解移民如何考量迁徙的选择（包括不迁徙）和着手开始迁徙的重要性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这种认可，部分是由愈发明显可见的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移民旅行推动的。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失踪移民项目（Missing Migrants）发现，自 2000 年以来，已有超过 4.6 万名移民在迁徙途中死亡。[2] 有关移民安全和权利的问题已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 年 9 月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民问题的纽约宣言》，重点关注了以上两方面的问题。[3]《宣言》包括承诺在 2018 通过一项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的全球契约，这本身就体现了对不安全、无序和非常规移徙的关切日益加剧。需要注意的是，该宣言和就达成这一契约所作出的承诺，部分是为了应对 2015 年间欧洲的大规模移民。在大规模迁徙发生期间，移民（包括难民）展现出了极大决心要到达某些特定国家（如德国、瑞典和奥地利）的坚定决心。

1 Marie McAuliffe, 移民政策研究部部长；Adrian Kitimbo, 研究顾问，国际移民组织和研究助理，比勒陀利亚大学，高敦商业科学学院；来自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研究生院的 Alexandra M. Goossens; 以及文莱达鲁萨兰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和研究）副教授兼副院长 AKM Ahsan Ullah。

2 国际移民组织，2017。

3 联合国大会，2016。

本章主要通过严谨的研究听取和学习移民的知识，来讨论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的重要性。在旅程开始之前和旅途期间，所有移民都会做决定。其中一些相较于其他决定，后果更为重大，甚至涉及生死攸关。本章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迁徙手段与选择更有限的人们。那些享有较高自由度的人，比如退休后迁往澳大利亚的中国百万富翁，他们不是本章考察的重点，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选择面更广，也更少身处易受伤害的脆弱状况之中。考虑到移民经历具有极大多样性，本章将讨论迁徙之旅，以及在迁徙前和途中移民如何认识这样的旅程。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当下移民研究与实践中得出许多重要的东西。下一节简要介绍移民的“自我能动性”（self-agency）（即移民在独立决定和选择的情况下作出和行动的能力）和“能动性的连续性”（continuum of agency），解释面对迁徙时选择的变量。在第三节中，我们讨论了在移民研究中比较关键的和新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暗示了对于移民自身来说，关于对迁徙与迁徙的旅程的思考最近几年是如何变化的：（错误）信息；签证偏好；风险与回报以及迁徙的压力。在下一节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最新进展，这些研究方法和技术使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可行。结尾部分则讨论了包括与全球移民契约在内的研究和政策倡议的含义。总体而言，我们主张：更好地了解移民在迁徙旅程中的选择，对制定更为有效的移民政策至关重要。

## 关于移民自我能动性的思考

多年来，针对迁徙原因的，国内外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与调查，最早可追溯至 1880 年。[4] 验证迁徙动因和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对迁移模式的解释以及对影响与塑造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和过程的解释。支持所有重要移民理论的核心考虑是，人们能够行使自由意志或自我能动性的程度。[5] 所有常规移民理论都涉及从不同程度考量迁徙动力（或缺乏动力），而且对移徙前和移徙过程中移民的作用、决策和行为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有助于解释迁徙的形成原因。换言之，移民的自我能动性的程度正成为想要了解移民模式、流程和结果，的关键因素。[6]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人的能动性的角度解释移民的二元结构——被迫迁徙和自愿迁徙——主导着政策和研究。随后，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间，人们广泛认可存在着能动性的持续性，而不是自愿 / 非自愿的二分法。[7] 例如，Faist 认为应该从“自由度从高到低”的角度来考虑持续性，[8] 而 de Hass 则指出“‘自愿 / 被迫’的二分法过于简单，因为它假定一类移民享有完全的自由，而另一类完全没有选择或能动性。”[9] 在这样的语境下，移民如何理解与进

4 Ravenstein, 1885 和 1889。

5 示例写作内容请参见累积因果（Massey，1990），新古典经济学（Todara，1989），世界体系论（Portes 和 Walton，1981），社会资本理论（Massey，1987），劳动力移民新经济学（Stark 和 Bloom，1985）以及社会网络理论（Boyd，1989）。

6 McAuliffe and Jayasuriya, 2016; Triandafyllidou, 2017.

7 de Haas, 2011; Faist, 2000; Massey et al., 1998.

8 Faist, 2000.

9 de Haas, 2011.

行移徙，包括那些对何处去和如何去极度缺乏选择权的移民，已成为移民研究和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无论如何分类，不同的被迫迁徙者都有着适用于自己的不同地域选择替代选项。这些选择与选项不仅取决于外部限制因素，还取决于诸如性别、年龄、财富、人脉和关系网等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理解决定迁移的人的观点和经历……我们必须将他们视为能动体，即使从物理意义上看他们的移动空间可能十分受限。[10]

在劳动力迁移的背景下，人们对能动性和结构有相当的关注，以及人们如何在一系列“干预障碍”[11]影响下考虑移民。流行观点仍认为所谓的“经济移民”在移民行为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发挥了相当大的能动性，但这观点过于简单了。例如，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和分析发现，由于面临的约束和选择不同，劳动力移民的选择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债务劳工和在高压环境下牺牲权利的劳务移民的状况。[12] 劳务移民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自我能动性并选择自己移民事宜的方方面面收到了严重的限制，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选择得以保留，其中包括是否移民（这是大多数移民者能动性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哪移民，如何移民，是否或何时返回家园。[13] 越来越多的人赞同通过询问移民本人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迁徙前和迁徙中如何考量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移民模式与过程的动态和变化的本质，这一点尤为重要。

## *移民与出身靠碰运气（lottery birth）*

考察各国的总体生活质量，以及在签证准入方面的迁移能力，可以看出正规移民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出身靠碰运气”有关。例如，有的国籍群体似乎不太可能获得签证。表 1 总结了所选国家的人类发展的全球指数、脆弱性指数和签证准入指数。[14] 例如，其中的“签证限制指数”，是根据一国公民的旅行自由进行的全球排名的指数，[15] 揭示了个人相对轻松地进入他国的能力在诸多方面都是由国籍决定的。签证准入也广泛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表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稳定、安全和繁荣。数据还表明了以下两个方面：人类发展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有着显著差异；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可能同时是重要的移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来自人类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的国民，能够免签证去到世界上 85% 左右的国家。[16] 这些国家也是重要和首选目的国。[17] 然后，在表格下方，这些国家的签证限制表明正规移民途径对其公民来说问题重重。非正规途径很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潜在迁出移民最现实（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

10 Turton, 2003.

11 Lee, 1966.

12 Ruhs, 2013.

13 Khalaf and Alkobaisi, 1999; Ullah, 2010.

14 人类发展指数是一项检测平均成就的综合指数，作为评价标准的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是：预期寿命，教育和体面的生活水平。签证限制指数测量了 218 个国家适当的签证限制，反映了个人方便简易地去他国旅行的能力。排名越高，个人就能无需签证去到更多的国家。脆弱国家指数由和平基金会创造，根据 178 个国家的稳定水平和面临的压力进行年度排名。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

15 Henley & Partners, 2017.

16 同上。

17 Esipova, Ray and Pugliese, 2017; Keogh, 2013; McAuliffe and Jayasuriya, 2016;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6.

## 表 1. 选定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脆弱性指数和签证限制指数

| | 国家（按HDI排名顺序） | 人类发展指数（HDI）2016 | 脆弱性指数 2016 | 签证限制指数 2017 |
|---|---|---|---|---|
| | | 排名 | 排名 | 排名 |
|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 挪威 | 1 | 177 | 4 |
| | 澳大利亚 | 2 | 172 | 7 |
| | 瑞士 | 2 | 174 | 6 |
| | 德国 | 4 | 165 | 1 |
| | 丹麦 | 5 | 175 | 3 |
| | 新加坡 | 5 | 161 | 4 |
| | 加拿大 | 10 | 169 | 6 |
| | 美国 | 10 | 159 | 3 |
| | 瑞典 | 14 | 171 | 2 |
| | 英国 | 16 | 162 | 4 |
| | 法国 | 21 | 158 | 4 |
| | 意大利 | 26 | 148 | 6 |
| | 希腊 | 29 | 130 | 6 |
| 高人类发展水平 | 马来西亚 | 59 | 115 | 13 |
| | 伊朗 | 69 | 47 | 95 |
| | 土耳其 | 71 | 79 | 52 |
| | 斯里兰卡 | 73 | 43 | 95 |
| | 黎巴嫩 | 76 | 40 | 96 |
| | 墨西哥 | 77 | 107 | 26 |
| | 泰国 | 87 | 74 | 67 |
| | 突尼斯 | 97 | 88 | 73 |
| | 利比亚 | 102 | 25 | 99 |
|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 埃及 | 111 | 38 | 88 |
| | 印度尼西亚 | 113 | 86 | 79 |
| | 伊拉克 | 121 | 11 | 103 |
| | 摩洛哥 | 123 | 89 | 78 |
| | 印度 | 131 | 70 | 87 |
| | 孟加拉国 | 139 | 36 | 95 |
| | 巴基斯坦 | 147 | 14 | 102 |
| 低人类发展水平 | 叙利亚 | 149 | 6 | 101 |
| | 海地 | 163 | 10 | 86 |
| | 苏丹 | 165 | 4 | 97 |
| | 也门 | 168 | 4 | 98 |
| | 阿富汗 | 169 | 9 | 104 |
| | 埃塞俄比亚 | 174 | 24 | 96 |
| | 厄立特里亚 | 179 | 18 | 98 |
| | 索马里 | 不详 | 1 | 100 |
| | 排名第一表示： |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 最脆弱国家 | 最灵活的护照国籍 |
| | 排名最低表示： | 低人类发展水平 | 最稳定国家 | 最不灵活的护照国籍 |

*来源：*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2016; FFP, 2016; Henley & Partners, 2017。

*注：*索马里并未纳入 HDI 的衡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纳入 HDI 的衡量体系的国家，需要该国符合以上三个维度指数新近的、可靠的且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对待收录国家来说，理想情况应是通过相关国际数据机构能够从该国国家统计部门获取数据。

尽管移民发生的背景影响着人们的迁移方式，但我们同样应该承认寻求“更好的生活”（包括通过迁移），是人类永恒的天性，使我们倾向于移民。当我们通过各国收入水平来考察移民模式时，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便一览无余。例如，目前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都居住在高收入国家。[18]

## 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潜在）移民能告诉我们什么

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对迁徙如何做出思考和决定，研究的发现能够对移民行为与预期行为的普遍假设起到了支持或反驳作用。[19] 虽然相比从前，一些政策制定者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和数据，但明显，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假设推测，缺少对移民潜在和实际的决策与经历的了解。例如，人们一般会假定，如果能够获得有关旅途中的风险信息（包括死亡风险），那么每年通过极端危险的海路迁徙的人数会大大降低。然而，虽然已经证明，更对称的信息能够对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20] 更好的理解为何有的人即使在获知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奔赴危险旅程，这对从移民视角更深刻地拓展移民相关知识，有着重要作用（具体风险和冒险问题见后文）。以移民为导向，而不是政策导向的研究视角，对关注移民决策和经历的研究来说弥足珍贵，是最主要的优势。询问潜在与实际的移民对可能采取或正在采取的迁徙与旅途的看法，相较于取代政策设置的评估性研究，更能够在动态变化的迁徙起源和中转环境方面提供重要见解。在具有可持续性对策之中融入移民自身的理解与看法，更有效保护启程前与途中的移民，是重中之重。这些信息也可用于发展不同的概念框架，用来更准确地解释移民观点。[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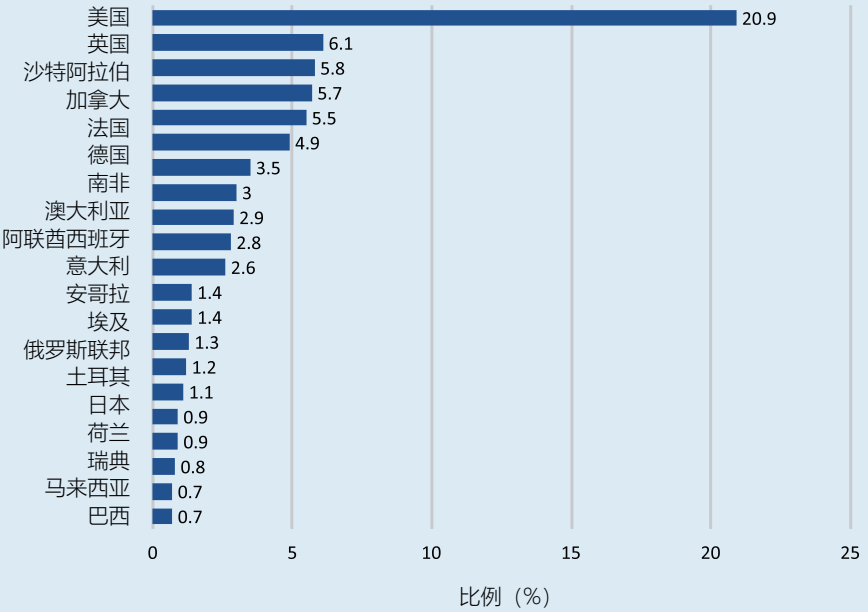
移民研究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潜在和实际移民在不同阶段如何考虑迁徙旅途有着浓厚兴趣，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证据指出了一些重要的考虑因素。首先，人们早已意识到移民渴望、意图和实际迁徙行为之间的区别。[22] 虽然研究移民的愿望和意图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移民趋势，但对迁徙的愿望或意图并不一定（或通常不会）转变成实际迁徙。《盖洛普移民意向调查》（Gallup Survey on Migration Intentions）的最新结果，就反映出愿望、意图和实现之间显示显著差异。这项调查自 2005 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而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有机会估计有 7.1 亿成年人（占世界成年人口的 14%）愿意移民到另一国家。然而，开始着手移民计划的只有 6600 万人，而到实际准备阶段的只剩 2300 万人，即世界成年人口的 0.4%，数字急剧降低。[23]

第二，移民如何在动态的、有时是快节奏的环境下思考并进行迁徙，因此人们可能需要对变化中的环境做出快速的反应。这种动态性是由不断增强的跨国互联互通来支撑的，这得益于更为精密的、可接通的通信技术（见第 6 章）。迁徙情境的动态本质，要求我们继续倾注于研究移民的观点和经历，而不是将其视为“一次性的”活动。

1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6。
19 Hernández-Carretero 和 Carling, 2012。
20 RMMS, 2014; Alpes 和 Sorensen, 2015。
21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Triandafyllidou, 2017。
22 Stark, 1981; Carling, 2002.
23 Esipova, Ray 和 Pugliese, 2017。

第三，对不想移民的人关注变少，部分原因是待在家一般被视为惯常做法。然而，有迹象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驱使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国际移民的压力或许正在增强。[24] “移民文化”的长期发展可能会给今后越来越多的社群带来问题，他们宁愿呆在家里，但不太能够这样做。[25]

## 图 1. 2010 到 2015 期间潜在移民主要希望前往的目的国家




*数据来源：*《盖洛普移民意向调查》（2017），国际移民组织（IOM）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GMDAC）

盖洛普调查（2017）显示，相较于其他国家，一些目的国更受移民的欢迎，尤其是美国。但这种调查出的偏好似乎忽视了受访者要移民到这些国家的可能性或能力。要谨慎对待这些调查数据，因为调查结果还表明，与渴望或有的移民倾向的人相比，正在筹划移民的人数要少得多。许多其他的研究也反映出这种差异，这些研究表明，可能想移民的人只有少数会真的付诸行动[a]。通常，解释移民为何偏好目的国会强调经济问题：像这样的研究中，工资较高的富裕国家往往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国。然而，对某些群体来说，其他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如对一个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宽容的看法、法治的适用程度以及它的安全程度，可能比创收和工作机会更为重要[b]。

a: Jayasuriya, McAuliffe 和 Iqbal, 2016;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b: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24 Bylander, 2014.
25 Mescoli, 2013; Ball, Butt 和 Beazley, 2017; Mbaye, 2017。

任何以移民视角为话题讨论，其中心都是信息的作用，以及信息如何与迁徙过程相互作用，特别是考虑到社交媒体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正日益增加。这一方面将在下一小节进行讨论，在这之前，我们将通过移民为中心的研究，继续考察剩余的关键及新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列举了最近的经验研究的例子，阐述移民考量是如何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发生变化的。

## *（错误）信息*

无论是考虑可选择的事项、挑选目的地或决定最安全和经济上最可行的路线，信息在移民对迁徙思考和认知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在考虑返回家园时时，核心问题也是信息。信息的质量和有效性对于成功移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信息的作用是受限定的。大量研究表明，当移民决定信息是否可信及应给予多少重视度时，信息来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26] 信息可能来自人们的社会关系，如家庭成员、朋友和其他社交网络，包括国内的和目的国的关系；数十年来的研究证实了与移民关系亲近的人（社交含义上的，而不是地理含义）提供的信息最受重视。[27] 最近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解，发现旅行前和旅途中，来自亲密社会关系的人的信息被移民视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为这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信息。[28]

相反地，由于人们更多地信任社会关系，而不是官方信息，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些可靠的信息，比如关于移民政策的政府信息，移民却并不认为是准确的，这些信息也不太可能影响移民决定。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认知。这和目的国开展的针对潜在非正规移民的信息战（ information campaigns）（包括威慑性信息）尤为相关。一些研究发现，信息战通常是起不到作用，寻求庇护者并不太了解（欧洲）目的国。[29] 然而，移民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一些国家更可能提供准确的移民信息。例如，2014 年底于印度尼西亚进行的研究发现，39% 的阿富汗调查对象指出“在他们前往澳大利亚旅程中，澳大利亚政府是他们最可靠的信息来源”。[30]

信息的传播也在不断演变，近期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已转变了信息交流的本质。社交媒体和实时通信应用程序（例如 Facebook、Skype、Viber、Whatsapp 等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为人们提供了新方式，分享移民旅程的潜在风险与收益的信息。这似乎影响着移民决策进程，并对移民模式产生影响，2015 年移民大规模迁往欧洲，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参阅第 6 章关于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的内容）。例如，一家德国非营利性机构开展的研究，就调查了叙利亚及伊拉克难民在前往德国前和途中是如何搜索（navigate）信息来源的。[31] 首先，受访者都信任诸如家人朋友之类的社会关系。然而，研究结果也表明，人们越来越依赖来自不是很知名的社交媒体网络的信息，特别是当他们为有计划的中转做准备时。[32]

此外，社交媒体为寻求移民和宣传移民服务的人提供了联系的平台，不管后者提供的服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例如，旅游服务与招聘机构，贩卖假身份证明文件及签证的人口贩运者）。尽管很多人都

26 Wall, Campbel 和 anbek, 2015。
27 Pickering et al., 2016; Komito 和 Bates, 2011。
28 Kuschminder 和 Koser, 2016; Maroufof, 2017; Hagen-Zanker 和 Mallett, 2016。
29 Gilbert 和 Koser, 2006; UK Home Office, 2004。
30 Pickering et al., 2016.
31 MiCT, 2016.
32 同上。

知道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但心存畅想的移民仍可能使用社交媒体来找到贩运者。[33] 在 2016 年的调查中，欧盟委员会向 21 个欧洲国家询问了移民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及其他相关网络平台，以及贩运者自己如何招揽顾客。从结果来看，有一些群体（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在比如脸书这类社交平台上“寻找旅伴，咨询危险、风险建议，以及寻找可靠的贩运者”。 还有掌握更多信息的群体散播关于路线、目的地、庇护做法、政治局势、立法和社会福利的信息。有国家进一步指出，有些 Youtube 视频会用几种不同语言，对如何移民、寻求庇护和实际运作给出建议和详细指导。[34]

## *对签证的强烈偏好*

在可能的情况下，移民会选择通过正规签证渠道进行迁徙。[35] 正如本章开头强调的那样，凭签证出行和无签证出行有着明显差异。从移民角度来看，移民经历可能在诸多重要方面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些方面可能会影响移民者本人及家庭，包括那些可能留在来源国的人。首先，签证代表了入境一国的管辖权，因此为持证人到达该国和在该国出行提供了合法保障。持有有效签证可以更大可能地保护人们不受剥削。相反，无签证出行将人们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被官方拘留或驱逐，或是被那些提供非法移民服务的人（比如偷渡蛇头者或人贩子）剥削和虐待，被迫游离于受监管的体系之外。

第二，毋庸质疑，从逻辑上来说（logistically），凭签证出行更为方便，出行的可选项更多。在某些案例中，这意味着行程是否可成行，尤其是涉及到航空旅行时。因为在出境、中转和入境时，航空出行通常是受到严格监视和管制的。第三，签证在旅行途中提供了更多的确定和自信，这种旅行更可能是依计划进行的，包括费用相关问题。凭签证出行通常更安全、更确定、更容易去适应更多选择，比如旅程长短、出行方式及出行同伴（如果有的话）。

如此看来，人们对有签证的出行具有强烈偏好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决策时，潜在移者会着重考量是否能拿到签证，且已有事实表明，当移民身处来源国，探讨迁徙的可能性时，能否拿到签证是一大关键因素。例如，近期针对网络求职和移民意图的调查发现，能否拿到签证成为人们进行网络求职搜索的一个决定因素（how people conducted online job searches）。[36] 同样，人们发现，签证设置的变化也会影响潜在移民对迁徙思考及最终移民事宜。例如，当针对特定群体的签证限制（包括国籍限制）被移除之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37] 尽管有各色各样的实例，但是当关键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实施签证自由化时，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还有在欧盟内部推行的申根协定，该协定所试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家。[38]

对签证可获得性的了解在关乎一系列不同安排的，包括那些可能是由于多种环境因素造成的迁徙意愿背后的原因。例如，在斯里兰卡，通过劳务移民的途径迁移到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GCC），已被证实和潜在的保护需求有关。在缺少可行保护的情况下，人们利用可行办法设法移民，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劳务移民迁徙。下方文本框内即为这项研究的调查结果。

33 Frouws et al., 2016.

34 EC/EMN, 2016.

35 注意：虽然“正规”移民不一定需要签证，而此处提到签证是因为它们通常是必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者来说。此外，在移民者和普通大众看来，“签证”一词比“正规”更好理解，接受度更广。

36 Sinclair 和 Mamertino, 2016。

37 Czaika 和 de Haas, 2016。

38 Ortega 和 Peri, 2013。

## 劳工移民——寻求庇护者应对保护问题的替代方案

这项研究可能是第一次在冲突后国家内进行的关于移民意向、实际移民和不流动的纵向研究。很显然，与那些不受冲突影响严重的地区的人相比，将劳务移民作为逃避途径并不适用于生活在受冲突影响严重地区的人。研究成果表明，那些面临迫害的人……确实积极考虑并在某些情况下将劳动力移民作为逃避策略。与寻求庇护相比，这种劳务移民是逃避战略，在寻求庇护的选项受限的环境中并不陌生，而且劳动力移民所需的资源估计比寻求庇护所需的资源少二十倍。

从政策角度来看，该研究表明，那些需要逃避迫害和寻求其他形式保护的人们，如果有选择权，可以通过正规途径迁移到国家工作，而不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他们并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民，而是可能成为难民的人，通过选择常规劳务移民路径进入目的地国家（通常是中东）作为替代，而这原来可能不是他们的首选。因此，一个可能的选项是探索鼓励潜在寻求庇护者（甚至是在联合国难民营等待的难民）的低技能劳工移民到中东国家的可行性。另一种可能的策略是，发达国家可帮助弱势群体提高职业技能，并与主要目的地国家合作提高认可率（recognition rates），这可以指导他们进入正规的移民路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不大可能招募大批低技能的工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服务业，如清洁，这些行业已经被非正规移民填补。

毫不意外，对签证和正规途径的偏爱延伸到移民的其他方面，包括抵达后的移民身份以及人们如何返乡。例如，在希腊的格鲁吉亚移民往往宁愿申请居留证，也不愿申请庇护或非正规停留（stay irregularly）。[39] 最近关于受协助的自愿返回的研究也发现，涉及返回移民决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他们更愿意守法。[40] 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人们更愿意他们所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行事，包括在迁返决策过程中，这不仅是直观的，而且从移民的角度来看也是可行的。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仅会对回归来源国有影响，也会对未来可能成行的国际移民计划有重要的意义。

## *风险和回报*

大多数人可能会偏向于遵守法律的行为，包括获得授权的与签证相关旅行，但是如果没有正规的途径或是没有的到入境的授权怎么办？从表 1 可以看出，对于一些人来说，获得签证前往大多数国家旅游的希望十分渺茫。例如，阿富汗人目前在亨里签证指数排名最后，这意味着通往首选目的地的正规移民途径严格受限。在许多国家缺乏正规移民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进行国际移民的能力方面更受限，只能留在国内；或者迁移到不太理想但可以进入的国家；或者非正规的移民选项（到首选目的地）更为可行。这可能会导致“非自愿的不流动”（involuntary immobility）[41]，即偏好移民的人无法移民，或者求助于高风险的非正规迁徙方式移民。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极端情况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例如迁移到不一定是首选的国家，但至少可以进入的国家。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虽然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国家，但大多数国际移民却无法去美国，而是寻求其他选项。这一点得到了当下的国际移民的数据支持，例如，在一些地区，区域内

39 Maroufof, 2017.

40 Koser 和 Kuschminder, 2015。

41 见 Carling 对非自愿不流动的讨论 (Carling, 2002)。

移民远远超过了该地区的外迁移民。这在非洲最为显著，区域内移民占目前移民的绝大多数，与区域自由流动协议部分有关（见第三章的讨论）。

尽管有来自家人、朋友和其他移民的宣传活动、媒体报道和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潜在的移民仍然在考虑高风险的非正规移民。埃塞俄比亚区域混合迁徙秘书处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比例很高的潜在移民（92%）意识到通过非正规旅行前往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相关风险，但有42%表示，迁徙的收益值得为旅途和抵达过境国与目的国冒险[42]。在迁移期间，移民有对不同类型的虐待和（或）身体上的困难的容忍度介于1%（性虐待）到44%（人格侮辱和口头虐待）[43]。另一项最近的研究，对跨越地中海到欧洲的约500名移民进行访谈，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这些非正规移民旅行带来的风险；就算认识到了真正的危险，他们还是会选择飘洋过海。[44]已经有研究涉足了人们考虑和从事高风险的非正规海上移民时评估效用的心理机制[45]。例如，Carling 和 Hernández-Carretero 研究了塞内加尔的潜在移民与通过海上迁徙的方式前往西班牙群岛的风险之间有何关联。他们发现，面对高风险旅程，人们采取了几种心理机制，包括各种回避方式，拒绝（discrediting）负面信息，让危害最小化。通过非正规的海上迁移到达预期的目的地的能力，似乎包括对飘洋过海的“痛苦”的逆来顺受，否则就只能望洋兴叹；还有一些减轻痛苦的心理策略。然而，在移民旅行期间的虐待、剥削和创伤仍然是非正规移民一个研究不足、没有充分理解的方面。我们所了解的移民面临的一些极端情况，往往来自调查记者、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他们有他人所不具备的，能迅速传递迁徙之路上移民者的辛酸故事的能力。有关辛酸经验和剥削情况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做出的困难选择，理解迁徙通道发生的变化。例如，参见《户外》（Outside）杂志上发表的调查性新闻文章中关于达连湾峡道通道（Darién Gap corridor）的文章。重要的是，尽管存在风险，但人们作出移民决定时所处的背景以及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无论如何定义）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 达连湾：穿越世界上最危险丛林的恐怖旅程

达连峡谷是位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界的一个没有法纪的荒野，充斥着致命的毒蛇和反政府游击队等等。该地区还有来自古巴、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流，绝望之余他们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危险之旅。……

由于通向美国的传统途径变得更加困难，古巴人、索马里人、叙利亚人、孟加拉国人，尼泊尔人等已经开始前往南美洲国家向北旅行，从陆路穿过中美洲地峡。这个旅程中最糟糕的部分是通过达连峡谷。整个区域是个没有路的迷宫，旅行者通常徒步和坐船，通常被缉毒刑警和毒贩还有反政府游击队控制着，游击队自1964年以来一直在与哥伦比亚政府打仗。每年有数百名移民进入这个区域，走上这条魔鬼之路，许多人在途中遭到不法分子（coyote）（移民贩运贩者）的杀害或抛弃，再也没有出来。……

一个名叫莫米（Momir）的矮胖孟加拉人，因为发烧而脸色苍白，拒绝了不法分子在船搁浅时

42 RMMS, 2014.

43 同上。

44 Crawley et al., 2016.

45 Carling 和 Hernández-Carretero, 2011。

下船的命令。阿拉法特向我们展示了他脚底的一个大伤口，不肯走了。在闷热的 90 华氏度气温下，这些人走了好几天，很虚弱，靠饼干和河水生存。他们很害怕。……贾法尔开始哭泣，引发了那些人一阵阵绝望的恳求。他们亮出手腕和肚子上的伤疤，有人的手指不见了一截。……很很容易理解对于任何尚有理智的人会逃离如此惨况。但难以理解的是，这些人怎么来到了距离家乡半个世界之远的达连峡谷的南部边缘，却丝毫不知道前方有最残酷的考验。他们的意志力令人惊诧，但峡谷的阴暗深渊已经吞噬过准备更充分的人。

另外一个［汽车旅馆经理］蒙特罗的视频显示，一群尼泊尔人蜷缩着对着纸盘子（hunched over paper plates）。……当局抓了他们，并在驱逐出境之前带他们去蒙特罗旅馆吃了顿饭。“当然，我从不叫海关来查任何住在这里的人，因为我不同意那些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人该被遣返，”蒙特罗说。“他们的动机令人难以置信。”

摘录：JasonMotlagh，发表于《户外》杂志，2016 年 7 月 19 日。

另外，目前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国际保护制度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合法却非正规的移民选项，这使很多无法获得签证相关旅行的人选择非正规移民。从移民的角度来看，非正规庇护移民有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这种现象正日益受到移民贩运者利用，这些蛇头受利益驱使，从移民为追求幸福的付出中获利 [46]。偷运和贩卖网络借机扩大，向没有选择人下手，于是特定的贩运通道变得及其危险。虽然国际保护制度有可能成为《难民公约》下可能没有保护需要的人开条“裂口”（funnel），但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移民旅途中，都是极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我希望，承受了这次旅程的风险和艰辛之后，这些男孩能在那里学习，拥有美好前途——我们知道他们在喀布尔没有未来。我们很高兴他们安全地完成了这一旅程。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未来。我想去德国和他们在一起。年幼的兄弟姐妹也想跟他们去德国。阿富汗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每个人都想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对现在的决定很满意。万一我们在喀布尔出事，那么我们还有两个家人在德国安全活着。

两名喀布尔移民的母亲 [47]

有了这些关于风险的考量，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危险的旅程，我们还需要承认潜在的回报。对于一些社会群体来说，移民的回报可以是长期的，可以让下一代和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和生活水平，同时还能对来源国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提供支持。对于其他群体，包括那些在来源国内，经济、社会或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国际移民已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家庭和社区成员通常通过亲缘关系或族裔谱系参与移民，以获取资源和安全。[48]

46 Carling, 2016; McAuliffe 和 Koser, 2015。
47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2016.
48 Monsutti, 2005.

## *移民的压力*

现有的证据表明，即使可以通过签证获取走常规的移民途径，一些家庭和社区进行国际移民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包括那些更愿意留在国内的人。[49] 尽管国际移民带来了好处，但这指向了对于一些社区“移民文化”的长远发展存在一种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这种移民文化被描述为一种“非移民者观察与自己有社交联系的移民并试图模仿其移民行为”的文化。[50] 这种文化的发展已经影响到潜在的移民如何看待他们的未来：“年轻人在成长，成年后越来越期望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进行国际移民”。[51] 然而，最近的研究则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留在家里的人会产生新的压力，因为他们发现留下越来越难。总的来说，例如，面临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向海外迁移来向大家庭提供侨汇等等的压力，影响着各种环境中的年轻人。[52] 在 2016 对 2015 移居欧洲的阿富汗人进行的研究中，对于留在家乡的移民家庭成员的言谈中突出了这个问题：

> 在叛乱分子杀死了我们的兄弟，把我们的房子放火烧毁之后，我们决定把兄弟送走……所有的家人一道决定把我们的兄弟送到欧洲去。一旦到了欧洲，他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整个家庭。
>
> 来自塔哈尔省的移民者的兄弟 [53]

在西非，一些家庭严重依赖来自孩子和配偶的侨汇，而且代表了全家人对迁徙所形成的的压力可以是巨大的：

> 安妮家族一直以来都依靠其他的几个儿子在经济上援助……现在，轮到安儒纳 • 安妮（Arouna Anne）了，他是家庭中最后一名男性，为了让父母和已经死亡的兄弟们留下的孩子们改善生活。他只有 14 岁。……安儒纳半年没有见过父母了。他不时给他们寄一些钱。但这并不够。“我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说。“我必须养活这个家。”他非常清楚欧洲之行的危险。他的一个朋友也在不久之前尝试过，但却死在了利比亚。[54]

尽管来自同龄人的压力也起到了作用，但来自家庭的压力在不同的环境中也很明显。例如，研究人员在 2016 年对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到达苏丹的年轻女孩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家庭状况

49 Ball, Butt 和 Beazley, 2017。
50 Kandel 和 Massey, 2002。
51 同上。
52 Heidbrink, 2017.
53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2016.
54 Searcey 和 Barry, 2017。

对女孩和年轻女性的移民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们，如果是经历过某种家庭危机，例如来自单亲或是没有父母的家庭，则她们更有可能会移民。虽然受到缺乏机遇、选择或是性别局限（见性别方面的文本框）的限制，但她们“渴望‘做些事情’改变现有情况的愿望，都表面了她们的主观能动性，她们决定出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55] 研究还发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移民女孩感受到来自社区“移民文化”的压力，这种文化使得移民成为一种竞争力，让那些决定留下来或不能移民的人感受到了屈辱。那些把已经成功移民的人定义为“胜利者”的同龄人压力，也影响到了移民决策过程。[56]

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儿童迁徙人数大幅上升。在迁徙途中，移民儿童所面临的可能是极端的挑战和脆弱性，这为制定有效的应对方面提出了过多问题。附录 A 含有通过关于阿富汗孤儿以及来自中美洲的儿童从墨西哥中转的案例研究，对移民儿童旅程进行讨论。

关于长期形成的劳务移民通道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作为家庭收入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侨汇的越来越依赖反过来又将人们锁定在特定的移民模式中。虽然改善家庭收入和相关社会变化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有些人感受到了巨大的移民压力的影响，并认为留在国内不再像过去那样可行。尼泊尔迁徙务工人员从方方面面突出了这一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尼泊尔有大规模人口出国就业，主要是移民去海湾国家和马来西亚，这已经改变了尼泊尔农村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的男子移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研究显示，移民的决定一般在家庭层面进行，但驱使迁徙的压力日益增大。研究发现，迁徙决策的社会意义日益增强，移民的“文化”逐渐浮现。[57] 关于尼泊尔留守妇女的研究表明，大规模的男性迁徙对留守妇女和家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她们的能动性。就家庭幸福感而言，移民通过增加收入，改善了食品安全，土地和牲口租赁以及扩大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改善了家庭福祉。但这也增加了妇女的工作负担，这并不是由她们自己的能动性决定的，而是家庭决定使然。尽管女性的决策权明显增加，但重大决定仍然由男性移民通过移动电话做出。

## 性别维度：决策，女性化和性别角色

与移民有关的决策过程具有较强的性别维度。例如，传统社会中，父权制影响一系列社会和家庭互动，包括迁移。在一些社会中，女性参与决策的情况还很少见。家庭传统，地位，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都影响着谁在家里做主。例如，在菲律宾，青年单身女性的移民决定通常牵涉到家庭整体潜在利益的结构。这意味着女性进行移民的决定，通常是建立在家庭需求而不是个人进步的基础上。g 在阿富汗，迁移往往具有强烈的“男子气概”特征，尤其是年轻男子和男孩的非正规移徙，这被视为是一种走向成年的仪式。[H]

55 Grabska, Del Franco 和 de Regt, 2016。

56 同上。

57 Adhikari 和 Hobley, 2015。

迁徙与性别关系的一个核心方面，是国际移民性别构成的变化——即所谓的移民“女性化”。[i] 女性约占世界国际移民人口的一半；然而，这个比例在不同区域差异很大，而且有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大部分的移民是女性。[j] 同时也出现了质的变化，今天，女性移民者更有可能独立的移动，而不是作为依赖者，[k] 包括上述提到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妇女更多地参与到了海外汇款和供养家庭的活动中，这反过来又改变了社会和家庭的动态和决策。最近在爪哇进行的实证研究，强调了国际移民的性质在不断变化：男女的（不）流动性与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密切相关。……个案研究说明了性别决策的一系列结果，即使在高度重男轻女的爪哇语境中。我们强调，围绕劳务移民获得权的决策过程如何与家庭中“不断变化”的性别和代际动态变化相关。社会性别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移民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关联，以使先前固定的家庭和个人能够获得劳务移民。与此相关的是，个人的迁移经历可以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想象中的或实际的迁移和未来产生相关的影响，例如在“不断变化”的家庭中的性别迁移。寨屯的家庭中，她的儿媳妇的移民与其他成员的流动有关。同样，卡里德（ Khalid）不愉快的非法移民之旅为利亚纳（ Riana）通过正式渠道的流动奠定了基础。[l]

g Chant 和 Radcliffe, 1992; Oishi, 2002。
h Monsutti, 2007.
i Castles 和 Miller, 2003; Pfeiffer et al., 2007。
j 联合国 , 2006; Martin, 2007。
k Ullah, 2013.
l Khoo, Platt 和 Yeoh, 2017。

## 研究技术的进步

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等创新不仅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方式。

这些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研究领域，包括迁徙。技术正在日益改变着移民研究和数据收集方法，这既既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又引发了人们的忧虑。虽然如面对面访谈和纸质调查等传统研究方法无疑仍然对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技术进步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为进一步了解移民的观点和迁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 *在线研究工具，软件和硬件设备*

网络工具，如基于网络的调查和在线访谈，在难以到达的地方扩大了开展与移民相关研究的能力。它们使研究人员不仅可以极大地扩大他们研究的地理范围，而且可以快速有效地接触到特定的群体。[58] 互联网也加强了研究过程的包容性，使本来不会被听到的移民为自己的境遇发声。

已经得到证明，对于集中在贩运或非正规移民等敏感话题的研究人员来说，基于互联网的研究

58 Oiarzabal 和 Reips, 2012.

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非正规移民可能因为担心自己暴露身份而不愿参与使用传统研究方法（如面对面访谈）的研究，因为“对非正规移民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敏感问题”[59]。通过使用诸如基于网络的调查等工具，研究人员可以越来越多地为受访者提供更高的隐私。[60] 当对敏感主题进行研究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些类型的调查，能够从受访者那里获得更为诚实和私人的答案。[61] 例如，2013 年一项关于澳大利亚非正规移民的研究，就是将项调查翻译成多种语言，受访者可以在平板电脑上自主完成调查。[62] 通过给予移民更多的控制权——让他们在完成调查时能够选择他们喜欢的语言——可以合理地认为该调查成功从调查参与者中获得了诚实和坦率的回答。[63] 在线方法明显干扰性较少，并且可以赋予移民作为研究主体身份发挥作用。这些方法同样也被证明可以减少社交焦虑通社会期望偏差效应，从而在研究结果中产生更真实的答案。[64]

此外，理解移民决策的关键——纵向研究，已经通过 GPS 技术等技术得到了加强。例如，在获得同意的情况下，个人设备的 GPS 功能使研究人员更容易追踪移民旅程。[65] 新兴的软件和硬件工具也意味着可以相对便宜地收集数据，而且速度更快，并可以存储更长的时间。[66] 这些信息通信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以下能力：保持参与者的参与度；为跨度时间较长的研究提高数据维护。[67]

## *社交媒体和大数据*

社交媒体技术正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强大工具。随着脸书 Facebook 和推特 Twitter 等网站的崛起，社交媒体网站已成为有用的移民信息库，截至 2017 年 5 月，仅 Facebook 就拥有全球超过 19 亿的用户。[68] 重要的是，通过为潜在地研究参与者提供强大的搜索能力，这些网站使研究人员能够访问更广泛的移民社区。社交媒体网站在对离散社会群体进行研究时特别有用，这些群体越来越多地将这些平台用于各种网络活动。[69]Reips 和 Buffardi 明确认为，“社交媒体可以为移民研究人员提供独特的洞察力，帮助他们了解移民在其社交网络中自然发生的想法和行为。”[70] 此外，大数据来源，[71] 如社会媒体和互联网搜索引擎可以提供地理数据，这为找到人们的精确位置，包括移民定位等十分有用。叙利亚人道主义跟踪系统，是一种使用抓取设备技术以及众包（crowdsourced）摄影、视频和文本报告的成图系统。[72] 该系统已被证明是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最成功的大数据工具之一。它不仅被研究人员用来跟踪冲突趋势与移民迁移，而且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移民自己也使用，用以寻找安全的旅行路线并避开人贩子。[73]

59 Düvell, Triandafyllidou 和 Vollmer, 2008.
60 Reips 和 Buffardi, 2012.
61 Kays, Keith 和 Broughal, 2013.
62 McAuliffe, 2013.
63 同上 .
64 Joinson, 1999.
65 Taylor, 2015.
66 Banati, 2017.
67 Farabee et al., 2016.
68 Fiegerman, 2017.
69 Crush et al., 2012.
70 Reips 和 Buffardi, 2012.
71 “大数据是使用搜集数据来建立算法、模型和分析的实践方式，用以更好的理解人类行为”(Kuang, 2017).
72 见“叙利亚追踪器”，www.humanitariantracker.org/syria-tracker.
73 Ashton et al., 2016.

### *挑战和机遇*

新技术带给移民研究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这些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在方法论和伦理方面却受到了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在网上进行的研究往往没有考虑到研究对象与学者之间互动的重要性。[74] 线上采访，未能捕捉到语气和面部表情等细微线索，可能会阻碍研究人员全面理解研究参与者的观点。[75] 此外，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互联网，所以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有偏见的，正如所谓的“数字鸿沟”排除了那些无法使用这些技术的人。[76] 然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高度便携式的平板电脑技术，可以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帮助做调查时可能需要支持的受访者。与基于网络调查的方法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验证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是否是预期的参与者。然而，在线调查的优势现在提供了自动核实调查答复的能力，[77] 利用数据库技术，可以证实参与者提供的身份和年龄信息。[78]

围绕隐私、数据保护和机密性的问题，特别是使用社交媒体等大数据来源，研究参与者和研究人员都面临着风险和挑战。[79] 例如，在社交媒体上“跟踪”时，研究人员可能不会通知或获得被观察者的同意，这引发了道德伦理方面的担忧。研究人员也越来越难以区分个人和公共数据，因为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因此，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如何在不危害自己或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开展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讨论也越来越多了。[80] 即使新的研究技术明显伴随着缺陷，信息通信技术还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创造了巨大的优势。随着移民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接受这些技术，我们不仅要确保使用适当的方法，而且还要应对在数字时代是会被放大的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

## 政策和研究的含义

人口迁徙是一个古老的现象，迁徙前、迁徙途中和迁徙后发生的迁徙决策过程，一直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广泛条件的影响。虽然决策的固有性质可能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它发生的条件正在演变，尤其是随着跨国联通和通讯的进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能够看到、读到和听到人们如何在遥远的地方生活。正因为我们更能够看到和（实际地）切身感到战争、饥荒和赤贫的代价，现在我们对超越了文化、信仰或财富的共同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日益增长的全球互联互通也为人们的互动提供了支持，包括共享（错误）信息、资金转移以及思想知识的交流，而现在互动能够实时发生。这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包括我们如何思考迁徙和人口流动。

本章考察了移民在不同背景下对迁徙旅程的考量的，并借鉴了该主题的大量研究成果的新发现。

74 Ignacio, 2013.
75 同上。
76 Hargittai, 2010.
77 Andrews, Nonnecke 和 Preece, 2003。
78 Nash et al., 2013.
79 Harriman 和 Patel, 2014。
80 Gold 和 Nawyn, 2013; Hesse-Biber, 2011; Kays, Keith 和 Broughal, 2013; Karpf, 2012。

我们看到，对特别是与非正规移民有关的来源国和过境国的研究，正在加强，。最有趣的一个部分也最引人担忧的是，将移民作为研究领域内具有（扩大）能动性的行为体，包括传统类型的“被迫”移民 ,如难民。这一点建立在对这样的认可基础上的 ,即近几十年来人们的迁移行为已经从二元被迫 - 自愿（binary forced-voluntary construct）的认识转向对移民的连续能动性的认识上。移民获取和利用各种来源信息的方式仍然令人感兴趣。研究表明，信息的获得方式演变迅速，其中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与促进移民旅程人员联络的性质变化，如招聘中介和贩运者。第 6 章中讨论了加强跨国连通性和移民者通信模式的问题。

在为安全、有序和正规移民而订立 2018 年全球契约的背景下，更细致理解潜在和实际移民对迁徙的观点和考虑，就可以作出更深刻的可持续政策应对，将人口支持和稳定具体化，加强旅途中人身安全，并且扩大与签证有关的旅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以下几点与研究和政策相关：

●**研究人员需要更多关注移民的能动性，了解人们如何理解迁徙与政策类别的关系，**并且减少对对管制系统至关重要的政策类别的强调。例如，与考略公民身份、技能等属性是否满足签证要求相比，支付非法移民服务并制定策略管理风险旅行的能力，似乎对谁迁移，迁往何地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才是给迁徙监管和支持移民迁出国和东道国人口，带来更广泛的问题。

●在各国对管理移民的规范入境和逗留需求下，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协调迁徙意愿与应对迁徙压力的日益增加，仍然具有挑战性。**如何在不造成不必要地增加“移徙需求”的情况下，加强正规的途径，进一步投资制定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相关想法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了解移民如何考量迁徙与旅程，对于开发有效应对方式至关重要。

●在更先进和更容易获得的电信技术的跨国连接的支持下，迁徙的环境动态性质，**需要我们通过**纵向而不是偶然的“一次性”运动式的调查，**继续投入了解移民的观点和经验。**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迫使人们和社区群体进行国际移民的压力持续增加，长期发展而成的“迁移文化”会对越来越多的希望留在家乡的群体造成困难。因此，**更好地理解不移民偏好所涉及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包括在冲突和其他危险环境中）。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支持那些愿意留在自己社区的人。

●新研究**技术持续不断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对这些机遇的**利用与风险的管控，仍然是促进有效的和符合道德的移民研究的一个关键方面。例如，大数据分析提供了一种分析迁徙动态的新方法，但这绝不能以损害移民的隐私和保密原则为代价。

WILLIAM ALLEN
SCOTT BLINDER
ROBERT MCNEIL

# 8 迁徙与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1]

## 引言

此文的大多数读者应该都在自己的社区、工作场所或社交圈遇到过移民，或者自己本身就是移民。此外，还有许多人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移民问题。从电影、报纸到推特，媒体以多种形式报道移民问题，或者仅仅是作为时事热点提及这个话题。虽然我们每个人对于移民问题的确切理解很可能取决于个人境遇，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态度和观念都建立在直接经验和媒体的视角上。 包括研究人员、记者、政治家和人民大众在内，许多人仅就移民问题的单一视角发表观点和参与辩论，却同时忽略了其他视角。有时候，这种做法是在刻意鼓励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有时候并非有意，或许是因为媒体报道自身的缺陷：媒体的内容往往快速产出，且其篇幅往往有限。

本章，我们旨在回答四个关键问题：

- 世界各地的媒体是如何报道有关迁徙与移民的话题的？
- 这些媒体报道对于公众，决策者和移民本身的想法和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
- 新闻工作本身的实践活动如何促成这些报道？
- 近来有关媒体和移民问题的研究经验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有何启示？

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媒体和移民是一对有争议的术语。时间地点不同时，两者的表现和变化形式也不同。本章认为，虽然众多研究倾向于关注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且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公认为移民目的地国的高收入民主国家，但这只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本章还考虑了被网站和社交媒体创造的，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识别、生成和共享的方法的新型沟通模式。[2] 这些信息可能是公众熟悉的新闻，也可能更接近娱乐和艺术作品。现代传媒的内容和形式尤其多样。 本章也指出，各国媒体对移民问题报道的差异反映了各国媒体系统运作的差异。在这里，媒体自由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即使是相对“自由”的媒体在其处理方式上也或多或少是公正与偏袒并存的。虽然我们研究的空间和范围有限，但我们尽可能的，尤其是从不同的地域性角度，来反映媒体对移民问题关注的多样化( 尽管在报道数量上很有限 )。我们审查了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 ,但也收录了( 在可能的情况下 ) 以初始语言发表的有关媒体内容的研究成果。

1 William Allen，研究人员，中心迁移、政策和社会 ( COMPAS ) 和迁移天文台 ( 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 )，牛津大学；Scott Blinder，政治学，麻州大学 Amherst 分校副教授；Robert McNeil，研究员，中心迁移、政策和社会 ( COMPAS ) 和头传媒 ( Head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迁移天文台 ( 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 )。

2 Beckett, 2010.

# 背景和语境

可以说，一直以来人类以应有尽有的方式谈论着移民这个话题：甚至阿塞拜疆 10000 年前的岩石雕刻都描绘了人们迁徙的画面。[3] 有关逃离迫害、为改善经济状况远行、谈论祖国和外国人、分享流亡经历的想法和故事贯穿了历史。[4] 但如今是什么使得移民问题——尤其是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变得如此重要？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反移民言论和许多国家的反移民政党取得了新进展。例如，欧洲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政治观念右倾的人，基于对移民政策的考虑，已经远离主流政党，流向所谓的“挑战者政党”。[5] 相应地，负面甚至是敌对的移民报道，也随着反移民政党的崛起和及其政治言论的得势而增多。[6] 政治辩论往往将移民作为替罪羊，将移民问题的复杂成因、影响和类型简化为几个易于重复提起的故事或只言片语。[7] 但仅将公众对移民的负面评价归责于媒体，则又把问题简单化了。其他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实际或想象中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更广泛的政策（如经济紧缩）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8]

语境的变化也会影响报道模式。其中两个重要因素包括媒体的自由度，以及媒体在数字世界中的运作方式。自由的媒体环境是指“政治新闻报道强有力，记者安全有保障，国家极少干预媒体事务，以及媒体无需承受繁重的法律或经济压力”。[9] 人们普遍认为，媒体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10] 因为媒体可以向选民报道时事进展，监督政府机构，让公职人员承担起责任而不必受到当事政府机构或其本人的过分干预。世界各地的媒体自由程度差距很大。2017 年，世界上 13% 的人口生活在出版自由的国家，而将近一半（45%）的人口生活在出版受限的国家。[11]

即使是在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新闻也常常报道政府和强势群体所偏爱的用语和话题。[12] 因为特别是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记者经常依赖政府官员为他们提供信息。世界各地媒体的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13] 比如在英美国家，媒体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自由”模式）。媒体也可以是政党的外围延伸（南欧国家“极化多元”的做法非常普遍）。在第三种模式中，媒体具有专业性和自主性，媒体代表和联系包括工会、自发组织和政党在内的众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北欧国家存在“民主社团”模式）。第三种模式的媒体总体上对于更多不同的观点更加包容，而自由和极化多元系统尽管在程度和原因上有差异，却往往更倾向于反映官方的政治辩论。

同时，民主和专制政权下的媒体报道也不一样。目前多数研究关注民主国家的媒体系统和新闻

3 Cherry 和 Leppard，2015。
4 Anderson, 2013.
5 Hobolt 和 Tilley，2016。
6 Wodak，khosravinik 和 Mral，2013。
7 Greenslade, 2005.
8 关于对移民态度更全面的看法，参见 Hainmueller 和 Hopkins，2014。
9 自由之家，2016：1。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在排名中包含了数字媒体及其制作人的分析，如博客和博客作者。
10 Zielonka, 2015.
11 剩下的百分之 42 的人口生活在出版受限的国家。自由之家，2017。
12 Entman, 2004.
13 Hallin 和 Mancini, 2004。

报道。然而在专制国家，移民和其他问题的媒体报道可能反映了国家利益。[14] 比如，一些人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很少报道俄罗斯联邦与中国边境关系，可能表明两国国家和区域精英对此问题变得越来越不重视。[15]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相继兴起。它们成为新闻来源（或许是分流），也在多方面改变了媒体领域。有些人认为数字化转型正威胁着传统报纸，因为网络允许用户随时随地获取各种信息，比如新闻、广告、体育报道和生活问题等。[16] 此，购买或订阅全版内容的报纸和杂志的必要性就降低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一项研究表明，近一半（46%）的美国市民就是如此。[17] 这个比例在一些只专注于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所有的网站的国家更高，比如巴西（70%）、葡萄牙（66%）、爱尔兰（52%）和加拿大（48%）。然而，这两个世界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比如博客：研究发现博客与传统媒体也在互相影响，有时甚至会引发后续报道，而有时候则是对报道内容做出相互反应。[18]

社交媒体也以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有时能够异常迅速地引发行动。例如，人们使用社交媒体来动员民众支持“阿拉伯之春”时期的抗议运动。[19] 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社区也利用社交媒体来呼吁公众支持某些面临驱逐出境威胁的移民者。[20] 但媒体的变化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获取、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出现了不平等，导致了所谓的“数字鸿沟”。[21] 这方面的风险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且又产生了新的差距。同时，社交媒体可能导致“回音室”效应或“泡沫”影响，因为用户看到的新闻仅仅是想法相似的朋友们认同后所转发的内容。[22] 这些媒体效应加强了政治的两极分化，尤其是为人们努力在移民政策上达成共识或做出妥协的局面带来了新的挑战。

# 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

## *移民观*

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大量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的媒体对移民问题采取了的负面态度。[23]2013 年至 2014 年年间，拥有高度人类发展水平的六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和英国），对移民问题不利的印刷和在线报道是有利报道的两倍还要多。[24] 这种差距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特别明显，加拿大和瑞士相对小一些。与此同时，我们抽选的人类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阿富汗、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的媒体不

14 Luo, 2014.
15 Sullivan 和 Renz, 2010。
16 Starr, 2009.
17 Newman 等 , 2016。
18 Meraz, 2009.
19 Khondker, 2011.
20 Patler 和 Gonzales, 2015。
21 Selwyn, 2004.
22 Sunstein,2017.
23 Philo, Briant 和 Donald, 2013。
24 McAuliffe, Weeks 和 Koser, 2015。

利报道也远远多于有利报道。这些国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媒体最有可能出现负面报道。此外，这两组国家的媒体对无序移民的态度最为负面。[25] 对特定国家媒体进一步的详细研究往往证实了这一普遍趋势。例如，2003 年到 2010 年间，丹麦和荷兰的报纸对移民的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相比之下荷兰报纸报道更为温和）。[26] 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研究表明，1998 年至 2005 年间，其移民报道（包括印刷新闻和广播电视）反映出这些媒体倾向于描绘移民群体的消极方面。[27]

但是，我们有理由谨慎对待这种消极的叙事。首先，负面报道并不是移民问题独有的。众所周知，记者通常倾向于强调大多数话题不利的一面。其次，负面新闻趋势之中也有例外。几个移民目的国和来源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他们的移民报道已朝着更为积极的——至少是更加中立的方向迈进了步伐，并且这种转变不是因为任何特别的事件。[28] 在特定的国家，例如瑞士和越南，即使在整体层面媒体格局变得更加极化，正面报道也有明显增加。[29]2000 年后，新西兰报纸也呈现了“更微妙和同情的报道”。[30] 此外，传统媒体的变化（以及传统新闻媒体以外的社交媒体的增长）为移民自己创作和推广突出移民问题的积极方面的报道提供了机会，之后我们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方面。

## *构架移民问题：竞争问题、不同方法*

移民报道不仅有正面和负面之分，而且呈现出各种问题、叙事和观点。虽然构架概念本身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定义，但为了本章叙述方便，以上角度可以宽泛认为是对构架移民问题的不同理解。[31] 认识到人们是如何定义构架非常重要。我们之后将会探讨，媒体构架如何影响人们对移民问题的认识。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媒体经常将移民问题看作是“法律和秩序”或者治安问题。[32] 例如，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意大利媒体普遍持有这种观点。[33] 英国媒体也曾认为移民是“非法的”，[34] 认为避难者和难民是“伪装的”或将其与恐怖主义威胁相联系。[35] 同时，1999 年到 2014 年年间，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英文报纸也往往报道移民是“非法的”，特别是马来西亚，这种认识甚为普遍。[36] 近期的研究认为，移民对经济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移民目的地国家的成本和财政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几乎不亚于对犯罪的影响。[37] 总的来说，法律地位、犯罪性和经济影响这些因素混杂于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之中，并相互关联。例如西班牙媒体对于拉丁美洲移民者的报道。[38]

另一种方法是将移民者从“本土”人口中区分开来，把他们描绘为对国家认同、文化或凝聚力

25 McAuliffe, Weeks 和 Koser, 2015。
26 van Klingeren 等，2015。
27 Boomgaarden 和 Vliegenthart, 2009。
28 McAuliffe, Weeks 和 Koser, 2015。
29 同上。
30 Spoonley 和 Butcher, 2009。
31 Cacciatore, Scheufele 和 Iyengar, 2016。
32 Suro, 2011.
33 Sciortino 和 Colombo, 2004。
34 Blinder 和 Allen, 2016b。
35 Esses, Medianu 和 Lawson, 2013。
36 Anderson, 2013.
37 Caviedes，2015.
38 Igartua, Cheng 和 Muñiz, 2005。

的威胁因素。美国媒体有拉丁移民威胁论，[39] 把拉丁美洲移民描绘为无法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人群。[40] 在中国广州，当地媒体也往往认为非洲移民是公共安全的威胁隐患，网络上甚至流传着“种族纯洁”的言论。[41] 同时，媒体也更加频繁的将反对伊斯兰教的民粹主义言论和文化、移民这样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比如 2011 年 7 月在挪威的于特岛和奥斯陆出现了有关白人至上主义恐怖袭击的公共辩论。[42]

媒体报道也可以通过非人性化的语言隐喻暗示将移民全部驱逐出境。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将移民比作自然灾害（通常是洪水）或者动物，尤其是昆虫（“群蜂”）。这种做法比较普遍，包括英国 [43]、澳大利亚 [44]、南非 [45]、美国 [46] 以及接受叙利亚难民的中东国家（详见“难民接受国和非接受国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在内的许多国家媒体都有类似的做法。[47][48]“非法”和“不规则”移民的新闻报道中也提到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威胁。[49]

## 难民接受国和非接受国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

被迫接受移民流的国家和远离冲突的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媒体报道可能也大不相同。一项[a]自 2011 年 3 月以来的调查，比较了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在线媒体有关叙利亚难民报道的差异，研究了哪一类国家使用“水”或“压力”这样的隐喻——例如难民潮将给社会各方面服务造成了压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作为难民接受国的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黎巴嫩、约旦、埃及和土耳其）的新闻报道在提及叙利亚难民时比非接受国（包括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使用更多的隐喻。这些隐喻选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把叙利亚人描绘成一个无法区分的群体，同时强调难民给接受国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记录隐喻的可见性和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理解媒体报道全球意义的重要部分。

a. Abid, Manan 和 Rahman, 2017。

与上述关于威胁论、人群区分和非人道品行的叙事不同的是，其他研究明确论证了一种人道主义构想，即“移民是不公平制度的受害者”。[50] 其中列举了比利时 [51]、法国 [52]、荷兰 [53] 等西欧国家的

39 Chavez, 2013.
40 在美国，按种族划分来论述并不新鲜，正如 Fores（2003）表明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媒体报道对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驱逐活动的影响。
41 Lan, 2016.
42 Wiggen, 2012.
43 Gabrielatos 和 Baker，2008。
44 Pickering, 2000.
45 Banda 和 Mawadza, 2015。
46 Santa Ana, 1999.
47 Abid, Manan 和 Rahman, 2017。
48 然而，正如 Salahshour（2016）探讨新西兰的情况，并非所有移民报道中的隐喻都是消极的：他们还可以沟通经济方面的积极因素。
49 Thorbjornsrud, 2015.
50 Thorbjornsrud, 2015.
51 Van Gorp, 2005.
52 Benson, 2013.
53 Bos 等，2016。

媒体对移民问题的一些报道作为案例。有趣的是，1990 至 2008 年间，韩国媒体曾受此构想主导，报道说：“大多数情况下，移民者被描绘成脆弱的受害者形象。”[54] 这种说法也出现在有关移民迁出的报道中（参见“罗马尼亚和孟加拉媒体对移民迁出的报道”文本框）。然而，这个构想常常与上文提到的其他观点同时出现。例如，马来西亚媒体根据其出版物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时而称避难者和难民是威胁，时而又称其为受害者。[55]

### 罗马尼亚和孟加拉媒体对移民迁出的报道

虽然许多研究专注于传统“迁入地”国家的媒体对移民迁入的报道，但也有一些关注“迁出地”国家的媒体对于移民迁出的报道。其中，有一项研究关注罗马尼亚大幅报纸对 2011 至 2012 年间该国的迁出移民及其对本国的经济汇款的报道。[b] 这些报纸倾向于将移民汇款看作本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然而也有少数媒体质疑移民迁出可能带来的技能流失和家庭分裂等问题。

另一项研究选择了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媒体作为研究对象。[c] 尽管孟加拉媒体承认了其工人在外国享有的机遇，但同时也担忧这些工人（尤其是女性工人）可能会遭受剥削和虐待。移民迁出问题是移民问题众多类型之一。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媒体对移民迁出的报道也同样褒贬不一。

b. Madroane, 2016。
c. McAuliffe 和 Weeks, 2015。

## *媒体报道与其覆盖范围的关系*

这种倾向也和媒体覆盖的地域大小有关。例如，将英国约克郡（英国政治实体之一的英格兰的一个郡）和威尔士（英国的政治实体之一）这两个地区的媒体对避难者的报道作为案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地方性媒体和区域性媒体工作的记者对移民的报道不尽相同，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有特定的网络关系和信息渠道。[56]

同时，对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两地报纸有关移民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与全国性小型报刊“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报道相比，地方小报尽管也对移民持负面态度，但它们更重视其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表现。[57]

这正好与先前在荷兰进行的研究相呼应。在荷兰，区域性报纸倾向于强调人情味，而忽略当地居民对移民避难的看法。[58] 这个模式与分歧的观念不谋而合：人们可能将移民看作全国性的问题，而从地

54 Park, 2014.
55 Don 和 Lee, 2014。
56 Finney 和 Robinson, 2008。
57 Cheng 等 , 2014。
58 d’ Haenens 和 de Lange, 2001。

方角度来看，他们会对其抱以赞成或中立的态度。[59] 然而，全国性辩论也会催生地方冲突和负面观念。[60]

为了探究覆盖范围究竟对移民报道有多大影响，另有研究对比了 2001 至 2012 年间加拿大和英国的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在这两个国家，失业率和实际移民人数这些地方因素并不会给社会整体框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61] 关于这一点的辩论阐明了媒体通常是如何针对某一特定语境产生其内容和效应的，因此很难得出大致的结论。

这种覆盖范围也在扩大，比如国际媒体也会报道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远距离观察可以改变报道的口吻和特定问题的显著性。例如，2014 年 2 月，澳大利亚媒体代表本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拘留中心发生的“暴动”进行了报道。尽管国际媒体质疑澳大利亚政府此举的合法性，[62] 并且加大了对被扣押避难者境况的关注，但它们仍然将这些移民描述得颇为不同。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探究新闻实践中的特定因素，或许对解释移民报道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帮助。

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的进步也助力网络媒体的研究。这些技术虽然仍处于开发之中，却已展现了传统报纸以外公众探讨移民问题的途径（参见“阿兰·库尔迪和席卷两千万荧屏的照片”）。例如，一项有关推特数据的研究显示，2013 年，当美国参议院就移民政策改革展开辩论时，移民问题的公众关注度呈现峰谷变化（其中有特定个体尝试引导公众舆论）。[63] 例如，一项有关推特数据的研究显示，2013 年，当美国参议院就移民政策改革展开辩论时，移民问题的公众关注度呈现峰谷变化（其中有特定个体尝试引导公众舆论）。博客和网上论坛提供匿名对移民问题发表言论的机会，而这些言论可能比传统媒体更强硬、更不近人情。[64] 尽管如此，它们同时也给了民众接触更多不同观点的机会。就拿韩国的网络社区来说，它比主流网络媒体包含更多对移民细致入微的描写。[65]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论坛依然将来自中东国家的男性避难者和难民与恐怖主义和性变态联系在一起，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公认的真正的难民”这一观念添油加醋。[66]

## 阿兰·库尔迪和席卷两千万荧屏的照片

2015 年 9 月，溺水死亡的叙利亚小难民阿兰·库尔迪（此前误报道为“艾兰”）的尸体照片席卷了全球两千多万荧屏，这主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对于这些照片造成的社会影响，有研究显示，初始推文中用的“难民”一词，不仅使其转发量一路飙升，而且将其从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传播到范围更大的中东地区受众，最后传播到世界各地。[d]

照片发表后迅速引发的余波中，众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德国和英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大对难民的支持的步骤。同时，对于这张照片究竟是如何对欧洲的难民辩论产生影响的、影响程度

59 Blinder 和 Allen， 2016a。
60 Hopkins, 2010.
61 Lawlor, 2015.
62 Laney 等， 2016。
63 Chung 和 Zeng, 2016。
64 Musolff, 2015.
65 Yi 和 Jung, 2015。
66 Rettberg 和 Gajjala, 2016。

有多大的问题上存在争议。[e]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事件标志着人们可以通过更多渠道对移民问题发表言论，这张照片也象征着欧盟紧锁的边境与孤注一掷穿越边境的偷渡者所承担的风险。人们得以质疑社交媒体作为众多内容的平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平台上的内容丰富多样，读者并不会认同所有，甚至会认为有些内容并不合适。

d. Vis 和 Goriunova, 2015。
e. Vollmer 和 Karakayali, 2017。

媒体内容也包含许多主题和体材。例如，对西班牙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如情景喜剧、系列片和故事片）的研究发现，剧中的外来移民角色比例不仅远远小于实际生活，而且他们都被演绎为受教育程度低、智商低、没有稳定工作而且更为暴力的形象。[67] 另有研究发现美国广播媒体的做法与其如出一辙。[68]

媒体对恰好有移民背景的运动员的报道，也提供了突出、重新架构甚至忽视了民族认同和融合问题的机会，[69] 例如有关法国国家足球队的报道，[70] 以及英国报纸对本国有移民背景的奥运会选手的报道。[71] 而且，斯洛文尼亚广播在报道已入籍的奥运会选手（多数为非洲裔）时，用了“进口的”、“不真实的”之类的名词，突出强调他们与观看报道的本土民众的差异。[72]

## *移民者主导的媒体和新闻业*

在强调移民者与本土民众差异的报道中，探究移民自身如何接触、创作和分享媒体内容是十分重要的。迎合各色移民读者的新闻编辑室，以及瓦解和巧胜传统媒体的数字媒体，给移民报道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例如，美国的西班牙语媒体与英语媒体的对比研究表明，前者对移民问题的报道更加正面，对受众的看法有潜在影响。[73] “移民新闻业”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其报道在许多风格、形式、动机以及与原籍国不同程度的联系上都有所不同。[74] 加拿大和美国的中文媒体，[75]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委内瑞拉记者 [76] 以及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黑人报对纸西印度群岛移民者的报道，[77] 都证明了移民者能以各种不同方式与原籍国进行联系与交流。例如，难民们通过推特和脸书直接分享自己的经历，这表示：“这一看似自我证明的转向，似乎给难民提供了潜在的自主管理自身社交媒体形象的机会。”[78] 这一技术可以延伸到其他媒体和地区。然而，正如我们后面将讨论的，这些信息和报道方式的有效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意图。

67 Igartua, Barrios 和 Ortega, 2012。
68 Mastro 和 Behm-Morawitz, 2005。
69 Maguire, 2013.
70 Garcia-Arjona, 2012.
71 Allen 和 Blinder, 2012。
72 Ličen 和 Billings, 2013。
73 Abrajano 和 Singh, 2009。
74 Shumow, 2014.
75 Zhou，Chen 和 Cai, 2006。
76 Shumow, 2012.
77 Tillery 和 Chresfield, 2012。
78 Rettberg 和 Gajjala, 2016。

# 媒体报道对公众认知、政策制定和移民者的影响

媒体报道，通过它所有的形式，联系着更广阔的世界。媒体提供的重要信息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影响着政策制定者的优先议程，也影响着移民者的抉择。

## *有关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认知*

事实不断地提醒我们：“新闻界极其成功地告诉读者们他们应该思考些什么”。[79] 上一节展示了媒体（不仅仅是传统报纸，还有其他形式的媒体）对移民的报道在全球范围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描写和手段是如何影响公众想法、政策制定和移民者本身的呢？

20 世纪初期，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我们对于问题的思考是基于“我们脑海中的画面”。这些“画面”，要么是我们自己通过直接经验创造的，要么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80] 这个想法明里暗里已构成研究媒体如何影响公众想法的基础：改变“画面”是否同样可以改变认知和观点？[81]

这些认知的其中一个方面涉及这个国家的移民者人数。人们往往会高估少数群体的真实人数，由于他们将移民看作是“威胁”（甚至夸大这个“威胁”），抑或是因为他们接受并利用了错误的信息。[82] 媒体往往会助长这些想法、促进这类信息的传播，尤其是遇到像移民这样的象征性问题，而个人对于各种移民和难民问题往往缺乏直接经验。[83]

改变人们手头的信息，能够对公众就移民问题的看法产生影响。[84] 例如，欧洲和美国的调查实验发现，公众是否得知移民人口的准确信息对其问题的认知会有影响。研究人员随机告知了几个小组的参与者他们各自国家真实的移民人数信息。在大多数国家，相比不知道真实信息的参与者，得知了真实信息的参与者说自己国家移民过多的可能性更小。[85] 在希腊、意大利和英国，这个差异尤其显著；但在法国和俄罗斯，这个差异会相对小一些。[86]

另一个方面是对于移民人口性质更多的了解：为何到来？从哪里来？例如，当英国公众认为自己国家的移民都是避难者或劳工时，官方数字显示，事实上当时学生才是最大的移民群体，但媒体的移民报道中却很少提到学生群体。[87] 与此同时，在芬兰，有相当数量的公民（22%）认为自己国家大多数移民并不来自俄罗斯（实际上芬兰多数移民来自俄罗斯），而是来自索马里和其他一些地方。[88] 在这个案例中，依赖印刷媒体获取信息的芬兰人比主要通过看电视获取信息的芬兰人对于移民的认知要更加准确一些。

---

79 Cohen, 1963.

80 Lippmann, 1997.

81 在荷兰，提供移民人口比例信息并未改变公众认知。而实际上在瑞典，这种做法略微提高了认为移民人数过多的民众的比例。

82 Herda, 2010.

83 Vliegenthart 等，2008。

84 Grigorieff, Roth 和 Ubfal，2016。

85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4.

86 在波兰，提供移民比例的真实信息并不能改变公众对移民的认知。在瑞典，这种做法实际上稍微增加了认为移民太多的人口的比例。（Transatlantic Trends, 2014）

87 Blinder, 2015.

88 Herda, 2015.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这些差异对塑造公众移民观念很重要。同时，描绘现实的不同方式也可能影响认知（参见“数字和叙事对移民者更具说服力吗？”）。欧洲和美国的研究显示，当人们认为自己国家有大量移民人口时，就更倾向于反对移民。[89] 这些认知（并非外来移民人口真实数量）与反对移民的观点密切相关。[90] 同时，芬兰、[91] 西班牙 [92] 和美国 [93] 的研究证实，意识到移民是来自外国（尤其是条件差国家）群体的公民也倾向于反对移民。可以肯定的说，媒体报道在提供移民人口数量和性质的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能对舆论产生影响。

## 数字和叙述对移民者更具说服力吗？

有关移民和种族融合的信息有多种形式，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移民和本土受众。一项研究 [f] 分别对荷兰本土的年轻穆斯林女性和居住在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的穆斯林民众（一些移民和移民后代）进行调查，两者呈现相同的结果。这些信息不仅出现在个人的表述中，也可以作为数据资料反映整个穆斯林女性的情况。

阿姆斯特丹出生的穆斯林移民子女（研究中称其为“第二代”），对叙事证实反应更为强烈，对男女平等、性少数群体权利和世俗主义等公众生活中的观念的态度更为开放。同时，尽管不如第二代参与者反应强烈，当被提供数字信息时，穆斯林国家出生的移民（研究中称其为“第一代”）对这些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甚至在考虑到人们对数字的舒适度的情况下，以上结果依然不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差异？研究表明，可能是因为生长在偏向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会与他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产生共鸣，而生长在偏向集体主义社会的人更会被那些能表现集体观点和经历的数据所触动。尽管还需要在其他国家进行研究以确认这点，但这个发现确实表明了信息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对各种类型的观众来说都很重要。

f. Wojcieszak 等，2015。

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比如焦虑和恐惧，也会改变媒体对人们的影响效果。这是因为情绪会导致人们按照自己的感觉解读信息。比如，焦虑的情绪加上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的负面信息，美国人会产生更加强烈的敌对情绪，[94] 并且会搜索更多的负面消息。[95] 尤其是对经常使用媒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96] 西班牙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此研究将摩洛哥裔而不是拉美裔的移民和犯罪联系在一起。[97] 一项针对荷兰人的研究发现，愤怒也是影响人们看待移民的一种重要情绪。[98] 而对于欢乐、热情和同情等积极情绪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我们却知之甚少。[99]

89 Alba, Rumbaut 和 Marotz, 2005; 见 Hooghe 和 de Vroome, 2015。
90 Strabac, 2011.
91 Herda, 2015.
92 Igartua 和 Cheng, 2009。
93 Brader, Valentino 和 Suhay, 2008。
94 Brader, Valentino 和 Suhay， 2008。
95 Albertson 和 Gadarian, 2015。
96 Seate 和 Mastro, 2016。
97 Fernandez 等，2013。
98 Lecheler, Bos 和 Vliegenthart，2015。
99 Griskevicius, Shiota 和 Neufeld, 2010。

## *媒体和决策*

除了影响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媒体也会影响决策者的议事日程。[100] 针对此领域的研究表明，媒体对立法者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所报道的问题和被选中的媒体（详见文本框中‘英国新闻界和英国脱欧’）。[101] 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比利时，纸媒似乎比广播新闻对决策者影响更大，特别是在轰动一时的，具有象征性的问题上。[102] 而其他研究表明在一些更加常见的问题上，例如通货膨胀，媒体对决策者的影响就没那么重要了。[103]

### 英国新闻界和英国脱欧

在 2016 年 6 月英国脱离欧盟成员国公投（亦称英国脱欧公投）开始之前，英国纸媒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炒热“净移民”增加、感知的增加速度和移民总量上，而非公投本身。2013 年到 2014 年间，英国对于欧盟移民的报道激增，还着重对罗马尼亚移民进行了负面报道。某些评论者认为，脱欧公投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的欧洲统一怀疑论者大行其道，反移民纸媒对欧盟移民的批判威力显著。[g] 可以说英国纸媒对移民问题的详尽报道规划了从 2006 年就开始逐步上升的民粹主义倾向。然而，想确切证明媒体报道和政治事件结果的联系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像英国脱欧这样复杂的事件。公众察觉事件有很多来源，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最近在英国的欧盟移民人数的增长也要计入考量。[h]

g.Cummings, 2017。
h.Vargas-Silva 和 Markaki, 2016。

媒体的影响也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内容（或者媒体不报道：详见文本框‘选择不报道移民问题：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策改变’）是否对执政党和官员在政治上有利。[104] 一项涉及瑞士议员的实验表明，对于“一党独大”问题进行的负面报道能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反对者中年轻议员居多。[105] 荷兰和瑞典的更多证据表明，政党更想回应适合他们的平台的媒体报道：“正确的新闻导向能帮政党实现政治目标。”[106] 同样的情况也延伸到了其他政府层级，比如市级机构表示，媒体在帮助形成本地的政策议程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107] 与之对比，在中国，中央政府对传统媒体和一些网上媒体平台控制力度更大，商业媒体和非官方媒体似乎不会过多影响“官方”政府政策讨论。[108]

100 Baumgartner 和 Jones，1993。
101 Walgrave 和 Van Aelst, 2006。
102 Walgrave, Soroka 和 Nuytemans, 2007。
103 Soroka, 2002.
104 Thesen, 2013.
105 Helfer, 2016.
106 Van der Pas, 2014.
107 Scholten, 2013.
108 Luo, 2014.

## 不报道移民问题：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策的改变

探讨媒体对移民问题和移民者的报道内容仅仅是一个方面。媒体没有报道出来的叙事通常也很重要。一项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记录了澳大利亚媒体对于避难所的报道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i]

20 世纪 70 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想要描述寻求政治避难者人性化的一面。但大部分媒体组织无视这些诉求，他们更希望突出避难者和他们同谋的负面形象。这种不愿报道温情故事的后果就是不断推进政策，几十年来公众倾向于厌恶避难者，最终导致了澳大利亚对寻求避难者实施离岸处理政策。

i . Doherty, 2015。

### *对迁徙与移民的影响*

面对来自东道国大多是负面的媒体报道，移民会以几种方式来做出反应。就像美国的拉丁美洲裔移民那样，移民们有时要强调他们自己是勤劳的人，和那些移民犯罪者不一样：“……这些移民需要表示自己具有建设性公民的品质……因为这样会抵消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109] 与此同时，那些表现出对外国人歧视的媒体会让移民们产生想法，移民会认为东道国的公众都对他们有偏见。即使在智利的南美洲移民没有亲身经历过歧视，他们也总认为智利社会是充满歧视的，因为他们经常收看智利的媒体节目，这些节目对拉美人有刻板印象。[110]

总体来说，东道国的媒体也会从其他方面对移民的想法、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澳洲布里斯班的哈扎拉人根据他们自身的动机和想法，会有选择地从媒体节目中学习东道国的知识。[111] 他们也会收看原籍国频道或东道国频道的针对移民者自己的的节目，以此来保持他们国民性和民族身份。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韩国的亚洲女性会收看故乡频道来回忆她们的母语并且了解家乡时事。[112] 生活在德国和以色列的前苏联俄裔家庭也会收看东道国节目、家乡节目或国际频道来帮他们一边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一边将故国文化传承给下一代。[113]

同时，收看西方媒体会改变移民们对于故国的看法。例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阅读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敏感的民族争端和国民经济不佳表现的报道后，变得对中国政府持怀疑和批判态度。[114] 为移民人群服务的网络平台和网站，也能给他们提供和国内一起讨论国内社会问题的机会。津巴布韦的社交媒体就是这样的状况，网民在民族认同和历史事件的讨论上互相反对驳斥。[115]

一方面，媒体报道的事件可能大部分有教育意义，提醒人们关注现实问题或机遇未来。在 1996 年到 2006 年尼泊尔内战中，一项针对被迫迁移人群的研究涉及但没有明确验证某个方面，

109 Menjivar, 2016.
110 Etchegaray 和 Correa, 2015。
111 Tudsri and Hebbani, 2015.
112 Yoon, Kim 和 Eom, 2011。
113 Elias 和 Lemish, 2011。
114 Tai, 2016.
115 Mpofu, 2013.

即媒体对暴力冲突和死亡的报道可能会提升公众的忧患意识，进而影响到个人的迁移决定。[116] 与此同时，黎巴嫩的医学生决定移民到海外工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线上媒体广泛的国际营销。[117]

另一方面，媒体更广泛地影响了迁移的期望和动机。例如，一项对……她们直言无忧美国的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女性的深入研究，展示了媒体对“美好童年”的描述是如何影响到他们：“无虑的理想童年和她们在原籍国所经历的童年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母亲移民的决定因素。”[118] 媒体还为意大利南部的巴多拉托村塑造了一个难民避风港的形象。移民者和避难者会借鉴媒体和其他来源，以此“来想象东道国和移民之间的跨国界情感联系和展望未来的机会”。[119]

## *理解影响媒体对移民问题报道的因素*

为什么全世界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都不一样？本小节考虑一系列解释相关新闻报道习惯的理由，比如媒体所在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以及新闻编辑和从业者个人的日常决定。

在媒体全开放和半开放的环境中，涉及移民的某些报道还要考虑到经济因素。大部分媒体都是商业公司，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拿新闻内容卖个好价钱来维持生意运作。[120] 所以，编辑就要了解购买其产品的受众。

媒体公司是要将产品卖给那些要么完全反对要么一味亲近移民的人，他们会支持而不是反驳观众的观点。[121] 建立信任是很复杂的。这个过程需要公众认为媒体是公平和客观的，包括可能要尝试提出与主流相反或不同的观点，即使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也可以。媒体社团和组织的因素也会影响报道的内容，比如就业。具有创作媒体产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零工经济”来招揽自由工作者。[122] 这种不稳定的雇佣关系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可能不太想在一些引起社会争议的话题上挑战雇主，即偏离公司认为合适的既定方式来为观众报道移民问题。

选择、精简和编写故事的日常流程也会对移民报道产生影响。人们挑选新闻时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往往政治性模糊或想当然。[123] 在欧洲国家包括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波兰和英国，会有几个因素影响移民报道的内容。这些因素包括对新闻本身的内在价值判断、涉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决定最终发布内容的日常工作、编辑对新闻的立场和新闻记者对不同新闻来源的信任程度。[124] 当初拿到“第一手新闻”就需要了解新闻来源是为了推进媒体自己的议程而通过私下手段获取的。[125]

在承受来自编辑、公司和观众（真实或者假设的）压力之内，新闻记者的背景也会影响到他

116 Bohra-Mishra 和 Massey, 2011。
117 Akl 等 , 2007。
118 Horton, 2008.
119 Nikunen, 2016.
120 Croteau 和 Hoynes, 2006。
121 Tsfati 和 Cappella, 2003。
122 Markova 和 McKay, 2011。
123 Schudson, 2011.
124 Gemi, Ulasiuk 和 Triandafyllidou, 2013。
125 Peterson, 2001.

们如何报道移民问题。[126] 例如，一项针对在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工作的德国记者的研究[127] 表明，拥有移民背景能为他们的职业带来好处：这个背景能为他们提供打入关键组织内部的机会，或在特定环境下体现出专家水平。另一方面，这反而会导致“装门面主义”，记者会觉得自己被雇佣仅仅是因为他们假设的族群优势和彻底的文化排他，并且被看作弱势群体。有些媒体公司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通过多元化训练来培养雇员们在强化的社会环境中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这些项目或许可以给个体记者带来更多好处，比如使他们拥有着更大的人际网络，它们对挑战更深层的，更机构性的偏见却不是一样有效。[128]

## 总结：意义和未来的研究

我们已经讨论了全世界媒体对移民报道的不同方式；这些报道是如何影响移民和决策者的想法和行动的；以及这些报道为什么采取这些形式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们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未来会变得怎样？

鉴于媒体对移民问题的负面报道，且具有的广泛影响，媒体该如何谈论这样复杂多元的问题因此变得突出。一种观点认为，能够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新闻自由，拓展了我们的《权利法案》，增加了说服权的内容。”[129] 因此，我们要承认，各种形式的媒体在公众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新闻媒体总是和特定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我们在譬如移民等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吗？或者我们是不是被迫同意了某种结论，而这不是我们原本想选择的观点？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个人不应该总是被教唆去做一些陌生而合理的政治选择。相反的，媒体等信息来源应该提供原始材料，帮助读者运用心理捷径来了解超出个体直接理解范围的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但前面谈到，有些媒体公司却将移民比喻成灾星，强调移民可能带来代价和威胁，从而渲染移民问题和移民人群的负面形象。因此促进移民报道转变成合理、不紧不慢，并且远离预设怀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具体如何实施还不清楚。（其中一种解决方法详见文本框‘改变移民问题的叙述：通过商业途径解决问题？’）[130] 但媒体有正当理由承认移民潜在的代价和威胁，进而讨论不同类型的移民问题和相关的影响、妥协和后果。[131]

126 Cottle, 2000.
127 Graf, 2010.
128 O’ Boyle 等，2013。
129 Bernays, 1947。
130 Triandafyllidou, 2013.
131 Migration Observatory, 2015.

### 改变对移民的描述：要走商业道路吗？

对英国媒体中反移民报道的其中一个回应是发起“停止资助仇恨”运动。有些媒体故意渲染移民负面形象，这项运动针对和这些媒体一起合作宣传的公司，从而致力于通过经济途径作出改变。例如，此运动宣称成功说服乐高公司终止与《每日邮报》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此策略的批评者认为，如果大公司被鼓动使用它们的广告预算，给新机构的编辑方针施加压力，那这对于自由民主制来说是坏的先例，令人不安啊。[j]

j . Ponsford, 2006。

随着网上和社交媒体飞速增加，变得更多样化，它们也带来处理误导、虚假报道的问题。例如，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随后涉及移民的政策等等题目，都被假新闻困扰不已。人们故意制造这些新闻，却几乎没怎么考虑它们是否会被揭露。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移民故事在报道中司空见惯，正如在一篇恶名昭彰的德国文章中看到的那样（还有后来被正式撤回），报道了移民在法兰克福发动了“袭击”，[132] 还有英国《太阳报》取了“天鹅烘焙”的标题，宣称寻求庇护者偷猎了女王的天鹅并在英国的公园里烹制。[133] 然而，我们看到的那些新闻很可能只代表了虚假新闻的冰山一角。社交媒体若要让特定的观众获知政治信息和新闻十分容易，而这些传播方式却很难察觉和审查。例如，有一小部分易说服的受众，社交媒体会通过社交媒体动态联系他们，这种微瞄准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134]

然而，虚假新闻并不是新概念。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制造虚假或至少是可疑的信息是一种标准的宣传手段。此外，这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包含许多目的的多种形式集合：从可能无意中误导人们的信息，到故意制造欺骗性的消息，再到我们（正确或错误地）归咎于反面想法的标签。[135] 因此，虚假消息敦促人们重新评估使用媒体的方式——或许重新求助有威望和可信度的媒体，或者使用核查事实的机构，和其它研究证据来源。[136]

然而，这种可能的倒退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虚假新闻、定向消息和快速按需产生的信息是否合力侵蚀着我们对自由媒体的信心，对发现和努力实现利于社会发展目标十分不利。已知的虚假新闻为政客和其他人提供机会，他们出于政治原因，用“虚假”标题封杀其厌恶的真实报道。还有可能极端政治理念在网上舆论中生根发芽，成为了一种回音室，里面的人们只收到来自同一种政治理念的消息和情绪。

## *媒体和移民的未来*

显而易见，媒体影响了我们对于移民的看法，但其对我们行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不同环境下的

132 Eddy, 2017.
133 Medic, 2004.
134 Bennett, 2016.
135 Beckett, 2017.
136 Graves 和 Cherubini, 2016。

诸多因素。确实，关于媒体力量的共识在数十年间发生了改变。[137]

我们概述了媒体对移民的报道、媒体的影响力和一些影响新闻报道的新闻业因素，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领域：

1. 需深入研究媒体在新闻中转国和原产国的角色，特别要深入研究移民自身使用并偏好哪些媒体类型。这对于弄清信息是如何塑造认知、以及塑造的深度至关重要。

2. 进一步寻找证据，包括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和情绪以及移民政策是否塑造公众认知、如何塑造公众认知。关于流动性的政策活动在研究领域内外都有价值。应用研究可以帮助一系列团体开发交流干预手段，提高接下来听众和话题的交流效率。

3. 需要更加关注不同类型的媒体系统，它们将会（或将不会）撰写有关移民的不同类型的新闻。

4. 世界上存在显著不同的经历，意味着将大范围产生有关特定环境中媒体适宜角色的公开辩论，推动政策、民间社会和研究领域中已经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发展。

这些结论也提出了更多的伦理和政策问题。在不过度限制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应对虚假新闻和宣传做些什么呢？在报道移民问题上应怎样保持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动机的恰当平衡呢？我们认为个体，例如阿兰·库尔蒂（Alan Kurdi），比数百篇经过严谨研究后写出的论文对舆论的影响更大。媒体应如何用大量真诚但不哗众取宠的报道制衡这种强有力的形象呢？

这类问题会在各类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以不同方式进行讨论。因此，研究制造方和消费方应认识到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方式可以总结媒体的角色或改变媒体对移民的报道（若要了解已经采取的行动，详见例子“联合国针对移民和媒体正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文字框）。不仅移民自身是个饱受争议的多元现象，包含各种各样的变数，而且媒体中也包含动态的、多层次和多站点形式的交流。

## 联合国针对移民和媒体正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共同”（TOGETHER）倡议（www.together.un.org）是一种调动联合国、成员国、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社区级别研究员的全球行动，以增强针对移民和难民的凝聚力。它通过使用广泛的媒体，展现移民带来的共享利益，承认东道社会的正当关切。“共同”倡议致力于与全球社会交流与接触，特别是通过移民讲述自己的故事。自 2016 年发起以来，已在国际上主办了许多活动，包括支助电影节、工作坊和研讨会等。

137 Cacciatore, Scheufele 和 Iyengar, 2016。

KHALID KOSER
AMY CUNNINGHAM

# 9 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1]

## 引言

数十年以来，研究表明国际移民可以为介入各方带来大量益处。然而，从全球来看，许多反映出不同程度民心所向的政治领导人把移民者和移民现象与越来越严峻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联系起来。正如本章所强调，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比作案者更可能被暴力极端主义伤害，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然而，北美、欧洲和其它地区的一些政治团体认为，大量流入的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者中可能混入恐怖主义分子。

有时，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者的确会袭击移民接收国社会。而且这也见怪不怪了：移民和离散的团体过去曾介入恐怖袭击，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恐怖袭击。当下，人们关切返回国内的外籍恐怖圣战者 (FTFs) 若不被捉拿，可能会给他们的原籍国带来威胁，但这些人主要是上面谈到国家的国民。

在承认移民（或难民）有可能诉诸极端暴力的前提下，我们面临一个风险，即发生在当下或过去的孤立事件，都会被不顾时代背景的一概而论，从而被投射到未来，并被用作支持大量移民和庇护者流入会给国家和地区安全带来威胁这个说法的依据。这反过来能影响政策决定。

由于意识到这是个会吸引大量公众和媒体注意力的敏感话题，本章打算全面探讨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的关系。分析移民者和暴力极端主义间的关系十分必要，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移民者曾制造一些孤立的暴力极端主义事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第二，我们要把数据和证据带到通常被误导的公众辩论中，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辩论中缺少的重要研究和数据，这点十分重要。第三，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是有些联系，但这并不等同于平时引起关注的那些联系。最后，除非加强实施有理有据的政策和干预手段，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横行，否则激进化的移民在将来会带来更大风险。

本章剩余内容围绕三个部分。首先是一个简短的定义和数据概述，这个部分强调进行分析时需逻辑清晰的必要性，指出缺少可靠数据的问题，并突出如何辨别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随后，按照“移民循环”的逻辑，从移民离开到定居，有时会回归。这是典型的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相互作用的简单分类研究。本章最后是一系列对未来政策辩论的初步揭示。

---

1 Khalid Koser, 执行主管，国际社区参与和重建基金会（Global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Fund）；Amy Cunningham, 高级顾问，国际社区参与和重建基金会（Global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Fund）。

# 定义和数据

应对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关系的关切，我们面临的部分挑战是使用术语不精确。例如在欧洲的辩论中，公共话语中几乎不区别移民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然而他们是分开独立（但有时重叠）的法律和政策类别，连带着不同的权利和责任；同样地，在解释个人激进的原因时，可能个人经历比合法国籍地位更加重要。本章在讨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时，基于现有有限的研究，会点明哪一类人群是研究重心，以及移民经历在哪种程度上会起作用。虽然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国内移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IDPs) 会激进成暴力极端主义者，但几乎所有讨论的例子都涉及越境或国际移民。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移民者、公民和定居下来的少数族裔。欧洲发生的一些近期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袭击，是由近期到达的寻求庇护者或移民者发动的。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离开欧洲成为圣战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些欧洲国家的公民和移民者的后代（有时被称为第二和第三代移民者）。绝大部分情况下，归国圣战者都是接收国的公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针对不同情况要采取不同的恰当干预措施。例如，近期到达的移民者和寻求庇护者发动的种种袭击启示我们要加强移民管理；然而具有移民背景的欧洲公民离开欧洲，则表明一体化长久以来的失败，从而导致社会排斥。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待遇，移民者或许会被驱逐出境，但公民却不会。（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一些国家提出动议，要求剥夺归国圣战者在定居国的公民身份。由于在定居国他们有双重公民身份，因此他们可能符合被驱逐的条件。）

研究分析还有其他妨碍，因为既没有清晰定义暴力极端主义是什么，也对人们激进的原因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更不清楚是什么环境滋生了暴力极端主义（所以我们尚无法得出最佳的干预措施）。联合国和欧盟都没有作出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正式定义。[2] 一些国家在本国的国内政策和战略中对其作出了定义，但通常各不相同，如在暴力极端主义是否属于政治问题还是涉及更广泛领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例如，美国政府采用了广泛的定义，认为暴力极端主义是“倡导、参与、准备或支持以意识形态为动机和借口的暴力以达到社会、经济或政治层面的目标”。[3] 一些评论员认为在定义上达成共识至关重要；而另一些则认为这会带来风险，使得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遥遥无期。[4]

移民和恐怖主义的一个具体交集是联合国对圣战者的明确定义，即“到除了居住国 / 国籍国外的一国旅行的个人，旨在从事、筹划或者参与恐怖活动，或者提供 / 接受恐怖主义培训，包括牵涉到武装冲突。”[5]

引起暴力极端主义的动因通常归类为“推力”和“拉力”因素。推力是“……为暴力极端主义或叛乱势力兴起与扩张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因素”，而拉力多与金钱或心理状况有关，涉及“……个人在团体或者参加活动中获得的奖励”。[6] 人们普遍认为，“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进程是在特

2 Glazzard 和 Zeuthen, 2016。
3 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
4 Koser 和 Rosand, 2016。
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4。
6 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

定背景下独立形成的，同时是个别过程。何况一些术语的概念，例如“反对暴力极端主义”（CVE）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PVE）也存有争议。全球合作安全中心指出：“……尽管 CVE 本职工作是处理恐怖主义事宜，而它为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防止社群紧张、区域不稳定和战争，都表明了它奉行鉴别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宗旨。”[7] 尽管关于移民者和移民现象，特别是不规则移民的数据统计系统仍然很不发达，其数据在分析暴力极端主义问题上可能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是，该等数据比暴力极端事件的数据收集更稳健。即使有相关数据收录在案，但数据内容更多关注的是暴力事件及其受害者，而不是犯罪分子。2016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它分析上年度恐袭的全球数据）[8] 显示：2015 年 72%的恐怖主义致死事件发生在以下五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有关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的交叉数据甚至更少。这段内容后紧跟一段详细的说明——难民专员办事处报告称，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GTI 十大国家”中已确定的三个国家，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和索马里，2015 年产生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难民。[9] 从个体角度分析数据，例如关于预先筛选的移民者，和高举安全旗帜适合难民安置的候选人的数据很少；无论是不是移民者，收录的数据里都没有暴力极端主义罪犯的简明概况。此外，国内外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还远远不够，国家对移民者，特别是不规则移民的确认和归类方式缺乏统一性。本章并不试图提供直接的技术建议，而旨在强调各部门需实现更协调集中的信息共享。此外，国内外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还远远不够，国家对移民者，特别是不规则移民的确认和归类方式缺乏统一性。本章并不试图提供直接的技术建议，而旨在强调各部门需实现更协调集中的信息共享。

暴力极端主义袭击大部分发生在非经合组织国家，绝大多数的难民和失去故土家园的人民，以及约有 50% 的移民者都来自这些非经合组织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数据几近缺失。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间关系的系统分析和结论的得出，都因各种数据集合的漏洞受到严重妨害。

最后有一个警告书不得不提——部分来自前面确定了的术语定义与数据统计的挑战；在考察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时，我们须从两者的关联中分析因果关系。或许有些难民在逃离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直接侵害；可能是因为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例如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开家园。部分移民者和难民或许是因为悲惨的移徙历程而自发施暴；还有一部分人是基于他们移民的目的国情况，或是出于与以上两种况情无关的原因。某些情况下，极端主义分子冒充移民者发动恐怖袭击。部分移民者可能会积极寻求机会，接近暴力极端主义，而另一部分则对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人员招聘没有抵抗力。[10]

7 全球合作安全中心，日期不详。

8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6。

9 联合国难民署，2016。

10 对于这种联结更深入的分析，我们推荐读者阅读 Schmid, 2016。

# 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一种分类

可以用四种类型勾勒出暴力极端主义和移民之间的交叉关系，移民过程基本遵循迁移周期的逻辑——从出发，过境到定居（有时是返乡）；具体是：（一）暴力极端主义是造成流离失所和移民浪潮的驱动因素；（二）移徙过境、无家可归的人以及难民的营地和中心都存在激进化的风险；（三）恐怖主义向移民和避难潮渗透的风险；（四）融合困难可能导致对部分群体的社会排斥。最后一个交叉点——即移徙循环的结束，但由于缺乏数据和相关分析而未被包括在该循环内——存在移民返乡的可能性，但如果返乡再融合这个过程失败了或未能持续进行，可能会加剧某些归国者的暴力极端主义。[11]

## *暴力极端主义是造成移民和大批流离失所者的动因*

上述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与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数据浅显的比较，至少暗示了暴力极端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与难民离乡之间的某种联系——无论是因果还是相关。

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被迫移民上——也就是将难民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其他非自愿离开家园的人——重要的是区分从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直接侵害与间接影响而逃离的受难者。当今世界还有很多人仍可以明确演示出来，他们正在拼命逃离极端主义威胁，是暴力极端主义集团的目标。黎凡特的一位宗教少数派基督徒就是其中之一：据《经济学人》报道，截止至 2014 年，180 万叙利亚基督徒中有 50 多万人无家可归。[12] 另一个例子是尼日利亚北部有大批的流亡者：有证据表明，民众被迫离乡很可能是“博科圣地”刻意实施的战略，“博科圣地”早些时候是在乌干达北部的圣主抵抗军。在东南亚地区，包括缅甸若开邦，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是宗教少数派而受到暴力侵扰，流亡在外。

同样的，许多人可能没有直接受到暴力极端主义威胁，而是因为间接影响，例如暴力极端主义破坏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或造成社会福利提供中断，不得不背井离乡。[13] 有证据表明，阿富汗部分民众因反恐措施的影响而不得不在国内迁移。[14] 除了被迫移民和自愿移民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移民者不是因为受到直接侵害或间接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在允许暴力极端主义蓬勃发展的国家看不到未来。[15]

11 Koser 和 Kuschminder, 2015。
12 经济学人，2014。
13 Connor, 2016.
14 Koser, 2013.
15 Cunningham 和 Koser, 2015。

## 拉丁美洲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流亡

从历史上看，拉丁美洲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存在严重分歧，包括为打倒在任政府而发动武装叛乱运动。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西半球进行了历时最久的暴动起义，直到 2016 年 12 月 1 日，国会批准叛军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的和平协议，暴动才得以平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成立于1964年，旨在应对永久性的土地纠纷和日增的不平等现象。该组织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政府安全部队。然而，平民绑架事件，社会集会爆炸以及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也是司空见惯。[a]2017 年初，哥伦比亚境内有 700 多万流离失所者和 34 万国民以难民的身份居住在邻国，包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b]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并不是造成哥伦比亚出现大规模难民唯一的暴力组织。据悉，民族解放军（ELN）是由美国和欧盟共同认定的恐怖主义集团，它以绑架平民索取赎金，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实施暴力行为而闻名。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西半球进行了历时最久的暴动起义，直到 2016 年 12 月 1 日，国会批准叛军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的和平协议，暴动才得以平息。

在其他拉美国家如秘鲁，暴力极端主义已经被“光明之路”等共产主义团体所驱使。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光明之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分别引起暴动，造成全国数万人丧生，数十万人被迫移徙。[c] 尽管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曾经无处安身的人们大多返回故土，但余下的秘密组织仍在该国境内运作，估计有六万两千人依然处于长期的流离失所状态。[d]

a.Sullivan 和 Beittel, 2016。
b. 联合国难民署 , 2017。
c. 经济学人 , 2017。
d.IDMC, 2017。

## *难民营的激进化*

难民营（同时容纳无家可归的人）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场所，起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难民营可能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圣战者休养和恢复的基地。[16] 例如西南非洲国家解放军（SWANLA）在安哥拉占用纳米比亚难民定居点，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组织阿富汗难民营，还有尼加拉瓜反叛分子和柬埔寨红色高棉人组织边境难民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大马士革城外的耶尔穆克营利用难民作为达伊沙圣战者的“人盾”。[17]

第二个例子是难民营可能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招募新兵的基地。2015 年，喀麦隆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纳哈特·罗迪公开表示，他担心喀麦隆北部的 Minawao 难民营有可能成为“博科圣地招募的肥沃土壤”。[18] 肯尼亚当局也表达了类似关切，青年党可能正在该国北部的达达布难民营招募人员。有大致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达伊沙”组织可能在土耳其和黎巴嫩难民定居点招募新兵。

16 Zolberg, Suhrke 和 Aguayo, 1989。
17 Ban, 2015.
18 Larson, 2015.

第三个例子可能是在有限的文献中，难民营与暴力极端主义之间交集最普遍的一个——难民激进化为暴力极端主义的风险。[19] 有确切的例证证明难民营内的暴力源自难民激进化，包括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难民营的扎洛加营地），也门（在卡拉兹的索马里难民营），喀麦隆（在尼日利亚的 Minawao 营地）和约旦（在扎泰里的叙利亚难民营）出现的暴力事件。欧洲的难民集中地也出现这种现象。

2016 年 9 月，德国科隆当局逮捕了一名计划恐怖袭击的 16 岁叙利亚难民。2015 年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战中逃出后，他与父母亲在科隆附近的难民中心同住，后被捕，当局政府发现了制造炸弹的材料（包括电线架、缝纫针和小丁烷气罐）以及与“达伊沙”组织成员网络聊天的记录。欧洲的难民集中地也出现这种现象。2016 年 9 月，德国科隆当局逮捕了一名计划恐怖袭击的 16 岁叙利亚难民。2015 年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战中逃出后，他与父母亲在科隆附近的难民中心同住，后被捕，当局政府发现了制造炸弹的材料（包括电线架、缝纫针和小丁烷气罐）以及与“达伊沙”组织成员网络聊天的记录。法庭将这名男孩的激进化归因于他在难民中心常感孤独，所以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手机上。此外，他经常在线聊天……通过线上接触，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伊斯兰教 - 圣战主义的世界观”。[20]

现有的文献资料强调了激进化的暴力极端主义在难民营扎根的三种特殊条件：受教育水平低，特别是在极端主义宗教灌输填补教育空白的情况下；缺乏工作；而且没有行动自由。[21] 这三种情形在当今许多资源贫乏、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中十分普遍，而且这些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同样地，以上情形也表明人为介入干预或许有助于减少难民激进化为暴力极端分子的风险。

## 减少难民激进化的风险：中东应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

最近兰德公司发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降低难民激进化的风险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围——必须多管齐下，让难民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可行的选择。[e] 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对每一种情况进行深度评估，提供解决方法。这项研究表明，任何有效的纲领都需要捐助者、非政府组织 (NGOs)、当地居民、东道国政府和难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信息分享与目标协调。

解决经济和金融需求也十分重要，尽管它们不是诱导激进化的主要动因。难民寻求各种方法养家糊口，获得长期有效的工作技能。避难国必须满足难民的需求，保证难民可以与当地人民一样购买消费品，共同竞争和工作。这也意味着新解决方案应该使通常不直接介入难民问题的当地方面参与进来，例如商界。

被采访者建议，捐赠者需保证资金来源灵活，减少封闭，才能成功解决这个难题。国际救援基金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它们在危机开始时能缓解局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其作用会逐渐退化。[f] 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可以加强关于难民危机的长期财务规划的对话。

同时，解决就业和教育问题只是各类方法中的一小部分。保证心理、安全需求才是关键。如果

19 Lischer, 2006.

20 德国之声，2017。

21 Martin-Rayo, 2011.

难民在逃离原籍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心理创伤，[g] 在避难所往往会遭受虐待，时常感到屈辱和无助。在这种情况下，武装暴力组织很有可能趁火打劫，试图通过暴力赋能叙事使弱势群体激进化。为难民提供机会参与自治，例如难民营管理，也可以减轻这种风险。

e.Sude, Stebbins 和 Weilant, 2015。
f.Makdisi 和 Prashad, 2016。
g.Hawilo, 2017。

目前还没有关于移民者过渡营地内暴力极端主义风险或者事件发生的重要研究。但是，鉴于上述情况往往与难民营中的暴力风险增加如出一辙，假设风险存在还是合理。

## *庇护和移民流渗透的风险*

沿着移徙循环前进：在欧洲和北美，因为大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者继续从非洲和中东移徙过来，决策者考虑重新安置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原籍国的大量难民——最政治化的问题可能是，是否有证据支持一些断言，表明恐怖主义分子正向不规则移民流进行系统性的渗透，其目的是为了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击。 2016 年 4 月，一系列的报告公之于众，后来证实了 2015 年在萨尔茨堡难民营被捕的男子就是 2015 年 11 月在法国巴黎发动袭击的原恐怖组织成员。据他的个人证词，他是两名巴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一对伊拉克兄弟在法兰西体育场外自爆的）背后的组织者之一，十月份他们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往希腊。起初，这名阿尔及利亚男子和一名巴基斯坦男子在莱罗斯岛因未通过护照检查而被捕，但两人后来都被释放，于是他们继续前往奥地利，很快又遭到逮捕。[22] 英国广播公司调查称，“……两个人买了船票乘渡轮离开莱罗斯继续他们的叙利亚难民欧洲之旅”。[23]

这至少说明了欧洲法域之间没有足够的信息共享。随着导致巴黎袭击事件人员的更多消息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许多枪手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曾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达伊沙并肩训练和战斗。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袭击者是否是由达伊沙领导层精心部署来协调法国恐怖袭击活动的部分“休眠者”，还是作为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返回其原籍国。难民“危机”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受到关注，恐怖组织越来越臭名昭著，一些被采访的偷运者声称已经运送了伊斯兰国招募的新兵。[24]2015 年初，达伊沙“威胁日后会有 50 万难民通过利比亚涌入欧洲。”达伊沙还宣称将有 4000 名圣战者通过土耳其派往欧洲。[25] 一名偷运者证实，至少十名达伊沙圣战者冒充难民被送往欧洲，并声称这些圣战者一旦定居下来，便开始等待命令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在土耳其接受采访的两名偷运者表示，他们曾偷运圣战者穿越地中海过去。这种报道增加了不少。

不低估处理和消除这种风险重要性的同时，仍需警惕：偷运者不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直被政治家及决策者称为犯罪分子和骗子。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许多袭击者

22 Rose, 2016.
23 BBC, 2016.
24 Giglio, 2014.
25 Schmid, 2016.

有移民背景（见下一节的讨论），但最近在欧洲发生的大部分恐怖袭击与美国一样都是“国产的”，即由本国公民发动。当然也需注意，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事件仍然发生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方。[26]

## *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

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第四次交集发生是在移民者和难民已经定居之后；人们广泛认为，社会排斥会导致已定居的移民者和难民及其后代的暴力极端主义日益激化。社会排斥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但大多数定义指出，它指一个发生在个人、家庭、集体、社区、国家和全球层面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主要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相互作用驱动的动态和多维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一系列连续的包容与排斥情况，主要表现为移民和难民及其后代获取资源、能力和权利的不对等，最终导致他们遭受的不平等状况。[27]

《新美国经济》研究发现“911 事件以来，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都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28] 在此期间，绝大多数被指控从事恐怖活动（国内或国际）的美国人都是永久合法居民，其中有许多是第一代移民的后代。近来有些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则是由第二代移民者所为，其中包括一名阿富汗裔美国公民袭击了奥兰多的一家夜总会。在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一名罪犯为巴基斯坦裔美国公民，另一名罪犯 Tashfeen Malik 则是巴基斯坦公民，她凭借未婚妻签证来到美国，拥有有条件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29]

2016 年 9 月卡托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对恐怖分子在美国使用的签证进行了全面审查，提供了风险分析。卡托研究所发现，美国公民在外国出生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中死亡几率为 0.00003%。[30] 具体来说，卡托研究所分析了美国的 154 名外国出生恐怖分子，他们在 1975 年到 2015 年底期间的袭击造成了 3,024 人死亡，其中（应当说明）包括了 911 事件的近 3000 名受害者。这 154 名外国出生的恐怖分子中，

> 10 人为非法移民，54 人为合法永久居民，19 人为学生，1 人以 K-1 未婚夫（妻）签证入境，20 人为难民，4 人为寻求庇护者，34 人为持有不同签证的游客， 3 人来自免签国家。9 名恐怖分子的签证无法确定。在此期间，美国公民被外国出生的恐怖分子杀害的几率是每年 3609709 人中 1 人。美国公民在难民发动恐怖袭击中遇害的机会是每年 36.4 亿人中 1 人。[31]

据移民政策研究所对自 911 事件至 2015 年底在美国安置的 745000 名难民的分析，只有三

26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6。
27 Rudiger 和 Spencer, 200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28 新美国经济，2017。
29 Friedman, 2017.
30 Willingham, Martucci 和 Leung, 2017。
31 Nowraseth, 2016.

名难民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32] 然而，这些人是否在到达美国时已经是暴力极端主义份子或是到达之后转变，还是被恐怖集团故意派遣到美国尚不清楚。

外国恐怖分子的发生率或许是社会排斥的另一个指标，据估计约有 30000 人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战斗，主要与达伊沙并肩战斗。[33] 根据苏凡集团（美国的安全顾问事务所）的报告，当时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绝对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依次为：突尼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联邦，土耳其，约旦，法国，摩洛哥，黎巴嫩，英国和德国。[34] 虽然无法获取这些人的详细档案，但显然在突尼斯这样的一些国家，绝大多数是本国国民，而不是移民者或其后代。相比之下，似乎大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外国圣战者确实有移民背景。然而，他们仅占了这两个国家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总量的一小部分，这两国的圣战者加起来占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总量的一小部分。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不一定是重大移民问题。全球联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达伊沙圣战者数量已经降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2000 至 15000 人左右，这个数字接近 2014 年估计的圣战者最高数量的一半。”[35]

这些数据虽然分散而不系统，但也表明不仅是在经合组织国家，定居的移民者和难民及其后代有时候可能会激进化为暴力极端份子。对有些人来说显然发生了什么变故，这值得考虑和解释。

尽管仅凭这些分析不足以解释个体的激进化，一些分析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移民者及其后代激进化结构层面的驱动因素上。以比利时和法国为例，有人认为政治文化这种过于世俗化的治理方式已经排斥了一些少数族裔，特别是北非的穆斯林。一些分析师说：

> 就像法语国家的整体发现一样，我们只能猜测法国政治，城市化，青年失业究竟和逊尼派武装之间为什么有关系。我们怀疑当失业青年人数众多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会闹事。当他们住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们更可能接触到极端主义者。当这些法语国家城市在采取强硬的法国方式来进行世俗主义时，逊尼派激进主义对失业青年来说更具吸引力。[36]

相比之下，苏凡集团的报告更多地关注个体而不是（社会）政治驱动因素。当然，有些移民者及其后代经历了被边缘化和剥夺公民权的行为，这被认定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推动因素”，使得一些年轻的穆斯林和最近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更容易被极端主义者招募。

目前的政策反应包括促进“综合身份”（例如，一个人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身份，例如宗教的和国家的），并为他们提供机会感，实质上是提高一个人的信念，使他们认为自己能获得机会，看到未来自己能实现给予自己的选择。德国激进化与反激进化研究所主管丹尼尔·科勒表示，“在过去几年中，德国的反恐战略大量集中在与家庭合作防止激进化发生。然而，防止难民激进化还有大量工作要补做。”[37]

32 Newland, 2015.
33 苏凡集团，2015。
34 同上。
35 全球联盟，2017。
36 McCants 和 Meserole, 2016。
37 Oltermann, 2016.

## 中亚移民的激进化

为解释为什么中亚人犯下了相当数量的恐怖主义事件，爱德华·莱蒙和约翰·希瑟肖严谨有限的分析发现，暴力极端主义团体针对并专门招募移民者。h 在分析中亚国家相对少数人激进化时，他们凭借有限的信息和数据指出：

> . . . 这种现象很少见，我们的了解也很少。目前对这个话题的政策研究是比较薄弱且误解驱动的较多，学术研究不仅很少往往也是过时的。

莱蒙和希瑟肖对移民现象可能关系的观察指出，大多数激进化者是在离开祖国后才成为圣战组织的目标。他们指出，尽管中亚武装分子近期发动了一些高调的恐怖主义事件如 2017 年 4 月的圣彼得堡地铁爆炸、2017 年 1 月的伊斯坦布尔夜总会袭击以及 2016 年 6 月的阿塔图尔克机场爆炸事件，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中亚的宗教、经济或政治根源在“出口”恐怖主义。

莱蒙和希瑟肖认为，尽管个人决定加入极端主义团体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是很多人似乎都经历过某种孤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招募者会将目标锁定在社会边缘群体，包括在国外工作的人。而且根据他们的研究，“大多数中亚移民是识字的且具备一定技能，但往往从事的工作远远低于他们的能力，并往往被雇主剥削。”i 许多中亚青年男子为工作迁徙，远离家园。他们每天都面临经济困难，工作中得不到重用，遭受种族虐待，有时则会遭到国家的骚扰。这都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圣战主义的影响，强调必须打击仇外心理和对移徙工人的虐待，这本身对所有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激进化的可能性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而更突显了不作为将造成罕见的、可能的极端后果。

h.Lemon 和 Heathershaw, 2017。
i. 同上。

评估这种干预措施能否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有人担心一些其他政策选择可能是有害的。许多移民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面临歧视。此外，关于他们对经济、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信仰和动机以及国家认同造成不良影响的虚假或可疑言论也让他们污名化。把他们描绘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把他们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只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疏远他们的意外后果，从而增加他们对暴力极端主义叙事和议程的易感度。[38] 美国发布的 2017 年保护国家不让外国恐怖主义进入美国行政命令引起了一些人的关切。[39]

关于移民者、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的联系，最后一个角度还需要考虑到重新融入归国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可能带来的挑战。据联合国，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

> ……增加冲突的强度、持续时间和复杂性，可能对原籍国、过境国、目的地国以及他们活跃的邻近武装冲突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威胁正在迅速演变，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完全遏制。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返回其原籍国或抵达第三国后会带来重大的长期风险。[40]

38 Cunningham 和 Koser, 2015。
39 大赦国际，2017。
40 联合国安理会，2014。

学者、市民社会和少数决策者指出，必须优先考虑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的复原和重新融入。如果依靠拘留作为治疗归国的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的唯一手段，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个人和社区的激进化。确实有些人可以帮助防止进一步的暴力极端主义：

> 促进暴力极端主义罪犯的复原和重新融入是解决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和招募全周期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在外国恐怖主义圣战者回国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对可疑恐怖主义分子控诉活跃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减少再犯并在社区以及执法机关中建立信任，支持他们监禁后的复原和重新融入十分重要。[41]

## 背叛者和重新融入

在丹麦东部城市奥胡斯（丹麦第二大城市），警方、市政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互相协作开展协调一致的活动，旨在防止高危青年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j] 奥胡斯居民和执法人员首要关注的是高危青年是否有意向离开城市加入国外武装圣战组织，主要是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的达伊沙。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当地的利益相关者首先帮助遭受排挤和容易成为目标的年轻人融入到社会中。当地政府也会为那些曾到国外加入达伊沙，现在已经回到家乡的奥尔胡斯居民提供帮助。[k]

在丹麦，国家政策明确指出，凡是参加过恐怖行动而后回国的圣战分子，一经证实，都将被起诉；而那些没有记录证明曾参加过恐怖行动的人，则有资格得到援助。[i] 据报道，这一计划实施以来，加入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年轻人数量已然有所下降，尤其是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圣战者人数相比之下，成效明显。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篇报道中，奥胡斯模式的独特方法受到高度评价；在 2012 年，有 34 名奥尔胡斯的居民离开丹麦加入了达伊沙，其中，有 18 人回到了奥尔胡斯并参加了改造计划，6 人被杀，截止 2016 年 7 月，还有约 10 个人留在组织中。

然而，到了 2015 年，当人们从欧洲涌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加入恐怖组织的规模达到巅峰之时，该市只有一位市民离开本国加入圣战。[m] 更具体的说，这一计划还提供入学、心理辅导、住房和就业帮助，并帮助组织与父母见面交谈。曾经叛逃、加入恐怖组织，而如今重新融入社会，不再偏激的恐怖组织逃兵，在鼓动同辈回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向同辈们证明了重新融入丹麦社会是有可能的。[n]

政策和学术领域逐渐认识到，这些恐怖组织逃兵能够有效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衍生，因为这些人在伊斯兰国的种种经历能够对那些期望加入达伊沙或类似组织的人起到威慑作用。关于改过自新者的重要意义这点上，安妮·斯佩克哈德和艾哈迈德·亚伊拉同样强调了恐怖组织逃兵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那些幻想破灭的恐怖组织干部能够现身说法，讲述在伊斯兰国里的真实生活，可能是阻止，劝他人别加入伊斯兰国最有力的工具……[0]

政府要为方便这些恐怖组织逃兵融入社会，并公然反对极端组织创造有利的条件。[p] 采取的措施需要包括妥善安置这些改邪归正的前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服务，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

41 全球合作安全中心和反恐中心—海牙，2016。

我们不给那些低端的暴力极端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反而延长对他们的羁押时间，排斥这些人的话，这些幻想破灭的圣战者就可能会变成更坚定的极端主义支持者。

j．Crouch 和 Henley, 2015。
k．同上。
l． Lister, 2015.
m．Rosin, 2016.
n．同上。
o．Speckhard 和 Yayla, 2015。
p．Neumann, 2015.

## *对政策辩论的启示*

本章始于印证谈论这一敏感的政治话题的必要性，由于意识到可能会煽动人们对移民者的歧视，本章尝试着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移民和流离失所之间的交集，以及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交集。本章指出了现有定义以及数据的缺乏，强调了要建立任意偶然联系的挑战；对本章结论，而且这一领域的当前话语和政策都持有明显保留态度。本章以移民循环的逻辑出发，将移民、流离失所以及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交集进行初步分类。本章还提出了人们对该领域某些现行应对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意外后果的关注。

基于这一初步分析，对政策辩论提出以下七点启示：

●移民政策制定者要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管理者保持紧密对话；由于后者通常分布在不同的安全和发展部门，执行着内部和外部的任务，所以要达到这一要求困难重重；

●为了进行更加严密的分析以及制定更好的政策，需要更好的分析框架，更准确的定义，更全面的数据以及以经验为依据的证据；

●尽管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恐怖组织可能会进行渗透行动，政府还是要加强移民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并且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这其中包括适当地进行难民重新安置和移民对象预筛查，加强政府间的情报共享以及适当地运用生物统计学；

●应对造成流离失所和移民原因更综合性的措施应该包括干预措施，特别是在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上的干预措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可能是解决移民动因问题的一条途径；

●政府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以预防所有流离失所中可能出现的激进行为，包括难民和临时难民营内的过程，要更注重为难民提供教育，帮助就业，并且有可能的话，给予更多的行动自由；

●政府要制定更加有效的综合性和社会包容性政策，以减少社会排斥，降低移民者及其后代中暴力极端主义进程激进发展的风险；

●不能过度重视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进程的发展而破坏移民或者难民政策，这点很重要，比如说，要确保反对暴力极端主义（PVE）干预在尊重移民和难民权利的前提下进行。

从积极的角度总结来说，把移民当成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潜在办法是有可能的。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如果只把移民或流离失所当成暴力极端主义的原因或者结果来关注，那么这只

会加剧暴力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威胁。这种关注或许会成为限制移民、避难者以及难民入境的借口；限制他们的权利；或是强迫他们返回本国，回到不安全的环境中。相反，关注解决措施，可以在尊重移民难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解决移民问题，安置难民，这一举措可成为全世界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所作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42]

管理有方的移民行为可以促进相互理解；移民通过海外侨汇也会对原籍国消除贫困起到重大作用，减少暴力极端主义事件的出现。移民同时也是开放和全球化这些来之不易的原则的标志，暴力极端主义则试图破坏这些原则，因此我们应该保护这些原则。而政策制定者则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何促进移民的积极影响，为移民者提供机会，为难民提供庇护，而不仅仅只是关注暴力激进分子可能随之入境的低风险。

42 Koser, 2015.

HOWARD DUNCAN
IOANA POPP

# 10 移民与城市：超越《世界移民报告 2015》[1]

## 引言

《世界移民报告 2015》重点关注了这样一大主题：移民与世界各个城市的关系。如今，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地区，因此城市越来越受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投资者和移民重视。几乎所有的移民，不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都涌向了城市，因为只有在城市里他们的人力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世界移民报告 2015》对城市主题的关注，明确、及时地表明：作为世界移民的目的地，城市必须受到更多的关注；影响移民去向以及移民到达目的地后生活遭遇的，不仅仅只是国家机构。城市往往才是吸引移民的首要因素，移民的融合往往也是发生在城市里的。我们逐渐认识到，城市在社会运作和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渐重要，因此，我们正在改变对移民治理的看法，或者往更大的方面来说，改变对社会治理的看法。《世界移民报告 2015》涉及到了诸多内容。在这份《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本章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5》内容进行了简短的更新，我们希望能以此激发更多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并且让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更加深入地思考城市的运作以及自身所扮演的管理角色。

《世界移民报告 2015》通过数个章节分别谈论了移民与城市多样性、移民的脆弱性和应变能力、移民和城市发展、通过合作来管理人口流动，就南北方国家的移民与城市关系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侧重点在于移民福祉以及移民权利保障——现在通常被描述为“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2] 报告中指出，移民们配合当地治理并乐于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创造财富，因此，城区的治理应当包括移民，并明确照顾移民利益。我们的建议产生于应把移民纳入城市运作的理念和这种包容性将对城市本身所带来的利益的理念。报告敦促城市“为落实基础服务以及社会经济融入出台包容性城市政策”，因为这样做符合移民与城市的最大利益。不仅如此，“在世界体系中强化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定位的城市，应该对生活在社区中的移民群体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加以利用”。

本章将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基础上展开。2015 年 10 月，世界移民组织于日内瓦举行了主题为“移民与城市”的会议，《世界移民报告 2015》于会上发表。基于一些关于城市发展本

1 Howard Duncan，Metropolis Project and Secretariat and Loana Popp 的执行理事长，移民政策官员，IOM。

2 Right to the City 是一个纽约的组织，它描述自身的成立理念是“充分释放一种新型城市政治理念的能量，即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权力被剥夺了的人，不仅有进入城市的权力，而且还应该是作为有权设计城市、塑造城市、实现人权的城市居民而存在。”详情请参见 https://righttothecity.org/about/mission-history/。这个理念来源于以为法国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并由其后的很多人接受并延伸到移民和郊区发展的相关问题上。也请参考牛津大学 COMPAS 的最近成果 Global Migration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ies of the Future（在 www.futureofcities.ox.ac.uk/research/globalmigration-and-the-right-to-the-cities-of-the-future/）。

质以及他们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最新研究，我们将审视现代城市在移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城市在社会、经济事务以及移民轨迹上日益增长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上。在此，我们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5》进行简要的补充，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论述，将会对我们认为值得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仔细研究的部分进行重点论述，不论该部分涉及的是地区、国家还是世界。因此，本章内容并非是对当前移民著作的全面回顾，也非对于《世界移民报告 2015》内容的复述，而是选择性地对相关领域进行论述。

## 当前国际环境

移民以及他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成为了非常多国际社会活动的焦点所在。世界移民组织召开的移民与城市大会，召集各个城市的市长和其他官员进行了系列会谈，讨论内容广泛，力求使我们意识到城市行政机关和其他地方性机构如何影响移民进程及其结果，以促进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工作的开展。[3]

第三届全球移民与发展市长论坛（The Third Global Mayoral Forum）于 2016 年 9 月在菲律宾奎松城举行，由联合移民与发展倡议（Joint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国际移民组织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共同领导。[4] 会议内容涉及讨论地方政府如何如何援助来自动乱国家的移民倡议（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Initiative）并从中受益，而这一举措无疑是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又一示例。第五届世界地方和区域领导峰会（Fifth World Summit of Local and Regional Leaders）于 2016 年十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会议为期三天，而移民话题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议程之中。这次峰会在《波哥大宣言》的签署中落幕，在这一宣言中，签署者呼吁为可持续城市化发展而努力的地方行动。[5] 而在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Habitat III）举行之前，刚刚成立了全球市长议会（Global Parliament of Mayors），旨在能让各城市政治领袖共同为地方利益发声，并将移民问题作为两大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直以来，在城市问题上，联合国人居署都是联合国关注的焦点所在，而在 2016 年 10 月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上，其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给予了移民问题极高的重视。不论其是否是非法移民，所有移民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一有关全球城市中无证移民的措辞引人注目。与会者同意：所有的居民，包括移民，不论其是否居住在正式安置点，都应该能够过上体面、有尊严和有收获的生活，并能发挥他们全部的潜力。这一宣言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尽管移民存在很多形式，但不管他们是正在穿越国境或是已经穿越了国境，或是仅在本国境内迁离了常住地；不管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不管他们的迁徙是否出于自愿；不管

3 来自这个会议的建议在 IOM，2015a 中可见。

4 此报告在 www.globalmayoralforum3.ph/index.php. 可以获取。

5 IOM，2016.

迁徙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们要停留多久，所有的移民都是权利的拥有者。[6]

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讨论中，充分运用由国际移民组织构建的移民治理框架，经优化调整，建立起了城市移民治理框架（Urban 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该框架的正式名称为城市移民治理工具箱（Migration Toolbox for Urban Governance）。[7]

最近，联合国通过了《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宣言中，联合国启动了程序，致力于达成两大全球协议，旨在应对世界各地已知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尤其是应对万众瞩目的叙利亚内战所引发的危机。其中一项协议旨在解决难民问题，而另一项协议则重点关注如何促进人口安全、有序、正常地迁徙。这些协议还指出了城市在人口迁徙、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的功能和应承担的责任。此外，联合国大会于 2017 年 2 月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移民问题特别代表的报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Migration）。[8]这份报告出自彼得萨瑟兰（Sir Peter Sutherland）之手，因此又名《萨瑟兰报告》，报告对全球移民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并为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这份报告重点谈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与危机相关的人口迁徙；劳工移民；有序移民（包括移民返乡）；包容性；移民治理。其中，第十四条建议指出，城市及地方政府应当被赋予体现在本章、《世界移民报告 2015》及移民与城市会议报告中的部分主题中所描述的权力。

## 更新后的城市形象

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以致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治理方法，包括重新考虑如何治理移民问题。由于城市是绝大多数移民流动的目的地所在，人口迁徙俨然成为了城市化的同义词。眼下，许多城市正面临着管理快速增长的人口难题，还有一些城市正为人口流失找寻对策。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谈论着城市化这一议题，而移民相关议题更是为许多学者所深入探讨，这些学者包括 Saskia Sassen、[9]Manuel Castells、[10]Nina Glick Schiller 以及 Ayse Çaglar。[11] 萨森提醒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城市（旧称世界级城市）的存在，注意到全球城市的影响力，尤其是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推动金融及其他行业全球化，而国家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这一现象虽然经常被夸大但却是事实）。全球城市及支撑其发展的企业公司能够在国家政策法规管辖范围之外正常运作。随着信息技术及全球化进程的其它一些方面的日新月异，城市在决定移民流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学者们已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注意力从

6 United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bitat III), 2016.
7 IOM，2015b.
8 UNGA，2017.
9 Sassen，1991.
10 Castells，1996.
11 Glick Schiller 和 Çaglar，2010。

国家层面转向了地方政府层面。[12] 在近期论文集《定位移民问题：重整城市与移民》中，[13] Glick Schiller 和 Çaglar 也采用了这一做法，在卡斯特尔所做研究的基础之上，他们将城市看作移民流动空间而非静态物质住所，并将移民看作促进城市性格演变的重要驱动力。最近，Hein de Haas 与 Mathias Czaika 指出：

> 如今，人力资源与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更确切地说，越来越集中于一些国家的都市地区，这一现象体现了城市化及国家内部由农村向城市移民进程。[14]

这一系列的发展不仅只是引发了学术界的兴趣。其表明，城市所具有的影响力与作用可能比所在地方政府官员想象中的还要大。中央政府方面应当在其移民和社会融入政策框架中给城市行政部门及其他地方行为体安排重要的角色，而城市方面应当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意识到要为人口迁徙及居住在城市内的移民负起相应责任，而不仅仅只是将这些责任交由国家法域承担。

由于城市本身才是移民人力资本的最大付酬者，城市已然成为了决定全球移民流动及迁移模式的关键因素。[15] Seto 论述道：

> 促使移民流入各大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群的因素有很多：经济政策与激励措施，本地机构与移民目的地机构，发展小型城镇的政府政策以及地理方面的集中投资。随着大量资金流入众多三角洲地区，当地经济基础已然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制造业及加工业经济，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这正是无论大三角洲地区的地理环境、大小如何，移民都会流入大三角洲城市的潜在动因。放眼 2060 年，所有三角洲地区都将面临需要提高劳动人口工作技能并且促进技术创新的挑战。三角洲地区若要实现经济持续性增长，就应当大量投资教育、能力构建，以及城市中心地区吸纳移民劳动力资源的能力。[16]

尽管事实如此，谈论移民话题的相关文献以及数据资料依然强调“国家”才是移民来源地与目的地的基本单位，强调国家移民、融入社会政策的作用，强调国家就业统计数据，以及其它国家层面的现象。然而，决定移民流动的因素不仅仅只有国家政策，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行政机关、其他私人或非政府地方机构部门才是吸引经济活动，才是提升利益、吸引投资及促进移民的关键所在。在国家政策体系地方活动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但是，吸引并留住移民的是城市中的各个机构而非国家，而这一趋势也正日渐明朗。移民融入社会的重任主要是由城市而非国家承担，对此我们早有耳闻，然而我们却很少听说，城市在决定移民流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缺乏这一认知，相关研究及移民政策制定中出现了显著偏差，即政策讨论过程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决定移民流动的主要因素。我们应当强调的，不是谈论城市内的设施是否足以安置移民并使之融入社会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而是应当意识到，尽管城市实际上正日益成为移民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城市尚未被国家移民政策的发展计划所囊括。

12 Skelcher, Sullivan 和 Jeffares, 2013; Buch et al., 2013; Combes, Démurger 和 Li, 2017。

13 Glick Schiller 和 Çaglar，2010。

14 de Haas 和 Czaika, 2014。

15 Price 和 Benton-Short, 2007. 其他传统上的措施请参考 Scott 和 Storper, 2003。

16 Seto，2011.

# 移民、城市化及治理挑战

《世界移民报告 2015》着重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内部如何就移民管理，包括如何发展自身经济形成合作关系。该报告指出，我们应当将移民流动视作给城市带来潜在巨大效益的途径，而非亟待解决的负担。报告中探讨的合作关系多为城市与移民的合作关系，移民被视为城市的雇员、企业家、雇主重要来源，以及城市与移民来源国经贸合作及文化沟通的桥梁。不过，该报告同样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但指出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策碎片化问题，还指出了各级政府间具备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潜力。鉴于相关政策碎片化，而学术文献又开始以更先进的视角看待城市，如果能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由地方政府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力，那么，相信一些国家可从中获益。而《萨瑟兰报告》中也间接提到了这一观点。

城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是全球人才竞争的焦点所在，然而，如今的城市权力受限，难以左右移民政策及税收收入，难以制定方案吸引、支持并留住移民，难以施展自身的影响力。当前，地方移民治理及其成效存在多方面问题，我们将谈及《世界移民报告 2015》中不太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响应报告中呼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加强政策合作关系的号召。鉴于本章的重点为移民治理，我们强调治理机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正式行政单位，还是私人、民间社会机构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尤其是从居民（包括移民）组织的非正式活动中，一个城市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城市的特点。这一点超越了城市居民为改善地方经济社会生活所做出的努力，而移民保留的国际联系，以及其他居民通过商业、家事、教育及文化打造出的国际联系共同塑造了城市特点。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努力之后，城市往往就拥有了不断创新的能力，这在贫民窟及城市边缘住宅区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地区依靠官方机构来治理是不太现实的。[17]

## *庇护城市*

有的城市直接将自身推广为移民优选目的地，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以“庇护城市”自居，以此来维护移民政策中的自身利益，公然违背相关国家针对非法移民的法律。“庇护城市”运动在美国尤为盛行，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城市对国家移民法律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城市不愿执行这些令人不满的法律。Harald Bauder 在其 2017 年发表的文章中分析了加拿大、英国及美国对“庇护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他发现，在这三个国家中，人们对“庇护”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运用迥然不同。[18]“庇护城市”运动相对来说属于不太正式的社会运动，因此“庇护城市”这一概念的内涵在这些国家存在差异，相较于英国而言，加拿大与美国城市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英国，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庇护所之城”这一术语。“庇护所之城”一词强调了那些欢迎并支持难民及其他移民的社区，公然违背国家移民法律。[19]

17 Rufin, 2016; Deininger et al., 2010.

18 Bauder, 2017.

19 参见 https://cityofsanctuary.org/。

或许，正是由于城市没有充分参与到移民政策及实施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才有了“庇护城市”的存在。如今，美国正打算对所谓的“庇护城市”实行财政等方面的制裁，因此，显然没有城市愿意以“庇护城市”自称，因为那样做会构成非暴力反抗。上述例子说明了城市在处理移民事务时自治权力有限，体现了当前城市没有充分参与到国家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表明了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展开合作的必要性，如建立《世界移民报告 2015》中提到的合作关系。[20]

## *世界各地超大城市的贫民窟*

每每谈及地方移民治理面临的问题，人们往往首先就会谈到城市应当如何应对人口增长，尤其是如何应对为城市带来多样性的人口增长。而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中，人口增长问题尤为突出。2016 年，世界上有超过 30 座人口数量超过 1000 万的超大城市，其中，日本东京的人口数量最多，超过 3800 万。[21] 许多超大城市中都存在大规模的贫民窟，一些贫民窟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 100 万。位于墨西哥城的那扎 - 查可 - 伊泽塔区（Neza-Chalco-Izta）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超过 400 万名贫民，称作“特大贫民窟”。[22] 贫民窟的治理问题向来不胜枚举，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一言以蔽之，生活在贫民窟中，住房短缺，环境拥挤，缺乏安全，基础及公共设施短缺，如安全饮用水资源匮乏，卫生服务设施紧缺，垃圾清运设施贫乏，交通不便，街道数量稀少，应急车辆甚至都无法通过。在这些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患病风险上升，暴力事件频发，居民缺乏教育及其他发展机遇，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也有所提升。贫民窟的形成是南方国家快速城市化进程（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重要特征，而这一趋势预计将在未来持续下去。对于面临这些问题的城市而言，持续性的大量移民势必会产生重大问题。一些南方国家城市已然采取措施，试图缩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数量，因为移民速度一旦过快，地方政府将无法及时应对，无法为新移民提供满足需求的服务及基础设施。

尽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流动通常发生在一国境内，但是，中央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能够支持地方政府妥善应对这种移民方式。如果超大城市不是通过经济增长，而是以扩大贫民窟面积实现发展的话，就会面临严峻的治理难题。如今，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趋势丝毫没有削减的迹象，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找寻方法，使得世界上的超大城市及其他大城市将这类移民流动转化为支持其建设的正能量。换言之，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放缓，甚或是遏制人口向城市流动。然而，包容性改造贫民窟将面临诸多挑战。

## *包容性改造升级贫民窟*

几十年来，在与发展相关的文章中，贫困的贫民窟都是一大挑战。但随着对包容性发展的关注，大家的看法近期发生了改变。联合国人居署负责实施的参与式贫民窟改造方案（Participatory Slum Upgrading Programme），就体现了大家对“包容性发展”的关注。该方案希望通过“向

20 Chen，2015.

21 UN DESA，2016.

22 参见 https://borgenproject.org/category/slums/。

主要城市行为体，尤其是贫民窟居民赋权，以逐步消除社区、城市和国家层面的城市贫困”。总的来说，包容性发展力图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发展决策制定过程，其目的是不以牺牲最贫穷的社会成员为代价来实现发展目标，比如实现人均 GDP 增长率的目标。贫民窟居民参与发展进程，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居住条件，还能提高城市治理质量。它还可以成为贫民窟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有力手段；倘若这些移民能更多地行动起来而不是停留在脆弱状态中，这也将意味着移民自身也要为融入社会承担部分责任。

这又涉及到了创新潜力。随着贫民窟居民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众多挑战制定出解决方案，现在许多人从中看到了这股潜力。贫民窟中的许多问题无法依靠正规的治理机构得到解决，因此，这里的居民成为改善贫困生城市活的主要力量，并为邻里管理提供新思路。[23] 很多人从中看到希望，但也有人提出警告，他们反对将贫民窟过度浪漫化。

### 南方国家在国际移民组织（IOM）移民和城市会议上的评论

南方国家城市化发展迅速，贫民窟应运而生，并成为城市化核心特征，且贫民窟的发展在未来也不会减缓速度。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有大片的贫民窟，有些超过一百万居民。加纳库马西市市长维亚夫（K.B. Wiafe）指出，移民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产生了贫民窟。那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连饮用水和电都不能保证。他希望可以减少向库马西移民的人数，以缓解城市住房供应压力，而且他考虑了物质刺激措施鼓励人们留在农村。加纳内政部长马克·欧文·沃永戈（Mark Owen Woyongo）根据国家现状呼应了这些评论，他表示首都阿克拉市有 43％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布隆迪大使 Ndayisaba 也对他的首都发表过类似看法。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指出，贫民窟的生活拥挤，缺乏饮用水，卫生条件差且贫穷，很是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他描述了世卫组织在解决城市卫生问题方面的方法，其核心要义包括获取卫生不平等的数据，优先采取干预措施，发展对移民能快速的卫生系统，培养文化、语言能力，同时考量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权时制宜，以及通过合作制定这些措施。

## *城郊贫民窟定居点*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和国内移民涌入城市周边地区，导致该地区的定居点规模不断扩大。这些定居点位于城市边界，而且常常在城市的法定管辖范围之外，因此其面临的挑战与城市贫民窟有所类似但又有显著不同。城郊贫民窟甚至比城市贫民窟更不正规，能得到的服务和资源更少。因此，在这里，贫民的生活条件（包括卫生条件）比城市贫民窟更差，找工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而城市规划者在规划时往往无法覆盖到城市周边的居民点，从而导致治理上的巨大遗漏。无论是在一个城市的边缘还是在边缘之外，有些城市周边地区实际上是无人管辖的。因此，不仅这里的问题无法解决，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这些定居点容易受到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控制。[24]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周边都可以找到这种非正规居住区。在南亚、非洲和

23 Smedley 2013; Manoj et al., 2016. 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slums is also highlighted in Saunders, 2010.

24 Amerasinghe 和 Marshall, 2017; Shivendra and Ramaraju, 2013。

拉丁美洲，描述这种现象的文字非常多，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文章不仅谈到了向城市周边移民所引发的问题，也谈到了这些居住区可激起的创新能力。[25] 肯尼亚内罗毕的马沙勒山谷贫民窟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法的暂时性居住区，缺乏官方治理，为应对这一难题，这里的居民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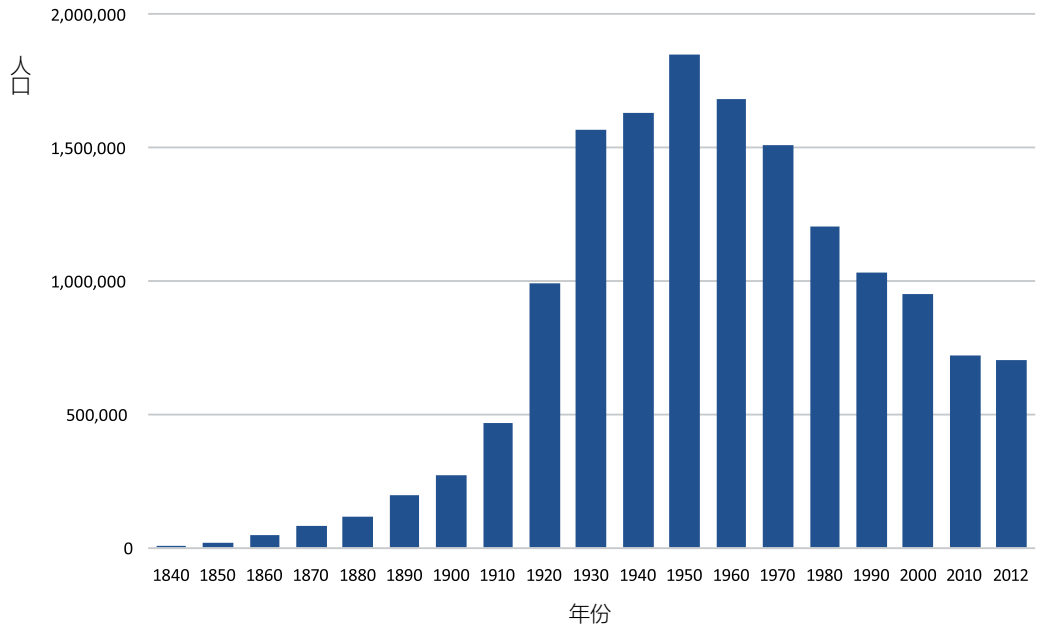
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周边地区出现居民点，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城市由于城市扩张近期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由于房价快速增长以及向欧洲移民，许多欧洲城市周边建立起居民点。当下，学术研究人员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非正规、非法的居民区，这些居住区给其毗邻的里斯本、雅典和罗马等城市的治理能力带来了压力。[27]

## *收缩的城市*

扩张型城市的反面是收缩型城市。由于人口外流和低生育率，这些城市人口减少，因此税基缩小，而且往往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每 10 个城市中差不多就有 1 个城市正在收缩。[28] 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有所体现。人们被经济或其他有利条件吸引迁往别处。往往是大城市吸引了小城市的人，例如在日本，许多人离开中等城市前往东京，期望发财。[29] 也存在其他情况，比如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国总人口下滑导致部分城市人口下滑。当下，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和印度的城市经历着大幅度收缩。[30] 一些前期人口收缩的城市后期出现人口反弹，英国伦敦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这个城市经历了人口收缩的时期，1991 年其人口数从 1939 年的近 900 万下降到了 640 万，但其经济状况发生扭转，人口反弹，现在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它将成为特大城市。[31] 底特律等美国城市素来因人口收缩闻名（图 1），当下其与密歇根州政府合作，正大力吸引移民，以改变人口减少的长期趋势。许多新移民来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使底特律的努力获得了小小的成功。它现在是美国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32] 底特律等城市的经济和人口资源高度交织在一起，它们经历过人口收缩，我们必须观察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伦敦和纽约在上世纪 70 年代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口流失，看这些城市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是对于许多未来将要或当前正在收缩的城市而言，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历史性的低生育率需要这些城市制定战略来应对永久性人口流失的影响。[33]

25 Narain, Anand 和 Banerjee, 2013。
26 Thorn, Thornton 和 Helfgott, 2015。
27 Raposo, Crespo 和 Lages, 2017; Salvati et al., 2014。
28 The Economist, 2015.
29 Takahashi 和 Sugiura, 1996。
30 The Robinson Rojas Archives, 2008.
31 GLA Intelligence, 2015.
32 Arab American Institute, 2012.
33 Pallagst, 2014.

图 1. 1840 - 2012 年底特律人口




*来源*：迈勒（Myler），2013。

## *城市如何应对 2015-2016 年的大规模移民和流离失所*

谈及城市在移民融入社会过程中具体扮演何种角色，大家越来越关注民间社会组织所做的努力，他们已经走到了台前。例如，对 2015-2016 年的难民和其他移民（相当大一部分去了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的安置和融入。[34] 这些社会组织的贡献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应急措施，以及应对如此大规模移民要融入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极大挑战的长效机制中的一部分。

加拿大自 2015 年以来已经安置了大约 4 万名叙利亚难民。当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帮助解决了叙利亚人早期抵达和安置问题，而且也是正式的难民赞助者，这引起广泛关注。[35] 加拿大私人赞助的难民方案允许当地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签订协议，私人赞助商承担难民定居和融入新城市一年的费用，政府相应地在安全和医疗检查之后为其提供签证。[36] 一些国家认为非政府组织部门可以遵循这一模式。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支持发起全球难民赞助倡议（Global Refugee Sponsorship Initiative）。[37]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借鉴加拿大难民赞助方案，帮助其他国家实施他们自己的方案。虽然这种形式的方案由国家政府管辖，但

34 Glorius 和 Doomernik (eds), 2016. 也请参见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d.。
35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
36 Hyndman, Payne 和 Jimenez, 2017; Tito 和 Cochand, 2017; Garcea, 2016。
37 UNHCR, 2016.

务必要注意，它只对当地社区行动者以及主动资助难民的地方政府机构起作用。其特点是对赞助的需求超过了可提供的签证的数量，实际上已超出了国家政府处理申请的行政能力。这不仅体现了人们愿意支持难民在其所在的社区定居并融入社区，而且体现了实施这一官方方案来组织难民定居的能力。

但是，中东和土耳其的城市承担了最大责任，照顾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周边国家的难民，因此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在联合国难民署营地以及其它难民营中居住着大量难民，但大部分难民还是居住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的城市中，成为城市难民。在土耳其，只有 8%的难民生活在难民营，其余的都居住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最近一次统计表明在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人达 539000 人，而且难民注册过程仍在继续。[38]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处理好国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穆拉特·埃尔多安（Murat Erdogan）认为："市政当局应被视为决定移民，难民和凝聚政策的主要机构，而不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偏好，成为可有可无的咨询机构"。他还建议实施以下做法：

> 还有一种方法与前一种一样有效。这就是建立一种机制，使得所有相关公共机构汇集在一个地方。我们需要为难民创造这样一个地方，所有服务归集一处。[...] 对于当地服务的具体安排，难民应该参与到决策过程。我们应该考虑叙利亚人的需求，建议和关切，因为现在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应该从这一点出发安排法律和行政事务。地方政府，尤其是市政当局，在为难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务必要防止当地人民与难民之间关系紧张。市政当局在协调地方矛盾方面的表现将直接影响社会的整体和谐。涉及社会融入的项目在对社会冲突的能力建设有极大帮助。[39]

## 治理：从政策到城市规划

自从"2015 年世界移民报告"公布以来，对于城市对全球移民流动的影响力及其在移民融入中的作用，只有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认识有所增长。[40] 城市对移民的重要性不是暂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口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我们对城市的许多看法都是在先前更为农业化的社会中形成的，这一点在我们考量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时尤其明显。国家和其他上级政府以及城市都需要认识到，城市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增长，我们需要转变对治理角色的看法。国家和其他上层政府要设法让城市参与到与移民和融合政策相关的商谈。鉴于一个国家通常有许多城市，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城市在制定政策时扮演的角色，但是诸如加拿大城镇联会（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美国国家城市联盟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欧洲城市组织（Eurocities）

38 Erdogan, 2017.

39 同上。

40 例子请参见 The Guardian, 2015 and the LSE Cities centre website (https://lsecities.net/).

和非洲城市发展伙伴关系（Africa’s Municip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等城市联合可能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和机构需要认识到他们现有的以及潜在的影响力，并且承担一定的责任，负责相关领导。换句话说，城市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授权，并且应该接受这种授权。

管辖权的变更需要时间，特别是当变更涉及修改宪法。如果权力的分配是一个零和命题，那么城市将无法快速获得更多的创收权、土地使用决定权和基础设施开发权，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本该承担的职责。而赋予地方政府任何处理移民政策事宜的权力就更加难以实现。只要上级政府能够推翻与移民、定居和融合相关的地方决策，我们就更有理由鼓励政府间的深度合作，想方设法地让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一同制定政策，正式重新分配管辖权只能从长计议。呼吁国家政府让地方政府参与政策制定，是为了更好地调整每年接纳入境的移民人数，更好地争夺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的移民，帮助移民及其家庭更大程度地融入社会，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在当地合作伙伴的参与下，国家移民和融合政策的发展将会得到加强。城市在其所管辖区域扮演着何种角色？与之相关的大部分讨论都强调了政策，尤其是与移民及其利益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移民融入社会，社会变得和谐，文化变得丰富，城市和居民都收获更有活力的经济。《2015 年全球移民报告》呼吁更好地协调地方政策和上级政策。而城市规划是城市用于彰显重要性的最有力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规划和移民的对接。在管理移民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考虑上级政策而忽视城市规划。其实，城市规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治理，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宣布诸如移民融入之类的政策，对移民企业家开放大门和支持融合是一方面，但具体的实施只有在规划中才能落实。规划为资源分配设定优先级，并限制行政人员和民选官员的决策。如果一些城市规划不允许移民建立企业或宗教场所，包容性政策可能会遭到挫败。而如果保证移民在社区、企业、宗教、文化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也能成为规划委员会的一份子，规划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包容性行为。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参与规划不仅是一种包融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将确保人们从规划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这个群体的利益和需求。这其中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其中包括服务地点，提供交通、通信、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和信息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诚然价值观、权利和政治问题事关重大，然而，在移民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更为实际的规划问题可能会在移民融入一个城市的过程中更加引人注意。移民社区的公共交通服务方便吗？可以在社区新开具有异国风情的杂货店吗？可以修建一个有充足停车位的礼拜场所吗？可以在附近开图书馆吗？附近有移民服务机构吗？这一类现实问题更多是城市规划者管辖的范围，而不是民选官员或其他政策制定者的管辖范围。

## *为多样性做规划*

随着对移民权利，城市权利运动和包容性的地方政策制定的强烈关注，对移民融入的讨论常常忽略了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为移民所带来的影响做准备与为人口增长做准备是相似的。人口不断增长时，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提供和经济发展都是重中之重。但是由于移民让城市人口多元化，围绕移民进行的规划必须超越这些基本原则。许多人认为，多元化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优势，多年前多伦多市还以“多元化就是我们的力量（Diversity Our Strength）”为座右铭。此外，网上出现了很多宣传多元化优势的组织，其中包括由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创建的“跨文化城市计划 (Intercultural Cities)”和由多伦多美翠基金会 (Maytree Foundation) 创建的“移民

城市（Cities of Migration）”。规划理论提出了“多元文化规划（mulcultural planning）”原则，用以指导城市规划人员将移民和多样性纳入他们的规划中。尽管人们很少将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但它还是提醒我们认真考虑，值得我们在移民和城市规划领域对它深入了解。

简而言之，多元文化规划就是根据当地人口的多民族构成和发展方向，对既定环境和规划流程进行有计划的转变。[41] 传统形式的城市规划倾向于将其居民同化，寻求为广大居民群体服务。多元文化规划直接考虑到人口的多样性，注意到其复合群体的单独利益，以及他们在哪里居住、讨生活、过日子。例如在北美的许多大城市，来自亚洲的移民直接在郊区定居，而在早些时候，他们通常先在市中心的民族飞地（ethnic enclave）暂时停留。[42] 洛杉矶、多伦多或温哥华郊区不仅在住房方面面临发展上的压力，而且商业发展和其它与土地使用紧密相关的活动也面临压力，因此需要换种方式考虑郊区的发展，采取不同的规划方式，对发展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也换一种角度解决。

少数民族专用零售区对城市规划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少数民族社区可能会把这些地区的用途变得十分复杂，远远超出购物的范围。庄智西（音 Zhixi Cecilia Zhuang）最近在多伦多这些地区的研究成果为规划师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43] 正是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如购物、社区交通和参与社区活动，展示了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规划作出的决定对这些日常生活体验的质量有重大影响，而日常生活的质量是多元文化规划的重点。高层的政策声明如果不是通过城市规划实施，则是毫无意义的。

## 为多样性做规划：庄智西提出零售用地的案例分析

市政府应探索创新方式，支持移民团体表达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官方的计划，城市设计指南和文化规划等全市性政策，应明确认可城市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此外，应在少数族裔零售地区制定定点政策，使少数族群社区能够与市政官员合作，在设计和规划中加入少数族裔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街景、建筑外观、店面装饰、人行道空间、标牌、街头叫卖、公共艺术和社区活动。最后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是二级计划、特殊区域研究、战略计划、街道景观设计指导方针或综合社区改善计划，这将为城市官员提供明确的指导，以便保持和加强如此深厚的民族风景。城市官员可以在反映社区需求、优化各种资源、改善实体经营环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城市规划者、城市设计师和经济发展官员作为一线专业人员，有责任解决与社区变化和身份认同表达、公共空间设计质量、经济发展和振兴有关的问题。

穆罕默德·卡迪尔（Mohammad Qadeer）对多元文化规划进行了更广泛的考察，并提出了一套理论，他相信这套原则可以指导那些希望他们的城市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的城市规划者们。[44]

41 Van der Horst 和 Ouwehand, 2011。

42 Hiebert, 2015; Gold, 2015; Li, 2008.

43 Zhuang, 2015.

44 Qadeer, 2009; Qadeer 和 Agrawal, 2011。

### 穆罕默德 • 卡迪尔给城市的建议，这些城市都在为多样性做规划

- 公共咨询台提供少数民族语言设施，翻译和口译服务。
- 让少数族裔代表参加计划委员会和工作组，并促成规划人员多元化。
- 让少数民族社区组织加入规划决策过程。
- 将认可种族多样性列为官方 / 综合规划的目标。
- 在规划中纳入为特定文化机构而设的全市政策，如礼拜场所、民族老人之家、文化机构、殡仪馆、集市和庆祝游行。
- 在规划分析中定期分析民族和种族变量。
- 研究转型中的少数族群聚居区和社区。
- 制定维持少数民族社区的政策 / 设计指南。
- 为少数族群商业区，商场和商业改善区制定政策 / 战略。
- 把文化 / 宗教纳入特定场所 / 轻微变量的可接受理由。
- 采纳具有民族特色的标志、街道名称和符号。
- 解决针对少数民族的服务需求。
- 解决移民的特殊服务需求。
- 制定保护民族遗产的政策 / 项目。
- 制定适合不同群体的住房指导方针。
- 推动民族社区住房和社区发展的倡议 。
- 制定的策略战略考虑到跨文化需求。
- 为发展经济促进少数族群创业。
- 促进民族艺术和文化服务。
- 在赛场设计和程序中加入民族运动（如板球和地掷球）。

城市规划往往以 10-25 年为周期，因此是需要考虑人口变动的长期战略规划。虽然迁移趋势有时会意外转变，但通常这个趋势很容易预测，尤其是监管下的移民体系，所以城市的长期规划可以非常高效、靠谱。这尤其有利于高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交通运输、住房、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通信以及商业和零售部门的布局。稳定和可预测的移民趋势，以及对城市新移民定居模式的研究结果，为规划者在规划城市长远未来时提供了便利。本小节还是希望大家能更加关注城市规划在当地移民治理中的重要性。我们在讨论中进一步呼吁采取包容性地方政策，但单靠政策的发展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包容性，必须通过实地规划来实施相应的政策。

# 展望未来

## *讨论中有北方国家偏见？*

城市规划的这些问题和将多元文化纳入规划主要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实践经验。对移民和城市的讨论，包括城市规划，会大幅倾向于发达社会及其成熟经济体的关切。发生这种情况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无论其是中等规模还是超大规模，这些讨论可能都会忽略它们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面临贫民窟带来的挑战，而其本质正是没有规划。贫民窟不仅仅贫困，还缺乏基础服务设施，包括饮用水、卫生、电力和公共交通等。贫民窟的有些地方可能机动车辆（包括救护车）无法到达，或许被认为无法治理，排除在城市规划的范围之外。

贫民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合标准的住房，这也是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的一个主要议题。在基多（Quito）举办的人居三会议提出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涉及面广泛且雄心勃勃。尽管这个议程不具约束力，却为地方和国家政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长期指导，为如何让城市更宜居、更可持续并更具包容出谋划策。但是，这个议程是否在富裕国家更容易实现仍然是个疑问，即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参与到新城市议程中。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规划者；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规划办公室，很多都没有一个规划师。换句话说，世界各个城市实施“新城市议程”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富裕国家可能在执行这个议程时表现最好。

关于当地对移民后果的管理，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城市将处理得更好，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规划资源，而且管理移民流的能力要高于南方国家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达成了一致，该目标中无数次提到城市和移民问题，他们就“新城市议程”也达成了协议，其中同样提到了移民问题，这可喜可贺；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普遍协议是否同时适用于所有社会仍值得商榷。目前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会发现这些目标没有过时，依然是有用的。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与富裕国家的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且更为严重，这将影响其实现全部目标的能力。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哪个？

> 虽然财政资源很重要，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很多地方即便有了新资源，也没有做好利用的准备，实际上现存的资源他们不使用。地方的能力是最大的障碍［...］。人力资源匮乏。尽管印度有 5000 个人口过万的地方，但估计经过培训的规划师却只有 3000 左右。即使我们每个地方只分配一个规划师，仍有 40% 的缺口。更遑论面对新德里或孟买这样的大城市时，这个分配提议有多荒唐。此外，很少有规划师兼有公共财政的学习背景，而大多数公共财政专业人员又没有很好的规划技巧，这就使大多数地方资本预算不足，难以维持现有的基础设施。[45]

对于这些警示性的言论，应该补充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可以从那些不太富有的国家中学习经验。就像前面简略提到的贫民窟，不太富有的国家已经发明出一些新的应对方法。这种创新不但

45 Citiscope, 2016.

本身具有价值，也表明城市在管理中可以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方法。这种做法为包括移民在内的居民留出更多发挥才智的空间，让他们能够为当地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为加强社会凝聚力提供路径。

## *一些影响*

这里所讨论的每一个领域，即便是简单提及的，都需要学术界、政府、民间研究者以及地方和国家的政策官员和越来越多地参与这些事务的国际社会进一步审查。对本章所涉及的主题进行进一步讨论，重点如下：

城市作为移民流动模式的决定因素，对于治理意味着什么：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协同一致，设置移民层级、在全球竞争人才、并做好定居和融合的工作以及非政府行为发挥的角色，包括商业界和民间社会组织为移民目的地城市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做移民管理的工作。

南方国家的包括大城市和贫民窟的移民城市面临的独特挑战，如应对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压力巨大、贫民窟和城郊居民点的扩张、规划能力的欠缺。

移民和城市规划，包括明确为多样性所做的规划：引导城市规划者讨论南北方国家城市在移民方面面临的挑战，得出最佳方案，为移民作出城市的长期规划。

城市作为决定移民模式的世界领袖的出现，是不断进行的城市化的结果，如今这已成为了全球性现象。城市不仅吸引着世界顶尖人才，也是数以百万计普通移民的目的地。在这里，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对未来憧憬无限。国际化都市和超大城市吸引着移民同时，由于过度拥挤，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变得不再宜居，一些较小的城市将越来越受到青睐，而这些较小城市在管理移民和融合方面可能会经验不足，这时它们将受益于前人在发展中总结的智慧。本章呼吁城市、他们的民选领导人、政策官员、规划师以及众多机构之间加强知识和经验交流，这些机构的行动将对移民进程产生影响。虽然我们认识到边界和移民政策仍然是国家当局的管理权限，但是我们敦促各国政府也能够让城市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移民浪潮中，城市已经成为全球行动者了。长期的历史表明，城市化将不会逆转，城市将越来越适合参与国家的移民政策讨论。此外，国际社会可以召集城市官员和机构举行会议，加强我们对处理这一复杂问题的集体思考。

# 参考

## 第一章

Clemens, M., C. Montenegro and L. Pritchett

2009 The Place Premium: Wage Differences for Identical Workers across the U.S. Border. Washington DC: Centerfor Global Development.

Gibson, J. and D. McKenzie

2011 Australia's Pacific Seasonal Worker Pilot Scheme: Development Impact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New Zealand:University of Waikato.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

2017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7. IDMC,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7/pdfs/2017-GRID.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0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IOM and United Nations,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00_edited_0.pdf.

2003 World Migration Report: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03_1.pdf.

201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The Future of Migration: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Change.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0_english.pdf.

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2014 Migrants in Low-Skilled Work: The Growth of EU and Non-EU Labour in Low- Skilled Jobs and its Impact on the UK. London. Available from 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33083/MAC-Migrants_in_low-skilled_work__Full_report_2014.pdf.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3 The fis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 in OECD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3. OECD, Paris.Ruhs, M. and B. Anderson (eds.)

2010 Who Needs Migrant Workers? Labour Shortages, Immig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0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2 – Wallchart. UN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wallchart2002.pdf.

2003 Long-Rang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on Long-Rang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trends/population-projections.pdf.

20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Highlight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Key findings and advance tables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7_KeyFindings.pd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9 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NDP,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7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943e8a34.pd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9 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NDP,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7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943e8a34.pdf

Van Hear, N.
2011 Diasporas,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in conflict-ridden societies. In: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Nexu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Changing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s (T. Faist, M. Fauser and P. Kivisto, e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World Bank
2016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Role for the World Bank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90381472677671445/Migration-and-development-arole-for-the-World-Bank-Group.

2017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992371492706371662/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27.pdf.

World Bank Databank
2017 Personal Remittanc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CD.DT?locations=XO.

## 第二章

Abel, G. and N. Sander

2014 Quantifying glob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Science, 343(6178):1520–1522.

Abel, G., K. Samir and N. Sander

2013 Examin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glob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2014, 25–28 June 2014, Budapest, Hungary.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Budapest. Available from http://epc2014.princeton.edu/abstracts/140830.

Alvarez, P., P. Briod, O. Ferrari and U. Rieder

2015 Remittances: How reliable are the data?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 5(2):42–46. Australian National Audit Office (ANAO)

2013 Individual management services provided to people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 Canberra. Castles, S.

2002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36:1143–1168.

Clarke, J.

2000 The problems of evaluating numbers of illegal 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Regularisations of Illegal Im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 de Bruycker, ed.). Bruylant, Brussels. Clandestino Research Project Database on Irregular Migration

2009a Clandestino Project Overview: Size and Development of Irregular Migration to theEU. Database on Irregular Migr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irregular-migration.net/typo3_upload/groups/31/4.Background_Information/4.2.Policy_Briefs_EN/ComparativePolicyBrief_SizeOfIrregularMigration_Clandestino_Nov09_2.pdf.

2009b Irregular Migration in Spain. Database on Irregular Migr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irregular-migration. net/fileadmin/irregular-migration/dateien/4.Background_Information/4.2.Policy_Briefs_EN/Spain_PolicyBrief_Clandestino_Nov09_2.pdf.

2012 Update Report Greece: The Number of Irregular Migrants in Greece at the End of 2010 and 2011 (T.Maroukis). Database on Irregular Migr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irregular-migration.net/fileadmin/irregular-migration/dateien/4.Background_Information/4.5.Update_Reports/Maroukis_2012_Update_report_Greece_2.pdf.

2015 Update Report Germany: Estimated Number of Irregular Foreign Residents inGermany (D. Vogel). Database on Irregular Migr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irregular-migration.net/fileadmin/irregular-migration/dateien/4.Background_Information/4.5.Update_Reports/Vogel_2015_Update_report_Germany_2014_fin-.pdf.

de Beer, J., J. Raymer, R. van den Erf and L. van Wissen
2010 Overcoming th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 A new method applied to flow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6(4):459–481.

de Beer, J., R. van der Erf and J. Raymer
2009 Estimates of OD Matrix by Broad Group of Citizenship, Sex and Age, 2002–2007. Report for the MIMOSA project. Available from http://mimosa.cytise.be/Documents/Mimosa_2009b.pdf.

Fleischman, Y., S. Willen, N. Davidovitch and Z. Mor
2015 Migration as a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for irregular migrants: Israel as case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47:89–97.

Frontex
2010 Beyond the Frontiers: Frontex: The First Five Years. Frontex, Warsaw, p.20. Available from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General/Beyond_the_Frontiers.pdf.

Gallagher, A. and M. McAuliffe
2016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 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Gordon, l., K. Scanlon, T. Travers and C. Whitehead
2009 Economic Impact on London and the UK of an Earned Regularization of IrregularMigrants in the UK.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London. Available from 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gla_migrate_files_destination/irregular-migrants-report.pdf.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n.d. Database: IDMC Global figures 2016. IDMC,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

2016 GRID 2016: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IDMC,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2016/.

2017 GRID 2017: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IDMC,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5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Migrant Workers –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ILO,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36343.pdf.

2016 Promoting Fair Migration. ILO,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3898.pd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9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Sixth Edition (BPM6). IMF,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n.d.a Glossary on Mi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publications.iom.int/ (forthcoming).

n.d.b About: Missing Migrants Project: Tracking Deaths Along Migratory Route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about.

n.d.c Methodology: Missing Migrants Project: Tracking Deaths Along Migratory Route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methodology.

n.d.d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assistedvoluntary-return-and-reintegration.

n.d.e Migration Health: Healthy Migrants in Healthy Communitie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health.iom.int/.

n.d.f Displacement Tracking Matrix (DTM).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dtm.info/.

n.d.g Counter-Trafficking.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counter-trafficking.

n.d.h ECOWAS Training Kit: Meet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Needs for Migration Data. Global Migration Data Analysis Centre (GMDAC). IOM, Berlin (forthcoming).

n.d.i Latest Global Figures: Missing Migrants Project: Tracking Deaths Along Migratory Route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

2016a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2015 Key Highlight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DMM/AVRR/AVRR_2015_Key_Highlights.pdf.

2017a Key Migration Term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key-migration-terms.

2017b Migration Flows – Europe. Displacement Tracking Matrix.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migration.iom.int/europe/.

2017c IOM's Strategy to Enable, Engage and Empower Diaspora.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diaspora.iom.int/ioms-strategy-enable-engage-and-empower-diaspora.

2017d GMDAC MigFac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OM: Berlin. Available from http://gmdac.iom.int/gmdacmigfacts-international-migration.

Koser, K.
2010 Dimensions and dynamics of irregular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3):181–193.

Kraler, A. and D. Reichel
2011 Measuring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flows – what available data can tell. InternationalMigration, 49(5):97–128.

Krogstad, J., J. Passel and D. Cohn
2017 5 facts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27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4/27/5-facts-about-illegal-immigration-in-the-u-s/.

Laczko, F.
2017 Improving data on migration: A 10-point plan.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 7:1, January–March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Lemaitre, G., T. Liebig, C. Thoreau and P. Fron
2007 Standardized Statistics on Immigrant Inflows: Results, Sources and Methods. OECD, Paris.

McAuliffe, M.
2017 The nexus between forced and irregular migration: Insights from demography. In: The Demography of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G. Hugo, J. Abbasi-Shavazi and E.P. Kraly, eds). Springer.

McAuliffe, M. and F. Laczko (eds.)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McAuliffe, M. and K. Koser (eds.)
2017 Introduction. In: A Long Way to Go: Irregular Migration Patterns, Processes, Drivers and Decision Making. ANU Press, Canberra.

McAuliffe, M. and V. Mence
2017 Irregular maritime migration as a global phenomenon. In: A Long Way to Go: Irregular Migration Patterns, Processes, Drivers and Decision Making (M. McAuliffe and K. Koser, eds). ANU Press, Canberra.

Nawrotzki R. and L. Jiang
2015 Indirectly estimating international net migration flows by age and gender: The community demographic mode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DM-IN) Dataset. Historical Methods, 48(3):113–12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n.d.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OECD Stat, Paris. Available from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IG.

n.d.b Foreign-born employment. OECD Stat, Paris. Accessed 03 July. Available from https://data.oecd.org/migration/foreign-born-employment.htm (accessed 03 July 2017).

n.d.c Net ODA. OECD State, Paris. Available from 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 (accessed 30 June 2017).

2012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2.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from 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international-migration-outlook-2012_migr_outlook-2012-en.

2012b Connecting with Emigrants: A Global Profile of Diasporas.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from www.oecdbookshop.org/en/browse/title-detail/?isb=9789264177949.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OECD.Stat, Paris. Available from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IG.

2016a Statistical annex.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6.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from www.oecd.org/els/mig/international-migration-outlook-2016-statistical-annex.pdf.

2016b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6. OECD Publishing, Paris.

Poulain, M. and N. Perrin

2001 I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improving in Europe. Working Paper No. 12. Joint ECE-EUROSTAT Work Session on Migration Statistics organiz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 Statistics Division. UN Statistical Commission and 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urostat). Geneva, 21–23 May. Available from www.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2001/05/migration/12.e.pdf.

Poulain, M., N. Perrin and A. Singleton (eds.)

2006 Towards Harmonized European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C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Louvain, Belgium.

Raymer, J. and F. Willekens (eds.)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Data, Models and Estimates. Wiley, Chichester.

Raymer, J., G.J. Abel, G. Disney and A. Wiśniowski

2011 Improving Estimates of Migration Flows to Eurostat.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Working Paper No. 15, December.

Raymer, J., A. Wiśniowski, J.J. Forster, P.W.F. Smith and J. Bijak

2013 Integrated modeling of European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8 (503):801–819.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2010 Annual Report 2009/2010. Available from www.gov.za/sites/www.gov.za/files/saps-annual-report.pdf.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1998 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sion 1.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from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58rev1E.pdf.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08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s://esa.un.org/migration/index.asp?panel=1.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Retrieved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pdf

2015a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index.shtml.

2015b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5 Revision: CD-ROM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5.pdf.

2015c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to and from Selected Countries: The 201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mpirical2/migrationflows.shtml.

2015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to and From Selected Countries: The 2015 Revision. CD-ROM Documentation.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mpirical2/docs/migflows2015documentation.pdf.

2015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2016 Population Fact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5.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populationfacts/docs/MigrationPopFacts20154.pdf.

20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1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UNDP,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69/hdr_2009_en_complete.pd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popstats.unhcr.org/en/persons_of_concern.

2010 UNHCR Global Trends 2010.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statistics/country/4dfa11499/unhcr-global-trends-2010.html.

2013 Note on the Mandat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and His Office.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ctober 2013.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protection/basic/526a22cb6/mandate-highcommissioner-refugees-office.html.

2016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76408cd7.pdf.

2017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dach/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7/06/2016_Global_Trends_WEB-embargoed.pdf.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16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UNODC, Vienna. Available from 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2016_Global_Report_on_Trafficking_in_Persons.pd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7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Civilian Secu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71339.pdf.

Vertovec, S.
2005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Diasporas. Working Paper No. 3. 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Vertovec, S. and R. Cohen (eds.)
1999 Migration, Diasporas and Transnationalism.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Vezzoli, S., M. Villares-Varela and H. de Haas
2014 Uncover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 Data: Insights from the DEMIG Databases. Working paper No. 88.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Oxford.

Walk Free Foundation
2016 Global Findings: The Global Slavery Index 2016. Walk Free Foundation, Western Australia.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slaveryindex.org/findings/.

Willekens, F.
2016 Evidence-based monitoring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i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s Stakeholders (CESS), co-organized by the European Statistical Advisory Committee (ESAC), Budapest, 20–21 October; and at the Eurostat conference, Towards More Agile Social Statistics, Luxembourg, 28–30 November.

World Bank
n.d.a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n.d.b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Data: 24 September 2015 (updated as of April 2017). World Bank, Washington,D.C. Available from www.worldbank.org/en/topic/migrationremittancesdiasporaissues/brief/migrationremittances-data.

n.d.c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Publication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www.worldbank.org/en/topic/migrationremittancesdiasporaissues/brief/migration-and-remittances-publications.

2015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5.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102761445353157305/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25.pdf.

2016a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2016 – Third edi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from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3743/9781464803192.pdf?sequence=3&isAllowed=y.

2016b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6.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661301460400427908/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26.pdf.

2017a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7.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992371492706371662/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27.pdf.

2017b Remittan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decline for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Press releas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7/04/21/remittancesto-developing-countries-decline-for-second-consecutive-year.

## *第三章*

Acosta, D.

2016 Free Movement in South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an Alternative Model?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23 August.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e-movement-south-america-emergencealternative-model.

Adepoju, A.

2016 Migration Dynamics, Refug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Academic Impact(UNAI), 20 September. Available from https://academicimpact.un.org/content/migration-dynamicsrefugees- and-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africa.

Altai Consult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5a Migration Trends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Connecting the Dots. Prepared by Altai Consulting for IOM MENA Regional Office.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altai_migration_trends_accross_the_mediterranean.pdf.

2015b Irregular Migration Between West Africa, North Af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repared by Altai Consultingfor IOM Nigeria. Available from https://fmmwest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en-altai.pdf.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7a 3412.0 – Migration, Australia 2015–16. ABS, Canberra, 30 March. Available from 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3412.0/.

2017b Media Release – Migration, Australia, 2015–16. ABS, Canberra, 30 March. Available from 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atestproducts/3412.0Media%20Release12015-16.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6 International Student Data 2016.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berra. Available from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search/International-Student-Data/Pages/InternationalStudentData2016.aspx.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DIBP)

2016 Australia's Humanitarian Programme 2016–17 Discussion Paper. DIBP, Canberra. Available from www.border.gov.au/Report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discussion-papers/discussion-paper-humanitarianprogramme_2016-17.pdf.

2017 Temporary Work (Skilled) visa (subclass 457) Programme, 26 April update. DIBP, Canberra. Available from https://data.gov.au/dataset/visa-temporary-work-skilled.

Bertelsmann Stiftung an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2 Rethink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ge of Migration (Bertelsmann Stiftung,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eds.). Verlag Bertelsmann Stiftung, Gutersloh, Germany.

Bolter, J.

2017 The Evolving and Diversifying Nature of Migration to the U.S.-Mexico Border.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6February.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evolving-and-diversifying-nature-migrationus-mexico-border.

Carling, J.

2016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Carvajal, D.

2017 As Colombia Emerges from Decades of War, Migration Challenges Mount.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13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olombia-emerges-decades-war-migrationchallenges-mount.

Cerruti, M.

2009 Gender and Intra-Regional Migration in South America.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s, 2009/12.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

2014a The IPCC's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What's in it for South Asia? CDKN, London. Available from https://cdk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CDKN-IPCC-Whats-in-it-for-South-Asia-AR5.pdf.

2014b The IPCC's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What's in it for Africa? CDKN, London. Available from https://cdk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AR5_IPCC_Whats_in_it_for_Africa.pdf.

Cook, S., J. Lu, H. Tugendhat and D. Alemu
2016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Facts and fictions from the agri-food sector in Ethiopia and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81:61–70. Available from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15301571.

Curtain, R., M. Dornan, J. Doyle and S. Howes
2016 Pacific Possible: Labour Mobility: The Ten-Billion-Dollar Prize. The World Bank, July. Available from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555421468204932199/pdf/labour-mobility-pacific-possible.pdf.

Danish Refugee Council and Regional Mixed Migration Secretariat (RMMS)
2017 Regional Mixed Migration in East Africa and Yemen in 2017: 1st Quarter Trend Summary and Analysis.RMMS East Africa and Yemen. Available from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MMS%20Mixed%20Migration%20Trends%20Q1%202017_0.pdf.

Devillard, A., A. Bacchi and M. Noack
2016 A Survey on Migration Policies in West Africa. ICMPD, Vienna, and IOM, Dakar. Available from www.icmpd.org/fileadmin/ICMPD-Website/ICMPD_General/Publications/2015/A_Survey_on_Migration_Policies_in_West_Africa_EN_SOFT.pdf.

Djafar F. and M. Hassan
2012 Dynamic of push and pull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onesian workers in Malaysia.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ehavioural Studies, 4(12):703–711.

Doherty, M., B. Leung., K. Lorenze and A. Wilmarth
2014 Understanding South Asian Labor Migration. Workshop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Affairs, La Follet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Available from www.lafollette.wisc.edu/images/publications/workshops/2014-migration.pdf.

Ellis, P. and M. Roberts
2016 Leveraging Urbanization in South Asia: Managing Spatial Transformation for Prosperity and Livability.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2549/9781464806629.pdf.

European Commission
n.d.a Schengen Area. European Commission Migration and Home Affairs.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borders-and-visas/schengen_en.

n.d.b Temporary Reintroduction of Border Control. European Commission Migration and Home Affairs.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borders-and-visas/schengen/reintroduction-border-control_en.

2007 EU-enlargement: The Impact of East-West Migration on Growth and Enlargement. EU Research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uxembourg. Available from http://cordis.europa.eu/docs/publications/1001/100124151-6_en.pdf.

2014 The 2015 ageing report: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nd projection methodologies. European Economy, 8.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from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publications/european_economy/2014/pdf/ee8_en.pdf.

2015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83, Spring 2015. European Commission.Available from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archives/eb/eb83/eb83_first_en.pdf.

2017a Irregular Migration Via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From Emergency Responses to Systemic Solutions. EPSC Strategic Notes, Issue 22.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epsc/sites/epsc/files/strategic_note_issue_22_0.pdf.

2017b Migration on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Managing Flows, Saving Lives.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25 January.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sites/homeaffairs/files/what-we-do/policies/european-agenda-migration/proposal-implementation-package/docs/20170125_migration_on_the_central_mediterranean_route_-_managing_flows_saving_lives_en.pdf.

European Council

2016 EU-Turkey statement, 18 March 2016. Press release 144/16. European Council. Available from www.consilium.europa.eu/press-releases-pdf/2016/3/40802210113_en.pdf.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6 Current Migration Situation in the EU: Hate Crime. FRA. Available from http://fra.europa.eu/en/publication/2016/current-migration-situation-eu-hate-crime.

Eurostat

2017a Migration and Migra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Eurostat. Available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

2017b 63300 Unaccompanied Minors Among Asylum Seekers Registered in the EU in 2016. Eurostat, 11 May.Available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8016696/3-11052017-AP-EN.pdf/30ca2206-0db9-4076-a681-e069a4bc5290.

Flahaux, M.L. and H. de Haas

2016 African migration: Trends, patterns, drivers.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4(1):1?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n.d. Lake Chad Basin Crisis. FAO, Rome. Available from www.fao.org/emergencies/crisis/lakechadbasin/intro/en/.

2016 FAO Insecurity in the Lake Chad Basin. FAO, Dakar, 23 June. Available from www.fao.org/africa/news/detail-news/en/c/420990/.

Frontex

2016 Western Balkans: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6. Frontex. Available from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WB_ARA_2016.pdf.

2017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for 2017. Frontex, 15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7.pdf.

Frouws, B. and C. Horwood

2017 Smuggled South. Danish Refugee Council and Regional Mixed Migration Secretariat (RMMS), March.Available from http://regionalmms.org/images/briefing/Smuggled_South.pdf.

Gao, H., T.B. Bohn, E. Podest and D.P. Lettenmaier

2011 On the causes of the shrinking of Lake Chad. IOP Scienc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6(3):1?. Available from 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6/3/034021/meta.

Georgetown University

n.d. Planned Relocations: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s://isim.georgetown.edu/Planned-Relocations.

Gois, A.

2015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 Heinrich Böl Stiftung, Berlin, 23 November. Available from www.boell.de/en/2015/11/23/labour-migration-asean-region.

Gonzalez-Barrera, A.

2015 More Mexicans Leaving Than Coming to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Available from www.pewhispanic.org/2015/11/19/more-mexicans-leaving-than-coming-to-the-u-s/.

Gonzalez-Barrera, A. and J. Krogstad

2016 Apprehensions of Migrants at U.S.-Mexico Border Rose Sharply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Pew Research Center, 21 December.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2/21/apprehensions-ofmigrants-at-u-s-mexico-border-rose-sharply-in-october-and-november/.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ffairs Office (GCAO)

2017 Ethiopia, Saudi Arabia Sign Domestic Workers?Recruitment Agreement. GCAO, Ethiopia. Available from www.gcao.gov.et/web/en/-/ethiopia-saudi-arabia-sign-domestic-workers-recruitment-agreement.

Hatsukano, N.

2015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and Support Environ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for Greater Productivity,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Welfare in ASEAN.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vember 2015. Available from www.eria.org/ERIA-DP-2015-76.pdf.

Hickey, M., P. Narendra and K. Rainwater
2013 A Review of Internal and Regional Migratio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Research Programme Consortium, Working Paper 8. Available from http://migratingoutofpoverty.dfid.gov.uk/files/file.php?name=wp8-hickey-review-of-internal-and-regional-migration-policy-in-sea.pdf&site=354.

Hu, X.
2012 China's You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Search of Fortune, Happiness, and Independence. MigrationPolicy Institute, 4 January.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nas-young-rural-urbanmigrants-search-fortune-happiness-and-independence.

Hugo, G.J.
2014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ASE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alays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51(1):43?7.

2015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Population, Spaceand Place, 22(7):651?68. Available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psp.1930/full.

Hummel, D., M. Doevenspeck and C. Samimi
2012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Migration in the Sahel: Selected Issues with a Focus on Senegal and Mali. Migratio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Sahel (MICLE) Research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 Available from www.micle-project.net/uploads/media/micle-wp1-2012-en.pdf.

Hummel D. and S. Liehr
2015 Migration in the West African Sahel ?More than a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SOE Policy Brief No.2/2015. Available from www.isoe.de/fileadmin/redaktion/Downloads/Bevoelkerung/policy-briefisoe-2015-2.pdf.

Içuygu, A. and S. Koser Akcapar
2016 Turkey.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ICEF Monitor
2015a Strong Growth in Japan's Foreign Enrolment in 2014. ICEF, Bonn. Available from http://monitor.icef.com/2015/07/strong-growth-in-japans-foreign-enrolment-in-2014/.

2015b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2015. ICEF, Bonn. Available from http://monitor.icef.com/2015/11/the-state-of-international-student-mobility-in-2015/.

Igielnik, R. and J. Krogstad
2017 Where Refugees to the U.S. Come From. Pew Research Center, 3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2/03/where-refugees-to-the-u-s-come-from/.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IRCC)
2016 2016 Annual Report to Parliament on Immigration, IRCC Canada. Available from www.cic.gc.ca/english/resource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2016/index.asp.

Infometrics and National Research Bureau Ltd
2016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 2015/16: For Education New Zealand, October. Available from https://enz.govt.nz/assets/Uploads/The-Economic-Impact-of-International-Education-in-New-Zealand-2015-2016.pd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2016 Leading Places of Origin. IIE,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Leading-Places-of-Origin/2015-16.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
2017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7. IDMC,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7/pdfs/2017-GRID.pd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6 Labour Mi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iagnosis, Strategy, and ILO's Work in the Region.ILO Technical Reports, 2016/2. ILO, Lima. Available from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8185.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n.d.a South America. IOM, Buenos Aires.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south-america.

n.d.b Mediterranean. In: Missing Migrants – Tracking Deaths Along Migratory Route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mediterranean.

n.d.c Displacement Tracking Matrix.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dtm.info.

n.d.d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OM, Dakar.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west-and-central-africa.

2015a Bay of Bengal and Andaman Sea Crisis: IOM Revised Appeal. IOM, Bangkok.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country_appeal/file/IOM-Revised-Appeal-Bay-of-Bengal-and-Andaman-Sea-Aug2015.pdf.

2015b More Europeans Migrate to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Than Other Way Around: IOM Study.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news/more-europeans-migrate-latin-america-caribbean-other-way-around-iom-study.

2016a Assessing the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Migration Nexus in South Asia. IOM, Bangladesh.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environmental_degradation_nexus_in_south_asia.pdf.

2016b Mixed Migration Flow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Compilation of Available Data and Information.IOM, Geneva, June 5. Available from http://migration.iom.int/docs/2016_Flows_to_Europe_Overview.pdf.

2016c Migrant Vulnerabilities and Integration Needs in Central Asia: Root Causes,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IOM, Astana. Available from www.iom.kz/images/inform/FinalFullReport18SBNlogocom.pdf.

2016d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Route: Deadlier Than Ever. Data Briefing Series Issue No. 3. IOM GMDAC, Berlin.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gmdac_data_briefing_series_issue3.pdf.

2016e 3rd Almaty Process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 19–20 September 2016, Astana Kazakhstan. IOM, Astana. Available from www.iom.kz/en/new/213-alma-proc-meet-eng.

2017a Sri Lanka Flood 2017: Statistical Summary of Displacement Situation. IOM, Sri Lanka.Available from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country/docs/srilanka/IOM-SL-Displacement-Map.pdf.

2017b Return of Undocumented Afghans from Pakistan and Iran: 2016 Overview.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afghanistan.iom.int/sites/default/files/Reports/iom_afghanistan_-_return_of_undocumented_afghans_from_pakistan_and_iran_-_2016_overview.pdf.

2017c Migration Trends in South America. South American Migration Report No. 1. IOM, South America. Available from http://robuenosaires.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20PDFs/Report_Migration_Trends_South_America_N1_EN.pdf.

2017d Mixed Migration Flow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Compilation of Available Data andInformation: Reporting Period 2016.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2016_Flows_to_Europe_Overview.pdf.

2017e Mediterranean Migrant Arrivals Top 363,348 in 2016; Deaths at Sea: 5,079. IOM, Geneva, 6 January.Available from www.iom.int/news/mediterranean-migrant-arrivals-top-363348-2016-deaths-sea-5079.

2017f Analysis: Flow Monitoring Surveys The Human Trafficking and Other Exploitative Practices Prevalence IndicationSurvey April 2017. IOM DT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migration.iom.int/docs/Analysis_Flow_Monitoring_and_Human_Trafficking_Surveys_in_the_Mediterranean_and_Beyond_26_April_2017.pdf.

2017g Yemen, 14th Report – May 2017. IOM and UNHCR, Task Force on Population Movement (TFPM). Available from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draft_tfpm_14th_report_may2017_hct.pdf.

Ionesco, D., D. Mokhnacheva and F. Gemenne
2017 The Atlas of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OM and Routledge. Available from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projects/atlas-environmental-migration.

Ipsos MORI
2016 Perceptions are Not Reality: What the World Gets Wrong. Ipsos MORI, December. Available from www.ipsos.com/ipsos-mori/en-uk/perceptions-are-not-reality-what-world-gets-wrong?language_content_entity=en-uk.

Jacobsen, J. and M. Valenta
2016 Moving to the Gulf: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to the GCC countries,1960–2013. Labour History, 57(5):627–648. Available from http://dx.doi.org/10.1080/0023656X.2016.1239885.

Jayasuriya, D. and R. Sunam
2016 South Asi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Kelly, A.
2017 Number of Nigerian women trafficked to Italy for sex almost doubled in 2016. The Guardian, 12 January.Available from 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7/jan/12/nigerian-women-traffickedto-italy-for-sex-doubled-2016.

Krogstad, J.
2016 5 Facts About Mexico and Immigration to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11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2/11/mexico-and-immigration-to-us/.

Krogstad, J. and G. Lopez
2016 Venezuelan Asylum Applications to U.S. Soar in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4 August.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8/04/venezuelan-asylum-applications-to-u-s-soar-in-2016/.

Krogstad, J., J. Passel and D. Cohn
2017 5 Facts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27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4/27/5-facts-about-illegal-immigration-in-the-u-s/.

Krogstad, J. and J. Radford
2017 Key Facts About Refugees to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30 January.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1/30/key-facts-about-refugees-to-the-u-s/.

Lesser, G. and J. Batalova
2017 Central Amer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w Research Center, 5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entral-american-immigrants-united-states.

Luna, K.
2017 Central Americans Turn to Mexico for Asylum.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10 March. Available from https://cis.org/Luna/Central-Americans-Turn-Mexico-Asylum.

Majidi, N. and L. Oucho
2016 East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Malik, S.
2015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vailable from 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immigration/news/2015/05/21/113690/asian-immigrants-in-the-unitesstates-today/.

Manji, F.
2017 No Win-Wins in Kenya's Modern-Day Voyages in Search of W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26 May. 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7/05/26/no-win-wins-in-kenyas-modern-dayvoyages-in-search-of-work/.

McAuliffe, M.
2016 Resolving Policy Conundrums: Enhancing Humanitarian Protection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TCM_Development-McAuliffe-FINAL.pdf.

McAuliffe, M. and K. Koser
2015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ow migrant smugglers are exploit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Adva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inter 2015, 30–33.

Meyer, P., R. Margesson, C. Seelke and M. Taft-Morales
2016 Unaccompanied Children from Central America: Foreign Policy Consideration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s://fas.org/sgp/crs/homesec/R43702.pd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China Releases Report on Foreign Students for 2015. 20 April. Available from http://en.moe.gov.cn/News/Top_News/201604/t20160420_239196.html.

Mixed Migration Hub
2015 Detained Youth: The Fate of Young Migrants, Asylum-Seekers and Refugees in Libya Today. Study 1,July 2015. MHUB. Available from www.mixedmigrationhub.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MHUB_2015_Detained-Youth_Exec-Summary_EN.pdf.

Moon, K.S.H.
2015 South Korea's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Their Political Impact. East Asia Policy Paper 6, Centre for East Asia Policy Stud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South-Koreas-demographic-changes-and-their-political-impact.pdf.

Natter, K.
2014 Fifty years of Maghreb emigration: How states shaped Algerian, Moroccan and Tunisian emigration. Working Paper, DEMIG No. 2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from www.imi.ox.ac.uk/publications/wp-95-14.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2016 Migration Trends 2015/2016.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November.Available from www.mbie.govt.nz/publications-research/research/migrants---monitoring/migrationtrends-and-outlook-2015-16.pdf.

Nshimbi, C.C. and L. Fioramonti
2013 A Region Without Borders? Policy Frameworks for Regional Labour Migration Towards South Africa.MiWORC Report, African Centre for Migration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Available from www.miworc.org.za/docs/MiWORC-Report-1.pdf.

Oommen, G.Z.
2015 South Asia–Gulf migratory corridor: Emerging pattern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5(3):394–412. Available from http://dx.doi.org/10.1080/21632324.2015.1010705.

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2016 Labour Migration in Central Asia. OSCE Security Community, Issue 1/2016. OSCE. Available from www.osce.org/magazine/250386.

Park, Y-b.
2017 South Korea Carefully Tests the Waters on Immigration, With a Focus on Temporary Worker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south-korea-carefully-tests-watersimmigration-focus-temporary-workers.

Passel, J. and D. Cohn
2017 As Mexican Share Declined, U.S.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Fell in 2015 Below Recession Level.Pew Research Center, 25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4/25/as-mexicanshare-declined-u-s-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fell-in-2015-below-recession-level/.

Rahman, Md M.
2013 Migrant indebtedness: Bangladeshis in the GCC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3(6):205–219.Available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imig.12084/full.

Raines, T., M. Goodwin and D. Cutts
2017 The Future of Europe: Comparing Public and Elite Attitudes. 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Available from 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ations/research/2017-06-20-future-europe-attitudes-raines-goodwin-cutts-final.pdf.

Refugee Council of Australia
2017 Recent Changes in Australian Refugee Policy. RCA, June. Available from www.refugeecouncil.org.au/publications/recent-changes-australian-refugee-policy/.

Reifeld, H.
2015 Emigration, Transit and Host Country: Migration in Morocco. KAS International Reports Issue 2–3,Konrad-Adenauer-Stiftung. Available from www.kas.de/wf/en/33.40711/.

Royal Thai Government
2015 Summary of the special meeting on irregular migr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Press Release, 29 May.Available from www.mfa.go.th/main/en/media-center/14/56880-Summary-Special-Meeting-on-Irregular-Migration-in.html.

Russell, M.
2017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Rocky Road to Integration. Briefing, April 2017. European ParliamentaryResearch Service, European Parliament. Available from 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7/599432/EPRS_BRI(2017)599432_EN.pdf.

Sanchez, G.
2016 Latin Ame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regionalmms.org/images/sector/smuggling_report.pdf.

Schwikowski, M.
2016 Refugees from the Horn of Africa struggle in South Africa. Deutsche Welle, 21 June. Available from www.dw.com/en/refugees-from-the-horn-of-africa-struggle-in-south-africa/a-19343830.

Sitaropoulos, N.
2000 Modern Greek asylum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evant European developments. Journalof Refugee Studies, 13(1):105–17.

Slay, B.
2015 Exchange Rates, Remittances, and Poverty in the Kyrgyz Republic.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Programme, 25 May. Available from www.eurasia.undp.org/content/rbec/en/home/presscenter/articles/2015/5/25/exchange-rates--remittances--and-poverty-in-the-kyrgyz-republic.html.

Smick, E.
2006 Canada's Immigration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from www.cfr.org/blog-post/strange-death-europe-2.

Solomon, F.
2017 Thousands displaced as powerful cyclone hits Bangladesh, prompting fears for Rohingya refugees.Time Magazine, 31 May. Available from http://time.com/4799035/bangladesh-myanmar-cyclone-morarohingya/?platform=hootsuite.

Srivastava, R. and A. Pandey
2017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uth Asia: Drivers, Interlinkage and Policy Issu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ew Delhi. Available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94/249459E.pdf.

Staedicke, S., J. Batalova and J. Zong
2016 On the Brink of Demographic Crisis, Governments in East Asia Turn Slowly to Im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op-10-2016-%E2%80%93-issue-9-brink-demographic-crisis-governments-east-asia-turn-slowly-immigration.

Stats New Zealand
2016 Kiwi Exodus to Australia Bungees Back. Stats New Zealand, 21 July. Available from 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population/Migration/international-travel-and-migration-articles/kiwi-exodusaustralia.aspx.

Southwick, K.
2015 Preventing mass atrocities against the stateless Rohingya in Myanm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68(2):137–56.

Sturm, N.
2016 UNHCR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as Central American Asylum Claims Soar. UNHCR, Geneva, 5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news/latest/2016/4/5703ab396%20/unhcr-calls-urgent-actioncentral-america-asylum-claims-soar.html.

The Economist
2016 Remittances in Central Asia: From Russia with love. The Economist, 14 January. Available from 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688441-remittances-are-good-thing-except-whenthey-stop-russia-love.

Tierney, J., C. Ummenhofer and P. deMenocal
2015 Past and future rainfall in the Horn of Africa. Science Advances, 1(9):1–8. Available from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1/9/e150068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1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opDistribUrbanization/PopulationDistributionUrbanization.pdf.

2015a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index.shtml.

2015b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key_findings_wpp_2015.pdf.

20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Highlight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11 Livelihood Insecurity: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Sahel. UNEP,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UNEP_Sahel_EN.pdf.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AP)

2015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in the Pacific: Links, attitudes, and future scenarios in Nauru, Tuvaluand Kiribati. 3 December. Available from www.unescap.org/resources/climate-change-and-migrationpacific-links-attitudes-and-future-scenarios-nauru-tuvalu-and.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 (ESCW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5 2015 Situation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Displac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Arab Region. ESCWA and IOM.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n.d.a Population Statistic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popstats.unhcr.org/en/overview.

n.d.b Global Focu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Regional Office. UNHCR,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vailable from http://reporting.unhcr.org/node/4874#_ga=2.6528890.973728346.1497860924-1861603588.1494417376.

2016a UNHCR Resettlement Fact Sheet 2016. UNHCR Bureau for Europe,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9364f887.

2016b Refugees and Migrants Sea Arrivals in Europe: Monthly Data Update, August 2016. UNHCR, Geneva.Available from https://data2.unhcr.org/ar/documents/download/51337.

2016c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76408cd7.pdf.

2017a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UNHCR,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943e8a34.

2017b Tough Choices for Afghan Refugees Returning Home After Years in Exile. UNHCR, Geneva, 3 February.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news/briefing/2017/2/589453557/tough-choices-afghan-refugeesreturning-home-years-exile.htm.

2017c Canada's 2016 Record High Level of Resettlement Praised by UNHCR. UNHCR, Ottawa. Available from www.unhcr.ca/news/canadas-2016-record-high-level-resettlement-praised-unhcr/.

2017d Desperate Journeys: Refugees and Migrants Entering and Crossing Europe via the Mediterranean and Western Balkan Routes. UNHCR Bureau for Europe. Available from www.unhcr. org/58b449f54.pdf.

2017e As Asylum Applications by Venezuelans Soar, UNHCR Steps Up Response. UNHCR, Geneva, 14 July.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news/briefing/2017/7/596888474/asylum-applications-venezuelanssoar-unhcr-steps-response.html.

2017f Refugees and Migrants Sea Arrivals in Europe: Monthly Data Update, December 2016. UNHCR, Geneva.Available from https://data2.unhcr.org/ar/documents/download/53447.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7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 Including Unaccompanied and Separated Children – in Europe: Overview of Trends in 2016. UNHCR, UNICEF, IOM. Available from www.unicef.org/ceecis/Factsheet_refugee_migrant.pdf.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UNOCHA)

n.d.a El Niño in Southern Africa. OCHA. Available from www.unocha.org/legacy/el-nino-southern-africa.

n.d.b El Niño in East Africa. OCHA. Available from www.unocha.org/legacy/el-nino-east-africa.

n.d.c Current Emergencies. OCHA. Available from www.unocha.org/where-we-work/current-emergenc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n.d. Smuggling of Migrants: The Harsh Search for a Better Life. UNODC, Vienna. Available from www.unodc.org/toc/en/crimes/migrant-smuggling.html.

2015 Migrant Smuggling in Asia: Current Trends and Related Challenges. UNODC, Bangkok. Available from www.unodc.org/documents/southeastasiaandpacific/Publications/2015/som/Current_Trends_and_Related_Challenges_web.pdf.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UNRWA)
n.d. Where We Work. UNRWA, Gaza City. Available from www.unrwa.org/where-we-work.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6 DHS releases entry/exit overstay report for fiscal year 2015. DHS Press Office, 19 January. Available from www.dhs.gov/news/2016/01/19/dhs-releases-entryexit-overstay-report-fiscal-year-2015.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n.d.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USAID Southern Africa Regional. USAID. Available from www.usaid.gov/southern-africa-regional/agriculture-and-food-securit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Fact Sheet: Fiscal Year 2016 Refugee Admissions. 4 October.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C.Available from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6/10/262776.htm.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WOLA)
2016 Migration Enforcement in Mexico. WOLA, 20 September. Accessed from www.wola.org/2016/09/migration_enforcement_in_mexico/.World Bank

2015 Live Long and Prosper: Aging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Report. Available from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3133/9781464804694.pdf.

2017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992371492706371662/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27.pdf.

Zong, J. and J. Batalova
2016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6 January.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asian-immigrants-united-states.

## *第四章*

Aldred, J., A. Astell, R. Behr, L. Cochrane, J. Hind, A. Pickard, L. Potter, A. Wignall and E. Wiseman
2008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blogs. The Guardian, 9 March 2008.

Bakewell, O.
2008 Research beyond the categories: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irrelevant research into forced migration.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1(4):432-53.

Banks, M.
2012 Blog posts and tweets: The next frontier for grey literature. Grey Journal (TGJ), 8(1):54-59.

Black, N.
2001 Evidence based policy: proceed with care. BMJ (Clinical research edition), 323(7307):275-279.

Bornmann, L.
2014 Do altmetrics point to the broader impact of research? An overview of benefit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tmetrics.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8(4):895-903.

Boswell, C.
2008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expert knowledge: Knowledge and legitimation in European Union immigration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4):471-88.

Box, R.
1999 Running Government Like a Busines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9(1).

Caarls, K.
2016 NORFACE Research Programme on Migration, Migration in Europe: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cy Dynamics (2009?014), Summary Report. Available from www.norface.net/wp-content/ uploads/2016/06/Summary-Report-NORFACE.pdf.

Carling, J.
2016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n McAuliffe M.L. and F. Laczko (eds.),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Castles, S.
2010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1565-1586.

Cavanagh, S.
2009 Technology links students to fieldwork. Education Week, 29:5.Cherney, A., B. Head, P. Boreham, J. Povey, and M. Ferguson

2012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social scientists 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s: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Australian academics. Evidence & Policy: A Journal of Research, Debate and Practice, 8(4):433?53.

Chong, E.
2010 Using blogging to enhance the initiation of students into academic research. Computers & Education,55(2):798–807.

Chu, S. and S. Kamal
2008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blogger credibility and argument quality on message elaboration and brand attitude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8(2):26-37.

Colquhoun, D.
2011 Publish-or-perish: Peer review and the corruption of science. The Guardian, 5 September 2011.

Costas, R., Z. Zahedi and P. Wouters
2015 Do "altmetrics" correlate with citations? Extensive comparison of altmetric indicators with citation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66(10):2003?019.

Davies, M. and R. Woodward
201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compan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United Kingdom.

Farrell, H.
2012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35-52.

Foster, J. G., A. Rzhetsky and J.A. Evans
2015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sts?research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5):875-908.

Greynet International
2014 Pisa Declaration on Policy Development for Grey Literature Resources. The Grey Journal (TGJ), 10(2):64-64.

Hagen-Zanker, J. and R. Mallett
2016 Journeys to Europe. The role of policy in migrant decision-making.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 Insights. ODI, London.

Iredale, R., Asia-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and UNESCO
2001 Mig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Landscape. Case Studies of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sia 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APMRN) Working Paper No. 9. APMRN Secretaria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Kirkpatrick, I., S. Ackroyd and R. Walker
2005 The New Managerialism and Public Service Professions: Change in Health, Social Services and Housing.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Koser, K.
2014 Strengthen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Migr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Role of Evidence. A paper commissioned by the 2014?5 Chair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 on Migration, Asylum and Refugees (IGC).

Mason, E.
1999 Researching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Behavioral & Social Sciences Librarian, 18(1):1-20.

McAuliffe, M.
2016 Migration moderate, 'waster Weaver'and inspirational team leader: reflecting on the lasting legacy ofGraeme Hugo in three spheres of migration policy. Australian Geographer, 47(4):383-389.

McAuliffe, M. and A. Parrinder
2015 Expanding the evidence base on irregular migration through research partnerships: The Australian Irregular Migration Research Programme.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 Volume V, Number 1.

McGann, J.
2016 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Available from www.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9&context=think_tanks.

Mewburn, I. and P. Thomson
2013 Why do academics blog? An analysis of audiences, purposes and challeng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38(8):1105-1119.

Mulligan, A., L. Hall and E. Raphael
2013 Peer review in a changing world: An international study measuring the attitudes of researchers. Journal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4(1):132-161.

Nutley, S. and J. Webb
2000 Evidence and the policy process. In T.O. Davies, S.M. Nutley, & P.C. Smith (Eds.), What WOrks?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public services. Bristol, England: The Policy Press.

Ozimek, A.
2012 Bloggers and Economists are Failing on Immigration. Forbes, 7 October. Available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modeledbehavior/2012/10/07/bloggers-and-economists-are-failing-onimmigration/#6672e4e022d0.

Pappas, C. and I. Williams
2011 Grey literature: Its emerging importance.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11(3):228?34.

Péoud, A.
2015 Depoliticising Mig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arratives. Palgrave McMillan,United Kingdom.

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The impact factor game. PLoS Med, 3(6), e291.

Poulain, M., N. Perrin and A. Singleton (eds)
2006 THESIM: Towards Harmonised European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Louvain, Louvain.

Priem, J., H. A. Piwowar and B.M. Hemminger
2012 Altmetrics in the wild: Using social media to explore scholarly impact. arXiv preprint arXiv:1203.4745.

Prosser Scully, R.
2015 How the pressure of publish or perish affects us all. The Medical Republic. Available from www.medicalrepublic.com.au/how-the-pressure-of-publish-or-perish-affects-us-all/1134.

Ravenstein, E.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48(2):167–235.

Rucinski, T.L.
2016 Toward a definition of grey legal literature. The Grey Journal (TGJ), 12(2):61-66.

Sageman, M.
2014 The stagnation in terrorism research.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6(4):565-580.

Schöpfel, J.
2011 Towards a Prague definition of grey literature. The Grey Journal (TGJ), 7(1):5-18.

Sense About Science
2005 I don't know what to believe.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stories. Available from www.senseaboutscience.org/activities/i-dont-know-what-to-believe/.

Smith, R.
2006 Peer review: A flawed process at the heart of science and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9(4):178-182.

Statista
2017 Number of blogs worldwide from 2006 to 2011. Available from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8527/number-of-blogs-worldwide/.

The LSE GV314 Group
2014 Evaluation under contract: Government press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policy research. PublicAdministration, 92(1):224-239.

Thelwall, M., S. Haustein, V. Larivière and C.R. Sugimoto
2013 Do altmetrics work? Twitter and ten other social web services. PloS one, 8(5):e6484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Van Noorden, R.
2014 Global scientific output doubles every nine years. Nature news blog. Available from http://blogs.nature.com/news/2014/05/global-scientific-output-doubles-every-nine-years.html.

Ware, M. and M. Mabe
2015 The STM Report: An Overview of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STM Association. Available from www.stm-assoc.org/2015_02_20_STM_Report_2015.pdf.

Warren, H.R., N. Raison and P. Dasgupta
2017 The Rise of Altmetrics. JAMA, 317(2):131-132.

Weinberger, D.
2011 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 Basic Books, New York.

Williams, C. and D. Padula
2015 The evolution of Impact Factors: From bibliometrics to altmetrics

Williamson, V. and N. Eisen
2017 We were the victims of fake news. Brookings Institution, 8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opinions/we-were-the-victims-of-fake-news/.

Wortham, J.
2007 After 10 years of blogs, the future's brighter than ever. Wired, 17 December.

## *第五章*

Most of the treaties discussed in the chapter are detailed in Appendix B. Therefore, they are not repeated here.

Advisory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Mobility
2015 Human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UNFCCC-Paris COP-21. November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unhcr.org/en-us/protection/environment/565b21bd9/human-mobility-context-climatechange-unfccc-paris-cop-21-recommendations.html.

Aleinikoff, A.
2002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and Migration: A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No. 3, IOM,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idm_3_en.pdf.

Bauloz, C.
2017 A Comparative Thematic Mapping of Global Migration Initiatives: Lessons Learned Towards a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global_compact_paper.pdf.

Betts, A.
2011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aps and way forward .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ertelsmann Stiftung an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eds.). Verlag BertelsmannStiftung, Gutersloh.

Betts, A. and L. Kainz

2017 The History of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Oxford Refugee Studies Cen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22.Oxford Refugees Studies Center. Available from www.rsc.ox.ac.uk/people/alexander-betts.

Bradley, M.

2017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Gaining power in the forced migration regime. Refuge, 33(1):97.106.Brookings Institu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15 Guidance on Protecting People from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rough Planned Relocation.Available from https://georgetown.app.box.com/s/6uhtgniynbsafos68dt7e8b94rjl2tef.

Cholewinski, R.

2012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B. Opeskin,R. Perruchoud and J. Redpath-Cross,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Doyle, M.

2004 The challenge of worldwide mi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7(2):1.5.

Ferris, E.

2016 In Search of Commitments: The 2016 Refugee Summits. Policy Brief 3. Andrew Renata Kald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Sydney. Available from www.kaldorcentre.unsw.edu.au/publication/policybrief-3-search-commitments-2016-refugee-summits.

Gallagher, A.

2010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Traffic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Georgetow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17 A Toolbox: Planning Relocations to Protect People from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vailable from https://georgetown.app.box.com/s/lagulcgiunmuzv4c7ogx2ywypfo4lla1.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4 Transatlantic Trends: Key Findings 2014.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Available from http://trends.gmfus.org/files/2012/09/Trends_2014_complete.pdf.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CIM)

n.d. Summary Note.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jahia/webdav/site/myjahiasite/shared/shared/mainsite/policy_and_research/gcim/GCIM_Summary_Note.pdf.

Global Migration Group

n.d.a. Members.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migrationgroup.org/gmg-members.

n.d.b. Global Migration Group: Terms of Reference.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migrationgroup.org/system/files/uploads/documents/Final_GMG_Terms_of_Reference_prioritized.pdf.

Guild, E. and S. Grant

2017 Migration Governance in the UN: What is the Global Compact and What Does it Mean?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252/2017. Queen Mary School of Law, Londo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95636.

Hathaway, J.

2005 The Rights of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n.d.a. Topics. Available from www.ilo.org/global/topics/lang--en/index.htm.

n.d.b. The Director General 乫 s Programme and Budget Proposals for 2018.19. Available from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2955.pdf.

2006 ILO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n Labour Migration: Non-binding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Labour Migration. ILO. Available from www.ilo.org/wcmsp5/groups 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6243.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n.d. IOM Director General William Lacy Swing's Speech at the UN Summit on Refugees and Migrants and Signing of the IOM.UN Agreement, 19 September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s://weblog.iom.int/iom-directorgeneral-william-lacy-swings-speech-un-summit-refugees-and-migrants%C2%A0and-signing-iom-un.

2015 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 IOM Council, 106th Session, C/106/RES/1310. 4 December 2015.Available from https://governingbodies.iom.int/system/files/en/council/106/C-106-RES-1310%20MIGOF.pdf.

2017 Constitution and other basic texts.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iom_constitution_en.pdf.

Jastram, K.

2003 Family unity . In: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T.A. Aleinikoff and V. Chetail, eds.). T.M.C.Asser Press, The Hague.

Kalin, W.

2012 From the Nansen Principles to the Nansen Initiative.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Preventing Displacement,41:48.49.

Kalin, W. and J. Kunzli

2009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oser, K.

2010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16(3):301.315.

Krasner, S.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Loescher, G.
2014 UNHCR and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E. Fiddian-Qasmiyeh, G. Loescher, K. Long and N. Sigona,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Martin, S.
201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volving Trends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Summitry, 1(1):64.83.

2016 New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refugee protec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4(3):60.75. Available from http://cmsny.org/multimedia/mes-susan-martin/.

Martin S. and J. Bergmann
2017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Mobility: Reducing Vulnerability and Increasing Resilience. Policy Brief 6. February 2017. KNOMAD. Available from 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2017-04/Policy%20 Brief%206_Environmental%20Change%20and%20Human%20 Mobility_final.pdf.

Martin, S., S. Weerasinghe and A. Taylor (eds.)
2014 Humanitarian Crises and Migra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 Routled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McAuliffe, M. and F. Laczko (eds.)
2016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IOM, Geneva.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MICIC) Initiative
2016 Guidelines to Protect Migrants i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Conflict or Natural Disaster. Available from 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

Naim, M.
2009 Minilateralism: The magic number to get real international action. Foreign Policy, June 21. Available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6/21/minilateralism/.

Nansen Initiative
2015 Agenda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oss-Border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Available from www.nanseninitiative.org/.

Newland, K.
2005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echanisms,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olicy Analysis and Research Programme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1 Global governance: Fear and desire.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ertelsmann Stiftung an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eds.). Verlag Bertelsmann Stiftung, Gütersloh.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1992 Declaration and Treaty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Available from www.sadc.int/files/8613/5292/8378/Declaration__Treaty_of_SADC.pdf.

2005 Protocol on Facilitation of Movement of Persons. Available from www.sadc.int/documents-publications/show/Protocol_on_Facilitation_of_Movement_of_Persons2005.pdf.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Migration (SRSG)
201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Migration. UN Doc. A/71/728. 2 February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002/18/PDF/N1700218.pdf?OpenElement.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5 Population Facts: Integrating Migration into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 2015/5.Population Division.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popfacts/PopFacts_2015-5.pdf.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n.d. Terms of Reference: Task Force on Displacement. Available from https://unfccc.int/files/adaptation/groups_committees/loss_and_damage_executive_committee/application/pdf/tor_task_force_final.pdf.

2011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Sixteenth Session, Held in Cancun from 29 November to 10 December 2010. UN Doc. FCCC/CP/2010/7/Add.1. 15 March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0/cop16/eng/07a01.pdf#page=4.

2012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Eighteenth Session, Held in Doha From 26 November to 8 December 2012. UN Doc. FCCC/CP/2012/8/Add.1. 28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2/cop18/eng/08a01.pdf.

2015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Twenty-first Session, Held in Paris From 30 November to 13 December 2015. UN Doc. FCCC/CP/2015/10/Add.1. 29 January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10a01.pd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1950 Statute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28(V). 14 December 1950.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3b66c39e1.pdf.

2015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 Doc. A/RES/69/283. 23 June 2015.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RES_69_283.pdf.

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UN Doc. A/RES/71/1. 3 October 2016.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1.

2017a Modalities for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s of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UN Doc. A/RES/71/280. 17 April 2017.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ODG/GCM/A-71_280-E.pdf.

2017b New Urban Agenda. UN Doc. A/RES/71/256. 25 January 2017.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256.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n.d. ExCom Plenary Sessions.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excom-plenary-sessions.html.

2013 Note on the Mandat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and His Office.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ctober 2013.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protection/basic/526a22cb6/mandate-highcommissioner-refugees-office.html.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UNHRC)

1988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16: Article 17 (Right to Privacy), The Right to Respect of Privacy, Family,Home and Correspondence, and Protection of Honour and Reputation. 8 April 1988. Available from 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922.html.

1989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18: Non-discrimination. 10 November 1989. Available from 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a8.html.

1990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19: Article 23 (The Family) Protection of the Family, the Right to Marriage andEquality of the Spouses. 27 July 1990. Available from www.refworld.org/docid/45139bd74.html.

1992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20: Article 7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0 March 1992. Available from 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b0.html.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n.d.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Within Large and/or Mixed Movements. Available from www.ohchr.org/EN/Issues/Migration/Pages/Draftsforcomments.aspx.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Action. Available from www.unfp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conferenc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action.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UNRWA)
n.d. Where We Work. Available from www.unrwa.org/where-we-work.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UNSG)
199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Convening of 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 Doc. A/52/314. 18 September 1997.

2016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In Safety and Dignity: Addressing Large Movements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UN Doc. A/70/59. 21 April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sites/default/files/in_safety_and_dignity_-_addressing_large_movements_of_refugees_and_migrants.pdf.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s
2013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s. UN Doc. A/68/283. 7 August 2013.Available from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3/421/15/PDF/N1342115.pdf?OpenElement.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d.a. 17 Goals to Transform Our World. Available from 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n.d.b. UN Habitat III Conference. Available from 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abitat3/#prettyPhoto.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n.d.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vailable fro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United Nations System Chief Executives Board for Coordination
n.d. Directory of United Nations System Organizations. Available from www.unsystem.org/members/relatedorganizations.

World Bank
200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507301468142196936/Globaleconomic-prospects-2006-economic-implications-of-remittances-and-migration.

Weerasinghe, S., A. Taylor, S. Drury, P. Indravudh, A. Gregg and J. Flanagan
2015 On the margins: Non-citizens caught i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violence , conflict and disaster.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3(1):26.57. Available from http://jmhs.cmsny.org/index.php/jmhs/article/view/4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n.d.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Available from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mouvement_persons_e/mouvement_persons_e.htm.

## 第六章

Abdullahi, B.
2016 The world is not as globalized as you think. Available from www.weforum.org/agenda/2016/07/i-wasborn-and-raised-in-a-refugee-camp-the-world-isn-t-as-globalized-as-you-think/.

Acosta Arcarazo, D. and A. Wiesbrock (eds)
2015 Global Migration: Old Assumptions, New Dynamics. Praeger, Santa Barba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07 Overseas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Australia, ABS Catalogue 3401.0, June2007, Main features, available from 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allprimarymainfeatures/926D133FE53C4666CA25734B0015BBFC?opendocument.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DIBP)
2012 Annual Report 2011.12. DIBP,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Audit Office (ANAO)
2006 Advance Passenger Processing, Performance Audit Report No. 34, 2005.06. Available from www.anao.gov.au/sites/g/files/net616/f/ANAO_Report_2005-2006_34.pdf.

Bantman-Masum, E.
2015 Migration machine: Marketing Mexico in the age of ICTs. In: Digital Labour and Prosumer Capitalism(O. Fraysse and M. O'Neil, eds), 106.124.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Berg, C.
2008 The Growth of Australia 罟 s Regulatory State: Ideology, Accountability and Mega-regulators.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Melbourne.

Betts, A.
2011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Boyd, M.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638.670.

Brunwasser, M.
2015 A 21st century migrant's essentials: Food, shelter, smartphone. The New York Times, 25 August.

Bryant, C.
2015 Drones get a new mission: Saving lives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Financial Times, 26 June.

Cairncross, F.
1997 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Carling, J.
2008 The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remittanc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4(3):581.598.

Castles, S., H. de Haas and M.J. Miller
2014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Fifth edition, p. 319.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Clemens, M.A.
2014 Does Development Reduce Migra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8592. Available from www.ftp.iza.org/dp8592.pdf.Crews, C.W.

2012 Ten Thousand Commandments: An Annual Snapshot of the Federal Regulatory Stat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Czaika, M. and H. de Haas
2014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H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migrato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48(2):283.323.

Dijstelbloem, H.
2017 Migration tracking is a mess. Nature, 543:32.34.

Diminescu, D.
2008 The connected migrant: An epistemological manifesto.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7(4):565.579.

Driessen M., J. van Emmerik, L. Nygren-Junkin and M. Spotti
2011 ICT Use in L2 Education for Adult Migrants. A Qualitativ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and Sweden.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Joint Research Centre,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Ericsson
2016 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On the Pulse of the Networked Society. Ericsson AB, Stockholm.

Gammeltoft-Hansen, T.
2008 The Refugee, the Sovereign and the Sea: EU Interdiction Polic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king paper 2008 (6).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Copenhagen.

Godenau, D. and A. Lopez-Sala
2016 Multi-layered migration deterrence and technology in Spanish maritime border management.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31(2):151.169.

Gold, S.J. and S.J. Nawyn
2013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Studies. Routledge, London/New York.

Held, D., A.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Hoovestal, L.
2013 Globalization Contained: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the Container. 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

Hunter, A.
2015 Empowering or impeding return migration? ICT, mobile phones, and older migrants 乫 communications with home. Global Networks, 15(4):485.502.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Tourism Economics
2014 IATA Air Passenger Forecasts. Available from www.iata.org/pax-foreca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4 Second Regional Conference in view of the creation of the Alliance of Asian Associations of Overseas Employment Service Providers: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Recruitmen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vailable from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manil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17424.pdf.

2017a Migrant Application (MigApp). Available from www.weblog.iom.int/migrant-application-migapp.

2017b IOM Guatemala develops a mobile application for migrants in crisis. Available from www.weblog.iom.int/iom-guatemala-develops-mobile-application-migrants-crisis.

IOM,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16 Economic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matic Area 1. Ninth Globa 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ngladesh 2016, GFMD Research and Policy Initiative, November. Available from www.gfmd.org/docs/bangladesh-2016.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2016 ICT Facts and Figures. ITU Data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World Bank
2017 Mobile Cellular Subscriptions. Available from www.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T.CEL.SETS?locations=AF.

Jeandesboz, J.
2008 Reinforcing the Surveillance of EU Border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RONTEX and EUROSUR. CEPS Challenge Paper No. 11.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Brussels.

Khalaf, R.
2016 Tech to the rescue in migrant crisis, Financial Times, 24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www.ft.com/intl/cms/s/0/a731a50a-da29-11e5-a72f-1e7744c66818.html#axzz41XAqZT2A.

Kelly, M.
2005 Submission to the Inquiry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Migration Act 1958, 29 July 2005.Available from www.law.mq.edu.au/public/download/?id=15999.

Kuschminder, K. and K. Koser
2017 The Role of Migration-Specific and Migration-Relevant Policies in Migrant Decision-Making in Transit.Working paper No 17, UNU-MERIT Working Papers. UNU-MERIT, Maastricht.

Lechner, F. J. and J. Boli (eds)
2015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Fifth edition. Wiley Blackwell, Chichester.

Lucassen, J., L. Lucassen and P. Manning (eds)
2010 Migration History in World History: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Brill, Leiden.

Mansfield-Devine, S.
2015 Biometr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iometric Technology Today, 4:5.8.

Massey, D.S.
1987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1372.1403.

1990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3.26.

Mattoo, D., C. Goldberg, J. Johnson, C. Farias Riano and A. Ahad
2015 Immigrants in the smart city: the potential of city digital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immigrant integration.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mmigrants-smart-citypotential-city-digital-strategies-facilitate-immigrant-integration.

McAuliffe, M.
2013 Seeking the Views of Irregular Migrants: Decision Making, Drivers and Migration Journeys. Irregular Migration Research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5,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Canberra.

2016 The appification of migration.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ociety, Policy Forum, 20 January. Available from www.policyforum.net/the-appification-of-migration/.

McAuliffe, M. and A.M. Goossens
2017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In: Handbook on Migration and Globalisation (A. Triandafyllidou, ed.),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McAuliffe, M. and K. Koser
2015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ow migrant smugglers are exploit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 Advance, Winter: 30.33,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cAuliffe, M. and F. Laczko (eds)
2016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IOM,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Nep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
2014 Labour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A Status Report for Nepal: 2013/2014.

2015 Labour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A Status Report for Nepal: 2014/2015.

Panagakos A.N. and H.A. Horst
2006 Return to cyberia: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world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Global Networks,6(2):109.124.

Pittman, P.
2013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Labor Recruitment. A Framework for Discussion. Paper produced for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Portes, A. and J. Walton
1981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Rabogoshvili, A.
2012 Chinese migration to Russia as revealed by narrativ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1(2):9.36.

Ravenstein, E.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48:167.235.

Shrier, D., G. Canale and A. Pentland
2016 Mobile Money & Payments: Technology Trends. Connec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ri Lanka Ministry of Foreign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Welfare
2013 Sri Lanka Migration Profile.

Stark, O. and D.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73.178.

Statistics Bureau,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Japan
2016 Statistical Handbook of Japan. Available from www.stat.go.jp/english/data/handbook/index.htm.

Steger, M., P. Battersby and J. Siracusa (eds)
2014 The Sage Handbook of Globalization. Sage, California.

Taylor, S.
2008 Offshore barriers to asylum seeker movement: the exercise of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In: Forced Migration, Human Rights and Security (J. McAdam, ed.). Hart Publishing, Oregon.

Tobbin, P. and J.K. Kuwornu
2011 Adoption of mobile money transfer technolog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7):59.77.

Todaro, M.
1989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Fourth edition. Longman, New York.

Triandafyllidou, A. and T. Maroukis
2012 Migrant Smuggling. Irregular Migration from Asia and Africa to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7 Connectivity for Refugees.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connectivity-for-refugees.htm.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2017 World Tourism Barometer. Volume 15, January.

Unver, C.
2015 Essays on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f migration: The roles of broadband connectivity, industry-level productivity and human capit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2017 Access: A newsletter issued by the Office of Congressional Affairs for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Staf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7 US Relations with Mexico. Fact Sheet. Available from www.state.gov/r/pa/ei/bgn/35749.htm.

Valkenburg, G. and I. van der Ploeg
2015 Materialities between security and privacy: a constructivist account of airport security scanners. Security Dialogue, 46(4):326.344.

Vargas-Silva, C.
2016 Literature Review: Remittances Sent to and from Refug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KNOMAD Working Paper 12, March. Available from www.knomad.org/publication/remittances-sent-andrefugees-and-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literature-review.

White House
1998 International Crime Control Strategy: June 199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www.fas.org/irp/offdocs/iccs/iccsiv.html (accessed 1 February 2017).

World Bank
2017 Personal remittances received (current US$), Sri Lanka. Available from www.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CD.DT?locations=LK.

Yoon, K.
2016 The media practice of 'KaTalk' in the face of Facebook: young Koreans 잖 use of mobile app platforms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Critical Arts, 30(2):217.232.

Zelinsky, W.
1971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61(2):219.249.

Zijlstra, J. and I. van Liempt
2017 Smart(phone) travelling: understanding the use and impact of mobile technology on irregular migration journey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Border Studies, 3:174.191.

## *第七章*

Adhikari, J. and M. Hobley
2015 'Everyone is leaving. Who will sow our fields?' The livelihood effects on women of male migration from Khotang and Udaypur districts, Nepal, to the Gulf countries and Malaysia.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 35(1):11.23.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2016 We Knew that they Had no Future in Kabul: Why and How Afghan Families Decide to Leave.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Available from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12499.pdf.

Alpes, M.J. and N.N Sorensen
2015 Migration Risk Warning Campaigns are Based on Wrong Assumptions.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Available from www.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191356.

Andrews, D., B. Nonnecke and J. Preece
2003 Electronic survey methodology: A case study in reaching hard-to-involve Internet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16(2):185.210.

Ashton, W., P. Bhattacharyya, E. Galatsanou, S. Ogoe and L. Wilkinson
2016 Emerging Uses of Big Data in Immigration Research. Available from www.idees-ideas.ca/sites/default/files/sites/default/uploads/general/2016/2016-sshrc-ksg-ashton_et_al.pdf.

Ball, J., L. Butt and H. Beazley
2017 Birth registr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children of transnational labour migrants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3(3):305-325.

Banati, P.
2017 Is Longitudinal Research the Best Response to the 'Post-Truth' Order? UNICEF. Available from https://blogs.unicef.org/evidence-for-action/is-longitudinal-research-the-best-response-to-the-post-truth-order/.

Bochenek, M.
2016 Closed Doors: Mexico's Failure to Protect Central American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hrw.org/report/2016/03/31/closed-doors/mexicos-failureprotect-central-american-refugee-and-migrant-children.

Boland, K.
2010 Children on the Move: A Report on Children of Afghan Origin Moving to Western Countries. UNICEF, Afghanistan.

Boyd, M.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638.670.

Bylander, M.
2014 Contested mobilities: Gendered migration pressures among Cambodian youth. Gender, Place & Culture,22(8):1124.1140.

Caneva, E.
2014 Children's agency and migration: Constructing kinship in Latin American and East European families living in Italy. Childhood, 22(2):278.292.

Carling, J.
2002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involuntary immobilit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Cape Verdean experienc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8(1):5.42.

2016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pp. 25.53.

Carling, J. and M. Hernandez-Carretero
2011 Protecting Europe and protecting migrants?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unauthorised migration from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42.58.

Castles, S. and M.J. Miller
200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Third edition.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Chant S. and S.A. Radcliffe
1992 Chapter 1: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In: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 Chant, ed.). Belhaven Press, London.

Crawley, H., F. Duvell, K. Jones, S. McMahon and N. Sigona
2016 Destination Europe?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and Drivers of Mediterranean Migration in 2015.MEDMIG Final Report. Available from www.medmig.info/wp-content/uploads/2016/12/research-briefdestination-europe.pdf.

Crush, J., C. Eberhardt, W. Pendleton, M. Caesar, A. Chikanda and A. Hill
2012 Diasporas on the Web: New networks, new methodologies.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Migration (C. Vargas-Silva, e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Czaika, M. and H. de Haas
2016 The Effect of Visa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ynamics.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www.imi.ox.ac.uk/publications/wp-89-14.

de Haas, H.
2011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ceptualising Polic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Effects.Working Paper No. 32, Oxfo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Donini, A., A. Monsutti and G. Scalettaris
2016 Afghans on the Mov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Refuge in Europe. Global Migration Research Paper No. 17,Global Migration Centre.

Düvell, F., A. Triandafyllidou and B. Vollmer
2008 Ethical issues in irregular migration research.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3):227.239.

Echavez, C., J. Bagaporo, L. Pilongo and S. Azadmanesh
2014 Why Do Children Undertake the Unaccompanied Journey?: Motivations for Departure to Europe and Other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Families and Residents of Sending Communities in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and UNHCR.

Edmonds, E. and P. Salinger
2007 Economic influences on child migration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Bihar and Uttar Pradesh.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3174. Available fro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39481.

Esipova, N., J. Ray and A. Pugliese
2017 Number of Potential Migrants Worldwide Tops 700 Million. Gallup World Poll. Available from www.gallup.com/poll/211883/number-potential-migrants-worldwide-tops-700-million.aspx?g_source=ALL_GALLUP_HEADLINES&g_medium=topic&g_campaign=tiles.

European Commission (EC)/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 (EMN)
2016 EMN Ad-Hoc Query on COM AHQ on Addressing and Prevent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Migrant Smuggling-exploring cooperation frameworks with social media and other relevant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sites/homeaffairs/files/what-we-do/networks/european_migration_network/reports/docs/ad-hoc-queries/ad-hoc-queries-2016.1055_com_use_of_social_media_in_migrant_smuggling_wider_diss_final.pdf.

European Parliament News
2016 Fate of 10,000 missing refugee children debated in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 European Parliament News,21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60419IPR23951/fate-of-10-000-missing-refugee-children-debated-in-civil-liberties-committee.

Eurostat
2017 Asylum applicants considered to be unaccompanied minors: 63,300 unaccompanied minors among asylum seekers registered in the EU in 2016. News Release, 80/2017 11 May. Eurostat. Available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8016696/3-11052017-AP-EN.pdf/30ca2206-0db9-4076-a681-e069a4bc5290.

Faist, T.
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Farabee, D., M. Schulte, R. Gonzales and C.E. Grella
2016 Technological aids for improving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BMC Health ServicesResearch, 16:370.

Fiegerman, S.
2017 Facebook Tops 1.9 Billion Monthly Users. CNN. Available from http://money.cnn.com/2017/05/03/technology/facebook-earnings/index.html.

Frouws, B., M. Phillips, A. Hassan and M.A. Twigt
2016 Getting to Europe the Whatsapp Way: The Use of ICT in Contemporary Mixed Migration Flows toEurope. Regional Mixed Migration Secretariat Briefing Paper,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s://ssrn.com/abstract=2862592.

Fund for Peace (FFP)
2016 Fragile States Index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fundforpeace.org/fsi/.

Gilbert, A. and K. Koser
2006 Coming to the UK: What do asylum-seekers know about the UK before arrival?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2(7):1209.1225.

Gold, S.J. and S.J. Nawyn (eds.)
2013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Studies. Routledge, New York.

Grabska, K., N. Del Franco and M. de Regt
2016 Comparative Research Report: Time to Look at Girls: Adolescent Girls 岁 Migration in the South. Global Migration Centr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Geneva. Available from http://graduateinstitute.ch/files/live/sites/iheid/files/sites/globalmigration/shared/Research%20 Projects/Comparative%20Research%20Report%20FIN.pdf

Hagen-Zanker, J. and R. Mallett
2016 Journeys to Europe. The Role of Policy in Migrant Decision-making. ODI Insights, Policy Brief.

Hargittai, E.
2010 Digital na(t)ives? Variation in Internet skills and uses among members of the 'Net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80:92.113.

Harriman, S. and J. Patel
2014 The ethics and editorial challenges of Internet-based research. BMC Medicine, (12):124.

Heidbrink, L.
2017 Assessing parental fitness and care for unaccompanied children.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37.52.

Henley & Partners
2017 The Henley & Partners Visa Restrictions Index 2017. Available from www.henleyglobal.com/international-visa-restrictions/.

Hernandez-Carretero, M. and J. Carling
2012 Beyond 'kamikaze migrants': Risk taking in West African boat migration to Europe. Human Organization, 71(4):407.416.

Hesse-Biber, S.
2011 The Handbook of Emergent Technologie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Ignacio, E.N.
2013 The challenges of online diaspora research. In: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Studies (S.J. Gold and S.J. Nawyn, eds.). Routledg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6a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Unaccompanied Minors (UAMs) in Greece. IOM, Greece. Available from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iom_greece_uam_final.pdf.

2016b Fatal Journeys Volume 2: Identification and Tracing of Dead and Missing Migrants. IOM Global Migration Data Analysis Centre (GMDAC), Berlin. Available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fataljourneys_vol2.pdf.

2017 Missing Migrants Project. Latest Global Figures. Available from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latestglobal-figures.

Jayasuriya, D.
2016 Labour Migration as an Alternative for Asylum Seekers facing Protection Issues: A Sri Lanka-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Occasional Paper No. 22/2016. DIBP, Canberra.

Jayasuriya, D., M. McAuliffe and M. Iqbal
2016 The Dynamic Nature of Migration Aspirations: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ouseholds in Sri Lanka.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Occasional Paper 20/2016. DIBP, Canberra.

Joinson, A.
1999 Social desirability, anonymity, and Internet-based questionnair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1(3):433.438.

Kandel, W. and D. Massey
2002 The culture of Mexican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80(3):981.1004.

Karpf, D.
2012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net tim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639.661.

Kays, K., T.L. Keith and M.T. Broughal
2013 Best practice in online survey research with sensitive topics. In: Advancing Research Methods with New Technologies (N. Sappleton, ed.). IGI Global, Hershey, pp. 157.169.

Keogh, G.
2013 The Statistical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Asylum Application Trend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GDP in the EEA. Statistics Departmen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Available from https://arxiv.org/ftp/arxiv/papers/1305/1305.2824.pdf.

Khalaf, S. and S. Alkobaisi
1999 Migrants' Strategies of coping and patterns of accommodation in the oil-rich Gulf societies: Evidence from the UA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6(2):271.298.

Khoo, C.Y., M. Platt and B. Yeoh
2017 Who migrates? Tracking gendered access to migration within households 'in flux' across time.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accepted; forthcoming).

Kinne, L., E. Go.dziak and S. Martin
2016 Longing to Feel 'Safe and Comfortable': Protecting Unaccompanied Mino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SIM), Georgetown University.

Komito, L. and J. Bates
2011 Migrants' information practices and use of social media in Ireland: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roceedings of the 2011 iConference. Available from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940801.

Koser, K. and K. Kuschminder
2015 Key finding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of migrants.Migration and Policy Practice, 5(1):28.31. Available from http://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tionpolicy-practice-volume-v-number-1-february-march-2015.

Kuang, C.
2017 Opening doors with open data. Harvard Political Review, March 2,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harvardpolitics.com/harvard/open-data/.

Kuschminder, K. and K. Koser
2016 Afghans in Greece and Turkey seeking to migrate onward: Decision-making factors and destination choices.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 6(3):30.35. Available from http://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tion-policy-practice-vol-vi-number-3-june-september-2016.

Lee, E.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1):47.57.

Maroufof, M.
2017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Georgian migration to Greece. European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Law,19(1):34.56.

Martin, S.
2007 Wom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Policy Brief No. 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Massey, D.S.
1987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1372.1403.

1990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56:3.26.

Massey, D.S., J. Arango, G. Hugo, A. Kouaouci and A. Pellegrino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Mbaye, L.M.
2017 Supporting communities under migration pressure: The role of opportunities, information and resilience to shocks, in McAuliffe, M. and M. Klein Solomon (Conveners) (2017)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OM: Geneva.

McAuliffe, M.
2013 Seeking the Views of Irregular Migrants: Survey Background, Rationale and Methodology.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4.

McAuliffe, M. and D. Jayasuriya
2016 Do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choose destinatio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surveys in Australia, Afghanistan, Bangladesh, Pakistan and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4(4):44.59.

McAuliffe, M. and K. Koser
2015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ow Migrant Smugglers are Exploit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 Adva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inter 2015, pp. 30.33.

Mescoli, E.
2013 Towards the elsewhere: discourses 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practices between Morocco and Italy.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21(3):290.304. Available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070289X.2013.828614.

Meyer, P., C. Seelke, M. Taft-Morales and R. Margesson
2016 Unaccompanied Children from Central America: Foreign Policy Considerations.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MiCT
2016 Media in Cooperation and Transition, Information to Go. MiCT Briefing No. 1.

Monsutti, A.
2005 War and Migr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of the Hazaras of Afghanistan. Routledge,London/New York.

2007 Migration as a rite of passage: Young Afghans building masculinity and adulthood in Iran. Iranian Studies, 40(2):167.185.

Motlagh, J.
2016 A terrifying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jungle. Outside Magazine, 19 July. Available from www.outsideonline.com/2098801/skull-stake-darien-gap.

Mougne, C.
2010 Trees Only Move in the Wind: A Study of Unaccompanied Afghan children in Europ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Geneva.

Nash, V., R. O'Connell, B. Zevenbergen and A. Mishkin
2013 Effective age verification techniques: Lessons to be learnt from the online gambling industry. Universityof Oxford, Oxford. Available from www.oii.ox.ac.uk/archive/downloads/publications/Effective-Age-Verification-Techniques.pdf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658038.

Oiarzabal, P.J. and U.D. Reips
2012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9):1333.1338.

Oishi, N.
2002 Gender and Migration: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Working Paper No. 49.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Ortega, F. and G. Peri
2013 The effect of income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Studies,1(1):47.74. Available from https://doi.org/10.1093/migration/mns004.

Pfeiffer, L. , S. Richter, P. Fletcher and J.E. Taylor
2007 Gender in economic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s: a critical review. In: Wome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 Morrison, M. Schiff, and M. Sjoblom, eds.). Palgrave Press, New York, pp.11.49.

Pickering, S., C. Tazreiter, R. Powell and J. Barry
2016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f Irregular Migrants in Indones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19|2015.

Portes, A. and J. Walton
1981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Ravenstein, E.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48:167.235.

1889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2:241.305.

Reips, U-D. and L.E. Buffardi
2012 Studying migra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methods from psycholog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9):1405.1424.

Regional Mixed Migration Secretariat (RMMS)
2014 Blinded by Hop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of Ethiopian Migrants. Regional Mixed Migration Secretariat, Mixed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No. 6, Nairobi.

Ruhs, M.
2013 The Price of Right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Oxford.

Salt, J.
1992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4):1077.1111.

Searcey, D. and J.Y. Barry
2017 Why migrants keep risking all on the 'deadliest route'. New York Times, 22 June.

Secretaria de Gobernacion
2016 Menores Migrantes en Mexico. Unidad de Politica Migratoria, Mexico. Available from www.politicamigratoria.gob.mx/work/models/SEGOB/Resource/2510/1/images/Menores%20migrantes%20en%20M%C3%83%C2%A9xico%20extranjeros%20presentados%20ante%20las%20autoridades%20migratorias%20y%20mexicanos%20devueltos%20por%20Estados%20Unidos(1).pdf.

Serna, N.
2016 Fleeing cartels and mara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considerations and profiles from the Northern Triang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28(1):25.54.

Sinclair, T. and M. Mamertino
2016 Online Job Search and Migration Intentions Across EU Member States. Working Papers from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Stark, O.
1981 "On the optimal choice of capital intensity in LDCs with 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9:31.41.

Stark, O. and D.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73.178. Suarez-Orozco, C. and M.M. Suarez-Orozco

2009 Children of Immig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Taylor, L.
2015 No place to hide? The ethics and analytics of tracking mobility using mobile phone dat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4(2):319.336. Available from https://doi.org/10.1177/0263775815608851.

Todaro, M.
1989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Fourth edition. Longman, New York.

Triandafyllidou, A.
2017 Beyond irregular migration governance: Zooming in on migrants 乫 agency. European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Law 19(1):1.11.

Turton, D.
2003 Conceptualising Forced Migration. Oxford Refugee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12.

Tyrrell, N. and G. Kallis
2016 Childr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y migration. In: Movement, Mobilities, and Journeys, vol. 6 (C. Ni Laoire,A. White and T. Skelton, eds.). Geographies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pringer, Singapore.

Ullah, A.K.M.A.
2010 Rationalizing Migration Decisions. Labour Migrant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New York.

2013 Exposure to remittanc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gen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14(3):475.492.

UK Home Office
2004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Potential Asylum Seekers in Countries of Origin and Transit. Home Office Findings 220, London, UK.

United Nations
2006 2004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ited Nations Publishing,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2016 Uprooted: The Growing Crisis for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UNICEF,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16 201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Available from http://hdr.undp.org/en/2016-report.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3 October 2016, A/RES/71/1. Available from www.refworld.org/docid/57ceb74a4.html.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16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UNODC, Vienna.

Van Hear, N.
2014 Reconsidering migration and cla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8(1):100.121.

Vervliet, M., C. Rousseau, E. Broekaert and I. Derluyn
2015 Multilayered ethics in research involving unaccompanied refugee minors.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28(4):468-485.

Wall, M., M.O. Campbell and D. Janbek
2015 Syrian refugees and information precarity. New Media & Society, 19(2):240.254.

Ward, T.W.
2013 Gangsters Without Borders: An Ethnography of a Salvadoran Street Ga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Oxford.

World Bank
n.d. Intentional Homicides (per 100,000 people).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VC.IHR.PSRC.P5?end=2015&start=2015&view=map, accessed 30 June 2017.

## *第八章*

Abid, R.Z., S.A. Manan and Z.A. Rahman
2017 'A flood of Syrians has slowed to a trickle':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yrian refugees in the online media news reports of host and non-host countrie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11(2):121.140.

Abrajano, M. and S. Singh
2009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issue attitudes and news source: The case of Latinos and immigration reform. Political Behavior, 31(1):1.30.

Akl, E.A., N. Maroun, S. Major, C. Afif, B. Chahoud, J. Choucair, M. Sakr and H.J. Schunemann
2007 Why are you draining your brain? Factors underlying decisions of graduating Lebanese medical students to migrat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4(6):1278.1284.

Alba, R., R. Rumbaut and K. Marotz
2005 A distorted nation: Perceptions of racial/ethnic group sizes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other minorities. SOCIAL FORCES, 84(2):901.919.

Albertson, B. and S.K. Gadarian
2015 Anxious Politics: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a Threaten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llen, W and S. Blinder
2012 Jessica Ennis, Mo Farah and Identity Language in the British Press: A Case Study in Monitoring and Analysing Print Media. Migration Observatory Report. COMPAS,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wp-content/uploads/2016/04/Report-Identity_Language_ British_Press.pdf.

Anderson, B.
2013 Us and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Banda, F. and A. Mawadza
2015 'Foreigners are stealing our birth right': Moral panics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Zimbabwean immigrants in South African media.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9(1):47.64.

Baumgartner, F. and B. Jones
1993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Beckett, C.
2010 The Value of Networked Journalism. Polis Journalism and Societ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London. Available from www.lse.ac.uk/media@lse/POLIS/Files/networkedjournalism.pdf.

2017 'Fake news': the best thing that's happened to journalism. Polis Journalism and Societ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Available from http://blogs.lse.ac.uk/polis/2017/03/11/fakenews-the-best-thing-thats-happened-to-journalism/.

Bennett, C.J.
2016 Voter databases, micro-targeting, and data protection law: can political parties campaign in Europe as they do in North America?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6(4):261.275.

Benson, R.
2013 Shaping Immigration News: A French-American Compari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Bernays, E.L.
1947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50(1):113.120.

Blinder, S.
2015 Imagined immigrati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meanings of `immigrants 岂 i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debates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63(1):80.100.

Blinder, S. and W. Allen
2016a UK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tion: Overall Attitudes and Level of Concern. Migration Observatory Briefing. COMPAS, Oxford.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resources/briefings/ukpublic-opinion-toward-immigration-overall-attitudes-and-level-of-concern/.

2016b Constructing immigrants: Portrayals of migrant groups in British national newspapers, 2010.2012.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0(1):3.40.

Bohra-Mishra, P. and D.S. Massey
2011 Individual decisions to migrate during civil conflict. Demography, 48(2):401.424.Boomgaarden,

H.G. and R. Vliegenthart

2009 How news content influences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Germany, 1993.2005.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8(4):516.542.

Bos, L., S. Lecheler, M. Mewafi and R. Vliegenthart

2016 It's the frame that matters: Immigrant integration and media framing effects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55:97.108.

Brader, T., N.A. Valentino and E. Suhay

2008 What triggers public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Anxiety, group cues, and immigration threa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4):959.978.

Cacciatore, M.A., D.A. Scheufele and S. Iyengar

2016 The end of framing as we know it …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effect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9(1):7.23.

Caviedes, A.

2015 An emerging 'European' news portrayal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1(6):897.917.

Chavez, L.

2013 The Latino Threat: Constructing Immigrants, Citizens, and the N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Cheng, L., J. Igartua, E. Palacios, T. Acosta and S. Palito

2014 Framing immigration news in Spanish regional pr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2(6):197.215.

Cherry, J.F. and T.P. Leppard

2015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and the earliest seagoing: the limitations of inference. World Archaeology, 47(5):740.755.

Chung, W. and D. Zeng

2016 Social-media-based public policy informatics: Sentiment and network analyses of US immigration and border security.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7(7):1588.1606.

Cohen, B.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Cottle, S. (ed.)

2000 Ethnic Minorities &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idenhead.

Croteau, D. and W. Hoynes

2006 The Business of Media: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ine Forge Press, Thousand Oaks,California.

Cummings, D.
2017 How the Brexit referendum was won. The Spectator: Coffee House. Available from https://blogs.spectator.co.uk/2017/01/dominic-cummings-brexit-referendum-won/.

d'Haenens, L. and M. de Lange
2001 Framing of asylum seekers in Dutch regional newspaper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3(6):847.860.

Doherty, B.
2015 Call Me Illegal: The Semantic Struggle Over Seeking Asylum in Australia.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Available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Call%20me%20illegal%20-%20The%20semantic%20struggle%20over%20seeking%20asylum%20in%20Australia_0.pdf.

Don, Z.M. and C. Lee
2014 Representing immigrants as illegals, threats and victims in Malaysia: Elite voices in the media. Discourse & Society, 25(6):687.705.

Eddy, M.
2017 Bild apologizes for false article on sexual assaults in Frankfurt by migrants. The New York Times, 16February. Available from www.nytimes.com/2017/02/16/world/europe/bild-fake-story.html?_r=0.

Elias, N. and D. Lemish
2011 Between three worlds: host, homeland, and global media in the lives of Russian immigrant families in Israel and German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2(9):1245.1274.

Entman, R.M.
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Esses, V.M., S. Medianu and A.S. Lawson
2013 Uncertainty, threat, and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promoting the dehumanization of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9(3):518.536.

Etchegaray, N. and T. Correa
2015 Media consumption and immigration: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erception of stigmatization among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3601.3620.

Fernandez, I., J. Iguartua, F. Moral, E. Palacios, T. Acosta and D. Munoz
2013 Language use depending on news frame and immigrant orig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48(5):772.784.

Finney, N. and V. Robinson
2008 Local press, dispersal and commun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sylum debat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9(4):397.413.

Fiske, S.T. and S.E. Taylor
2016 Social Cognition: From Brains to Culture. Thir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Flores, L.A.
2003 Constructing rhetorical borders: Peons, illegal aliens, and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immigra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4):362.387.

Freedom House
2016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6: The Battle for the Dominant Message. Available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TOP_2016Report_Final_04232016.pdf.

2017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7: Press Freedom's Dark Horizon. Available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P_2017_booklet_FINAL_April28.pdf.

Gabrielatos, C. and P. Baker
2008 Fleeing, sneaking, flooding. A corpus analysis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 1996.2005.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36(1):5.38.

Garcia-Arjona, N.
2012 Sport and immigration. Media coverage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France national soccer team. Historia y Comunicacion Social, 17:85-102.

Gemi, E., I. Ulasiuk and A. Triandafyllidou
2013 Migrants and media newsmaking practices. Journalism Practice, 7(3):266.281.

Graf, H.
2010 Interviewing media workers. Medie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49):94.107.

Graves, L. and F. Cherubini
2016 The Rise of Fact-Checking Sites in Europe.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Available from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The%20Rise%20of%20Fact-Checking%20Sites%20in%20Europe.pdf.

Greenslade, R.
2005 Seeking Scapegoats: The Coverage of Asylum in the UK Press.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Grigorieff, A., C. Roth and D. Ubfal
2016 Does Information Change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Representative Evidence from Survey Experiments. IZA Discussion Pap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SSRN). Available from https://ssrn.com/abstract=2889665.

Griskevicius, V., M.N. Shiota and S.L. Neufeld
2010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sitive emotions on persuasion processing: a functional evolutionary approach. Emotion, 10(2):190.206.

Hainmueller, J. and D.J. Hopkins
2014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7(1):225.249.

Hallin, D. C. and P. Mancini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elfer, L.
2016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ians: an individual-level political agenda-setting experi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1(2):233.252.

Herda, D.
2010 How many immigrants? Foreign-born population innumeracy in Europ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4(4):674.695.

2015 Beyond innumeracy: Heuristic decision-making and qualitative misperceptions about immigrants in Finlan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8(9):1627.1645.

Hobolt, S.B. and J. Tilley
2016 Fleeing the centre: the rise of challenger parti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uro cri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9(5):971.991.

Hooghe, M. and T. de Vroome
2015 The perception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Belgiu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8(1):38.56.

Hopkins, D.J.
2010 Politicized places: Explaining where and when immigrants provoke local op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01):40.60.

Horton, S.
2008 Consuming childhood: 'Lost' and 'ideal' childhoods as a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1(4):925.943.

Igartua, J.J., I.M. Barrios, and F. Ortega
2012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immigration in prime time television fiction. Comunicacion y Sociedad, 29(2):5-28.

Igartua, J.J. and L. Cheng
2009 Moderating effect of group cue while processing news on immigration: Is the framing effect a

heuristic proc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4):726.749.

Igartua, J.J., L. Cheng and C. Muniz
2005 Framing Latin America in the Spanish press: A cooled down friendship between two fraternal lands.Communications, 30(3):359.372.

Khondker, H.H.
2011 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Arab Spring. Globalizations, 8(5):675.679.

Lan, S.
2016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rac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City & Society, 28(3):298.318.

Laney, H.N., C. Lenette, A.N. Kellett, C. Smedley and P. Karan
2016 'The most brutal immigration regime in the developed world': International media responses to Australia's asylum-seeker policy. Refuge, 32(3):135.149.

Lawlor, A.
2015 Framing immigration in the Canadian and British news medi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48(2):329.355.

Lecheler, S., L. Bos and R. Vliegenthart
2015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News framing effects on opinions about immigr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2(4):812.838.

Li.en, S. and A.C. Billings
2013 Cheering for 'our' champs by watching 'sexy' female throwers: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ity and gender in Slovenian 2008 Summer Olympic television cover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4):379-396.

Lippmann, W.
1997 Public Opinion. Free Press, New York/London.

Luo, Y.
2014 The Internet and agenda setting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media coverage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289-1312.

M.droane, I.D.
2016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remittances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ties: migrant.non-migrant relationships in the Romanian press. Identities, 23(2):228.246.

Maguire, J.
2013 'Sport and migrat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 Human Migration. Chicester/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Mastro, D.E. and E. Behm-Morawitz
2005 Latino representation on primetime televis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1):110.130.

Markova, E. and S. McKay
2011 Media 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Practices. Ital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http://cadmus.eui.eu/handle/1814/19731.

McAuliffe, M. and W. Weeks
2015 Media and migr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int and online media reporting on migrants and migration in selected origin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Belconnen, AC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vailable from www.border.gov.au/ReportsandPublications/

Documents/research/media-migration.pdf.

McAuliffe, M., W. Weeks and K. Koser
2015 Media and migr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int and online media reporting on migrants and migration in selected countries (Phase II).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Belconnen, AC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vailable from www.border.gov.au/Report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research/mcauliffe-weeks-koser.pdf.

Medic, N.
2004 How I took on the sun.and lost. The Telegraph, London, 15th July. Available from 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1467073/How-I-took-on-the-sun-and-lost.html.

Menjivar, C.
2016 Immigrant criminalization in law and the media: Effects on Latino immigrant workers' identities in Arizo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0(5.6):597.616.

Meraz, S.
2009 Is there an elite hold? Traditional media to social media agenda setting influence in blog network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3):682.707.

Migration Observatory
2015 Too many? Too few? Too difficult? How should the UK think about how many refugees to take? Migration Observatory Commentary, Oxford: COMPAS,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resources/commentaries/too-many-too-few-too-difficult-how-shouldthe-uk-think-about-how-many-refugees-to-take/.

Mpofu, S.
2013 Social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Zimbabwe. Ecquid Novi: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34(1):115.122.

Musolff, A.
2015 Dehumanizing metaphors in UK immigrant debates in press and online media. Journal of Language Aggression and Conflict, 3(1):41.56.

Newman, N., R. Fletcher, D. Levy and R.K. Nielsen
2016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6.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vailable from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files/Digital%2520News%2520Report%25202016.pdf.

Nikunen, K.
2016 Hopes of hospitality: Media, refugee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a pl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2):161.176.

O'Boyle, N., F. Fehr, P. Preston and J. Rogers
2013 Who needs or delivers diversity training? Journalism Practice, 7(3):300.313.

Park, K.
2014 Foreigners or multicultural citizens? Press media's 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s in South Kore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9):1565.1586.

Patler, C. and R.G. Gonzales
2015 Framing citizenship: Media coverage of anti-deportation cases led by undocumented immigrant youth organisation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1(9):1453.1474.

Peterson, M.A.
2001 Getting to the story: Unwriteable discourse and interpretive practice in American journalism.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4(4):201.211.

Philo, G., E. Briant and P. Donald
2013 Bad news for refugees. London: Pluto Press.

Pickering, S.
2000 The hard press of asylum.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8:32.3.

Ponsford, D.
2016 Seeking an advertising boycott of newspapers you disagree with is an illiberal way to promote liberal values. The Press Gazette, 11th November. Available from www.pressgazette.co.uk/seeking-anadvertising-boycott-of-newspapers-you-disagree-with-is-an-illiberal-way-to-promote-liberal-values.

Rettberg, J.W. and R. Gajjala
2016 Terrorists or cowards: negative portrayals of male Syrian refugees in social medi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6(1):178.181.

Salahshour, N.
2016 Liquid metaphors as positive evaluation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grants in a daily New Zealand newspaper.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13, Part B:73.81.

Santa Ana, O.
1999 'Like an animal I was treated': Anti-immigrant metaphor in US public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10(2):191.224.

Scholten, P.W.A.
2013 Agenda dynamics and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intractable policy controversies: the case of 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ies in the Netherlands. Policy Sciences, 46(3):217.236.

Schudson, M.
2011 The Sociology of News. W. W. Norton, New York.

Sciortino, G. and A. Colombo
2004 The flows and the flood: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in Italy, 1969.2001.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9(1):94.113.

Seate, A.A. and D. Mastro
2016 Media's influence on immigration attitudes: An intergroup threat theory approach.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3(2):194.213.

Selwyn, N.
2004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and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6(3):341.362.

Shumow, M.
2012 Immigrant journalism, ideology and the production of transnational media spaces. Media Culture &Society, 34(7):815.831.

2014 Media production in a transnational setting: Three models of immigra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15(8):1076.1093.

Soroka, S.
2002 Issue attributes and agenda-setting by media, the public, and policymaker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4(3):264.285.

Spoonley, P. and A. Butcher
2009 Reporting superdiversity. The mass media and immigration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30(4):355.372.

Starr

2009 Goodbye to the age of newspapers (Hello to a new era of corruption). New Republic.

Strabac, Z.
2011 It is the eyes and not the size that matters: The real and the perceived size of immigrant populations and anti-immigrant prejudice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13(4):559.582.

Sullivan, J. and B. Renz
2010 Chinese migration: still the major focus of Russian Far East/Chinese North East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23(2):261.285.

Sunstein, C.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Suro, R.
2011 Introduction. In: Writing immigration: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in dialogue (M. Suarez-Orozco, V. Louie and R. Suro,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pp. 1.18.

Tai, Q.
2016 Western media exposure and Chinese immigrants' political percept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33(1):78.97.

Thesen, G.
2013 Political agenda setting as mediatized politics? Media.politics interactions from a party and issue competition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2):181.201.

Thorbjornsrud, K.
2015 Framing irregular immigration in western med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9(7):771.782.

Tillery, A.B. and M. Chresfield
2012 Model blacks or 'ras the exhorter':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black newspapers' coverage of the first wave of Afro-Caribbe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43(5):545.570.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4 Transatlantic Trends: Mobility,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from http://trends.gmfus.org/files/2014/09/Trends_Immigration_2014_web.pdf.

Triandafyllidou, A.
2013 Migrants and the media in the 21st century: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media to reflect diversity and promote integr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7(3):240.247.

Tsfati, Y. and J.N. Cappella
2003 Do people watch what they do not trus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5):504.529.Tudsri, P. and A. Hebbani

2015 "Now I'm part of Australia and I need to know what Is happening here": Case of Hazara male former refugees in Brisbane strategically selecting media to aid accultu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16(4):1273.1289.

van der Pas, D.
2014 Making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Do parties only respond to media attention when the framing is right?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1):42.65.

Van Gorp, B.
2005 Where is the frame? Victims and intruders in the Belgian press coverage of the asylum issu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4):484.507.

van Klingeren, M., H.G. Boomgaarden, R. Vliegenthart and C.H. de Vreese
2015 Real world is not enough: The media as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comparing Denmark and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3):268.283.

Vargas-Silva, C. and Y. Markaki
2016 EU Migration to and from the UK. MIgration Observatory Briefing, Oxford: COMPAS,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wp-content/uploads/2016/04/Briefing-EU_Migration_UK.pdf.

Vis, F. and O. Goriunova (eds)
2015 The Iconic Image on Social Media: A Rapid Research Response to the Death of Aylan Kurdi. Sheffield:Visual Social Media Lab,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Available from www.dropbox.com/s/hnydewwtido6nhv/VISSOCMEDLAB_AYLAN%20KURDI%20REPORT.pdf?dl=0.

Vliegenthart, R., A.R.T. Schuck, H. Boomgaarden, and C.H. De Vreese
2008 News coverage and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1990.20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4):415-439.

Vollmer, B. and S. Karakayali
2017 The volatility of the discourse on refugees in Germany.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1.22.

Walgrave, S. and P. Van Aelst
2006 The contingency of the mass media's political agenda setting power: Toward a preliminary theor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1):88.109.

Walgrave, S., S. Soroka and M. Nuytemans
2007 The mass media political agenda-setting power: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media,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Belgium (1993 to 2000).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814.836.

Wiggen, M.
2012 Rethinking anti-immigration rhetoric after the Oslo and Utoya terror attacks. New Political Science, 34(4):585.604.

Wodak, R., M. KhosraviNik and B. Mral (eds)
2013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Bloomsbury, London.

Wojcieszak, M., R. Azrout, H. Boomgaarden, A. Paz Alencar and P. Sheets
2015 Integrating Muslim immigrant minorities: The effects of narrative and statistical messag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4(4):582.607.

Yi, J. and G. Jung
2015 Debating multicultural Korea: Media discourse on 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1(6):985.1013.

Yoon, T-I., K-H. Kim and H-J. Eom
2011 The border-crossing of habitus: media consumption, motives, and reading strategies among Asian immigrant women in South Kore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3):415.431.

Zhou, M., W. Chen and G. Cai
2006 Chinese language media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W. Sun, e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5:42.74.

Zielonka, J. (ed.)
2015 Media and Politics in New Democracies: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第九章*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7 USA: Trump's revised travel ban will stir hatred and division. Press release, 6 March. Available from www.amnesty.org/en/press-releases/2017/03/usa-trumps-revised-travel-ban-will-stir-hatred-anddivision/.

Ban, K-m.
2015 Opening remarks at press encounter, 9 April. Available from 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5-04-09/opening-remarks-press-encounter.

BBC
2016 Paris attacks: Who were the attackers? BBC News. Available from 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4832512.

Connor, P.
20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Key Findings From the U.S., Europe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15 December. Available from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2/15/international-migrationkey-findings-from-the-u-s-europe-and-the-world/.

Crouch, D. and J. Henley
2015 A way home for jihadis: Denmark's radical approach to Islamic extremism. The Guardian, 23 February.Available from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feb/23/home-jihadi-denmark-radical-islamicextremism-aarhus-model-scandinavia.

Cunningham, A. and A. Koser
2015 Migration, violent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Myths and realities.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5.pdf.

Deutsche Welle
2017 German court convicts 16-year-old Syrian refugee for planning bomb attack. Available from www.dw.com/en/german-court-convicts-16-year-old-syrian-refugee-for-planning-bomb-attack/a-38374202.

Friedman, U.
2017 Where America's terrorists actually come from. The Atlantic. Available from 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1/trump-immigration-ban-terrorism/514361/.

Giglio, M.
2014 Smuggler says he sent ISIS fighters to Europe. Buzzfeed. Available from www.buzzfeed.com/mikegiglio/smuggler-i-sent-isis-fighters-to-europe?utm_term=.nuzVAzbAQN#.fll6dvqd8P.

Glazzard, A. and M. Zeuthen
2016 Violent Extremism. Available from www.gsdrc.org/professional-dev/violent-extremism/.

Global Center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center.org/topics/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

Global Center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 The Hague
2016 Engaging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Violent Extremist Offends and Returning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Project Synopsis. Available from www.globa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March-2016-CSO-Rehab-synopsis-EN.pdf.

Hawilo, M.
2017 The Consequences of Untreated Trauma: Syrian Refugee Children in Lebanon. Northwestern Public Health. Available from www.publichealth.northwestern.edu/docs/nphr-docs/2017-1/NPHR-Feb2017_Hawilo2.pdf.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2017 Peru: Mid-year update 2017 (January . June). IDMC, Geneva. Available from www.internal-isplacement.org/countries/peru/.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6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6.2.pdf.

Koser, K.
2013 Afghanistan 2014: A Crisis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3/08/30/afghanistan-2014-a-crisis-of-internal-displacement/.

2015 IDPs, Refugees, and Violent Extremism: From Victims to Vector of Chang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2/20/idps-refugees-and-violentextremism-from-victims-to-vectors-of-change/.

Koser, K. and K. Kuschminder
2015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OM, Geneva.

Koser, K. and E. Rosand
2016 A better way to counter violent extremism: Why business as usual won't work. 27 July. Available from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07-27/better-way-counter-violent-extremism.

Larson, N.
2015 UN condemns Boko Haram abuse of children in Cameroon. AFP, 4 June. Available from www.capitalfm.co.ke/news/2015/06/un-condemns-boko-haram-abuse-of-children-in-cameroon/.

Lemon, E. and J. Heathershaw
2017 How can we explain radicalisation among Central Asia 짲 s migrants? Open Democracy. Available from 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edward-lemon-john-heathershaw/can-we-explain-radicalisation-amongcentral-asia-s-migrants.

Lischer, S.
2006 Dangerous Sanctuari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rnell.

Lister, C.
2015 Returning Foreign Fighters: Criminalization of Reintegration? Brookings Doha Center. 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En-Fighters-Web.pdf.

Makdisi, K. and V. Prashad
2016 Land of Blue Helmet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rab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vailable from www.ucpress.edu/ebook.php?isbn=9780520961982.

Martin-Rayo, F.
2011 Countering radicalization in refugee camps: How education can help defeat AQAP. Working paper, The Dubai Initiativ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cCants, W. and C. Meserole

2016 The French Connection: Explaining Sunni militancy. Foreign Affairs. Available from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03-24/french-connection.

Neumann, P.R.
2015 Victims, Perpetrators, Assets: The Narratives of Islamic State Defectors.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vailable from http://icsr.info/2015/09/icsr-reportnarratives-islamic-state-defectors/.

New American Economy
2017 Is there a Link between Refugees and U.S. Crime Rates? Examining crime data for the U.S. cities most impacted by resettlement from 2005.2016. Available from www.newamericaneconomy.org/research/isthere-a-link-between-refugees-and-u-s-crime-rates/.

Newland, K.
2015 The U.S. Record Shows Refugees Are Not A Threat.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news/us-record-shows-refugees-are-not-threat.

Nowraseth, A.
2016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98_2.pdf.

Oltermann, P.
2016 Germany's first attack by radicalised asylum seeker alarms officials. The Guardian. Available from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19/germany-train-attack-could-prompt-rethink-of-counterterrorism-policy.

Rose, M.
2016 Algerian held in Austria planned to take part in Paris attacks: Le Monde. Reuters. Available from http://ca.reuters.com/article/topNews/idCAKCN0XN26W.

Rosin, H.
2016 How a Danish town helped young Muslims turn away from ISIS. National Public Radio. Available from 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6/07/15/485900076/how-a-danish-town-helped-youngmuslims-turn-away-from-isis.

Rudiger, A. and S. Spencer
2003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Migr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OECD. Available from www.oecd.org/migration/mig/15516956.pdf.

Schmid, A.
2016 Links Between Terrorism and Migration: An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orism .The Hague. Available from https://icct.nl/publication/links-between-terrorism-and-migration-an-exploration/.

Speckhard, A. and A. Yayla
2015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recent defectors from Islamic State: Why they joined, what they saw, why they quit.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9(6). Available from www.terrorismanalysts.com/pt/index.php/pot/article/view/475/html.

Sude B., D. Stebbins and S. Weilant
2015 Lessening the risk of refugee radicalisation: Lessons for the Middle East from past crises. RAND Corporation. Available from 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100/PE166/RAND_PE166.pdf.

Sullivan, M.P. and J.S. Beittel
2016 Latin America: Terrorism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vailable from https://fas.org/sgp/crs/terror/RS21049.pdf.

The Economist
2014 The Christians of Iraq and Syria. The Economist. Available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4/08/economist-explains-13.

2017 A new hunt for remains of victims of Peru's internal conflict. The Economist, 2 March. Available from www.economist.com/news/americas/21717984-government-strives-investigate-atrocities withoutreviving-anger-new-hunt-remains.

The Global Coalition
2017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Flows Decline Over Past Year. The Global Coalition. Available from http://theglobalcoalition.org/en/category/foreign-terrorist-fighters/.

The Soufan Group
2015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The Soufan Group. Available from http://soufan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5/12/TSG_ForeignFightersUpdate3.pd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2014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Security Council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Available from www.un.org/sc/ctc/focus-areas/foreign-terrorist-fighter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6 Leaving No One Behind: Counting All People, Because All of Them Count. Available from 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49th-session.html.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6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576408cd7.pdf.

2017 Colombia Factsheet. Available from http://reporting.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UNHCR%20Colombia%20Factsheet%20-%20February%202017.pdf.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2011 The Development Response to Violent Extremism and Insurgency: Putt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Available from 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70/VEI_Policy_Final.pdf.

Willingham, A., P. Martucci and N. Leung
2017 The chances of a refugee killing you . and other surprising immigration stats. CNN. Available from http://edition.cnn.com/2017/01/30/politics/immigration-stats-by-the-numbers-trnd/index.html.

Zolberg, A., A. Suhrke and S. Aguayo
1989 Escape from Violence.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 *第十章*

Amerasinghe, P. and F. Marshall
2017 Risks and responses to urban futures: Building synergies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peri-urban communities for enhanced ecosystem service. Impact, Volume 2017, Number 1.

Arab American Institute
2012 Demographics. Available from www.aaiusa.org/demographics.

Bauder, H.
2017 Sanctuary citi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2):174.187.

Brookings Institution
n.d. Cities and Refugees: The European Response. Brookings Centennial Scholar Initiative and Foreign Policy program. Available from www.brookings.edu/series/cities-and-refugees-the-european-response/.

Buch, T., S. Hamann, A. Niebuhr and A. Rossen
2013 What makes cities attractive?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bour migration in Germany. Urban Studies,51(9):1960.1978.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Oxford.

Chen, M.H.
2015 Trust in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State Noncooperation and Sanctuary Cities after Secure Communities.91 Chicago Kent Law Review. Available from https://ssrn.com/abstract=2638849.

Citiscope
2016 Question of the Day: What are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implementing the New Urban Agenda?25 experts weigh in on the Habitat III outcome strategy being adopted this week in Quito. Available from http://citiscope.org/habitatIII/commentary/2016/10/question-day-what-are-biggest-obstaclesimplementing-new-urban-agenda.

Combes, P., S. Demurger and S. Li
2017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Agglom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Over 2002.2013. Working paper GATE 2017-09. Available from https://ssrn.com/abstract=291733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917333.de Haas, H. and M. Czaika

2014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H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migrato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48(2):283.323.

Deininger, K., C. Augustinus, S. Enemark and P. Munro-Faure (eds)
2010 Innovations in Land Rights Recognition,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rdogan, M.
2017 Urban Refugees from "Detachment" to "Harmonization". Syrian Refugees and Process Management of Municipalities: The Case of Istanbul,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marmara.gov.tr/UserFiles/Attachments/2017/05/09/5c68e8fe-6a35-4411-88f1-2f685bf4b1da.pdf.

Garcea, J.
2016 The resettlement of Syrian refugees: The positions and roles of the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and its Members.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48(3):149.173.

GLA Intelligence
2015 Population Growth in London, 1939-2015.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London. Available from https://files.datapress.com/london/dataset/population-change-1939-2015/historical%20population%201939-2015.pdf.

Glick Schiller, N. and A. Caglar (eds)
2010 Locating Migration: Rescaling Cities and Migran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Glorius, B. and J. Doomernik (eds)
2016 Refugee migration and local demarcations: New insight into European localities.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9(4):429.439.

Gold, S.J.
2015 Ethnic enclave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earchable,and Linkable Resource. Available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900772.etrds0118/abstract.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 #WelcomeRefugees: Canada resettled Syrian refugees. Available from www.cic.gc.ca/english/refugees/welcome/index.asp.

Hiebert, D.
2015 Ethnocultural Minority Enclaves in Montreal, Toronto and Vancouv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Available from http://irpp.org/research-studies/study-no52/.

Hyndman, J., W. Payne and S. Jimenez
2017 Private refugee sponsorship in Canada.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54:56.5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5a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2015: Conference on Migrants and Cities. Available from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ICP/IDM/RB-25-CMC-Report_web-final.pdf.

2015b 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 Available from https://governingbodies.iom.int/system/files/en/council/106/C-106-40-Migration-Governance-Framework.pdf.

2016 Toolbox of Migration-Related Elements for the City Resilience Strategy. Available from 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consultation_document_migration_governance_framework.pdf.

Li, W.
2008 Ethnoburb: The New Ethnic Community in Urban Americ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Manoj, R., S. Cawood, M. Hordijk and D. Hulme (eds)
2016 Urban Poverty and Climate Change: Life in the Slums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Routledge, New York.

Myler, K.
2013 "Detroit's population from 1840 ti 2012 shows high points, decades of decline", Detroit Free Press, 23 July 2013.

Narain, V., P. Anand and P. Banerjee
2013 Periurbanization in India: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Evidence. Report for the project Rural to Urban Transitions and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South Asia Consortium for Interdisciplinary Water Resources Studies (SaciWATERs), Telangana, India.

Pallagst, K.
2014 Shrinking Cit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outledge, New York.

Price, M. and L. Benton-Short
2007 Counting Immigrants in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ounting-immigrants-cities-across-globe.

Qadeer, M.
2009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multicultural planning? Plan Canada. Available from http://canada.metropolis.net/pdfs/qadeer_extracted_plan_canada_e.pdf.

Qadeer, M. and S. Agrawal
2011 The practice of multicultural planning in American and Canadian ci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20(1):132.156.

Raposo, I., J.L. Crespo and J.P. Lages
2017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the qualification of semi-urbanised peri-urban areas: The case of the Odivelas Vertente Sul area. In: Architectur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 an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between Society and Space (M. M. Mendes, T. Sa and J. Cabral, eds). Springer, pp. 151.176.

Rufin, C.
2016 Governance innovations for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in urban slums. Available from https://ssrn.com/abstract=274242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742424.

Salvati, L., D. Smiraglia, S. Bajocco and M. Munafò
2014 Land use changes in two Mediterranean coastal regions: Do urban areas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cological, 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Engineering, Volume 8, number 9.Available from www.waset.org/publications/9999331.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Saunders, D.
2010 Arrival City: 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 Knopf Canada, Toronto.

Scott, A. and M. Storper
2003 Region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Volume 37, pp. 579.593.

Seto, K.C.
2011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to mega-delta cities in Asia and Africa: Contemporary drivers and future scenarios.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 Volume 21, Supplement 1, pp. S94. S107. Available from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378011001221.

Shivendra, B.T. and H.K. Ramaraju
2013 Sanitation in periurban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cad. Indus. Res., Vol. 1(8). Available from http://jairjp.com/JANUARY%202013/10%20SHIVENDRA.pdf.

Skelcher, C., H. Sullivan and S. Jeffares
2013 Hybrid Governance in European Cities: Neighbourhood, Migration and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Smedley, T.
2013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lessons to be taken from slums. The Guardian, 5 June. Available from www.theguardian.com/sustainable-business/sustainable-design-lessons-from-slums.

Takahashi, J. and N. Sugiura
1996 The Japanese urban system and the growing centrality of Tokyo in the global economy. UnitedNations University. Available from http://archive.unu.edu/unupress/unupbooks/uu11ee/uu11ee0d.htm#the%20japanese%20urban%20system%20and%20the%20growing%20centrality%20of%20tokyo%20in%20the%20global%20econ.

The Economist
2015 'How to shrink a city'. The Economist, 30 May. Available from 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52343-many-cities-are-losing-inhabitants-better-manage-decline-try-stop-it-how-shrink.

The Guardian
2015 Cities in numbers: how patterns of urban growth change the world. Available from 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5/nov/23/cities-in-numbers-how-patterns-of-urban-growth-change-the-world.

The Robinson Rojas Archives
2008 Shrinking cities. In: UN Habitat's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8/9, pp. 40.47. Available from www.rrojasdatabank.info/statewc08091.4.pdf.

Thorn, J., T.F. Thornton and A. Helfgott
2015 Autonomous adapta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peri-urban settlements: Evidence of a growing culture of innovation and revitalisation in Mathare Valley Slums, Nairobi.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31, pp. 121.131.

Tito, S. and S. Cochan
2017 The story of a small Canadian congregation sponsoring a refugee family.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54:60.61.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bitat III)
2016 New Urban Agenda. Draft Outcome Document for Adoption in Quito, October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unipd-centrodirittiumani.it/public/docs/Habitat_III_New_Urban_Agenda_10_September_2016.pdf.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6 The World ‘s Cities in 2016.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urbanization/the_worlds_cities_in_2016_data_booklet.pd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201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Migration. Available from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events/coordination/15/documents/Report%20of%20SRSG%20on%20Migration%20-%20A.71.728_ADVANCE.pd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6 Global Refugee Sponsorship Initiative promotes Canada's private refugee sponsorship model. Available from www.unhcr.org/news/press/2016/12/58539e524/global-refugee-sponsorship-initiative-promotescanadas-private-refugee.html.

Van der Horst, H. and A. Ouwehand
2011 'Multicultural planning' as a contested device in urban renewal and housing: Reflecti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Urban Studies, 49(4):861.875.

Zhuang, Z.
2015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in retail landscapes: Case studies in the Toronto area.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ume 20, pp. 677.697.

# 附录

## *第二章*

## *附录 A. 迁徙相关的重要概念与定义*

### *境内流离失所者（IDP）*

1998 年联合国《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将境内流离失所者定义为：

> （……）被强迫逃离其家园或习惯住处的个人或集体，逃离的原因特别是要避免武装冲突、普遍的暴力、对人权的侵犯、天灾人祸，而这种逃离并没有穿过国际承认的边界。

有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更多信息，以及使用的定义和相关注意事项，请参阅 IDMC 文件和该部分引用的资料来源。

### *国际移民*

1998 年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修正版第一版提出了与衡量国际迁徙相关的重要概念。该建议书将国际移民定义为所有改变其常住国的人（p.9）。[1]

根据该建议书，常住国是指在这个国家，人们拥有日常栖身之处。[2] 而以休闲、度假、商务、医疗、宗教朝圣[3] 为目的临时出国的人不应算作国际移民，因为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常住国发生了改变。

建议书还区分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长期移民是指移居到其常住国以外国家至少一年时间（12 个月），因而其目的国成为他们新的常住国的人（第 10 页）。[4] 短期移民是指移居到其常住国以外的国家至少三个月但不到一年的人[5]——但因上述目的出国的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常住国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外来移民一定不是其迁入国的常住居民，但他们将成为他们迁入的国家的常住居民。而外迁移民应当是其迁出国家的常住居民，并将常住在另一个国家。对这一定义的采纳可帮助我们收集可用于全球比较的数据。虽然联合国建议国家数据系统采用此类定义，但这不应与各国行政与法律采用的国际移民的定义相混淆。[6] 同时还应该指出，国家实践中体现的国际移民的概念和定义经常不同于联合国推荐的概念和定义；本章呈现的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统计数据反映了一国对这些概念的定义，而这些并不一定是联合国推荐的定义。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8。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国际移民组织，n.d.h.。

*非常规迁徙*

尽管现在对非常规迁徙尚无达成一致的定义，但可将其广义地定义为“在派遣国、过境国和接收国的监管范围外进行的迁徙”。[7] 从目的国的角度看，非常规迁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在不拥有任何移民管制所需要的授权和文件的情况下即进入某个国家并在那逗留、工作。从派遣国的角度看，非常规迁徙意味着一个人未满足离开该国所需的行政手续，或是在没有有效护照或旅行文件的情况下离境。

*迁徙存量与流量*

对移民人口规模的统计通常基于存量（在特定时间点、特定国家国际移民的总量）和流量（在特定时期进入或离开一国的移民人数，统计时间一般为一年）。在这些定义中使用的术语“国家”也可指其他单位（如领地与地区）。[8]

对移民存量与流量进行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出生国与公民身份，下文将对此做出定义。（实际或预期停留时间是收集和统计迁徙流量数据的另一个因素。）[9]

- 公民身份表示个人通过出生或以声明、婚姻选择或国家法律的其他方式入籍而获得的与该国（州）之间的特定合法关系。
- 出生国是指在一个人出生时其母亲的居住国（信息获取按该国当前的边界），或者在默认情况下，分娩发生的国家（信息获取按该国当前的边界）。

*外来务工人员*

1990 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将外来务工人员定义为：“在一个他或她为非国民的国家准备从事、正从事或已从事过有报酬活动的人。”第三条继续指出该公约不适用于难民、无国籍人员和受培训者等群体。其他全球层面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定义可以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里找到，包括《就业迁徙公约》（修正版）1949 年（97 号）和《1975 年外来务工人员公约》（补充规定）（143 号）。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更多信息及可适用的定义和相关附加说明，请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以及这些文件引用的资料。

*难民*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以及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确定了全球

7 同上；和国际移民组织，2017a。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9 国际移民组织，n.d.h.。

范围内难民的合法含义。尤其是第一条（A）第二款说明该名称适用于符合下列描述的任何人：

> （……）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第一条的其它规定也进一步指出了不满足这一定义或不再属于难民的人。另外，联合国难民署章程、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就联合国难民署可管辖的人员作出了进一步解释。[10]

关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更多信息，以及适用的定义和相关附加说明，请参考联合国难民署文件以及该文件所使用的资料。

*侨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侨汇称作“由前往其他经济区域的人们通过暂时或永久迁徙从这些地区获得的家庭收入”。[11] 遵从同样的定义，“侨汇包括经电子汇款等正规渠道流动的现金或非现金物品，也包括通过直接携带过境等非正式渠道流动的现金和非现金物品。它们主要由移民到新的经济区域并成为那里的居民的个人所寄送或赠与的现钞和非现钞物品组成，也包括被在一个经济地区被雇佣但并非该地区居民的边境、季节性或其它短期工人的净报酬。”[12]

因而，侨汇通常为“雇员的报酬”和“个人转帐”的总和。[13] 和侨汇计算相关的“雇员的报酬”被定义为“在一个他们不是居民的经济体被雇佣的边境、季节性和其它短期劳动者的收入以及被非常驻组织雇佣的居民的收入”；[14] 这意味着国际组织、使馆和领事馆及其它非常驻的公司的居民雇员所挣的工资都被包括在侨汇的计算内，虽然从专业上谈它们不（一定）涉及居民移民和非居民家庭间的汇款。在某些国家非常驻实体机构量较多或者这些机构雇佣了大量人员，那么这个国家侨汇总额可能特别显著。“个人汇款”由所有“由居民家庭赚得的或收到的去往或来自非居民家庭的现钞或实物的经常性转移”构成，因而包括“所有居民和非居民个人间的所有经常性转移”。[15] 基于此，个人转帐也可能高估居民移民和非居民家庭之间的实际转移，而这种过高估计经常被当作侨汇的实际金额。同时，统计个人汇款和雇员报酬的总数得出的侨汇数量的向上偏差可能抵消未被计算在内的经非正式渠道转移的汇款。然而这些偏差的程度很难评估。

关于侨汇的更多信息、适用的定义和相关附加说明，可参考世界银行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使用的资料。

10 更多信息请查阅联合国难民署，2013。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
12 同上。
13 Alvarez 等人，2015。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
15 同上。

## *移民偷运*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的第三条( a )把“移民偷运”定义为：

（……）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得财务或其它物质利益而将一个人以非法方式带入一个他并非国民或永久居民的国家。

第三条（b）和（C）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

（b）“非法入境”指以不遵守接收国法律要求的方式跨越国境。

（c）“欺骗性的旅行或身份文件”意味着符合以下要求的任何旅行或身份文件：

（i）被有合法授权、可代表一个国家制作或颁发旅行或身份文件的个人或机构外的任何人伪造或用某些重要的方式改变的文件；或

（ii）通过歪曲、贪污或强迫或其它任何非法方式颁发或获得的文件；或

（iii）被非正当持有者的个人使用的文件；

## *人口贩卖*

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充，2000 年《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把“人口贩卖”定义为：

（a）（……）出于剥削的目的，通过威胁、利用武力或其它强迫形式、诱拐、敲诈、欺骗、滥用权力、乘人之危、给予或获得报酬或利益等方式招募、运输、转移、藏匿或接收人口并使一个人同意对另一个人进行控制。剥削至少包括要求他人卖淫或进行其它性剥削形式、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和奴役相似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等。

（b）本条（a）段所述的手段在被使用时，（a）段所述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对剥削企图的同意并不与此相关。

（c）出于剥削的目的招募、运输、转移、藏匿或接收一个儿童被认为是“人口贩卖”，即使不涉及本条（a）分段所述的任何手段。

（d）“儿童”为任何不到 18 岁的人。

关于人口贩卖、适用定义和相关说明，请参考本章节所提及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文件和这些文件使用的信息。

## *第二章*

## *附录 B. 离散人口*

离散人口一词已在不同学科间被广泛讨论并给出了一系列定义，但至今仍没有对这一术语一致同意的说法。一般而言，它指的是生活在他国的一国国民或公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离散人口（diaspora）照字面意思指“散落”（来自于希腊语的 diaspeirein 或“分散在”）。一些学者同意这一说法，即对比其它移民团体，离散人口的显著特征是存在和来源国或社区强烈的文化、语言、历史、宗教和情感联系，或者有一种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16] 根据国籍定义离散人口（例如，中国或印度离散人口）可能经常掩藏团体间诸如宗教或种族等区别。其他人建议跨国社群这一说法能更贴切地描述当今的移民经历，在这种经历中移民有可能和他们原住社区或他国的移民建立并保持联系，因而“同时属于两个或更多的社会”。[17]

出于统计目的为离散人口下定义极具挑战性。为给出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而面临的复杂性、敏感性及缺乏定义等问题阻碍了对可用于全球比较的离散人口数据的整合。在国家层面上，各国可能各自有对离散人口的统计定义，该定义经常反映出它们的历史和政治轨迹；然而迁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可能不被认作离散人口。而且收集迁出移民的信息经常依靠东道国的数据。外籍国民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但他们的孩子或后代的数据则较难得到。一些来源国的国家人口普查和家庭调查可能提供一些在国外的国民的信息，但是普查的频率和调查的样本大小等问题阻碍了对离散人口进行全面且及时的了解。因而即使对于单个国家，对离散人口进行量化和描述 – 即离散人口绘图 – 也难以实现。IOM 已帮助数个国家制定它们的离散人口图；关于 IOM 的工作请详见以下的文字框。出于这些原因，对全球离散人口存量进行一个可靠的估算几乎不可能。除非将定义缩小为迁出移民人群，因为关于他们的数据可从大多数国家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世界银行已对此进行尝试。[18]

### IOM 的离散人口绘图

在 IOM 内部，离散人口和跨国社群两词时常被互换使用。两个用语都指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而他们的身份和归属感是由他们的移民经历和背景形成。IOM 选择使用跨国社群是因为在一个全球流动规模前所未有的世界，这些社群经常由与至少一个国家有联系的人们组成。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方法促进信息和数据的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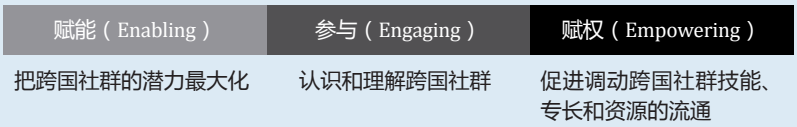
为了提供关于离散人口的相关信息，并识别那些有兴趣在他们的本土进行投资并贡献技能的个体，IOM 绘制了那些将最终用于制定政策建议的数据和想法。很多情况下，IOM 将跨国社群纳入它的项目规划的决定因素在于离散人口东道国或来源国的要求。IOM 参与的指导原则是要求符合所有合作方的利益，包括和跨国社群有联系的国家、离散人口自身及来源国社区。根据行动的 3E 原

16 Vertovec 和 Cohen, 1999。

17 Vertovec, 2005。

18 可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OECD)，2012b。在 OECD 的 2012 年报告中，离散人口被定义为按出生国界定的 15 岁及以上外国出生的人口及其在移民目的国出生的后代。但是，如报告中所提到的，并没有按一系列特征划分的关于目的国移民后代的信息。因此，这一报告并有提供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离散人口的信息。同时，这一报告只包含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而数据也只覆盖了 2008 年。这一组织中拥有最多离散人口的国家是墨西哥，有近 2000 万离散人口（占 2008 年 OECD 所有国家离散人口的 16%）。接下来是意大利（520 万人，占 4%），德国（410 万人，占 3%），印度（380 万人，占 3%）及英国（290 万人，占 3%）。OECD 报告最新版于 2015 年发布。

则，IOM 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法，给予作为发展主体的跨国社群能力、使其参与并使其获得权力并由 IOM 进行政策建议和规划支持使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每个阶段。




从 2000 到 2016 年，IOM 为多达 61 个来源国和 75 个目的国制作了 100 多份离散人口绘图报告，其中大多数为欧洲或其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绘图报告是和来自亚洲和太平洋以及中非和西非地区的移民相关。离散人口绘图集中在不同的优先次序上，并取决于离散产生的环境。虽然大多数报告主要关注离散社群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简况，这一绘图的目的既不同于分析个别离散人口社群使用的通信渠道也异于识别拥有熟练和半熟练技能的专业人员等等。 IOM 尤其支持离散专业人员积极参与他们来源国的健康和教育等部门，并通过这些部门认识到各国具体的发展需要。

## *第二章*

## *附录 C. 非常规移民流动*

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分析国家和地区间使用正规签证和移民通道的人口活动的数据有其内在的困难，因为相对而言很少有国家系统地收集和报告了这类信息。而要收集关于非常规移民的数据就更为困难，因为这种活动时常是秘密进行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移民都试图在这类旅行中逃避当局的监控。因此现在并没有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内关于非常规移民流动的数据。而且，全球较少有国家有能力对出入它们领土的非常规移民流动进行全面监控并收集数据。（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更偏远的国家，在那里非典型的地理隔离使数据的收集更为直接。）[19] 全世界很多国家继续对边境管理能力和技术进行投资以获得和非常规移民流动相关的数据。一些评论家质疑了量化非常规移民的用处，提出了收集和应用这种统计的实际困难以及背后的原理，而这些都可能达到惊悚的程度。[20] 但是从国家政府、地区和地方政府、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及其他等角度看，尝试量化非常规移民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对非常规移民性质和程度的更好的理解会促进更有效的回应和缓解措施的形成，这些对处于背井离乡或有非常规移民可能的人口尤其有好处。[21]

非常规移民流动通常被认为是以非常规形式进入过境和目的国，虽然在历史上和现在非常规离境仍是某些地区和国家的一个特征（例如，1949 到 1990 年间的东德，以及当下的朝鲜）。一些进行非常规移民的人 – 离境和 / 或入境 – 并不是明确需要逃避当局，反而有需要与当局或其它机构接

19 McAullife 和 Koser，2017。
20 Castles, 2002; Clarke, 2000。
21 McAullife, 2017。

洽（诸如联合国难民署）以寻求保护。在某些时间和地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可能构成沿特定移民通道进行非常规迁徙的人群很大的一部分。非常规迁徙可能使移民处于危险的乃至威胁生命的境地，IOM 失踪移民项目记录的移民死亡和失踪人数即悲剧性地展示了这一状况（见第二章关于 IOM 失踪移民项目的文字框）。

目前对全球非常规移民流动所知的是基于非常规移民以非常规形式进入一个地区（即没有官方授权）而推导出的对全球非常规移民存量的统计。从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许多非常规移民并不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入境，而是在到达后故意或不自觉地成为非常规移民。在这个背景下，非常规海上移民流动近年来愈发显著且同其他移民流动相比，其规模可能远超过目前所知。而这也和去往澳大利亚、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非常规移民流动尤为相关。

这并不是对非常规移民带来的挑战和困难轻描淡写；但在缺少其它数据的情况下，对这些流动进行评价确实很困难，而这些时常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被监测。以下关于非常规海上移民流动的解释即说明了这点。

## 非常规海上移民流

和其它形式的非常规移民不同，从贫困、欠发达和冲突四起的国家去往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海上移民流动相对而言得到较为完好的记录。这一迁移活动被如此严密监测的原因之一是它高度可见。它也吸引了公众高度的关注。高度控制的边境管理程序也因此出台并提升了国家统计和记录非常规海上移民范围的能力。例如美国海岸警卫队精确地报告了可追溯到 1995 年的非常规海上移民的数据。而欧盟的 Frontex 自 2008 年起也提升了其报告在地中海和北大西洋进行海上移民的人数的能力。这些流动主要呈现为南北移民，而这也突出了对监测去往北方的非常规海上移民的兴趣。

量化主要南北移民通道之外的非常规海上移民的规模十分困难。即便如此，Frontex 对以这种方式进入欧洲的监测和报告也比近十年前更系统化。数据往往捕捉到已经被制止或被觉察的非常规移民活动，但显然还是不能捕捉到所有以非常规方式进行海上迁移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在各种环境下都可能有未被察觉的成功海上冒险，但在有的情况下这个可能性会小一些。例如，一些非常规移民可能未被澳大利亚官方在西北海岸拦截到，结果有可能在严酷和孤立的海岸地区死亡；这些人迫切需要政府的觉察。

根据 McAuliffe 和 Mence(2017)

## *第二章*

## *附录 D 人口贩卖*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三条定义了人口贩卖的含义。[22] 但是缘于人口贩运的隐秘性、不可见以及未被给予充分报告的性质，对贩卖受害者的全球估算很有限且难以收集。最近 2014 年的数据显示在 85 个国家已发现有 17752 名人口贩卖的受害者。[23] 在 2012 到 2014 年间，在 106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 63251 名受害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指出在 2012 到 2014 年间发现的受害者大多数（57%）经历了跨国贩卖，而其余则是在境内被贩卖。[24] 出于同样原因相关数据极其有限，因此受害者的实际人数可能远高于被发现的受害者人数。[25]

2014 年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妇女和女孩构成了大多数，占总数的 71%。自 2003 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始收集人口贩卖的数据起，女性始终是主要的受害者。但基于越来越多的男性也成为受害者，女性的比例相比 2004 年的 84% 有所下降。在 2012 和 2014 年间，每五个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即有一个为男性。在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儿童的份额也从 2004 年的 13%（女孩 10%，男孩 3%）上升到 2014 年的 28%（20% 女孩，8% 男孩），但在 2011 年达到 34% 的高峰后有所下降。

尽管受害者被贩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剥削、强迫劳动、强迫婚姻、乞讨和器官切除，自 2003 年起性剥削为贩卖最主要的因素。但从 2008 年起该比例有所变化，从 61% 下降到 2014 年的 54%。同期因强迫劳动被贩卖的受害者份额从 31% 上升到 38%，且 2011 和 2013 两年比例更高（分别为 40% 和 39%）。当受害者总人数按性别和剥削形式划分时，显然女性遭受性剥削的比例更高（例如 2014 年被发现的女性受害者占总人数的 72%），而更高比例的男性经历了强迫劳动（例如 2014 年被发现的被强迫劳动的男性受害者占总数的 85.7%）。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在 2012 和 2014 年间，在被发现的每 10 个受害者中大约 4 个被贩卖而被迫劳动。而在这些受害者中，63% 为男性。

目前我们已认识到有必要获取关于贩卖受害者更好的数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在第 16 个目标中将“每 10 万人口中按性别、年龄和剥削形式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人数”作为指数之一（指数 16.2.2），也因此为改进数据提供了新动力。[26]IOM 的努力也提供了有用的见解。

---

22 参见附录 A 对人口贩卖的定义。

23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基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请查阅此文件查看解释说明、深入分析、附加说明以及和数据和趋势相关的有限性及方法论等问题。该组织先前的《贩卖人口全球报告》是其他的重要信息来源。另一重要信息来源是美国国务院的贩卖人口报告，可从联合国国务院，2017 找到。

24 基于这一定义，人口贩卖可能被误解涉及国际或国内迁徙。但这些活动和一个人是否为受害者并无直接关联。在这一语境下，被识别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意味着是迁徙过程中的人口贩卖中的受害者。但这也说明，很多人口贩卖涉及国内或国际迁徙。

25 例如，据全球奴役指数估计，2016 年有 4580 万人在 167 个国家遭受现代形式的奴役，其中 58% 的人口分布在五个国家：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 Walk Free 基金会，2016 和 www.globalslaveryindex.org/findings/）.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2012 年全球有 2090 万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其中有 910 万（或占总数的 44%）经历了国际或国内迁徙（参见国际劳工组织，2016）。尽管强迫劳动、奴役和人口贩卖有不同的定义，但仍存在定义上的重合，如强迫劳动或奴役的受害者也可以是贩卖的受害者。

2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

## IOM 关于协助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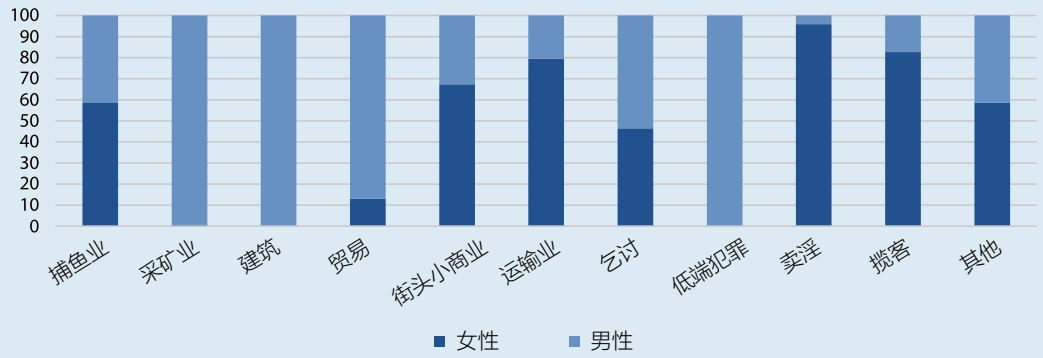
IOM 在 1990 年代开始帮助贩卖受害者。IOM 的全球数据库是同类中规模最大的，有 4 万 6 千名贩卖受害者的数据，并且包括原始数据。这些包括已被 IOM：（1）发现；（2）帮助；或（3）发现并给予帮助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代表了 140 个国籍并在 150 个国家被发现。这个数据库每年大约增加 5000 个案例。但是出于不同原因，并不是所有被 IOM 帮助的受害者都被记录在这个数据库里。此外，只有在 IOM 有反贩卖活动的地方数据才会被收集。

IOM 数据库里记录的贩卖受害者中，在 2005 和 2015 年间，男性贩卖受害者的比例有所增长，其中经历性剥削的受害者比例有所下降，而经历强迫劳动的比例有所增长。同期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 26 岁（在被帮助的时候），而有一半的受害者年龄在 18 到 34 岁之间。

在 2015 和 2016 年间，8976 名人口贩运受害者被发现、帮助，或被发现并给予帮助。这些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 29 岁，虽然平均而言男性受害者年纪长于女性。该时期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大约 15% 为儿童。

下图显示了按剥削形式划分的 IOM 数据。在采矿、建筑和低级犯罪等类别下，受害者几乎都为男性，而卖淫、揽客和运输则主要由女性构成。

### 2005-2015 年被发现、帮助、或被发现并给予帮助的受害者遭受的剥削类别（百分比）




IOM 也收集了关于人口贩卖的存在指数和沿移民路线的剥削性行为的数据。“人口贩卖和其它剥削行为普遍性调查”自 2015 年 12 月起已成为 IOM 的 DTM 运作的一部分被实行。这些数据表明在 2016 年沿着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移民线路被采访的 16000 名移民中有超过 30% 在旅程中经历了人口贩卖或其它剥削性行为。

关于 IOM 收集贩卖受害者的数据和这方面相关工作的更多信息，请见 www.iom.int/counter-trafficking.IOM 关于被识别的人口贩卖的原始数据可在 www.ctdatacollaborative.org/ 下载。

# *第三章*

## *附录 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和次区域*

请注意本表格所反映的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和次区域，但这不意味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这些划分。

| 非 洲 | | | | |
|---|---|---|---|---|
| **东非** [a] | **中非** [b] | **北非** [c] | **南部非洲** [d] | **西非** [e] |
| 布隆迪 | 安哥拉 | 阿尔及利亚 | 博茨瓦纳 | 贝宁 |
| 科摩罗 | 喀麦隆 | 埃及 | 莱索托 | 布基纳法索 |
| 吉布提 | 中非共和国 | 利比亚 | 纳米比亚 | 佛得角 |
| 厄立特里亚 | 乍得 | 摩洛哥 | 南非 | 科特迪瓦 |
| 埃塞俄比亚 | 刚果（布） | 苏丹 | 斯瓦西里 | 冈比亚 |
| 肯尼亚 | 刚果（金） | 突尼斯 | | 加纳 |
| 马达加斯加 | 赤道几内亚 | | | 几内亚 |
| 马拉维 | 加蓬 | | | 几内亚比绍 |
| 毛里求斯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利比里亚 |
| 马约特岛 | | | | 马里 |
| 莫桑比克 | | | | 毛利塔尼亚 |
| 留尼旺岛 | | | | 尼日尔 |
| 卢旺达 | | | | 尼日利亚 |
| 塞舌尔 | | | | 圣赫勒拿 |
| 索马里 | | | | 塞内加尔 |
| 南苏丹 | | | | 塞拉利昂 |
| 乌干达 | | | | 多哥 |
| 坦桑尼亚共和国 | | | | |
| 赞比亚 | | | | |
| 津巴布韦 | | | | |

a. 在本章中东非和非洲南部合并，虽然里面的国家 / 地域 / 地区保持不变。
b. 该次区域在本章被重新命名为“中非”并同西非合并。
c.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北非”。
d. 该次区域和东非合并。
本章中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西非”并同中非合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中非”）。

| 亚 洲 | | | | |
|---|---|---|---|---|
| **中亚** | **东亚** | **东南亚 [f]** | **南亚** | **西亚 [g]** |
| 哈萨克斯坦 | 中国 | 文莱 | 阿富汗 | 亚美尼亚 |
| 吉尔吉斯坦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柬埔寨 | 孟加拉国 | 阿塞拜疆 |
| 塔吉克斯坦 |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 印度尼西亚 | 不丹 | 巴林 |
| 土库曼斯坦 | 朝鲜 | 老挝 | 印度 | 塞浦路斯 |
| 乌兹别克斯坦 | 日本 | 马来西亚 | 伊朗伊斯兰 | 格鲁吉亚 |
| | 蒙古 | 缅甸 | 共和国 | 伊拉克 |
| | 韩国 | 菲律宾 | 马尔代夫 | 以色列 |
| | | 新加坡 | 尼泊尔 | 约旦 |
| | | 泰国 | 巴基斯坦 | 科威特 |
| | | 东帝汶 | 斯里兰卡 | 黎巴嫩 |
| | | 越南 | | 阿曼 |
| | | | | 卡塔尔 |
| | | | | 沙特阿拉伯 |
| | | | | 叙利亚 |
| | | | | 土耳其 |
| | | | | 阿联酋 |
| | | | | 也门 |

f.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东南亚”。
g.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中东”。

| 欧 洲 [h] | | | |
|---|---|---|---|
| **东欧 [i]** | **北欧** | **南欧** | **西欧** |
| 白俄罗斯 | 海峡群岛 | 阿尔巴尼亚 | 奥地利 |
| 保加利亚 | 丹麦 | 安道尔 | 比利时 |
| 捷克 | 爱沙尼亚 |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 法国 |
| 匈牙利 | 法罗群岛 | 克罗地亚 | 德国 |
| 波兰 | 芬兰 | 直布罗陀 | 列支敦士登 |
| 摩尔多瓦 | 冰岛 | 希腊 | 卢森堡 |
| 罗马尼亚 | 爱尔兰 | 罗马教廷 | 摩纳哥 |
| 俄罗斯 | 马恩岛 | 意大利 | 荷兰 |
| 斯洛伐克 | 拉脱维亚 | 马耳他 | 瑞士 |
| 乌克兰 | 立陶宛 | 黑山 | |
| | 挪威 | 葡萄牙 | |
| | 瑞典 | 圣马力诺 | |
| | 英国 | 塞尔维亚 | |
| | | 斯洛文尼亚 | |
| | | 西班牙 | |
| | | 马其顿 | |

h. 该次区域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可能既在本章东南欧、东欧部分被提及，也在北欧、西欧和南欧的部分被讨论。
i. 本章合并了北欧、西欧和南欧，但不包括下列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这些国家在本章中被划在南部 - 东部欧洲下，属于东南欧和东欧洲两个次区域。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 |
|---|---|---|
| **加勒比海地区** | **中美**[j] | **南美** |
| 安圭拉岛 | 伯利兹 | 阿根廷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 哥斯达黎加 | 玻利维亚 |
| 阿鲁巴 | 萨尔瓦多 | 巴西 |
| 巴哈马 | 危地马拉 | 智利 |
| 巴巴多斯 | 洪都拉斯 | 哥伦比亚 |
| 博奈尔，圣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 | 墨西哥 | 厄瓜多尔 |
| 英属维京群岛 | 尼加拉瓜 |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
| 开曼群岛 | 巴拿马 | 法属圭亚那 |
| 古巴 | | 圭亚那 |
| 库拉索岛 | | 巴拉圭 |
| 多米尼加 | | 秘鲁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 苏里南 |
| 格林纳达 | | 乌拉圭 |
| 瓜德罗普岛 | | 委内瑞拉 |
| 海地 | | |
| 牙买加 | | |
| 马提尼克 | | |
| 蒙特塞拉特岛 | | |
| 波多黎各 | | |

j. 在本章中次区域“中美洲”和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合并。

| 北美地区 |
|---|
| 百慕大 |
| 加拿大 |
| 格陵兰岛 |
|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
| 美国 |

| 大洋洲 | | | |
|---|---|---|---|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美拉尼西亚** | **密克罗尼西亚** | **波利尼西亚** |
| 澳大利亚 | 斐济 | 关岛 | 美属萨摩亚 |
| 新西兰 | 新加勒多尼亚 | 基里巴斯 | 库克群岛 |
|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马绍尔群岛 | 法属波利尼西亚 |
| | 所罗门群岛 | 密克罗尼西亚 | 纽埃岛 |
| | 瓦努阿图 | 瑙鲁 | 萨摩亚 |
| | | 北马里亚纳群岛 | 托克劳 |
| | | 帕劳 | 汤加 |
| | | | 图瓦卢 |
| | | |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

图例：

| 地区 |
| --- |
| 此区域 [i] |
| 国家 / 领地 / 区域 [ii, iii] |

*注：* 方法论及解释性注解请见《国际移民数量趋势：2015 年修正版》“CD-ROM”文件材料，该材料可在：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5.pdf 得到。

i. 本章内使用的次区域可能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部所使用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体现在名称上也可能体现在其中包括的国家、地域和地区。
ii.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是指他们在联合国日常运作中使用的简短形式，但并不一定是正式文件中使用的官方名称。这些名字根据联合国术语数据库，可在 http：//unterm.un.org/UNTERM/portal/welcome 中找到。该网址中所使用的指称以及材料均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机构（或 IOM）关于任何国家、地域、城市或地区的合法地位或它的权威及其边界的意见。详见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iii. 前一章所使用的本表格所含的实体包括国家、领地、地区和特别行政区。请注意这表格并不是全面的。

## *第四章*

## *附录 A. 学术出版的简要概述*

学术传播系统围绕一个已确立的重心旋转：出版物。一些形式的出版物（诸如学术刊物期刊）比其它出版物有大得多的可信度和分量（，而每个学术出版者还分属在不同的等级中）。在学术期刊发表研究结果无疑是当今学者的主要目标。[27] 期刊构成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市场收入的大约 40%（书籍为 16%），这个市场的规模在 2013 年被估计为 252 亿美元。[28] 通过学术出版，学者们能够正式地在科学界分享他们的发现。这样的学术交流使其它研究者能够了解最新的进展，为填补现有的知识缺口设计新的研究，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同行进行比较，或许还能避免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而且出版物构成了“…什么、何时和被谁发现了的永久记录 – 如同一本科学界的法庭登记册”。[29] 世界上第一个学术期刊 – 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早在 1665 年就出现了，表达了皇家学会对通过公开分享由实验性证据支持的结果和观点来促进科学进步的政策。从那时算起，被同行审议的活跃学术性英语期刊在 2014 年达到了 28100 个，[30] 据计算全球的科学产出每九年翻一番。[31] 今天的很多学者对学术文献量之大感到不知所措，要找到时间阅读每条文献（即使是在最窄的话题中）也正变得不可能。

出版物是学者职业发展的核心，而从事应用研究的研究者则不一定在同样程度的出版压力下工作。总的来说，学术回报系统使得出版物数量大大增加的原因，但是数量的增加并不会自动导致被

27 其他学术交流的途径包括书籍、会议讲演、讨论会、电子邮件以及其他途径。
28 Ware and Mabe, 2015。
29 Sense About Science, 2005。
30 Ware and Mabe, 2015。
31 Van Noorden, 2014。

出版的学术研究平均“质量”的提高。

衡量质量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按照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期刊文章），我们可以说一篇文章的质量在出版前主要在质量上被评估，而在出版后主要在数量上被评估。在学术期刊出版之前开展的质量评估被称为“同行审议”。“同行”指对上交的文章进行审议的人在一个主题上有相等（或更强）的专长。学术圈内的同行审议几乎都是没有报酬的。期刊文章的同行审议“…在传统上被看作是研究者职业义务的一部分”，[32] 在 40000 名研究论文作者中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他们中大多数认为同行审议“…对学术研究交流是必不可少的”。91% 的调查对象称“…审议过程改进了他们最近出版的论文的质量”，86% 称“…他们享受评估并将继续审议”。[33] 对做审议最切实的激励或许是获得认可：期刊通常出版年度的“感恩评估者”文件，在里面他们罗列出担任过评估者们的人名。[34] 被列入那些名单能够完善一个研究者的简历，尤其当他/她打算在某个特定领域寻求资金/找工作时。评估者在向期刊编辑提交建议（接受/修改/拒绝）前彻底检查方法、结果和结论。评估过程一直重复到编辑对手稿满意为止，它能够最终进入生产管线（编辑、排字、网络出版、印刷）。总的来说，同行审议周期长达数周到数月，（这个周期）在各个学科和期刊之间差别较大。在出版后，摘要是免费的，而阅读全文可能需要通过学术图书馆（通常向出版者交纳订阅费），或要按次收取费用才有权使用。要感谢一些作者的机构向出版商交纳了出版费，“开放阅览”出版模式才会允许所有人免费阅读全文。

同行审议过程在出版前检查一篇文章，主要使用定性的方法，而在出版后定量方法便支配了对材料的评估。引用量是书目计量学（书面出版的统计分析）唯一的基础单位。大致来说，引用越多，影响越大，论文/文章/书籍应有的质量越高。任何出版物的引用标准可以使用Google Scholar获得，它是全世界专业学者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例如，在Google Scholar搜索“人口迁徙（migration）”返回 380 万结果以及以下的第一页：[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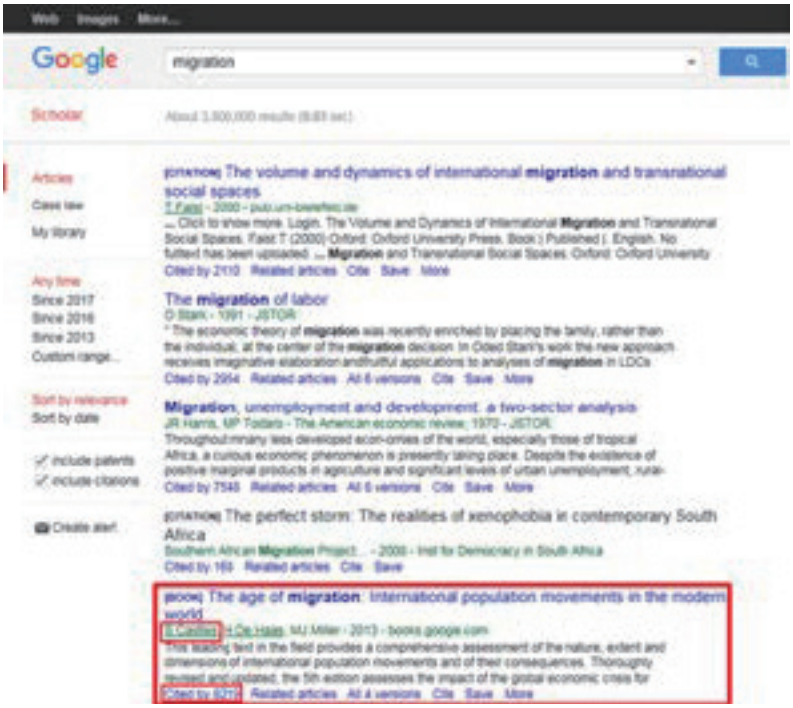
32 Ware and Mabe, 2015。

33 Mulligan, Hall 和 Raphael, 2013。

34 一些实例请参见 http://iovs.arvojournals.org/article.aspx?articleid=2277067.

35 搜索的结果可能根据用户设置而改变（即是否登录了 Google）以及地理上的用户地址。

图 1.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一例




你能一眼看到（图 1，左下）《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迁移》（“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到 2017 年 1 月为止被超过 8000 份其它出版物引用过。点击“Cited by 8219”，你能看到从第一版（1993）开始的所有引用此书的出版物。如果你点击作者的名字（S. Castles），你能看到作者的引用目录。

依靠引用数量计数，各种所谓的“影响指标”可以在出版物、作者、期刊等层面被计算出来。例如，一份期刊的影响因子（引用 / 出版比率）被广泛用作一份期刊的相对重要性的代表，而 h- 指数[36] 提供了衡量单个作者影响的方法（虽然它也能为一个部门，机构或国家计算）。引用 / 出版比率一般是检验三年内的两年出版周期。例如， X 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子，是用 2013 和 2014 年的 122 次文章引用除以 2013 和 2014 年出版的文章总数（166），所以 X 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素为 0.735（或 122 次引用除以 166 篇文章）。

关于影响度量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开放讨论，目的在于在研究资助者对于衡量他们资助的项目的影响的需要和专业学者对他们的作品（以及后续的资助）的公平评估系统的要求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最近，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正在被开发，在其评价系统内考虑到了（论文）在新闻和博客、推特、脸书等中的被提到的次数。

36 h 指数是指至少有 h 个引用的发表物的数量。比如说，作者 X 有四篇发表：A（被引用 27 次），B（被引用 14 次），C（被引用 2 次），然后 D（未被引用）。作者 X 的 h- 指数目前是 2。未来 X 的 h- 指数可能会是 3，如果发表 C 再被多引用至少一次。

学术回报系统很重视被同行审议的期刊发表的出版物，而在此系统中有所成就的压力被认为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弊端，[37] 这其中包括了质量问题。期刊中“出版或出局”的文化会扼杀研究创新，[38] 降低研究出版物的标准，[39] 鼓励同行审议欺诈 [40] 并对研究者从事适应决策者需求的应用研究的能力有不良影响。[41]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承受着进行创新研究、在顶级期刊出版并向政策受众出示证据并最终影响政策的压力。[42]

## *第四章*

## *附录 B. 学术期刊的贡献* [43]

###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 [44]

总编辑：Mulugeta F. Dinbabo

近些年，围绕移民 - 发展关系的辩论，已在全球激起了对人口流动的日益增长的兴趣。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也不例外，那里的研究者力图描述移民的趋势和模式，并为该大陆的发展建议相应的行动，以控制它的经济、社会和人类权益。在这个方面，基于证据的研究被广泛接受，并通过测试假设、验证现有的理论和阐述新的理论来建构和扩大知识体系。最终，这些研究发现需要向一个更大且更多样化，由专家学者、实践者、民间组织和政府代表所组成的受众发表和传播。出版物不仅会增强研究的知名度，同时还会提高研究者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的可信度。经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是培养智慧的辩论和探究的基本工具。但是，目前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仍缺少针对人口流动等等问题的经同行审议的高质量期刊。学者们要在非洲的期刊展示他们在该领域的发现仍有困难，若不是因为这类期刊出版不定期，就是因为它们干脆不存在。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HMR）是一份跨学科期刊，它的产生是为了鼓励和促进有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流动的所有方面的研究（即是，社会经济、政治、立法和发展）。AHMR 成立于 2014 年，旨在成为非洲撒拉以南地区的在国际 / 国内移民、民族关系和难民迁移等领域中最主要的学术期刊之一。AHMR 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有另外的机会出版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年轻非洲研究者的能力；出版和传播关于来自和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内的人类迁徙和难民迁移的社会人口、经济、心理、历史、立法和宗教方面的学术成果。另外，AHMR 识别最有效的举措并为在非洲正确实施移民政策提供指导方针。它也促进非洲斯卡拉布里尼人类流动学院（SIHMA）的视野和使命。总的来说， AHMR 积极为 SIHMA 的总目标作贡献，即传播培养对人口流动的了解的研究，并为保证非洲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权利和尊严的政策提供信息。

37 Smith, 2006。

38 Foster, Rzhetsky and Evans, 2015。

39 Colquhoun, 2011。

40 Prosser Scully, 2015。

41 Cherney et al., 2012。

42 同上。

43 这个附录中的文章都是各个期刊的主编提交的，这些文章并没有被编辑。

44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sihma.org.za/online-journal/。

在目前，AHMR 每年出版三期，分别在一月，五月和十一月。该期刊期刊也偶尔出版特刊。在过去的两年，编辑部收到了一大批文章，在严格的同行审议后，只有 25 篇在六期里出版。推进知识体系发展的学术手稿受到鼓励并会被考虑出版。AHMR 出版原创的理论和应用成果，包括诸如移民和发展、移民和人权、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流动性和就业和仇外、融合和社会凝聚等主题。

AHMR 的网络出版物为从业者、研究者、学生、学者和决策者提高了信息的可获取性。作为保证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策略的一部分，AHMR 定期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相关的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 / 研究机构互动。从读者和合作者处获得的回馈表明 AHMR 的电子发表物提高了因特网搜索能力。它也扩大了相关信息的来源并同时降低了出版者和期刊使用者的花销。至今为止，AHMR 从作者和委员会成员以及从读者以查看和下载的形式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馈。这是由于 AHMR 独有的线上的且免费的传播，使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世界其它地方正在受到更大的关注的证据之一。事实上该期刊有向更多受众开放的优势，这使及时的回馈以及与读者互动成为可能。世界性的开放阅读的学术期刊作为传统的订阅期刊的替代品而出现。它们的文章对所有人开放，同时还提供在所有学术期刊中都常见的服务，诸如同行审议过程、生产和传播。在另个方面，许多学者出于对网络期刊缺乏信任，抵制在网络中介发表。例如，许多学术界的作者重视被同行审议过的期刊所接受。这与大学晋升决定过程中网络期刊出版物比印刷的期刊分量轻所产生的（网络期刊）可信度问题相关（Collins 和 Berge, 199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HMR 每年都会出版一些印刷版，并在非洲南部的大学分发。

在 2014 和 2016 年间，AHMR 出版了关于国际移民、发展和仇外的一份特刊（Special Issue）。来自美国石溪大学（Stone Brook University）的 Shimelis Gulima 教授担任了该特刊的客座编辑。这一辑的论文包括：《南非仇外暴力事件：2008 和 2015》（Violent xenophobic episodes in South Africa: 2008 and 2015）；《在非洲防止仇外：非洲联盟该做什么？》（Preventing Xenophobia in Africa: what must the African Union Do?）；《非洲之角的暴力冲突和被迫流离失所：寻找持久的解决方案的政府和捐赠政策和项目》（Violent conflict and forced displacement in the Horn of Africa: Government and Donor 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Search of Durable Solutions），和《发展引起的流离失所及其对北部西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贫穷城市家庭的生活的影响》（Development-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s of poor urban households in Bahir Dar, North Western Ethiopia）。

特刊是 AHMR 的新事业。这个想法在一场空前的在南非对非洲移民的攻击时产生。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的话。它把对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带到了一起，所有的问题都和特刊的总主题息息相关，每个问题昭示了平穷和欠发展、冲突、流离失所、人口迁徙和仇外之间的互相联系。对流离失所、仇外、冲突和人口迁徙等问题更深层的探究，如四份学术成果所示，有助于强调一些更大的、经常是全球性的过程，例如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还有在国家和地区内以及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另外，这些论文提供了对现有假定、诠释和做法的批评，如对于仇外这个用语；它号召以对眼下的问题能够加深了解的方法重新思考，并建议了解决现有挑战的措施，包括流离失所和仇外等等。

其它 AHMR 出版物包括著名作者像是：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社会学荣誉教授 Simon Bekker，以及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政治学教授 Laurence Piper，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仇外、祖鲁民族主义、英卡塔自由党和南非的选举政策的论文。加拿大皇后大学南部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Jonathan Crush 教授，他被提名为《移民和企业家精神特刊》（Special Issue on Migration & Entrepreneurship）的客座编辑。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 AHMR 在实现它的目标方面有所成功，一些挑战仍然存在，例如来自非英语地区和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较小的学术社群的研究者代表较少。

小结：

AHMR 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移民领域不多的受同行审议并在该领域内被普遍使用的学术期刊之一。它涵盖了众多的大陆层面的人口流动领域的问题和主题。AHMR 的文章在南非最高法庭和法院以及争议委员会的决定中被引用。AHMR 也会出版学生写的关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移民政策的最新发展的作品和文章。AHMR 在西开普大学社会发展学院（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通过在研究生级课程上（即是迁徙和发展（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邀请演讲者来引导讨论和辩论。AHMR 最近的研讨会主题包括：南非的迁徙和仇外；迁徙和回归以及移民对南非发展的影响。至今为止，AHMR 承办了数个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结果。AHMR 继续出版高质量的研究产出，它们将持续推进、鼓励和协助对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流动的各个方面的研究。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45]

总编辑：Graziano Battistella 和 Maruja M.B. Asis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APMJ）在 2016 年庆祝了它的 25 周年。当它在 1992 年创刊后，该地区的大规模临时劳务移民现象已发展了超过 10 年而且没有任何要慢下来迹象。在 1992 年，致力于移民的学术期刊非常少，APMJ 大概是唯一专门关注在亚太地区移民相关现象的期刊。本期刊的成立是为了传播关于在这个地区内、去往和来自这个地区的移民的研究，并鼓励有关移民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以促进对该地区的现实和远景的了解。在对过去 25 年 APMJ 出版的文章的回顾中，Jerrold Huguet 把该期刊的作用评论为在地区的移民领域（大多数为国际移民，但也包括一些文章关于境内移民，特别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编年记录者。虽然 APMJ 旨在涵盖整个（亚太）地区，被出版的学术成果还是没有充分囊括不同的亚区。早先 Asis, Piper 和 Raghuram(2010) 以及 Asis 和 Piper(2008) 的回顾谈论了被出版的文章存在着涵盖地区上的不均匀 – 大多数是关于东亚和东南亚，对南亚和西亚不多，对中亚几乎没有 – 这个情况在 Huguet(2016) 的回顾中没有变化。在学科方面，有投稿者学科多样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中现在加入了来自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以及少数来自社会工作学的投稿者。这一转变伴随着基于定性研究的文章的增加。

我从 1997 年加入 APMJ（开始作为助理编辑，随后作为合作主编）。我认为 APMJ 所出版的文章一般描述亚太地区的移民情境并反映当前的研究状态、政策讨论和倡议问题。不光考虑到出版了的文章还包括 APMJ 收到的大量投稿，那些没有达到能接受外部评论的等级的文章与现有的文献相分离，因而在理论框架和分析方面有所欠缺。我们从其它亚区收到了大量关于移民的投稿，但不

45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journals.sagepub.com/home/amj。

幸的是，它们往往只是运用一些统计手法然后墨守于“推拉式（push and pull）”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向关于韩国和中国投稿的转向大大增加了东亚文章在 APMJ 中的分量，反映了对这些国家主要感兴趣的问题。在韩国的多文化主义和婚姻移民的文章受到了最多关注，这也表明在韩国关于这些问题短期集中的研究（和资金支持）。关于中国的大多数文章涉及境内移民，虽然在过去几年回归移民和学生移民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如在下文进一步指出的那样。）

2015 和 2016 年出版的文章包括许多关于韩国和中国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最近两年强调了移民、来源地和目的地类型的多样性。例如，关于学生移民的文章经常与中国和印度学生相关，因为他们是前二大国际学生移民团体。关于在美国的无人陪伴的青少年韩国学生（这背离了早先观察到的“宇航员式”移民家庭，母亲陪伴孩子（移民）而丈夫留在国内），中国留学生归潮，以及对日本学生移民的一些关注扩大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菲律宾教师，新加坡的中国迁入移民企业家以及伊朗的阿富汗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生育差异等话题的文章，是一些揭示有关区域内移民的、相对不为人知的一些方面的文章，而关于越南人在波兰的文章提供了关于旧移民情况的更新和新的波兰越南人移民的特点。受国际移民影响的儿童是几篇文章的主题。在韩国收养多文化儿童（现象）是个令人欣喜的发展，把视角扩大到婚姻移民（大多数为妇女）以外。一个专用于探索第三文化孩子的概念的特别部分把注意力集中到和他们的家庭一起移民到亚洲的孩子们。这在对孩子的研究大多是关于那些“留守儿童”的地区是个相对新的话题。总的来说，2015 和 2016 年出版的文章结合了旧的或持续性的问题和新的或至今未获足够研究的问题。

APMJ 面临的缺口和挑战

虽然 APMJ 旨在向广大的受众传播基于研究的信息，但是作为一份学术期刊，它的首要受众主要是学术社群。同时，APMJ 传播的知识产品主要也是依靠学术社群的学术成果。期刊依靠研究者的投稿，而他们的作品受到同行审议者自愿做出的评审过程的检验。评估过程是培养作者和审议者之间对话的重要机制。但是，因为这是个双盲的过程，两方的交流和对话不能像面对面讨论那样进行辩论和讨论。尽管如此，评估者提供的反馈还是能改进这些基于证据生产关于移民的知识的论文。

在学术社群以外很难测量 APMJ 对决策的影响。各种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举个例子，基于研究的知识生产是时间和流程密集型生产，这可能与有时节奏很快而且富有争论的决策环境不相匹配。决策者往往对他们的上级、选民和大众（还有媒体）的意见和观点敏感，和公众意见的意志相反的研究发现可能难以为决策提供信息并对之产生影响。数据收集和分析所必须的时间可能赶不上事件的发展。例如，在 2015 年上半年，几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罗兴亚难民危机。罗兴亚人乘摇晃的船在海上漂泊，没有国家愿意欢迎他们，他们的困境给东盟国家带来了挑战。媒体报道提供了对这场危机的发展以及随后组织会议讨论临时解决方案的实时评论。而在 2015 和 2016 年没有涉及罗兴亚问题的学术成果。

APMJ 在 2015 和 2016 年错过的不光是“当前的”发展。长期以来，未经授权的移民行为在该地区问题非常重大，却没有从研究者得到很多关注。这个问题和人口贩卖混为一谈，而后者反而获得大量研究、政策和鼓吹。（有趣的是，2015 年罗兴亚危机也在一些报道中被塑造为非常规移民。）这是受资助驱使的研究如何支配研究议程和出版物的一个例子。

研究发现不会自动转化为会被决策者考虑的政策建议，这也超出了像 APMJ 这样的期刊工作范畴。这需要其它方面的干预，例如简洁的政策简报的产出，进行政策对话，或和媒体合作来产出更易获取并更及时的报告。更至关重要的是，本地区的政府机关需要形成重视数据及其对决策的价值的文化（投资于移民研究和数据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是一些例外）。

知识的产出和对各种知识产品的获取受到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社交媒体发展的影响。关于移民的网上期刊和开放获取期刊在数量上增加。在回顾 1992 年来 APMJ 的经历时，创始编辑 Graziano Battistella(2016) 了解了这些发展如何影响了像 APMJ 这样的期刊的作品和运作。直至 2014 年，APMJ 由 SMC 生产。但是技术发展以及主要的出版公司采用的策略，使得独立的出版者在一个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难以发展兴旺。销售和传播方面尤其有挑战性。在 2015 年，APMJ 接受 SAGE Publications 的提议并与其合作，SAGE 负责生产和期刊营销方面，SMC 仍然主要负责内容。尽管制作一份学术期刊存在许多挑战，同行审议过程所提供的详细审查依然是 APMJ 这种期刊的长处。在今后几年，在学术社区的持续支持和参与下，APMJ 不光希望能记录亚太地区的迁徙现象，也希望对该地区的学术、决策和政策宣传作较大贡献。

*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46]

总编辑：Howard Duncan

国际移民期刊由国际移民组织（IOM）所有，出版实证研究来推进学术研究并支持世界的移民政策社群。这项使命很有挑战性，因为决策者经常立即就需要证据而学术研究需要时间，而同行审议加长了这个时间，这就意味着一些研究的发表滞后于政策需要。但是除去危机事件，人口迁徙是更长期趋势的一个现象，而长期趋势的规律经常是只能随着时间推移才变得清晰。比起许多被要求更快交出分析和建议的决策者们，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趋势。决策经常似乎是要解决紧急的问题，但其实它有其固有的保守性。被研究所识别的新趋势可能经过很久才会在政策里被认同，这使得实证研究被认真完成并接受同行审查变得更加重要。本期刊旨在为学者和决策者提供新的见解并支撑为所有人提高人口迁徙的结果的集体努力。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移民就广泛的主题进行出版，开垦处女地并继续探索已被涉足过的路径。在这个短章节中，我们将描述 2015 和 2016 年在我们选定的那些主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即是从 IOM 的《世界移民报告 2015》出版以来。对于那些希望得到更多细节的人，我们建议去往期刊的网页。我们将涵盖的大主题为：移民模式，移民和发展，移民管理，以及数据和方法论。

移民模式

作为一份移民期刊，国际移民收到了许多分析移民模式的文章，这些文章超越了在国家和其它统计机构的网站上发布的统计汇编。过去的几年中，对导致人们选择移民的决策过程和意图的兴趣在增大；这和对传统移民理论对宏观的“推”和“拉”的因素的大量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

46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8-2435。

是传统理论一个补充，而不是代替。Mendoza（2015）通过比较有和没有迁出移民的家庭为墨西哥城的移民迁出模式提供了见解；她的逻辑回归模型揭示了在推动人群离境的原因中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在观察当今的科索沃，一个遭受着居民大量迁离的弱小国家，Ivlevs 和 King 注意到有较高教育水平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人对国家的前途和它的经济缺乏信心。对迁出的渴望回归到了自从独立之前夕就再未见过的水平，这个趋势本身就能刺激更大的离开这个挣扎中的国家的需求。Cohen, Duberley 和 Ravishankar 把观察到印度科学家如何使用国际流动作为职业增强剂，这个策略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有价值的国际经历，同时保留和印度的文化联系以及他们以更高的地位回到印度的能力。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已故的 Graeme Hugo 使我们注意到的多次移民现象的注意。Weeks and Weeks 检查了在当今从拉丁美洲迁到美国的迁出移民中跨国主义的作用，这个作用超出了支持汇款的高薪工作的吸引，涉及了他们祖国的政府在他们在国外期间保护他们的权利，并鼓励他们回归祖国中起到的日益增强的支持作用。在居留在拉丁美洲期间，Silva 和 Massey 详述了暴力在刺激人们离开哥伦比亚中的作用。虽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直接，暴力往往主要会导致那些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在国外有更强的社会网络的人的迁出。虽然暴力可能是导致离开的原因，却是社会资本网络决定了目的地。

Bylander 把我们带到柬埔寨来探究实际的和预见中的环境压力是如何刺激（人们做出）迁出的决定的。Gerver 以道德哲学的视角解释自愿归国的行为，提供了在促进回归以恢复权利和保证回归事实上是自愿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仔细的规范分析。立陶宛是第一个在 1990 年宣布独立的苏联国家，在审视来自立陶宛的大量迁出移民中，Klusener 等人使用人口普查和登记数据来记录诸如就业状况、教育、从前的移民经历等影响到迁出决定的特点。我们经常说的“新流动性”不光被高技能的经济移民者从一个实验室或公司总部移动到另一个所展示，也被一些寻求庇护者所展示，他们作为拥有完整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寻求可能不光是安全。Lukić 把我们带到塞尔维亚来观察当今庇护移民中转的运作。同样在审视有关寻求庇护者的目的地决定的还有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他们询问了 35000 个潜在的寻求庇护者，是否以及为什么他们偏爱一些目的国，而且发现澳大利亚被普遍偏爱。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猜测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一个人的流动性，Rodriguez-Gutierrez 和 Canal-Dominguez 让我们看到外语能力是如何影响人们移民的意愿以及他们对目的地的选择的。Ozcurumez 和 Aker 也审视了迁移的动机，他们把土耳其人向德国迁移的动机和向加拿大迁移的动机比较。他们发现（移民选择目的地的动机）不光是钱。

另一个关注度正在提升的方面是回归移民。传统的假定认为移民主要是单向的并且是永久的或非常长期的。这个假定导致一直存在的回归移民现象在之前成了一个被忽略的话题。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在它们的影响中，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产生了“新流动性”，这使得移民即使只在目的地居留较短时间后回家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对于很多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的移民，它们的移民意向是更短的居留，而不是永久居留。对某些人来说，在国外工作的时间往往比在国内能赚取更多的财富。那些回到祖国的工人，或许比起他们离开时有更高的技能，能够顺利的过渡到劳务市场。Barcevičius (2016) 探究回归的高技能立陶宛人在家如何过活以及他们是否向想久留。

移民和发展的关系

随着国际社会聚焦于移民和发展的关系以及它对反移民政治日益增长的关注，展示人口迁徙的好处已成为主流话题。如 Vecchio 所展示，甚至难民和逃离危险的寻求庇护者也属于这一类，他审视了香港的寻求庇护者是如何利用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的。即使作为一个无证的移民而在那里生活，都会享受全球联通的优势，这个优势支持了跨境的经济活动，使得寻求庇护者为香港的本已充满活力的经济做出净贡献。

在过去的十年，由于要求减少跨境汇款成本的呼声，以及各种提高其好处的建议，跨境汇款的优势已被大大地开发了。但是 Jawaid 和 Raza 提出了一些谨慎的警告，指出虽然（接收）跨境汇款总的来说对本国经济有很高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增加自愿的失业并减少经济增长。Busetta, Cetorelli 和 Stranges 审视了去往意大利的移民的汇款行为，发现该行为不随时间变化的程度令人吃惊。欧盟长期为了发展的目的支持对人口迁徙的管理。但是 Keijzer, Heraud 和 Frankenhaeuser 发现单个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不总是反映欧盟在移民和发展的关系上的立场，并且一些成员国仍然把移民主要看成是一个国内问题来单边管理。Resende-Santos 探究了一个小的、低收入的岛屿社会的前景并证明了移民的重要性以及“佛得角离散”对其经济的重要性。Akcay 和 Demirtas 在审视汇款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中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案例研究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汇款是如何被使用的。

移民管理

随着国际社会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全球移民讨论，尤其是随着建立关于移民的全球契约和难民的全球契约的进程的启动，对移民的管理成了舞台的中心，并开始引起学术研究者的关注。从这些讨论直接浮现出了一个事实，即治理已变成多部门的事，而且不光是各级政府在参与，许多其它的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其它雇主、教育部门、以至于偷渡和人口贩卖行业也在参与。在 2015 年，我们把两个特别章节专用于描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个明确地着手于民主治理，另一个则关于各国有或没有获得合法授权并从国家获得服务和权利的人的利益。Rother 收集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一些当代的人口迁徙显示出的挑战来检验民主的概念。这些挑战包括公民身份概念的扩大，一些阿拉伯国家的 2011 年起义带来的民主化的特殊性，对于世界上一些移民的居住和工作的危险本质逐渐增长的认识，以及对东盟国家移民管理的仔细审视。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发现民间团体在和这些作用如何是一个进一步民主化的力量的说辞的争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Bearup 检查了柬埔寨被贩卖人口重新融入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提供了并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发现。

第二个文集由 Castaneda 和 Yarris 编辑，它审视了国家当局对不同移民团体的正当性的评估。随着对移民的讨论在很多国家变得冷酷，在那些有和没有被授权居住、工作、上学、接受健康和社会服务的人之间的区别也变得冷酷，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些有合法授权的人中也存在按照它们是经济移民者还是难民而做划分的差别。这些文章考察到在德国的吉普赛人、加利福尼亚州的克伦难民、以色列未经授权的移民，以及在美国的散工。我们看到了对民主的行使和原则的挑战，以及民间团体对那些脆弱的移民的权益（的维护）所起的作用。

对于很多国家当局来说，最终但经常难以达成的目标就是井井有条的移民，即每年到达的人数、

人力资本的特征与本国的劳务市场的需要以及社会接纳他们的能力相匹配。Emilsson 审视了瑞典 2008 年劳务移民政策改变的效果，在这个改变中放弃大部分的国家管控，引入了雇主主导的选择机制。英国关注净移民目标减少已有数年，Cangiano 解释了在管理移民到那些种类的目标中出人意料的难度。 Hofmann，Carboni, Mitchneck 和 Kuznetsov 探究经济和社会政治目标如何在俄国尝试管理来自一些前苏联国家的人口流入中竞争主导地位，而俄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移民人数。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它们管理高技能移民永久居留筛选的积分系统多年而受到关注。Picot, Hou 和 Qiu 审视了被它偏爱高人力资本的积分系统选择来到加拿大的人最近收入表现。虽然他们发现以这个方式被选择的人比其他人挣的更多，他们也发现移民和管理这个政策的人都需要大量的耐心。澳大利亚一直是加拿大在（移民）选择系统竞争中的主要竞争者，两个国家都在持续不断地改进它们的系统以获得更大的优势。Islam 和 Parasnis 的研究结果发现对移民的人力资本特征回报最高的是澳大利亚的劳务市场。根据 Thangasamy 的说法，美国的唯中央政府有权制定移民入境政策模式，缺少各州直接的投入，并没能很好地服务于各州的利益。这种模式在满足美国各州的劳动力和人口需求方面效率低下。他的文章考量了美国单一中央政府制定移民入境政策的问题，并为美国采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替代模式进行了探究。

如果所有人口迁徙常态化、世界各地人才可以流通，那么世界就变得简单多了。但是情况远非如此。管理寻求庇护行为的复杂性已经上升到了议程的首位。一种试图管理寻求庇护行为的方式是通过与原籍国就自愿返回或被迫遣返达成协议。Janmyr 研究挪威与伊拉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协议的有效性，发现效果差强人意。与庇护政策一样，提供庇护的经济也是错综复杂。Surijakumaran 和 Tamura 为我们提供了提供庇护的计量经济学解释。Lukić 把我们带到塞尔维亚来显示当今过境庇护移民中转的运作。

管理移民不仅仅是管理入境事宜，管理出境也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考虑到前往无法保证其权益的国家担任家政工的妇女人数之多，以及考虑到留守儿童福祉，斯里兰卡采取各项措施限制了这类移民迁出。虽然迁出移民人数有所下降，但 Weeraratne 描述了有多少人选择通过使用非常规的移民手段来避开这些新规定，以致于使他们自身在目的地国变得更加脆弱。

不仅涉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参与。当 Šalamon 看到西巴尔干国家甚至无法实现欧盟对其在识别和登记寻求庇护者以及执行难民地位认定等基本事务方面的期望时，他把目标放在了超国家治理。此外，在超国家治理方面，Gülzau，Mau 和 Zaun 比较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地区成员过的签证政策，不出所料地发现了不小的分歧。Recchi 研究了他称之为欧盟的“公民身份差距”，并比较，或者说对比了移民和国民的生活机会，发现不管融合政策如何差距依然存在。

## 数据和方法论

人们期望学术期刊的方法论不断进步，《国际移民》也不例外。Caselli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意大利智库如何处理定义和衡量移民融合的难题。 2015 年 8 月，我们提供了五篇关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文章，去解决“糟糕的移民数据现状”，并通过数据收集、估算、分析和实际应用方面的创新引领更好的事态发展。

Gold 等人借鉴估算野生动物数量的方式，在确定难民人口方面提供了一项重大创新。用捕捉 - 再捕捉法估计人口适用于处于较小地域处的难民，他们还说明了地方政府可以如何使用这种方法为难民分配资源。Makaryan 提出过估算移民人口的许多替代方法，但她也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前苏联 15 个加盟国这样做会带来的特殊问题。她提到了所使用的“移民”定义各不相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含糊不清的数据。人口普查未能计算临时移民，以及以居民调查衡量移民情况的临时性价值。Moses 通过发布《EMIG 1.2：全球时间序列的年度移民流》（EMIG1.2: A global time series of annual emigration flows）来回应移民数据的（糟糕）状态，这是一个处于开发初期的开源数据库，但它已经为加强我们对移民情况的了解提供了（有）潜力（的平台），全球移民社区都应该参与进一步的数据库开发。迄今为止的数据分析证实，现在不仅迁徙率低于二十世纪初，而且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这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意外。Bailey 和 Lau 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香港。香港回归中国后迁徙现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了工人、学生和定居者之间高度活跃的双向流动。他们提出了一种分类并测算移民流量的新方法，以及统筹规划数据收集和制定政策的新体制机制。由于土耳其在难民危机爆发后收到了更多的关注，Tolay 带领我们领略一个关注土耳其移民的新学术领域的发展，注意其学术优势和相对弱点，并指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该采取的方向。

在我们这里涵盖的两年中，《国际移民》发表了许多其他话题，包括移民融合，例如 Fokkema and de Haas 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文化融合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成果，包括移民的政治参与、企业家精神在融合中的角色、城市正在发挥的作用，一些学者提出的迁徙证券化、跨国主义、学生移民等。《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这一简短部分只希望指出我们发表的一些领域。但这不能替代阅读文章本身。

### *《民族与移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47]

主编：Paul Statham

大多数学者和实践者都将《民族和移民研究杂志》简称为“JEMS”。JEMS 在 2017 年进入她出版的第 43 个年头，在国际上成立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排名最高的学术期刊之一。就像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一样，随着移民问题已经从相对边缘化的问题转移到政治和全球社会变革的核心，本刊已经（特别是在过去的 20 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极大地扩张了。这并不是说现在移民和民族关系比以往更重要，而是由此引起的关于迁移、流动性以及日益增加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等问题，现在被视为对国家、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如何共同生活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主题，移民已经成为社会和人们所经历的理解由全球化带来的核心变化的重要解释性透镜。这可以是“向好的”，例如动员公众来支持难民和在国际冲突中流离失所的人，或“向坏的”，反动的民粹主义政治企图通过以宗教、民族或种族理由来诬蔑一些“团体”，如“穆斯林禁令”和“建隔离墙”，以证明反移民政策的合理性。这里（本文）不是探讨这些重要主题的地方，但本刊正是学术界做此事的一个论坛。作为主编，我认为本刊是学术界和那些在学术界有立足之地的实践者的园地，他们可以将关于世界移民的关键问题的独创研究成果提交给同行看，并通过激励细察、回应和辩论来推进知识。尽管本刊主要是发布原创学术研究和调查的论坛，但我们努力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宣传我们的文章及其核心观点，包括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通过这种方式，关于当今移民的尖端研究有机会被搜索到、引起共鸣，

47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www.tandfonline.com/toc/cjms20/current。

并为其他公共政策论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辩论提供信息。

2017 年，JEMS 出版 16 期大约 160 篇每篇 9000 个单词的在移民和民族关系领域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文章。每篇文章发表都经历了双盲同行审议，意味着评论者不知道谁是作者，反之亦然。我们的接受率保持在约 20%不变。作为一个与出版商 Taylor and Francis 的同事一起工作的学术编辑团队，这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我们所管理的学术生产和审议（全部由学者自愿承担）的工业规模的概念。这还让我们了解到为响应当今世界上的移民问题的高社会相关性而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我们发表这么多（文章）的原因是让学术研究进入到公共领域，以便使其获得为公众理解提供信息的机会。原创学术研究的发现能给说客和政治家的主张提供合理性，有助于揭穿‘错误’的说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将其公之于众并留下记录。本刊认为，为学术界服务的最佳途径是使研究成果可见。我们的审查标准是全面的，而且与许多期刊相比，我们出版的门槛也相对较高，但我们的目标是“快速”，以便发表的成果能够涉及当前的争论。被我们接受的文章会在一个月内在线发布，通常在半年内出印刷版。因此，我们的巨额数量是“高质量移民学术研究快速进入公共领域”政策的结果，以便这些成果有机会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考虑到目前世界的状况，至少在我们收到的投稿量猛增的情况下判断，没有迹象表明对于移民的学术好奇心会减少。在过去的三年中，投稿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我们与出版商达成的协议是，高于门槛的研究报告，我们每年能发多少发多少。稿件积压对谁也没好处。

以其专题、地域和学科覆盖面进行评估，本刊可能是领域中涉及面最广泛的国际学术期刊。我们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多元主义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研究、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等方面进行研究。简而言之，我们的主要标准是“高质量”，通过同行审议来判断，我们的编辑团队扮演着“看门人”的角色。我们的目标是发表关于移民和民族关系的高质量研究，它们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现。我们乐于将小而重要的话题的研究纳入其中，例如世界偏远地区农村移民的民族志研究，以及有争议的却高度共鸣的文章，例如关于欧洲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文章——这篇以实证为基础的六国比较分析在 2015 年发表，两年来的下载量已超过 13000 次。我们很高兴接受基于大型数据集的系统性分析和小样本定性研究，以及结合多种方法方式的研究。最后，我们接受促进理论认识积累，同时也接受针对特定政策领域的研究成果。

虽然 5 年之前我想可以这样说，本刊是主要聚焦于“欧洲的”，近年来我们齐心协力，更直接地和北美的学者们（那些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鼓励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学者把《民族和移民研究》看作供他们辩论的论坛。这又一次反映了世界中那些正由人口迁徙驱动的重大变化。如果过去 10 年中国有 2.4 亿境内移民，这是不是移民学术圈显然应该涉足的课题？我们希望大陆间更多的交流可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我们这些学者带出我们的象牙塔和舒适区，去挑战一些深入我们骨髓的公认的“真相”。许多对人口迁徙和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战后时代从“南”向“北”移民的经历中提炼出来，并被来自于移民接收国的学者写下来。在全球化时代，迁徙既是驱动力也是结果，重要的是加入世界不同地区互相连接的进程，同时也要承认“一种尺码的鞋不会适合所有的脚”，承认有些渴望能“普世”应用的观点，可能实际上受环境和时间的约束。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和（“超级”）多样性的讨论，是否应该从加拿大或欧洲国家产生的知识中得到启发？或者它们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是这样，如何不同？为什么不同？

本刊发表独立的原创研究文章，然后每年发布若干由客座学者编辑的特刊，这些学者汇集了许

多同事，针对特定的关键移民主题或话题编辑出相对集成的文集。客座编辑管理第一轮审核，我们编辑团队在外部审核的帮助下审核文集。特刊提案是从每年两次的竞争性征稿的回复中选出的。从2015 年起已经发表的和正在编辑的论文，反映了杂志涉及的主题和学科的广泛范围。这些学术成果在以下方面讨论移民、流动性和文化多样性问题：亚太城市的转型、全球经济危机和衰退、超级多样性城市是移民者动员的地方、欧盟和欧洲移民治理、海湾作为移民者的“主体性”、自由民主国家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比较研究、作为移民变老、全球南北之间高技能移民、国际移民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国际学术流动性；、对“移民产业”的新视点、移徙愿望、无证和无人陪伴的儿童、离散政策和动员、亚洲的教育文化、可持续发展和性别、解释对移民的态度、湾区的高技术移民、护理和医疗移民、欧洲和泰国之间的跨国移民、移民“经纪”、战略性公民身份、全球走私、阿富汗的循环迁徙和回归移民。

本刊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我们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一天的会议，邀请来自各学科的一位大咖和其他领军人物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会议免费开放，由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移民研究中心（Sussex Centre for Migration, SCMR）举办。作为本刊的航母，是编辑团队核心学术成员（Paul Statham（我），James Hampshire，Laura Morosanu 和 Sarah Scuzzarello）的常驻地点。年会的作用是提醒人们，学术参与不仅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子的方式进行的，有时也需要一个人们可以见面并进行批判性交流的物理空间。超过 200 人参加了最近的两次年会，包括学生和实践者，我们过去几年的大咖有 Rogers Brubaker, Richard Alba, Bloemraad and Roger Waldinger。

有关年度会议的更多信息，详见 www.sussex.ac.uk/migration/seminars/conferences 和 Facebook 上的 JEMS 主页在 www.facebook.com/scmrjems 和推特 @scmrjems 以及期刊网站 www.tandfonline.com / loi / cjms20。

*《难民研究杂志》*[48]

主编：Khalid Koser

今年是《难民研究杂志》创刊 30 周年纪念日。其核心关注点从未如此重要。今天的难民人数比自办刊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统计，截至 2016 年底，难民人数达到 2130 万，其中包括 520 万巴勒斯坦人。尽管过去几年世界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流入欧洲的难民上，尤其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事实上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53%的难民来自三个国家，叙利亚（490 万），阿富汗（270 万）和索马里（110 万），世界约 85%的难民定居在较贫穷的国家。连大多数叙利亚难民不在欧洲，而在邻国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

难民在遭遇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旷日持久的流离失所中，现实无法预见永久性解决方案，并且更多的人搬迁到城市环境中，这使保护和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困难。难民始终遭受歧视，现在随着对难民的限制越来越多，其实比以往更加系统化：一些领导人开始暗示难民流动与暴力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风险有明确关系；对难民的仇外攻击增多。积极的方面，“2016 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有可能为国际难民制

48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s://academic.oup.com/jrs。

度和应对方面的重大改革铺平道路。《难民研究》期刊正在快速发展，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学科投稿，投稿质量屡创纪录，过去两年（2015 和 2016）中它的影响因子翻了一倍。但是，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不仅在于难民在全球政治、媒体和流行话语中的新相关性，还由于《杂志》已开始区别于近年来对难民的高度关注，而包括更广泛的“强迫性移民”。

越来越多的投稿和发表的文章没有专注于或明确地关注难民（与移民者相反，1951 年“关于难民状态的联合国公约”对“难民”有明确的法律定义，规定了个人经历或被国家迫害的风险和离开本国）。例如，过去几年以欧洲为主的学者提交的材料越来越多地关注寻求庇护者，就是那些自称为难民但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不符合难民的相当严格的标准的人。其中一些寻求庇护者，不被认为是难民，但他们返回家园可能仍然不安全，所以会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充性保护”。其他人被直接拒绝，并可能被驱逐出境。总的来说，这些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但假装是在逃离迫害以作为进入工业化国家的手段。

相比之下，许多美国学者提交了讨论永久性定居到美国的难民的文章——直到最近，希望临时禁止难民重新安置，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重新安置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多的难民人数。然而，可以说安置的难民相比其他难民来说，与公民有更多共同点：虽然他们可能肯定会因为他们的经历而忍受终身创伤，但大多数人都有办法得到富国的公民权，并享有公民的全部权利；许多人活得非常成功。对定居难民的研究，对于关注公民身份或企业家精神的期刊可能与关注难民的期刊同样重要。

类似的，关于曾经是难民的人们返回家园后的经历的文章不仅是有关难民的。在其他方面，《难民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所包括的人也不能定义为难民；例如，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即那些被迫离开家园但不住在国外的人，受到大量关注；以及由于环境变化而不是冲突或迫害逃离国家的人。

尽管在《难民研究杂志》上有关于“使命蔓延”的风险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关于有关IDPs的话题上，但当今大多数学者会认为，寻求庇护者、IDPs 以及被重新安置和回迁的难民属于“难民研究”范围，并且在本刊讨论比在有关移民期刊更适合。与此同时，对一些人口和经历。例如，大多数关于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文章都是被提交和出版到了移民期刊（以及其他各学科期刊），但许多人被迫离开了家园，像难民一样不自愿地迁移，可能也对援助和保护有类似于难民的需求。而且，至少有一些难民（和 IDPs）也可能成为人口贩卖活动的受害者。

《难民研究杂志》囊括的人口多样化特别反映了三个新的现实。首先，人们今天逃离家园和国家的原因并不总是像 1951 年“公约”起草时那样。许多人是逃离危险不是因为直接的个人威胁；许多人逃离非国家行为体（如 Da’esh）的迫害；许多人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但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其次，经济原因（移民）和政治原因（难民）之间的差异不再容易区分或者具备相关性，虽然国际法律、规范和体制框架仍然以此为基础。大多数人出于混合动机而迁移：难民逃离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政治性的，例如冲突或迫害，但是其直接原因可能是经济性的，例如失业，也可能是社会性的，例如无法获取教育或医疗保健。

第三，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的人而经常一起“混合移民”的现象越来越多：为寻求庇护而进入欧洲的人经常与逃离迫害的人混在一起（难民），为应对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迁移的人（他们可能会得到‘附加保护’），以及利用庇护制度的经济类移民。

这些实际情况对移民期刊的影响不亚于难民期刊。这些期刊的编辑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其核心关注点和受众，同时也要适应不断环境的变化，并尽可能避免重复或相互竞争。IOM 的《世界移民报告》纳入来自各种期刊的简短学术成果的这项新举措，为同行讨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论坛，并推进了我们促进关键的学术成就的联合进程，以及有关移民和难民的有根据的政策和实践。

*流动性（Mobilities）*[49]

主编：Kevin Hannam，Mimi Sheller 和 David Tyfield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流动性》杂志上，流动性的概念已经被发展起来以建立理论和分析流动的不同形式和实践之间的不同联系。流动性的一个组成要素当然是移民。《流动性》期刊与主流的移民期刊不同之处在于，其旨在建立一个研究平台，以承载有关研究全球人员、物品、资本和信息的大规模流动，以及本地日常交通流程、穿越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物流的研究。例如，它强调了新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文化实践方面的创新是如何为协调和管理流动性以及流动权和准入问题带来重大挑战。因此，它促进了对流动实践及其对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并开发了具象征性的、代表性的并且/或者基础性的多种流动形式的新理论（后者参见 Burrell，2016）。

在此简短的回顾中，我们希望重点介绍《流动性》期刊过去两年中发表的涉及移民实践的移动性研究的关键发展。首先，我们注意到，发表在该杂志上的一些与重构迁徙概念有关的并例证了推进移民研究所需的各种方法的特殊问题其次，我们将重点放在最近对与不同形式的、物理上或者形容上地的跨越边界的移动迁移有关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展望未来，并简要地概括反思当前的地缘政治性的重新划界进程，这可能导致不平等和不稳定性的增加。

移动性和移民实践的理论化

在《流动性》杂志的特刊中，Paul Basu 和 Simon Coleman（2008）强调了移民与物质性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尽管在移民和物质文化方面都有很多学术研究，但很少有明确关注这些研究领域如何相互衔接的文献”（313 页）。他们把迁徙行为的重构重新定义为在人类学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重要关注领域（礼物、临时性、翻译），而不是那些领域最常与移民研究有关的领域。另外，Nicola Mai 和 Russell King（2009，295 页）为定义多重流动性，着眼于爱情、性别和移徙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试图用比喻和实证的方式描绘出一些关键话题。这些话题被“各种各样的感情上的情感上的和与性有关的关系、附庸和期望，这些可以成为导致流动和为跨越边界而承担风险的强大而必要的动力。”所揭示。他们认为在流动性研究中进行“性转向”和“情感转向”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移民实践中的细微差别。同样，Nick Gill 和 Javier Caletrio（2011，第 301 页）在《流动性和被迫移民》（Mobilities and Forced Migration）问题特刊时引言中指出，“无论是否受政治或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关注一系列身体、物质上的、想象中和虚拟的流动性和不流动性相互作用来产生人口移动的方式，以对人类的流离失所有更充分的理解。”

49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www.tandfonline.com/toc/rmob20/current。

## 穿越边界

在最近整理的《流动性》2016 年出版的题为“穿越边界”的特刊中，我们汇集了从流动角度批判性分析移民实践的若干论文。Paolo Boccagni，Jean-Michel Lafleur 和 Peggy Levitt（2016）“提出通过跨国视角观察一些流程，例如流通、可移动性和接触，有助于使近期对政治跨国主义的研究变得微妙。”因此，他们认为：

作为政治转向的边界，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来概念化，研究和评估跨国界、交叉和挑战国界的政治进程。不仅仅是导致个人、社区和国家将其自身定义为跨国性构成的主体迁移。人的流通与政治思想、实践和项目的流通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解释运动中的政治的战略：政治参与和制度如何变化，并且不仅伴随着政治事物的流通，而且还是思想、价值观、技能和项目的流通。我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来概念化这种流通形成的空间和地点，以及如何评估它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安排的影响。（Boccagni，Lafleur 和 Levitt，2016，第 445 页）。

在这种对流动性的深度分析的例子中，Philipp Schröder 和 Manja Stephan-Emmrich（2016，第 420 页）展示了“探索中亚人如何参与“做生意”、“发展”他们的穆斯林虔诚、越过城乡界限，并在俄罗斯、中国或埃及的城市和“家乡”之间体验种族边缘化的深入的案例研究。他们强调移民实践，比如移民，可以在各种背景下“被制度化”为整个中亚的一种习得行为。

与此同时，Marcu（2016 年）对欧盟流动性的研究，侧重于东欧移民作为相对新的欧洲公民如何通过与边界接触来了解流动性实践。她分析了在西班牙参与了劳动力流动的东欧人的经历，以了解欧盟的扩大是如何影响这些公民的流动性以及他们是如何解释跨境的做法的。重要的是，她分析了边界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学习流动的工具，或者是当前人类流动的障碍”（第 344 页）。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她认为，“以前与现在所居住国之间的边界并不处于他们的生活周围，但已经转移到了他们的生活世界的中心”（第 354 页）。

Szewczyk（2016）进一步指出，一些有志向的波兰移民寻求各种不同的策略，包括获得英国公民身份和英国护照以提高他们的流动能力力和移民去欧洲以外的潜力。她强调了“走 - 停 - 走”流动性的可能性，她认为，这是获得（全球）公民身份的一种阶梯式办法，“这是欧洲年轻毕业生中的新精英群体的一个关键特征，他们使用欧洲国籍去获得替代的公民身份，获得了离开欧洲的流动性作为实际上和概念上的护照。”（第 362 页）。

## 结论

虽然前面的例子表明流动性和迁徙可以通过“去边界”的过程被学习和制度化，但边界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当代话题，这对于传统上通过 “边界重定”分析移民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就欧洲接收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的政治辩论；支持英国脱欧的公投；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造一堵墙的建议等，都证明了重塑边境的新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进程。边界的存在已被认为“不光是经验性的现象，它的使用、开放或是关闭，取决于谁跨越边界以及他们在政治辩论中变得多有争议”。（Scuzzarello 和 Kinnvall，2013 年，第 93 页）。

2015 年 9 月以来，难民和 / 或移民的流动已进入西欧和东欧之间地缘政治的中心地位，中欧被重新设想为远离生活艰苦的叙利亚、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人寻求新生活的中转站。对外来人口的接待已经两极分化，有欢迎这些新来者的，也有期望政府加强边界执法并防止所谓的欧盟庇护制度滥用。与此同时，随着高龄英国移民出国在欧盟居住，重新定边界的过程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和重要的问题，因为许多人依赖互惠的保健协议。

（除苏格兰之外的）英国支持英国脱欧的公民投票被认为是英国公民担心移民过多的一个反映，特别是错误类型的移民。这种情绪大部分是由媒体煽起的，强调了潜在的移民对英国纳税人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Vollmer，2017）。护照从字面上来说意味着不受阻碍地跨越国界移动的能力，但随着英国脱欧的这种移动能力将导致新的真实和感知的旅行阻力，边境过境减慢，人员和物品的移动受到管制、监督和检索（Adey，2002）。最后，还有待观察的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隔离墙将如何引发与这一边界相接触的新做法。

*《人口，空间和地点》*[50]

主编：Allan M. Findlay，Clara H. Mulder 和 Darren P. Smith

迁徙和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改变的人口地理特征

从发表文章的总数方面来看，人口迁徙是《人口，空间和地点》的主要兴趣点。文章涵盖国际移民和境内人口流动。一些研究者质疑把这两个说法区分开来的正确性，因为当代人口流动十分复杂，并且许多造成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现象发生的动因是一致的。（Hickey&Yeoh，2016; 另见 Hugo，2016）本刊最近的研究论文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非常时期中的问题，例如难民潮（Van Houte 等，2015），人口迁徙和气候变化（de Campos，2016），人口迁徙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反应（Vargas-Silva，2016）以及国际学生流动性的高涨（Frandberg，2015; Tan 和 Hugo，2016）。

然而，任何读者都会注意到，本刊发表的移民研究是明显不同的。这是因为我们把移民作为人口地理学和地理人口研究的一个关键维度（Findlay&Mulder，2015）。我们探讨了五个主题，阐明了作者在我们的期刊中发表的重要学术进展。我们首先回顾一些概念上的进展，然后开始研究人口迁徙本身，迁徙对于特定人群的后果，与社会隔离有关的问题，最后是跨国观点。

对人口移徙的（再）概念化

人口地理学家对空间、地点和人口学的多重环境感兴趣。可以说，可以认为，最重要的概念上的进步是承认人口流动（包括许多种形式的人口迁徙）是相关联性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意味着移民不再被视为由个人决策推动的孤立“事件”。相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迁移是关系性的，是将

50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002/(ISSN)1544-8452。

不同的生活跨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共享同一住所并有可能一起迁移的人的生活是关联的。（van Bochove 等，2015）。在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之间（例如在为工作进行国际迁徙的人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之间）（Murphy 等人，2016），或在到达一个社区的迁入移民和在同一个社区并在适应新来者的非迁移者之间，都是相关联的。（Phillips&Robinson，2015）。在移民和那些有权力许可或阻止人口流动的人（例如那些向新来者分配住房的人），或那些支配移民政策并决定哪些人可以留下来而哪些人必须回到他们来源地的人之间，是关联性的。（Lietaert 等，2015）。

Findlay 等人试图提供更广泛的概念框架，以便为不同的人口迁徙研究理清秩序。（2015：394）他们提出了一个三层架构来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迁徙和其他人类流动的变化。在一个层面上，更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和更长的寿命导致了个体和相关家庭成员流动性的变化（Coulter 等，2016）。其次，诸如在劳动力市场全球化（Visser，2016）或碎片化的住房市场运营的结构性影响已经在人口流动性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周期性效应”（Vargas-Silva，2016）。第三，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时空转换中嵌入的人们生活的本质已经在人类流动的许多方面产生了长期变化。这一直与世俗根基的好转（Champion 等，2016a）以及英国政府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对青年流动的影响等等动力有关（Champion 等，2016b）。

这一关于移民研究概念进展的讨论产生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关于流动性的知识应该植根于对移民为关系性实践的承认；其次，移民应该被视为一个关键机制，它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所有人类地域，包括移动者和非移动者（ Jons，2015）。

## 移民行为

《人口，空间和地点》的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描述和解释移民行为本身，无论是在总体移民流量方面还是在个人行为方面。测量人口迁徙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Bell 等人（2015 年）描述了全球内部（一国之内）流动计量的测量方式的差异。Sander and Bell（2016）展示了如何根据年龄、时期和出生群体（同时代出生的人）来摸清移民流量。大多数其他研究更详细地讨论了人口迁徙如何与某些个人特征相关。虽然一些研究旨在在总体上解释迁移的可能性（Thomas 等，2016），但大多数文章都有一个更具体的关注点。各种文章涉及具体的迁徙目的地，如农村地区（Eimermann，2015; Stockdale，2016）。其他文章集中在特定人口类别，如父母及其子女（Bennett 等，2015）、博士生（Pásztor，2015）和老年人（Marjavaara 和 Lundholm，2016）。然而，其他文章则侧重于特定类型的人口迁徙，如回归移民（Amcoff 和 Niedomysl，2015; Erdal 等，2016; Model，2016），向第三国继续迁徙（Ahrens 等，2016）或临时迁徙（Zander 等，2016）。也有研究人们的移徙动机（Clark 和 Maas，2015; Coulter & Scott，2015; Vilhelmson 和 Thulin，2015），一项研究侧重于移民决策（Balážet，2016）。

## 迁徙的后果

《人口，空间和地点》2015 年和 2016 年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迁徙有许多个人和社会后果。从劳动力市场结果来看，迁徙通常对个人有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劳动力移民易受

劳工政策和东道国经济的影响（Maher & Cawley，2016）或遭受歧视（Wang 等，2015）。对于返回到阿富汗的移民案例，Van Houte 等（2015）认为移民加强了现有的社会经济分层而不是改变它。尽管高技能移民可能会一帆风顺，但他们也面临相当大的风险（Bradatan 2016，以及高技能移民特刊中的其他论文，她写的引言）。Kveder 和 Beauchemin（2015）描述了移民经历如何与本国的房地产和商业资产投资相关联。其他文章的重点是移民对人际网络的影响（Newbold 等，2015），死亡率（Mberu&Mutua，2015; Zarulli，2016）或健康与幸福（Murphy 等，2016）。

迁徙产生的隔离

社区之中、之内、之间和之外的国内和国际移民是当代人口地理隔离的主要组成部分。最近《人口，空间和地点》的许多论文都强调了多种形式的移民（重新）产生社会空间隔离，并形成隔离新空间性的基础。随着对地方社区动态民族构成的普遍关注，最近的研究论文显示（非）隔离邻里日益多样化（Johnston 等，2016），社会和空间混合水平有所增加（Catney，2016），以及由移民引发的种族间共存的证据（Kohlbacher 等，2015）。这里的差异因素包括社会差异关键内容（例如宗教、种族、文化、社会阶层）的影响，例如，基于全国性和特定区域性来源地之间的差异（Aradhya 等，2016）以及与农村和城市移民身份相绑定的部分（王等人，2017）。令人信服的证据揭示了隔离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自我选择性 / 选择性移居来维持的（Zucotti 和 Platt，2016），以及由于与人群和地点的锚定感，比如熟悉度、社交关系和邻里关系造成的不移动和不迁移，（Fong 和 Hou，2015; Clark 等，2015; Holton，2015）。关键在于随后的移民社会群体的代际效应，这些社区群体可以“保持不动”在特定的隔离式社区和 / 或在社区内社会性移动（Goodwin-White，2016），或者迁移到不同的隔离（且多样）社区（Gustafsson 等，2016）。其他最近的论文阐述了社会空间隔离是如何延伸到住宅领域以外的社会和娱乐互动的不同公共空间的（Neal 等，2015），并在职业 / 工作空间内越来越严重（Gandini 和 Lozano-Ascencio，2015）。

跨国观点

研究人员在研究跨国主义及其对原籍地和目的地地区的变革性影响方面由来已久（Fauser 等人，2016）。最近的研究通过展示不同类型流动性之间强大的联系来（为研究体系）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Janta 等人，2015）。特别是跨国迁徙已被证明是大量短期流动的前兆，涉及到移民回到其原籍地区探望朋友和家人以及反过来的家人的看望。研究（Humbracht，2015）表明，这些访客的流动性不仅仅涉及旅游，而且他们在提供照料，身份确认以及权利维护（如领土权利）方面也很重要。

另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是跨国社会保护（Faist，2015）。移民者用各种策略为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家人提供非正式的社会保护。他们的社会实践已被证明是生成新的社会和地理不平等的关键过程。这提出了许多问题，事关社会保护对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移民及其家人的生活机会的影响。

结论

显然，在《人口，空间和地点》发表的人口地理学和地理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迁徙及其原因和后果有着广泛的兴趣。这种广泛的兴趣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表现出来，从概念性探索到大规模数据集的分析，使用实验方法研究，到采用定性方法（如深度访谈）的研究。最近的研究论文清楚地突出了当代移民过程和结果以非凡方式（重新）塑造全球人口地域的重要和多样化的方式。

# *第五章*

# *附录 A. 定义*

下列定义是按术语英文单词首字母顺序排列的。

---

*国际习惯法*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确定了国际法的关键来源。它们是：

> （a）国际公约，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特殊性的，都确立了竞争国明确承认的规则；（b）国际惯例，可以证明一般惯例被接受为法律；（c）文明国家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d）遵守第 59 条的规定、司法裁决和各国最高级的国际法学家的教导，可作为确定法律规则的附属手段。[51]

《国际法院规约判例法》，特别是其中的北海大陆架案，为国际习惯法及其内容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52]

*全球治理*

关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定义表明，该术语可以从程序性层面或实质性层面来界定：

> 在程序性层面上，可以将它（全球治理）理解为各国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围绕某一特定事项所牵涉的共同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议程设置、谈判、监督、实施和执行。在实质性层面上，可以通过规范、规则、原则和决策程序来识别出全球治理，这些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调控着国家（和其他跨国行为体）的行为。[53]

51 此处需重点关注。欲得全文，请参见《国际法院公约》，网络地址为 www.icj-cij.org/en/statute（于 2017 年 7 月 18 号获取）。

52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Denmark), 1969.

53 Betts, 2011. 欲了解已经被融入上文的“政体”的定义，另请见 Krasner, 1983。

*有组织犯罪团伙*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公约”）第 2 条将“有组织犯罪团伙”定义为：

一个包含三人或三人以上成员的结构化群组，存在了一段时间，意图实现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 “公约”所确立的犯罪行为，且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获得金融或其他物质利益为目的。

*偷运移民*

《偷运议定书》第 3（a）条将“偷渡移民”定义为：

为了直接或间接地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使某人得以非法进入该人不是国民或永久居民的缔约国。

第 3（b）和（c）条还进一步澄清道：

（b）“非法进入”是指与合法进入接受国的必要条件不符合的过境；
（c）“欺诈性旅行或身份证件”可指符合下述情况的任何类型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
（i）非经合法受权的个人或代理机构代表国家而制作或签发的旅行或身份证件，证件为伪造或被改动；或者
（ii）以提供失实信息、贿赂强迫等非法方式不当签发或获取的；或者
（iii）由合法持有人以外的人使用。

*贩卖人口*

“巴勒莫议定书”第 3（a）条将“贩卖人口”定义为：

以剥削为目的，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迫手段、绑架、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利用易受伤害处境、又或是给予接受付款或利益以取得对别人的控制权，以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这种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与奴隶相似的做法、奴役或割取器官。

第 3（b），（c）和（d）条还进一步澄清道：

（b）贩运人口的受害者对于条款（a）中所述的有意的剥削的认同，在条款（a）中所述的任何一种方法已被使用的情况下，应该是无意义的；
（c）以剥削为目的，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受儿童，即使不涉及条款（a）中所述的任何手段，也应视为“贩运人口”；
（d）“儿童”是指任何未满十八岁的人。

# 第五章

## 附录 B. 全球多边条约和缔约国

将公约根据其专题领域罗列如下。一些公约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遇到这种情况时，仅列举一次。[54]

| 主题领域 | 条约 | 通过时间 | 生效时间 | 缔约国数量 | 缔约国列表链接 |
|---|---|---|---|---|---|
| 人权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 1966 | 1976 | 169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
|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 1966 | 1976 | 165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3&chapter=4&clang=_en |
|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ERD） | 1966 | 1969 | 178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2&chapter=4&clang=_en |
|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 1979 | 1981 | 189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8&chapter=4&clang=_en |
| | 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 | 1984 | 1987 | 162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9&chapter=4&clang=_en |
| | 儿童权利公约（CRC） | 1989 | 1990 | 196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1&chapter=4&clang=_en |
| | 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ICRMW） | 1990 | 2003 | 51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3&chapter=4&clang=_en |
| | 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 | 2006 | 2008 | 174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5&chapter=4&clang=_en |
| |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2006 | 2010 | 57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6&chapter=4&clang=_en |
| 难民法 | 有关难民身份的公约（难民公约） | 1951 | 1954 | 145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2&chapter=5&clang=_en |
| | 有关难民身份的议定书 | 1967 | 1967 | 146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5&chapter=5&clang=_en |
| 贩运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CTOC） | 2000 | 2003 | 188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2&chapter=18&clang=_en |
|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 | 2000 | 2003 | 171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2-a&chapter=18&clang=_en |
|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移民偷运的补充议定书（偷运议定书） | 2000 | 2004 | 145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2-b&chapter=18&clang=_en |

54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关于通过、生效和缔约国的信息均是在 2017 年 7 月 18 至 23 日间获取的。

| 主题领域 | 条约 | 通过时间 | 生效时间 | 缔约国数量 | 缔约国列表链接 |
|---|---|---|---|---|---|
| 劳工与服务 * | 就业移民公约（修正案）（97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 1949 | 1952 | 49 | 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1300:0::NO:11300:P11300_INSTRUMENT_ID:312242:NO |
| | 有关在虐待条件下的迁徙和促进迁徙工作者机会平等和待遇的公约（143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 1975 | 1978 | 23 | 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1300:0::NO:11300:P11300_INSTRUMENT_ID:312288:NO |
| | 有关家政工作者的体面劳动的公约（189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 2011 | 2013 | 24 | 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1300:0::NO:11300:P11300_INSTRUMENT_ID:2551460:NO |
| |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 1994 | 1995 | 164 WTO 成员 ** | 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
| 迁徙方式 |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修订版（SOLAS） | 1974 | 1980 | 163 | 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StatusOfConventions/Documents/Status%20-%202017.pdf *** |
| | 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修订版（SAR） | 1979 | 1985 | 110 | 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StatusOfConventions/Documents/Status%20-%202017.pdf **** |
|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 1982 | 1994 | 168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XI-6&chapter=21&Temp=mtdsg3&clang=_en |
|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 | 1944 | 1947 | 191 | www.icao.int/publications/Documents/chicago.pdf |
| 气候变化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 1992 | 1994 | 197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IND&mtdsg_no=XXVII-7&chapter=27&Temp=mtdsg3&clang=_en |
| | 巴黎协议 | 2015 | 2016 | 154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7-d&chapter=27&clang=_en |

* 章节正文中提到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八个基本协议可以通过网址 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找到。

** WTO 成员包括国家、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和欧洲联盟。

*** 请见第 16 页；文件获取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

**** 请见第 410 页；文件获取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

# *第七章*

# *附录 A. 儿童移民：驱动因素和挑战*

*Tom K. Wong, Nadia Hartvisgen 和 Elizabeth Arroyo*[55]

正如成年移民者一样，儿童移民也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的，而这种决定很少能够化约为任何单一的决定因素。然而，儿童的迁徙，尤其是没有父母或其他成年人陪伴，对于儿童在移民决策中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 或缺乏作用 )提出了更为紧迫的问题。此外，对于父母移民后留下的子女，可能是“移民子女是家庭团聚中的积极推动者，能够（重新）塑造和谈判亲属关系”。[56]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世界上大多数的儿童移民并不是逃避暴力或逃避迫害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这些儿童可能是出国谋求前景的改善，例如更好的经济前景和扩大获得教育的机会。家庭的作用在这里值得特别关注。家庭动力本身可能成为迁移的推动因素，例如，当家庭破裂（例如失去养家者或户主）使得经济上有转移到别处的必要性时。家庭内部的动力也可能导致儿童，特别是青少年，承担迁徙负担，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身体素质，能够在国外进行艰难的旅程。。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家庭也可以战略性地决定孩子在目的地国家成功的可能性更高。[57]

然而，儿童也可能迁移，因为决定离开困难的环境或紧急情况——冲突，迫害和歧视，虐待和暴力，以及环境灾难，这只是促使儿童移民的几个因素。冲突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儿童特别容易受到军队或武装团体的招募以及许多其他严重形式的虐待和剥削。事实上，冲突每年都会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儿童背井离乡。[58]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儿童移民者在移民决策中都没有能动性。青少年的移徙可能不像是年幼的儿童那样捆绑于成人的决定。例如，对于幼童，父母可能会面临将其留在家人身边或将他们带走的决定，但青少年可能会让其自己选择。儿童移民者，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幼童，在冲突引起的移民方面作出移民决定时可能没有主动性，但在其他情况下，青少年可能比幼童移民有更多主动性。例如，当移民决定聚焦于寻求经济或教育机会时。[59]

## *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阿富汗几乎一直在经历冲突和政治动荡。因此，近几十年来，阿富汗的流离失所和移民问题一直是全球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阿富汗人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寻求庇护者群体之一。[60]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阿富汗儿童独自开始这些旅程，或在中途被分开。

最近对欧洲大陆上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人都是第二代移民者，

55 Tom K. Wo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Nadia Hartvisg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Elizabeth Arroyo, Sin Fronteras, IAP.

56 See Caneva, 2014, for a review of children’s roles in migratory processes. See also Tyrrell and Kallis, 2016.

57 Mougne, 2010; Edmonds and Salinger, 2007; Suárez-Orozco and Suárez-Orozco, 2009.

58 UNICEF, 2016.]

59 For example, see Vervliet et al., 2015.

60 Echavez et al., 2014。

这意味着他们与阿富汗的关系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 ,生活在阿富汗以外的国家 ,现在已经到了欧洲。[61] 对阿富汗无陪同未成年人的采访表明，许多人没有想过他们在阿富汗的未来，也没有想过到邻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准备冒着健康和安全风险抵达欧洲。[62] 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因此可能继续在欧洲寻求庇护。阿富汗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占 2015 年在欧盟提出庇护申请的所有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中的一半以上。[63]

谈到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为何要离开阿富汗前往欧洲，阿富汗研究部门和联合国难民署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会加入到无人陪伴的旅行中是由于一系列经常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贫穷，不安全，缺乏教育、就业机会、家庭和同龄人的期望”。[64] 此外，特别是在移民和走私网络发达的高发地区，离开阿富汗的决定常常由一家之主和孩子分享。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揭示了家庭使用的决策逻辑，当他们把孩子送往欧洲时，在许多情况下，所涉及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些风险因移徙带来的潜在收益而变得黯然失色，或者因为家庭感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送孩子出国。[65]

在途中，这些儿童，主要是 13 至 17 岁的青少年男孩，[66] 十分容易受到身体暴力，走私者的骚扰和执法人员的性剥削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在与阿富汗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进行的访谈中，尽管有些人公开讨论他们的迁徙旅程，许多人却不想回忆起他们的经历。[67] 如上所述，由于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经常在家人的同意和支持下前往欧洲，因此，他们所遭受的创伤“因他们的期望以及不让家人失望的压力而加剧”。[68] 当儿童被委托给偷运者时，家庭因此所累积的债务使这些压力变得更加沉重。个人对更好的生活的期望会加大压力，这可能导致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陷入险境。[69]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无人陪伴的旅途中回来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家人，都强烈地表示，一旦他们能为旅行提供资金，他们将进一步进行无伴旅行。”[70] 此外，根据对希腊境内的 1,206 次无人陪伴儿童移民访谈，国际移民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42% 的孩子，主要来自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打算在欧洲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不管希腊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只有约 23%表示希望返回原籍国。其余受访者表示愿意返回原籍国，但后来决定留在希腊。[71]

*来自中美洲的无人陪伴儿童在墨西哥过境*

2014 年，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内的中美洲北部三角地区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导致许多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离开家园。有些人去了邻国，但许多人到美国避难，并通过墨西哥向北跋涉。在那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 52,000 名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中美洲无人陪

61 Donini, Monsutti and Scalettaris, 2016。
62 Boland, 2010。
63 Eurostat, 2017。
64 Echavez et al., 2014。
65 同上。
66 同上。
67 Boland, 2010。
68 Donini, Monsutti and Scalettaris, 2016。
69 Mougne, 2010。
70 Echavez et al., 2014。
71 IOM, 2016a.。

伴的未成年人。[72]

随着中美洲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通过墨西哥的流动增加，该国的移民管制工作也有所加强。2015 年，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INM）逮捕了近 36,000 名正在通过墨西哥过境的中美洲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73] 相比之下，2014 年这一数字大大低于此数，只有 23,000 多人。

中美洲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流向美国的主要动因之一是暴力。北部三角地区的杀人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74] 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经常离开北三角，以避免强行招募年轻人犯罪的团伙，因为他们强迫年轻人实施犯罪行为，包括凶杀和敲诈勒索，或强迫他们贩毒或进行性交易。[75]

在北部三角地区内移徙可能不如墨西哥之旅危险，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通过塔巴斯科州（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北部边境）的 Tenosique 镇或在恰帕斯州的伊达尔戈城（墨西哥南部与危地马拉接壤）进入墨西哥。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一般通过货运列车进入墨西哥或由人贩子偷运到该国。孩子们坐在货运列车顶上的照片，往往身无长物，带只一个背包，除了火车车厢边缘的细铁条外，通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触目惊心的旅程，危机四伏。此外，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INM 在某些地区的强大存在，已经导致移民者放弃安全的路线，并试图通过更危险的路线过境墨西哥以避免被逮捕。此外，通过梅里达倡议，美国拨出数十亿美元帮助墨西哥加强南部边界的安全，并扩大其移民拘留能力，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内，[76] 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措施。虽然这使得通过墨西哥的过境更加困难，但它也增加了对偷运者的需求。由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过境墨西哥，可能会遭到绑架，被有组织犯罪网络勒索，还有劳动剥削和性剥削以及其他形式的虐待。[77]

虽然过境变得更加危险，但中美洲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继续通过墨西哥前往美国。认识到这一点，墨西哥政府也努力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设立了儿童保护联盟，其任务是向移徙儿童提供援助和支持。2014 年，墨西哥还通过了“儿童和青少年权利法”(General Law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其中包括为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措施。

*保护方面的挑战*

儿童移民带来了许多独特的保护挑战，因为儿童移民者面临既是儿童又是移民者的“双重脆弱性”。[ UNICEF, 2016.] 经验上说，儿童移民者特别容易遭受暴力、剥削和贩运；当孩子独自一人移徙或与家人分离时，人们对这些虐待的担忧会加剧。即使孩子最初可能与家人一起移徙，他们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在旅途中分开。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描述的，“暴力可能会以国家行动的形式发生（特别是在移民执法或拘留期间），普通公众（以仇外攻击的形式），雇主（以各种形式的童工），其他儿童（包括学校中欺凌和虐待）或家庭内（以家庭暴力的形式）”。[78]

72 Meyer 等人，2016 年。2014 年，在边境被捕的 52000 名中美洲无人陪护未成年人比前一年增长了 150%，比 2011 增加了 1200%。

73 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 2016.

74 例如，在 2015，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在故意杀人案件每 100000 人的数量排在第一和第二。参见世界银行，未注明出版日期。

75 例如，病房，2013；参见 Serna 2016。（see Ward, 2013; see also Serna, 2016.）

76 Bochenek, 2016.

77 Kinne, Goździak and Martin, 2016.

78 同上。

童工和童婚逼迫是儿童最易受伤害的最严重剥削形式。当儿童或他们的家人被迫依赖偷运者时，对这种剥削的担忧变得更加尖锐。当然，虽然移民走私和贩卖人口[79]是不同的，但对走私者剥削儿童的关注经常引起对贩卖儿童的关注。虽然对贩运受害者的全球估计数量有限，且难以收集，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估计，2014 年发现的贩运人口受害者中有 28%是儿童，其中约 20%是女童，8%是男孩。[80] 儿童移民者的死亡使得需要解决儿童移民面临的保护挑战变得更加迫切。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失踪移民者项目，自 2000 年以来，至少有 46,000 名移民者死亡，许多死亡者是儿童。[81] 例如，2015 年，IOM 组织估计，爱琴海每三名移民死亡中就有一名是儿童。[82] 此外，2015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由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 Frontières，MSF）在地中海海域救出的近 24,000 名移民中，有四分之一是儿童。[83]

儿童移民者的失踪也需要我们急切关注。2016 年，欧洲约有 10,000 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失踪，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在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讲话时，欧洲刑警组织指出，尽管其中一些儿童可能已经离开，在欧洲寻找家人，但许多人可能被偷运者利用，包括用于劳工剥削目的（用于乞讨或被迫犯罪）和性剥削。

79 关于“移民走私”和“人口贩卖”的定义，以及其他相关概念，见附录 A 这份报告的第 2 章，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80 UNODC, 2016.

81 IOM, 2016b.

82 同上。

83 同上。

# 译后记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全球化智库（CCG）很荣幸地再次和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承担了此次翻译工作，这是继 CCG 翻译出版《世界移民报告 2013》以来第三次为 IOM 翻译出版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年度报告。国际移民组织（IOM）是国际移民领域唯一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拥有 169 个成员国，8 个观察国，其宗旨是通过人道的和有序的迁徙让移民与社会受益。中国于 2016 年正式成为成员国。全球化智库（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也是中国国际移民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具有国家授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7》的排名中，CCG 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 91 位，是唯一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国际移民组织在促进各方就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合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连续多年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已成为国内外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的重要参考。《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的面世，使报告能够在中文世界里得以传播，为大家提供全球移民的最新趋势、议题与有关数据。不仅如此，本报告关注全球治理中的移民问题，全方位的介绍了国际移民领域的学术研究，国际移民与其他相关议题关联等等，旨在多层次的、从政策、学术与大众认知上为促进安全、有序、正常的迁徙做出贡献。为了让中国读者与研究者更深入了解国际移民相关议题的研究，译者在部分章节特意不将正文部分已经提及的机构名称在脚注处译为中文，以方便读者更准确查阅这些机构提供的重要文献与信息来源。全球化智库的研究人员杨靖皎、应妲、曲梅、牛骁、蒋逸尘和李珊珊参与了《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翻译工作。由于时间关系，本报告的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全球化智库（CCG）2018 年。

国际移民组织（IOM）

联合国移民署

17 route des Morillons P.O. Box 17，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电话：+41 22 717 911 传真：+41 22 798 6150
E-mail: hq@iom.int 网址：www.iom.int